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

【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 【英】伊泽·英格利斯 编 张士尊 信丹娜 译

奉天三十年 (1883-1913)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

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83-1913

Being the experiences and
recollections of Dugald Christie, C.M.G.

【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 【英】伊泽·英格利斯编 张士尊 信丹娜译

奉天三十年（1883-1913）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

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83-1913

Being the experiences and
recollections of Dugald Christie, C.M.G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英]伊泽·英格利斯编;张士尊,信丹娜译.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2

ISBN 7-216-04921-7

I. 奉…

II. ①杜…②伊…③张…④信…

III. 沈阳市—地方史—史料—1883-1913

IV. K29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8896 号

奉天三十年(1883-1913)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

[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 著

[英]伊泽·英格利斯 编

张士尊 信丹娜 译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221 千字
版次: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数:1-3 000
书号:ISBN 7-216-04921-7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8.375
插页:2
印次: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

大量记录,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录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的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

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 年 5 月

译者序

正像本书序言中所说,此书不是一本历史,也不是一本自传,而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对历史事件的一些回忆,既然如此,在阅读本书之前,读者应该对作者有个大略的了解。

此书作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中国名字叫司督阁,1855年出生于苏格兰山区一个普通的牧场主家庭。杜格尔德11岁前,父母先后病故,牧场逐渐衰败。杜格尔德15岁时,为了谋生,全家迁居格拉斯哥,他只好辍学,进入一家贸易公司做学徒。在格拉斯哥期间,杜格尔德积极参加宗教活动,是“宗教改革青年社团佛兰芒支部”的成员,“格拉斯哥铸铁少年团”的积极支持者。后来,又受到英国宗教复兴运动的影响,决心成为一名牧师,终身从事传教事业。杜格尔德22岁时,经过考试,进入爱丁堡大学医疗传教士学院。在五年的学习期间,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且获得多次奖励。毕业以后,杜格尔德毅然抛弃国内的优裕生活,接受苏格兰联合长老会海外传教委员会的派遣前往中国东北传教。1882年,杜格尔德携新婚妻子乘轮船前往中国,并于同年11月,在营口港登陆,然后冒着大雪酷寒,整整走了八天,到达沈阳,但由于没有安身之处,只好原路返回。第二年春天,杜格尔德再次前往沈阳,终于在小河沿买到一处住宅,有了立足之地。

从1883年初到1922年末,整整40年时间。杜格尔德先后在沈阳建立起第一家诊所;第一家医院;第一家医学院。每年诊治的患者从数百人,数千人,数万人,到数十万人。杜格尔德参加了1883年沈阳大霍乱的救助;1894年营口红十字医院的创建;1904年至1905年

日俄战争受害者的收容; 1910年至1911年抗击肺鼠疫的斗争。为此, 人们称他为奉天神医和奉天圣人。中国政府、俄国政府、日本政府、英国政府均先后为其授勋, 以表彰他在救死扶伤工作中的突出贡献。杜格尔德长期生活在中国, 深谙中国文化的奥秘, 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 与上流社会关系密切, 赢得了各界人们的普遍尊敬和信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杜格尔德的身体每况愈下。1922年, 盛京医学院的工作已经走上正轨, 在其健康无法恢复的情况下, 他返回了爱丁堡。杜格尔德28岁来到异国他乡, 68岁回到自己的祖国, 真可谓“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但是, 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并没有忘记他的贡献, 在其回国之前, 民国政府特授予他嘉禾勋章; 在其回国之后, 民国教育部和公众团体共同捐资, 为他铸造半身青铜塑像, 竖立在盛京医学院门前, 以资永久的纪念。

杜格尔德虽然回到了苏格兰, 但他的心仍眷恋着沈阳, 牵挂着盛京医学院的发展。为盛京医学院前往苏格兰留学的学生, 为盛京医学院获得更多的捐款, 他不顾年老体弱, 仍然四处游说奔波。1936年,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医生在苏格兰病逝, 终年81岁。

此书的合作者伊泽·英格利斯, 1855年出生于苏格兰, 为爱丁堡长老会詹姆斯·英格利斯牧师的女儿, 本人也是位牧师, 与哥哥J·W·英格利斯牧师一起在沈阳从事传教工作。1892年杜格尔德的妻子病逝, 同年秋天, 伊泽·英格利斯与杜格尔德在营口举行婚礼。从此以后, 她一直与杜格尔德生活在一起, 很少分开。盛京医学院成立后, 她担任英语教授。如今, 我们所能看到的反映他们在沈阳生活的著作, 即 *Ten Years in Manchuria: A Story of Medical Mission Work in Moukden, 1883—1893* (《满洲十年》); *Dugald Christie of Manchuria: Pioneer and Medical Missionary* (《满洲的杜格尔德·克里斯蒂》); *Chinese* (《中国人》); *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83—1913. Being the experiences and recollections of Dugald Christie* (《奉天三十年(1883—1913)》) 等书, 从行文风格上看, 可能均出自伊泽·英格利斯之手。据伊泽·英格利斯1922年回忆: 1914年, 她和杜格尔德回国募捐, 一位伦敦出版商要求克

里斯蒂医生写本书,介绍其在中国的经历。杜格尔德认为此书的出版会促进教会对盛京医院和医学院的投入,并有助于为盛京医学院的捐款活动,所以欣然允诺。经过两人数月的努力,终于使本书在1914年5月出版发行。由此看来,说伊泽·英格利斯是此书编辑者并不准确,实际上,此书是两人共同撰写,或主要出自伊泽·英格利斯的手笔。伊泽·英格利斯病逝于1952年,终年97岁。

1883年至1913年这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变迁速度较为迅速的时期,也是东北历史风云变幻最为复杂的时期,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黑死病、辛亥革命,起伏跌宕,使人目不暇接。身处东北政治中心沈阳的杜格尔德,以医疗传教士的特殊身份,参与和经历了这些重大的历史事变。在本书中,他虽然没有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的研究和理性的思考,但是,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形象地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给人以大量的感性知识。因此,本书为晚清史、东北地方史、基督教传播史、社会史等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本书英文本由伦敦“康斯特布尔有限公司”于1914年5月出版,当时就受到热烈的欢迎,20年代初在英国的书店里就已经买不到了。提到本书的版本问题,不能不说到20世纪30年代先后出现的两个日译本:1935年日本学者卫藤利夫的译本《满洲生活三十年——奉天圣徒克里斯蒂的回忆》(节译);1938年另一位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的译本《奉天三十年》(基本全译,但省去每章前面的诗,另外原著中的图片也没有采用)。卫藤利夫早年肄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从事西文翻译工作,后进入满铁图书馆系统,长期担任奉天图书馆的馆长。在沈期间,他广泛搜求有关东北的西文史料,杜格尔德的著述就是其中一种。矢内原忠雄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与卫藤利夫一样热衷于收集东北地方史料,看到卫藤利夫的节译本后,认为应该把其全部翻译过来,所以才有了日文全译本《奉天三十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为什么两位学者要先后翻译同一本书呢?我想,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太难。首先,他们都被杜格尔德的奉献精神所感动。卫藤利夫说:“在我研究那些枯燥无味的奉天地方史料的同时,阅读了克里斯蒂的

《奉天三十年》。我发现它凝结着人们的血汗和眼泪,是奉天永垂不朽的东西,即使其他一切都消失了,这篇回忆录也将流传下去。因为它发自笔者的内心,具有浸透人们灵魂的作用。”(《〈满洲生活三十年——奉天圣徒克里斯蒂的回忆〉序言》)矢内原忠雄也说:“提起司大夫,奉天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们感激他的恩惠,像神灵一样崇拜他。不仅如此,就是地方官也对他特别尊重,称誉他为传播文化的使者,聘他为外交工作的名誉顾问,给予其超越国界的信任。”(《〈奉天三十年〉序言》)卫藤利夫长期在东北从事文化工作,矢内原忠雄本人就是名基督徒,两者与杜格尔德产生共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现实的社会需要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带有军国主义情绪的卫藤利夫,还是带有民主色彩的矢内原忠雄都毫不隐讳。他们希望占领东北的日本殖民者向杜格尔德学习,以爱征服东北人民的心,征服中国人民的心,从而实现其在东北以及全中国建立“王道乐土”的“理想”。从这个角度看,日译本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是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服务的。

此次翻译,完全按照1914年伦敦英文本,并参照矢内原忠雄1938年的日译本。其诗文、照片、行文格式基本保持原貌,只是对原著所涉及的人名、地名,以及易于发生误解之处稍加注释,以方便一般的读者。

值得说明的是,杜格尔德虽然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但这并不等于其所有记述都符合历史实际,所有评价都公允客观,我们尊重他对某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印象和感受,如“袁世凯”,“义和团运动”等。并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出于保留历史著作的完整性,我们对这些观点没有改动。因此,敬请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千万不要忘记他的真实身份:一位著名的英国医疗传教士,一位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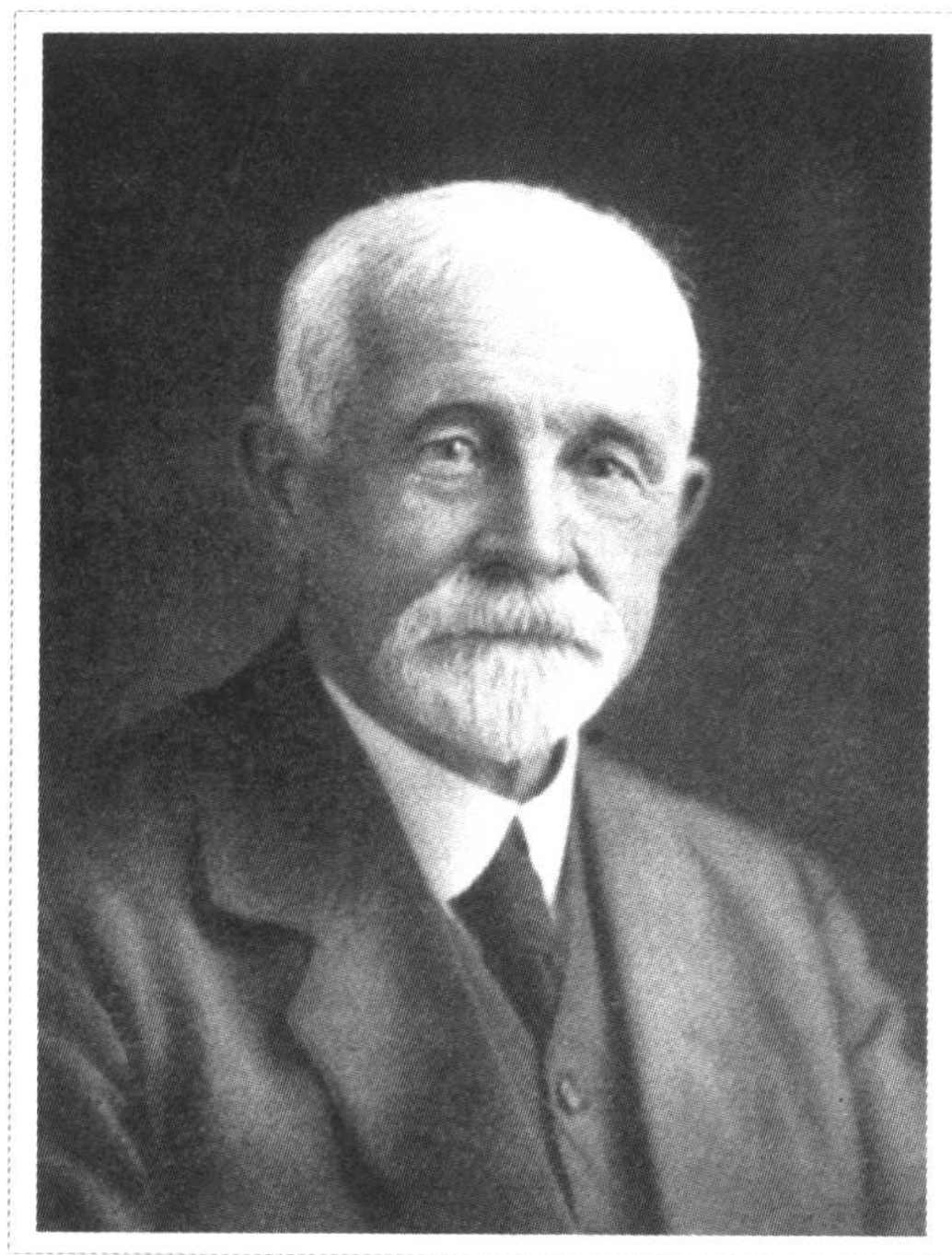
本译著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先生审校修改,在此特致谢忱。

译 者

2006年4月25日于月明山下

原 著 序

这不是一本历史书，更不是一本自传。我们没有通过这本书对满洲，甚至奉天进行全面介绍的打算，也没有对那里的人民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进行详细描述意图。很多重要的传教成就没有涉及，或只是稍微提到一点。介绍满洲，以及那里发生的战争和传教事业的书籍已经出版。我们只是想谈点个人的印象和感受，由此勾勒出昔日东方宁静不变的生活图景，以及今天风云激荡的历史画面。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医生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已出书目

档案文献

《中国新史》[葡]安文思著 何高济 李申译

《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法]李明著 郭强等译

《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上下册) 倪瑞英等译 刘海岩校

《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英]赫德著 叶凤美译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英]李提摩太著 李宪堂译

《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 张士尊等译

研究著作

《清初扬州文化》[美]梅尔清著 朱修春译

《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美]曾小萍著 董建中译

《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德]余凯思著 孙立新译 刘新利校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
[美]罗威廉著 江溶 鲁西奇译 彭雨新 鲁西奇校

《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 [美]魏
若望著 吴莉苇译

目录

译者序 1

原著序 1

第一章 那是一段值得留恋的时光 1

背景介绍

第二章 艰难的工作 4

1883—1887 年——奉天医疗传教工作的开始——各种困难——敌视和反对——邪恶的谣言——建立盛京医院——第一批手术

第三章 奉天：城市和人民 12

满人——满洲人——农村和农产品——奉天城——北陵——罗马天主教传教活动——新教传教活动

第四章 架起跨越深渊的桥梁 21

中国礼仪的重要性——礼貌——克制——两性分隔——居住——穿着——礼节——官员——无意的冒犯

第五章 在中国人中行医 29

中医的原理——古代外科知识——现代的无知——有害的方法——有益的方法——迷信——魔鬼附体——棘手的患者

第六章 满洲的气候、疾病和洪水 38

气候——当地人的居室——卫生状况——肺结核——眼睛疾病——1888 年的洪水——疟疾

第七章 东方和西方的误解 46

中国人民与其他国家人民基本相似——冷漠和忘恩负义的谴责——慷慨和好客——守信——“欺诈”——神经质——宿命论——自杀——复仇——残忍的报复“理”——缺少对宗教的虔诚

第八章 远离狂乱的人群 56

进入满洲——从前遥远的路途——旧时的旅行：乘车和行船——景观——在山区旅行——一位来访的波兰人——伯德·毕晓普夫人

第九章 1883—1894 年的进展 64

满洲对基督教的反应——杂居的移民——开放的观念——传教的政策：教会是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的——医疗传教——巡回医疗——诊所——医院——培养助手

第十章 中日战争爆发之初侧记 72

中国人对外国和外国事物的无知——派遣满洲士兵开往抗日前线——无法无天的满人——一名传教士被杀害——与官方的友谊

第十一章 中日战争的严酷现实 78

从前方传来的坏消息——中国将军们之间的争论——平壤战斗和左将军战死——奉天人的焦虑——传教士撤离奉天——日军向前推进

第十二章 救死扶伤的红十字医院 84

牛庄港的红十字工作——附近的战斗——日军占领——中国人的态度——和平——返回奉天——政府对红十字会工作的肯定

第十三章 出人意料的战争结局 92

满洲的觉醒——对西方知识的渴望——官员的冷漠——询问基督教的人们——不同的动机——接受洗礼的条件——教会人数迅速增加和自助能力增强——培养布道师和牧师

第十四章 太平沟瞎张的故事 98

在盛京医院——在他的家乡——洗礼——阅读盲文——
游走四方的布道师——殉教者

第十五章 走上歧途的爱国主义 105

外国对中国的侵略——改良运动——1898 年的变
法——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对危险估计不足——满洲
的平静气氛——人民和官员的友好态度

第十六章 疯狂的 1900 年 113

义和团兴起的原因:排外情绪;迷信;政府支持——奉天
政府态度的改变——朝廷的法令——传教士撤离——烧毁
传教的建筑——恐怖统治——殉道——变节——刘牧师
的故事——医院的助手——政府消灭义和团

第十七章 沉重的代价 128

俄军占领——盛京将军逃离奉天——奉天的无政府状
态——俄军进城——基督徒返回奉天——基督徒受难的故事
——政治前景——义和团运动对教会的影响

第十八章 1904 年的战争风云 138

俄国和日本——战争的酝酿——日军推进——辽阳战
役——沙河战役——暂时的停息——小规模的战斗——友
谊——在红十字会的火车上

第十九章 奉天大战期间 148

日军的袭击——越来越近的战斗——俄军撤退——暗
无天日的沙尘暴——最后的夜晚——没有撤退出去的俄国
人——弹雨——中国人的态度——日本间谍

第二十章 无辜者的苦难 155

红十字会和难民救助工作——解决难民的住处——传
染病——中国、俄国和日本伤员在一个医院里——没有爆炸
的炮弹——难民返回家乡——中国人对日本人态度的改变

第二十一章 1905—1907 年的重建 165

满洲的改革:严禁鸦片;教育;女子学校;修筑道路;安装

路灯;建立警察组织;改善卫生状况;整理财政——新的盛京
医院建设和开业

第二十二章 精神境界的升华 174

教会人数增多——发展——渴望——复苏——罪恶
感——更高的理想——妇女的进步——教育的发展——
艺术学院——理论培养

第二十三章 医疗传教的准则 181

新教传入中国百年大会——医疗传教成为教会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合乎逻辑的结论:建立医学院;培养中国
医疗传教士

第二十四章 满洲医学教育的起步 188

奉天的进步:现代建筑;教育;大学;电话;电灯;电车
道——医学教育的需要——障碍——敞开的道路——医院
的地点——政府的帮助——需要联合教会的承认——募集
资金——反响

第二十五章 黑死病 196

出现鼠疫——沿着铁路线扩散——奉天火车站苦力中
爆发鼠疫——杰克逊医生死亡——对中国人的影响——总
督的同情——纪念活动

第二十六章 抗击鼠疫 206

奉天所采取的抗击鼠疫措施:检查;隔离;布告——困
难——新年拜访——大雪——村庄——悲剧——战斗的胜
利——国际鼠疫会议

第二十七章 奉天的革命 215

革命的原因——奉天保安会——阴谋——民国的诞
生——红十字会

第二十八章 盛京医学院 224

大火的威胁——入学申请——教学开始——毕业生的
前景

第二十九章 革命过后 230

满洲的希望和忧虑——军队的医疗组织——对基督教态度的转变——学生运动——莫特先生的演讲——国家祈祷日

第三十章 展望未来 238

中国的稳定——变化的危险——未来的希望

大事编年 242

插图目录

-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医生 2
- 奉天城门:在奉天八个城门上都建有高高的门楼 3
- 1913年盛京医院门诊部和医学院大楼,病房在门诊部后面 6
- 缓慢而平静的小河,几乎就是一个湖泊 10
- 夏季的小河沿:茶棚中的游客在欣赏荷花 11
- 连接两个城门的宽阔街道 13
- 北陵:风化大理石拱道后面的正门常年关着 17
- 北陵:大理石铺就的宽阔的道路两旁排列着巨大的
石雕动物 20
- 在小河中捕鱼 39
- 奉天基督教堂完全是中国的建筑风格 65
- 满洲士兵前胸和后背都有一个很大的圆形标志 73
- 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盛京医院的大门 114
- 从战争焚毁的农村逃亡的难民:“这么多人到哪去住?” 156
- 1905年的红十字会工作:救助无辜的受难者 158
- 赵尔巽总督:一个干才、著名的理财家——面向未来的人 166
- 盛京医院的走廊:两边都是病房 173
- 徐世昌总督:他维护着中国政府的尊严 189
- 盛京医院的一间病房 194
- 锡良总督:他对治下的人民怀有父亲一样的情怀 197
- 亚瑟·杰克逊医生 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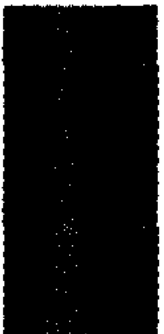
杰克逊医生的坟墓 205

防疫工作者整装待发 207

张作霖将军:他正率领军队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219

盛京医学院 225

王医生:像王医生这样的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
难以估量的 232



第一章 那是一段值得 留恋的时光

哦！多么愚蠢啊，
本可以享受所有甘美之物，
却将这一切轻易抛弃。

——威廉·布莱克^①

前路漫漫，就这样走下去吧。

——苏格兰民歌

寒冷的十一月，风在阴暗昏黄且坚硬沉闷的满洲^②平原上呼啸着，衰草枯杨和低矮的民居与大地浑然一体，没有起伏，没有色彩，一切的一切都是绝对的单调，只有头顶上蓝色的苍穹和闪烁的阳光还透出一线生机。而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我可爱的祖国——她是那样的美丽。天空飘浮着变换的云彩，山岭、荒野、湖泊气象万千，清新的野草随处可见，紫色的石楠花处处开放。在那里，我生活在朋友、同仁和乡亲们中间，处处感受到亲情。而在满洲，从牛

①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英国诗人。译者注。

②满洲(Manchuria):即我们常说的东北,俗称东三省。但两者具体所指的地理范围则有些区别。满洲作为一个专门的地理名称,出现在明末清初,后来西方人称东北为满洲,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清朝人却很少把东北叫作满洲。译者注。

庄港^①到遥远的内地,遇到的却是成千上万难以理解的中国人。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怀有生活的目标和理想,但对我们却充满着敌意和冷漠,最多也只是好奇。除了忙于日常劳作之外,他们根本无暇旁顾。

1882年,我受苏格兰联合长老会派遣,以一名医疗传教士的身份前往满洲。和现在相比,当时所遇到的阻力和反对是相当大的。“为什么去中国?”我的一位教授说,“留在国内,你将有很好的前途。”

“传教是一种失败的尝试,”他似乎是把上海传教失败作为自己的论据,“参加这种活动无异于浪费你的生命。”

在牛庄港上岸后,人们又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到内地去?留在这里,会轻松赚很多钱,同时也能尽力为中国人工作。”

“你正在做一件徒劳的事情,”这是当时普遍的看法,“中国人不需要你,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中医。”

“我愿意给你一个忠告,年轻人。”一位在中国工作多年的老医生说,“中国人根本不相信西医,他们不会吃你一片药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情不自禁地反问自己:他们所说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在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中间,几个外国人能做什么?为了向受难者传播上帝之爱,为了与满洲人一起分享永不熄灭的真理火炬,为了共同启动未来时代的伟大力量,这些都是远大的理想。那么,值得为此一试吗?

三十年过去了,时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人们出于敌视和迫害,烧毁了我们的房子和所有生活用品;我们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致命的鼠疫,以及我们同行的悲惨死亡;我们把孩子送回国内,让他们远离父母,过着艰难的日子;但这些牺牲都很值得。

回首那些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变迁,所有投身其中的人都会感受到,参与一个民族的觉醒和伟大人民的再生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

^①牛庄港(Newchwang Port):根据《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1860年中国东北开放的通商口岸为牛庄,即今辽宁省海城西40里的牛庄镇,但由于港口淤浅,后改为辽河口的营渚,或营子、营口,即今营口市,但在西方文献中仍称营口为牛庄,营口港为牛庄港。译者注。

情。如今,对外国人的敌意已经消失,当社会上出现如鼠疫、战争和饥谨等危机时,传教士,尤其是医疗传教士都要参与救助,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历任总督和政府高级官员都是我们的朋友,今天,在满洲各地旅行的外国人同样会感受到当地人民的善意和友好。

在满洲大地上,真理的火炬正在熊熊燃烧。基督教受到善待,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尊重。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教会学校起到了先锋作用。在满洲,基督教堂的数字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

仅就奉天^①而言,成千上万的患者得到治疗,教会医院远近闻名。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教会医学院不久将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中国自己的医学人才,去为上帝和他们的国家服务。

基督徒的奉献精神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大众心理越来越倾慕于基督教,并把其当作国家必须为之奋斗的理想。在满洲,政府举行基督祈祷日的要求得到迅速响应,为了表达他们的愿望,为了全能的上帝能够帮助和指引他们的国家,官员和民众一起走进我们的教堂。

奉天城门:在奉天八个城门上都建有高高的门楼



^①奉天(Mukden)即天眷盛京,俗称沈阳。顺治十四年(1657)设立奉天府,也称奉天。译者注。

第二章 艰难的工作

难道人生的路都是上坡吗？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①

最好的时光尚未到来。

——罗伯特·布朗宁②

1883年春天，几个外国人在满洲的首府奉天住了下来。当人们知道其中有一位医生的时候，城内出现了不小的骚动。因为难以买到用来行医的房子，我们只好在自己的院子里开办起一个小小的诊所。虽然我到中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而且几乎不懂汉语，但已开始在那里接待患者。开始，医疗工作成效甚微，人们蜂拥而至，每个人都自称有某种疾病，领受适当的药品，但即使他们真有病，那些药品有多少被使用，也是值得怀疑的。许多人的真正目的仅仅是为了看一看这个外国医生的模样。对其所为，我们听之任之，不加干涉，没有使用的药品也有它们的用途，渐渐地，骚动沉寂下来，就诊的人数减少，真正意义上的医疗工作开始了。

在以后的数月，甚至数年时间里，仍然面对着重重困难。患者对我这个怪怪的外国人的态度，和对待他们自己疾病的态度差不多。语言沟通是困难的。因为没有受过专门培训的助手，开始，我必须配制自己开出的处方，实施氯仿麻醉，然后独自做手术。候诊

①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19世纪中后期英国诗人。译者注。

②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19世纪中后期英国诗人。译者注。

室很小,诊疗室和药房在同一个房间,根本没有病房,已经动了手术的患者不得不住在自己的家中,或附近的客栈里。

所有障碍中最为头疼的是,只有当病成为痼疾的时候,只有当本地医生无能为力的时候,只有当患者似乎无法救治的时候,人们才想起我们,把我们当作最后一根稻草。加之,这里的人们对外国医生和他所开出的药品还存在着许多怀疑。一些人认为传教士只是英国侵略者的先锋。另一些人则确信我们的药品能够改变使用者的心智,迫使他们遵从外国医生并相信他的说教。一天,为了拔出一颗疼痛的牙齿,一位清朝官员来到诊所。他对我们的药品特别害怕,甚至不用我们提供的水漱口。那个老掉牙的故事到处传播:孩子们的心和眼睛被外国人挖出,用来调制药品和拍照。

人们追问:“一个盒子里边如果没有长眼睛,它怎么能够做出相片来?”

奉天的一个街区居住着众多的穆斯林,在这些中间,有许多所谓的医生。他们惟恐自己的收入减少,因此,极力去散布关于我们的恶毒故事和谣言。因为在南方中国和法国正在打仗,这些话就更易于为人们所相信。反对我们的标语和布告张贴于城内,而且有时就贴在我们的门上。为把我们赶走,人们尝试了各种努力。我的助手和仆人在大街上受到恐吓,人们用脏话谩骂,有时甚至向我们扔泥巴和石块,并不止一次扬言要烧毁我们的房子。为了看到底会怎么样,大批的人群聚集在附近,特别兴奋地议论着。虽然没有可怕的结果发生,但在当时,还是非常让人担忧的。

1884年夏季的一天,一位法国天主教神父穿着常见的黑色长袍前来拜访。他是坐着马车来的,在我们屋里逗留一段时间,然后就回去了。当时,诊所里有许多患者,自然知道他来访的人就有很多。第二天,攻击我们的谣言传播开来,因此,助手被告知不要上街。接着人群聚集在我们的门外,场面非常混乱。人们普遍相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和天主教神父一样急于要得到孩子们的心脏和眼睛,并且愿意为此花大价钱。当那位法国神父前来拜访的时候,在他的长袍

下面藏着一个小孩。我们进入一个黑暗的屋子里,进行商量,然后挖出孩子的眼睛和心脏,并议定了价钱。这种买卖孩子的交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第二天,装着孩子心脏和眼睛的三辆马车离开了奉天。这个故事中有三点是真实的,即一个穆斯林小孩丢了;一位穿着黑色长袍的法国神父曾经拜访过我们;在那位法国神父拜访我们的第二天,一个居住在奉天的外国人带着三辆马车离开了这座城市。

1913 年盛京医院门诊部和医学院
大楼,病房在门诊部后面



不久以后,一位母亲带着她的小女儿前来就诊。正当那位母亲向我详述其女儿病情的时候,那个小女孩悄悄地溜出了诊所,因为她听到过有关外国医生令人恐怖的故事,看到我这位外国医生的时候就感到恐惧。当那位母亲的喋喋不休停下的时候,环顾周围,她的女儿不见了!她非常激动,跑回候诊室,但那里没有她女儿的踪影。找遍院子内外,也是徒劳。那位母亲认定是我们偷了她的女儿,开始大哭大闹,叫喊着要我们交出来。最后,有人认为那个女孩可能已经跑回她们居住的客栈。派出一个人去找她,结果发现那个“小逃亡者”正躲在那里,为自己从可怕的外国医生身边安全逃离而庆幸呢。甚至当这个消息被带回来的时候,劝说那位情绪激动的母

亲离开诊所也有困难。当然,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个女孩。

这些恐惧和怀疑逐渐消失了。但是,在以后的一些年里,偶尔还有一些事情提醒我们眼睛是一种会引起怀疑的东西。甚至迟至1892年,还出现这样一件事:一个小姑娘被送到我们医院,在她的一只瞎眼睛上长了一个非常难看的瘤子。以前,她的母亲在我们医院呆过,而且信赖我们。因为这个瘤子严重地影响到小姑娘的婚姻大事,所以母亲急于要把它割去。我为小姑娘做了必要的手术,后来又为她植入了玻璃眼球。母女两人非常高兴,因为眼球完全合适,并极大地改善了姑娘的容貌。可一两天以后,母亲带着女儿找到我,要求把植入的眼球取出来。毫无疑问,一定是她的朋友吓唬她不要保有一只外国人的眼睛。

消除这些猜疑的首要因素一直都是稳步的医疗工作和公开进行的外科手术,同时也与基督的仁慈密不可分。

在奉天居住接近两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开设我们所说的“医院”,它就在我们住宅后面一座狭小的很不坚固的房子里。病房可以接纳12名患者,多数时间都住得满满的。在这样一个不如人意的地方取得如此好的医疗效果真是令人兴奋的事。在一次夏季大雨中,医院的一面墙坍塌了,其他三面似乎也将随之而去,但这样的后果没有发生,房子被成功地支撑住了,勉强为我们的患者又遮避了一段时间的风雨。但是,在冬季,天气特别寒冷,我们就不得不将医院关闭两个月。在来年夏季的大雨中,医院倒塌了,成为一堆废墟。因此,我们租用条件稍好些的另外一座住宅建立起临时医院,而它恰好处于现在医学院的位置上。这座临时医院运转了一年多,直到我们永久性的医院可以投入使用时为止。

在我们摇摇欲坠医院里住过的早期患者中,有两个满洲最早的白内障手术病例。一个是奉天的商人,他的右眼已经失明数年,此时,因为同样的原因,他的左眼也几近失明。此人颇有名气,况且让瞎子复明在满洲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因此,这个病例对我们来说非同一般。小医院室内光线相当昏暗,我们索性把手术台拉到院子里。许多人聚集在周围观看,其中包括一些政府官员。手术在众目

睽睽之下和屏息期待之中进行,一切都很顺利。当我伸出手指时,人们听到那位商人说出了手指的数目,结果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当这位商人还没有出院的时候,一位盲人由他的儿子领着来到我们医院,而他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儿子的模样。他原是一位乡村教师,但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一直没有工作,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几天之后,那张手术台再次被放到阳光下,因为第一次手术成功的传闻广为人知,这次有更多的人前来观看。当那位患者意识到自己能够见到光明的时候,我们几乎不能将他按在手术台上,直到我把他的儿子叫到面前,他第一次长时间静静地凝视着孩子的脸。

我也做了许多其他的手术。不久,外国医生手术的声誉便广为传播。一位商人前来就诊。从儿时起,就一直忍受着疼痛疾病的折磨。在长达两年时间里,没有一夜能够好好休息,睡眠只能是断断续续。他才三十八岁,但不断的疼痛使其未老先衰。一年之前,曾前来就诊,但是,当我向他解释某种手术是挽救他生命惟一办法的时候,他拒绝了,宁可重新选择中医。从始至终,咨询过的当地医生约有百人,还不算数个巫婆在内。但是,这些医生的治疗只是增加他的痛苦。他像奉天的许多人一样,厌恶外国人,且不失时机地攻击我们。但在一线生机面前,终于决定接受我们的治疗。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的病例。奉天的商人并不喜欢我们,也很少有人到我们这里就诊。这位患者在商界中非常著名,一方面,如果手术成功了,将有助于打破商人们对外国人的偏见;而另一方面,如果手术失败了,也会助长那些把我们说成是恶魔的谣言。患者是无力的、瘦弱的和易于激动的,由于长期的疼痛和不得休息,已经是筋疲力尽了。但是,手术相当成功,而且康复也很理想。几个星期之后,为表达谢意,他给医院捐了一笔款子,并挂起一块漂亮的牌匾。他一直都是医院的亲密朋友,并在商界的朋友中扩大着对我们的有利影响,稍后,加入了基督教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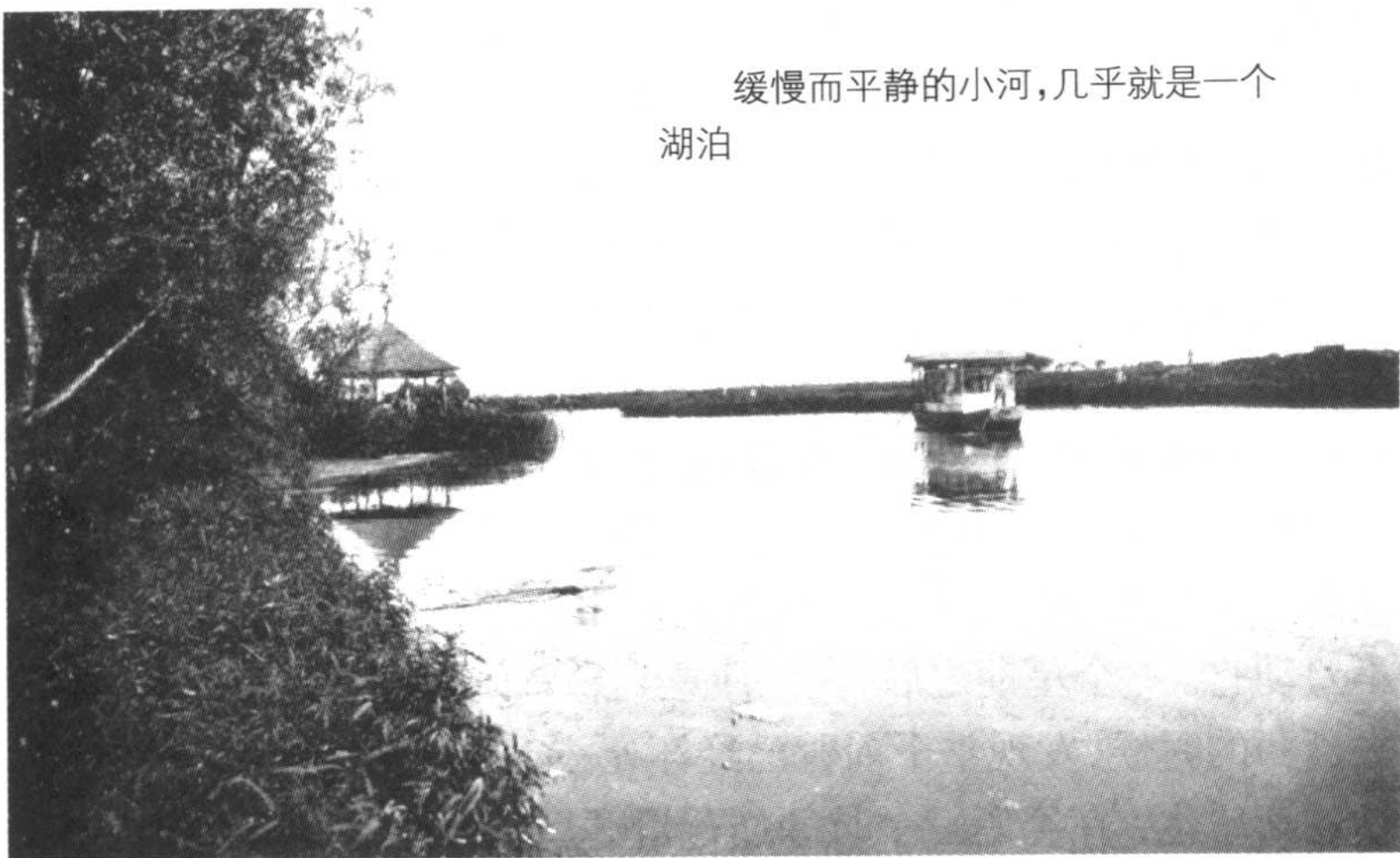
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做了一个比手指或脚趾更大的切断手术。这不是因为病变的肢体特别少,因为我们每周都会碰到这样的病例,事实是许多中国人宁愿死,也不愿失去一只胳膊或一条腿。

当盖棺入土的时候,他必须完整体面地进入那个黑暗的未知世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即对任何诊断都缺乏信心,以及怀有手术未必是最后希望的侥幸心理。乍一看来,这种想法没有任何道理,但实际上还是有些根据的,因为中国人有着很强的康复能力。

当我们着手第一例切断手术的时候,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三个月前,一个人用车拉石头,结果一块大石头滚落下来,重重地砸在他的一只胳膊上,导致粉碎性骨折,且倒地之后,车轮又从他的一只脚上碾了过去。人们请来一位中医,他没有想办法使骨头复位,只是在那只受伤的胳膊上敷上当地普遍使用的黑色膏药,并且告诉患者不要动它。一个星期之后,人们注意到患者的手指正在变黑,而当揭去膏药的时候,发现整个前臂已经坏死或正在坏死。从那时开始,病情逐渐恶化,在经历三个月的痛苦折磨后,所有的康复希望都破灭了。作为最后的努力,那位垂死的患者被送到我们医院。浑身都是褥疮,身体很弱,几乎不能讲话。折断骨头的一端支了出来,一直垫着伤臂的高粱秆和身体组织粘连在一起,结果,哪怕是最轻微的移动都会引起剧烈的疼痛和流血。患者胳膊发出的臭味使周围的人难以忍受,另外脚也非常疼痛,因此,他和亲戚朋友都急于做切断手术。他是个行将死亡的人,如果我们不能为其治疗,生命是保不住的。当手术进行的时候,他的心脏非常衰弱,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甚至担心他活不过来。但是,他苏醒过来了,而且从那天开始,逐渐恢复了元气。

为了挽救自己生命而愿意去做切断手术的人数增长非常缓慢,甚至直到今天,许多人也是拖延到很晚。在很长时间里,每个切断手术后的残存肢体都被细心地保管,送还它的主人,而这位主人保存它直到下葬。到那时,他躺到棺材里,被切下的肢体就放在身旁,这样,无论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他都将保持完整。

我们从来没有打算应该在中国式的小房子里长久地从事医疗工作。从一开始,就努力去购买一处适合做永久医院和诊所的房产,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特别不愿意把房产卖给外国人,而且我们的选择也只能在自己住宅附近和环境适宜的地方。一次又一次,似乎就要成功,但渴望得到的房产还是从我们的手中溜走



缓慢而平静的小河,几乎就是一个
湖泊

了。最后,一位准备前往外省就任的政府官员,与我们关系比较好,同意把自己的院子卖给我们。这个院子就在我们住宅以东不足百码的地方,在那里建立医院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奉天城东南,距离闹市区不远,有一条缓慢而平静的小河,几乎就是一个湖泊。每到夏季,小河沿^①成为追求享乐者和度假者乐而忘返之处。美丽宽大的叶子衬托着粉红色的荷花,在水面上轻轻摇曳;空气清新,沁人心脾,远非城内所能比拟;在岸上众多的茶棚中选择一处坐下,呼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良辰美景,闲谈品茗,别有一番情趣。非常幸运,在俯瞰小河的一块台地上,我们买到两块用来建房的地皮。在我们看来,就建立医院而言,在奉天,没有比这里更为理想的地点了。我们利用现存的建筑做病房,然后在前面建立起一栋崭新的宽敞的门诊部。1887年,一位友好的满洲高级官员,即盛京兵部侍郎^②,为新医院正式开业剪彩,许多在奉天的清朝

①小河沿(the Small River):位于沈阳市大东区境内。译者注。

②原文为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War。清朝在陪都盛京设五部,兵部为其中之一,每部的主官为侍郎,故这里译为侍郎。1938年矢内原忠雄日译本《奉天三十年》将其译为“兵部尚书”,误。译者注。

高级官员出席了仪式。同一天,在医院能够容纳 150 人的候诊大厅中,举行了一个基督徒参加的热情洋溢的集会。新医院病房能够同时容纳 50 名男患者和 15 名女患者住院治疗。

就这样,在奉天生活和工作的第一阶段结束了,那是与怀疑和敌视斗争的最初阶段,也是取得当地人民信任的开始阶段。

夏季的小河沿:茶棚中的游客在欣赏荷花



第三章 奉天:城市和人民

在你所知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拉迪亚德·基普林^①

为何不能抛弃功名利禄之心,来追求这和煦的阳光,
逍遥自在,怡然自得,忘却世间的悲伤。

来吧! 来吧! 来吧! 这里看不到敌人,
唯有严冬和寒风的肆虐与猖狂。

——莎士比亚

大约当西班牙无敌舰队横行海上,英国仍受制于人的时候,满洲东部山区崛起一个好战的部落,开始对我们现在称之为南满洲的明朝地方政权构成巨大的威胁。在此之前,南满洲广阔的平原沃野,一直为汉族移民所控制,形成众多的城镇和村庄。此时,腐朽的明王朝摇摇欲坠,行将崩溃,为击退这些强悍部落的进攻,使尽了招数,但都以失败告终。眼看着一个接一个的城镇陷落了,而那些不想丢掉性命的人则剃了发,梳起了辫子。满人鼓励臣服的汉人聚集在胜利者努尔哈赤麾下,组建起“汉军八旗”。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止步,直到统一全国,建立起崭新的清王朝,在中国进行长达270年的统治之后,刚刚退出历史舞台。

奉天在被满人占领之前就是一座重要的城市,后来满人把其作

^①拉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 Kipling):1865年出生于印度孟买,是英国20世纪前期的著名诗人。译者注。

为自己的首都，现在的城墙和皇宫都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夺取北京之后，努尔哈赤的孙子，即清朝的第一位皇帝把首都迁到那里，奉天则一直被当作龙兴之地加以管理，而且清朝创建者努尔哈赤及其儿子的陵墓也在附近。

在南满洲的人口构成中，满人比例一直不高，居民由混合的民族组成。最初，与满人血缘相同的土著部落分布在山区，汉人则定居在平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婚已经使满汉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实际上，人们很难再把满人、旗人和汉人区分开来。居民普遍使用汉语，满语完全失去了生命力。和北京一样，奉天的清朝官员也讲方言。只是在满人的发源地，还明显地保留着旧日的传统，不禁使人联想起征服者努尔哈赤所生活的时代。在南满洲，仍然有一些满人聚居的城镇和村庄，尤其在古老的皇陵附近。那里的人们特别排外，而且只在满人内部通婚。在较远的北方，满人的特色明显一些。但在南满洲的大部分地区，几乎看不到满人的身影，因为，最初活跃在这里的满人已经被派往全国各主要城市担任驻防任务去了。



连接两个城门的宽阔街道

那些初来乍到的观察者会问：满洲人怎么可能是汉人呢？因为，无论去哪里，他都会看到奇怪的、别具一格的和非常有代表性的满人妇女的发式，从而被那闪闪发光的、银质的、镀金的和彩绘的装饰品所触动。她们穿着满人的长袍，而不是汉族妇女常穿的夹袄和裙子；她们用天足走路，而不是如汉族妇女一样把脚裹成残疾，像跛子一样走路。如此明显的满人风格，怎么可能是汉人呢？事实是：她们不是满人，而是满洲人。

“您的老家在哪里？”你问一个人。

“我的老家在山东。”

“您到满洲多久了？”

“两百年。”他庄重地回答。

每年，移民仍然继续从山东、直隶和其他省份涌入满洲。在老家反对露齿而笑和留长指甲的妇女们解开小女儿一英寸宽的裹脚布，随着丈夫来到遥远的满洲，在天足大脚和面色红润的北方姐妹们中间住了下来。几年后，家中的姑娘们长大了。她们长着天足，穿着满人的服装，等到了应该谈婚论嫁的年龄，还要按照满人风格盘起头发，因为她们已经是满洲人。人们从古老的祖居地迁徙而来，各个省份的众多家庭聚居在一起，保守偏见和迷信色彩明显减少，地方观念和习俗常常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最后，经过相互的密切交往，很多东西都彼此融合了。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与那些居住在中国长城以南，仍然按照传统方式生活的同胞们相比，满洲人更乐于接受新鲜事物。

通常，中国人也称满洲为东三省。与中国内地相比，这里的人口密度不大，估计总人口有1500万到2000万。但由于移民的不断涌入，人口迅速增加。南满洲，即奉天省，在三省中人口最多，经济文化也最为发达。在肥沃的冲积平原上，散布着无数的村庄和众多的城镇。满洲土地的肥沃是令人惊异的，尽管有漫长而严酷的寒冬，一年仍可种植两季作物。主要的农作物是高粱，它是人和牲畜的食物，产量很高，其种子和果实之比甚至可以达到八百倍之多。高粱秆很长，也很结实，但很脆，是当地居民的主要燃料。如果把其

铺在瓦或石灰的下面，也可以做屋顶的材料；还可以做栅栏以及隔离物等等。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高粱，满洲人将怎样生活。在满洲，每座住房周围都种满了家庭食用的各种各样的谷物、豆类和蔬菜，当然，为购买一些生活日用品，也要出卖些农产品。

给每个新来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景观是墓地。出城后，有数英里的荒野，上面有无数圆锥型土堆，这就是公共墓地。无论你转到哪个方向，都有面积相对小一些的家族墓地。值得庆幸的是，正是这些点缀在旷野上的墓地，才给这个城市，给这个大平原增添了色彩和诗意。春季，由于翻耕和播种，辽阔而平坦的原野到处都是单调的土黄色，只有墓地生长着嫩绿的青草和暗绿的松树，使春天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满洲的人口集中在平原，但不全在平原。低缓的坡地已被开垦耕种，高峻的山峰仍由茂密的森林覆盖，建筑在峭壁之上的佛家寺院掩映在万木丛中。幽远而蜿蜒的山谷，偎依着鸟巢一样的小村庄，而清澈的河水就在谷底流淌。更远的东部，是连绵不断的高山，终年雪峰的光华和原始森林的浩瀚，无不给人以壮美之感。

奉天坐落在平原上，城东和城南六到八英里外就是低矮的丘陵。从遥远东部山区奔腾而来的浑河，在奉天和丘陵之间的平原上穿过，距离市区只有几英里。古老的奉天城面积并不大，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所修建的厚重并带有垛口的城墙，最高处可达40英尺，最宽处可达30英尺，城墙所环绕的面积不超过一平方英里。除城中的鼓楼和钟楼外，在城墙的四角上，在八个城门上，都建有塔楼，因此，从远处看，奉天倒像一座真正的塔城。由于这些砖石建筑已经不太稳固，大部分的塔楼被拆除了，减少了城市古香古色的味道。但是，灰色的古老城墙仍然挺立在那里，向人们倾诉着昔日古城的坚固与完美。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安装在幽深拱形门洞里，装饰着粗糙铁制门钉的巨大城门仍然要笨拙地按时关闭，使人们在夜间不得随意出入。

城门与城门之间由宽阔的道路相连，道路与道路之间由交错的胡同沟通。皇宫建筑群坐落在奉天城中央，虽然二百多年没有主

人,但桔黄色的屋顶仍闪闪发光,而其中所珍藏的清朝早年纪念品和古代器皿更是无价之宝。城内建有各级衙门、官员住宅、民居、钱庄、当铺和大商人的公馆,以及许多商店,但是,除了与城内政治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人们之外,很少有人愿意住在城内。1905年前,城内只有平房,实际上没有人试图去改变这座城市的传统风貌。

过去和现在一样,主要商业街的标志不是漂亮的建筑,而是商家挂出的大而华丽的幌子,例如色彩斑斓的巨大凤凰和龙等等。这条街的一端是古老的鼓楼,战鼓还竖立在那里,当发生战争和暴乱的时候,仍然会像过去那样敲响战鼓。这条街的另一端是钟楼,楼内仍悬挂着古代铸造的大钟。在过去的和平时期,用鸣钟来告知晚上的时间,只是近些年,才把鸣钟作为宵禁的信号,另外在城内发生火灾的时候,也要鸣钟。在古老的城墙外一英里,或更远一些,筑有一道土墙,周长约10英里,城墙和土墙之间是人口稠密的郊区。

据估计奉天大约有20万人口,它是满洲政治、文化、教育和商业中心。因为满洲的政府首脑(也称为鞑靼将军、将军、总督、地方长官等)在此办公,所以大批候补官员也聚集到这里。

奉天与欧洲城市,尤其与英国城市有着明显的不同,与中国境内其他地区的城市也有很大的区别:男性人口远远超过女性。奉天钱庄和当铺的老板,把女眷留在遥远的山西;众多的直隶商人,每年回家探亲一次;难以计数的手工艺人和体力劳动者,根本没有考虑把妻子从老家接来团聚;另外,那些从南满洲各地涌入城市谋生的人,每年只回家一两次,也不想携带家口到奉天定居。所有住在奉天的人,大部分为赚钱而来。当然,奉天也有许多人遵从祖上的传统,组成数代人,甚至百人以上的大家庭。但是,小家庭的数目也在不断增多,正如我们在英国常见到的那样,一个男人与他的妻子孩子,或许还有他的父亲母亲生活在一起。

奉天人是忙碌的勤勉的和易于满足的,同时也是平和的与遵守法纪的,他们的理想是过上富庶和舒适的生活。1905年以前,奉天没有警察。像祖辈们一样,他们没有更高的奢求。日落时分,店铺关门,没有路灯的街道沉寂下来,直到黎明前都少有人迹。

城北数英里外，越过一片开阔的长满绿草的荒野，是深藏于森林中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的陵墓，它大大有助于改善奉天周围景色的单调和沉闷。



北陵：风化大理石拱道后面的正门
常年关着

陵墓的外围是真正的野生丛林，在各种各样的野花、密集的灌木丛和上面长满野草的沼泽中间，被繁茂花草遮掩的小径几乎难以通行。在六月的某天下午，一个人陶醉于此可能会迷路。开满白色花朵树木，蔓延的铁线莲映衬着橡树和白桦的嫩绿，而透过这些绿色和白色，闪烁的蓝天更蓝，灿烂的阳光穿过绿树繁花，在地上洒满细碎的暗影，这一切，都具有难以名状的美。在树林深处，鸟儿在尽情歌唱，附近没有其他地方更让他们快乐和陶醉，更适合于他们的天性。在闪烁的阳光下，目光犀利的苍鹰在天空中翱翔。穿过树林，环绕着陵墓的红色高墙和高墙内黄色琉璃屋顶闪现在眼前。在这个长方形围墙的南部，有一条沉寂的、已经风化的白色大理石拱道，其末端就是进入陵墓的前门。平时两扇门紧紧关闭着，只有当皇帝钦差到神殿祭奠祖先的时候才打开。

在许多年里,陵墓的边门严禁出入,因此,除了住在那里的满人警卫外没有人能够看到墙内那个神圣的地方。如今,东门和西门打开了,从东门到西门,由路旁松树组成了一道绿色的天然拱道。围墙内的松树排列是如此完美对称,以致于一个人无论站在什么角度,向那个方向看,都是长长的笔直的一排。松树下面的灌木被砍掉了,围墙外树木的野生繁茂和自然色彩,与围墙内树木的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和人工色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关闭的南门到内城有一条很宽的人工铺筑的道路,两边排列着巨大的石雕动物。内城的门只对搬运物品的人或熟悉的陵寝警卫打开。内城是一个沉寂的、用砖铺就的院子,周围环绕着留有垛口的厚重城墙,城墙四角上建有高高的角楼。内城中最北的部分是埋葬皇帝的宝顶——一个高大的、圆形的、长满野草的土山,上面还长了一棵树,这就是皇帝的陵墓。为阻止来自北方的邪气,在内城和宝顶的后面,又由人工堆筑了一条长长的山岭,上面生长着树木和藤蔓,从那里,能观察到围墙内的陵墓以及围墙外拥抱陵园的树丛,越过一片平原,也可以眺望奉天的城墙和城楼。

在奉天定居的第一批外国人,或者确切地说,在满洲定居的第一批外国人,是法国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他们于1838年到达奉天。至1882年,除主教和神父的住宅外,他们已经拥有一座精美的大教堂,数所学校和孤儿院,一所神学院和一所修道院,所有这些建筑都集中在奉天南郊的一个大院里。^①传教士们似乎一直沿袭着使其皈依者与其他人保持距离的传统政策。非常明显,皈依天主教的村庄散布在全国各地,有的已经是第五代或第六代了。他们是这个社会思想端正、行为优秀和工作勤勉的人。他们的孩子受到严格和细心的教育,而教堂接受的孤儿也在不断增多。在各个城市中,神父们似乎也不怎么做容易引起麻烦的公开宣教,而只是在信徒中走动,安静平和地生活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天地中。

^①天主教堂位于沈河区小南街,1878年由法国传教土方若望所建。1900年被盛京义和团烧毁,1912年由南满教区法国苏裴理斯主教在原址重建。译者注。

从1867年开始,曾有一两个新教传教士到过奉天,但直到1874年前,还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要在那里从事传教工作。那时,社会各个阶层中的排外情绪非常强烈,1870年天津大屠杀中达到顶点的焦虑和苦难在满洲也可以被感觉到。^①在奉天,没有人欢迎令人厌恶的“洋鬼子”,传教士们无法在此立足。他们意识到,只有先做好农村的工作,才能在满洲逐步发展。一开始,他们派出一名中国布道师。他卖圣经,布道,与那些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进行长时间的深入谈论,他的耐心和机智终于为下一步工作铺平了道路。

苏格兰联合长老会尊敬的约翰·罗斯牧师^②和尊敬的约翰·麦金太尔牧师^③,多次从牛庄港出发前往奉天,后来,罗斯先生在奉天一个小客栈里租了一个房间,一住就是六个月。当时有很多人反对,很多人朝他扔泥巴,还有好几次几乎酿成暴乱。但是,局面逐渐稳定下来,人们在迫害停止后,组织了一个小型宗教集会,在一条最繁盛的街上,建起一个小礼拜堂。白天,对外布道;夜晚,则成为基督徒举行礼拜的地方。终于,传教士可以购买房产作为长期住所了。第一处教士房产位于奉天城东郊的小河沿,接着是另一处。现在,教会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地产了,医院、住宅、学校,还有医学

①天津大屠杀:1870年6月间,天津法国天主教教会的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批死亡,与此同时又不断有迷拐幼孩的事件发生,而拐犯供词又多牵涉到教堂。6月21日,群众聚集在教堂前示威,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弹压。因崇厚只派去几名官弁,丰大业竟持枪到崇厚衙门质问,并向崇厚开枪,没有命中;出衙门后,遇天津知县刘杰,又开枪行凶,打伤了刘杰的随从。群众怒不可遏,当场将丰大业击毙,随后举火焚毁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馆及英美教堂数所,打死传教士和西方商人20名,其中法人13名,俄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及爱尔兰人各1名。译者注。

②约翰·罗斯牧师(Rev. John Rose):生于1842年,死于1915年,苏格兰新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近四十年时间,足迹遍及东北和朝鲜半岛,是满洲和朝鲜新教教会的创始人。他掌握十一种语言,在圣经的翻译和解释方面,在传教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突出贡献,因此英国教会称他为“他所生活那个时代最有成就的传教士”。其主要著作有:*The Manchus, or The reigning dynasty of China: their rise and progress* (1880年); *Korean speech: with grammar and vocabular* (1882年); *Mission methods in Manchuria* (1903年)。译者注。

③约翰·麦金太尔牧师(Ren. MacIntyre):新教传教士,曾先后在我国山东和东北等地区传教。译者注。



北陵:大理石铺就的宽阔的道路两旁排列着巨大的石雕动物

院,而教堂也离此不远。在三英里外的奉天西郊,有另外一座教堂,一所艺术学院,以及传教士们的住宅。



第四章 架起跨越深渊的桥梁

不学礼，无以立。

君子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①

——孔子

使外国人遗憾的是，根据中国文化所形成的礼节常常直接与西方的习惯相抵触。一位来自欧洲的绅士，即使接受过大学教育，具有高雅的风度，但在那些有教养的中国人面前，好像也是一个粗人。他不时地冒犯这个古老文明的严格礼节，而这些礼节中的主要规则就连最下层的苦力也要遵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中国，欧洲人或美国人的品格“还没有确立起来”。“外国人”这个称呼的真正含义是外来者，是这个盛行中庸之道中央帝国之外某一国家的人。

一个外国人，无论去中国的任何地方，对这一点都会深有感触。

①“不知礼，无以立”(If you do not learn the rules of propriety, your character cannot be established);此句来自于《论语·尧曰》: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君子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The Superior Man subdues himself, and submits to these rules of propriety; he neither looks, hears, speaks, nor makes any movement contrary to them):此句来自于《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在《论语》中摘取了两句,并不完全与原文相符。译者注。

如果骑马在中国内地旅行,当穿过某个平静的小村庄,碰到一伙村民的时候,他也像在国内一样马不停蹄,在马背上大声地叫道:“到某地怎么走?”很可能没有人理睬。这个骑马的外国人可能会边赶路边想:“这些中国乡巴佬是多么没有教养啊!”

如果把旅行者换成粗俗且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乡下人。当进入那个小村庄的时候,他会拉住马缰慢慢遛口,这是礼节之一。当碰到那伙村民的时候,他要下马,这是礼节之二。“借光?”他说道。打扰其他人之前要表示歉意,这是礼节之三。然后,他同样询问前往某地的路,但得到了很好的回答,如果必要的话,为避免其走错路,某个村民甚至会送上一程。过后,这些乡下人自然会议论一番:外国人是多么粗野和愚蠢,连最起码的礼节都不懂。

外国人,不管是商人还是传教士,当在某个新城市或某个新地区住下来之后,都会遇到当地人的反对、怀疑和误解,在整个中国,这种经历相当普遍。当然,可以忽视这一点,我行我素,根本不考虑人们说些什么,想些什么。但是,在中国许多地方,对外国人潜在的厌恶和误解仍然如此普遍,恰恰因为外国人忽视中国人感情和观念。明智的做法是弄清人们不喜欢外国人的原因,并加以改变,尽量避免产生冲突。

例如,由于随意地处理上面写有汉字的纸张,已经不止一次激怒了中国人,差点引起暴乱。应该把没有用的写有汉字的纸张烧掉,因为人们把上面的字视为神圣。再者,在孔子的经典著作中描写君子的主要特征是“自律”——能够做到“克己”,因此,君子被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所景仰。普通人从没有想到要把其付诸实践,但却期望那些自称学者或领导者的人们做到这一点。许多外国人对周围的中国人摆出居高临下的架势,而在私下,这些中国人时刻都在轻蔑地嘲笑这些轻易发脾气的异族人。对外来人挑衅进行回击,通常被认为是野蛮人的标志。而西方人的急躁和缺乏耐心也引起了中国人的轻蔑。君子达观地看待一切事物,平静地包容着自己的时间被耽搁和别人的失信。

在外国人踏上中国土地的早期,尤其在通商口岸,不同性别间

外国人的自由交往是对中国人的极大冒犯,也可以说是中国人轻视外国人的开始。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满洲妇女所受到的限制要少得多,但尽管如此,社会生活中仍然有一道看不见的坚固篱笆隔绝在两性之间。对一个外国人来说,留心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但对一个中国人而言,外国的礼节规矩缺乏合理性,是实实在在的 errors 和荒谬。

然而,当一个外国人决心避开冒犯中国人观念的时候,能够泰然自若,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但为了赢得准备生活其中那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尊敬和友善,而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是非常值得的。

当我们在奉天住下来的时候,首先需要的是房子。像华北大部分地区一样,除了几座寺庙之外,满洲根本没有两层以上的建筑。

理由是这样:“神可以住在塔里,但人则不能。”

在那个时候,建起一座西式房屋肯定会带来麻烦,两层楼房就意味着一场暴乱。因此,高门大院,并在大门旁建有仆人居住门房的院子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院中内墙后面花园中的房子里安装西式门窗、地板和壁炉。可这些都不能被过路者看到,或外院的访客们看到。

还有一个穿衣问题,因为外国人的穿着打扮是最易引起人们注意的事情。一个出现在公开场合的男人,穿着短夹克和紧腿裤,在那个时代,被看作是对中国人普通行为准则的一种冒犯。一位令人尊敬的着装整齐的男人常常穿着长袍。中国女性的服装是宽松而稳健的,一个穿着相当得体西服的妇女在中国人眼中仍然不怎么好,因此,在许多年里,宽松的长袍、长大衣、长礼服和茶礼服受到大多数外国人的青睐。他们一般不穿当地人的服装,而且完全改换当地人的装束也有一些实际困难,变通似乎也没有什么作用,但选择适当的外国服饰会减少与中国礼节的冲突。

房子和服饰之类的问题容易解决,而掌握中国礼节的规律则相当棘手。为了和下层民众友好相处,为了使诊所和医院的工作更为顺畅,从而去掌握足够的一般性礼节和习惯,这并不困难。但是,从

早年起,我就厌烦与官员们交往,而在官场上,繁文缛节又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在下属面前侮辱一位官员,这是一个简单的错误,可人们却容易犯类似的错误。一旦外国人对某位中国官员礼节不周,他就可能咒骂你无礼,从而妨碍与他进一步交往。

当得知一位官员前来拜访的时候,为礼貌地接待他,内外大门都必须敞开,主人应该站在大门和二门之间恭迎。就相对位置而言,北为尊,南为卑;东为尊,西为卑。因为满洲的房子一般面南,所以在陪同客人进院和入门的时候,主人必须一直走在客人的西边。客人进门之后,主人也不能与其并行,而要时时落后半步。在屋内,把客人让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坐下是非常重要的事,但外国人的房子内部结构与中国人的不同,因此要确知哪个位置对客人最为合适常常很费脑筋。客人应尽可能坐在离门远一点的位置,而主人则必须坐在离门较近的地方,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坐在客人的西边。无论客人什么时候来,都要预备茶水,但上茶的时间要很好地选择。在正式场合,或客人第一次前来拜访,主人要用双手捧起茶杯,弯腰放在客人面前,而客人也要站起来,用双手接过来,并同时说一些得体的客气话。然后主人请客人喝茶,他们同时端起茶杯,客人呷几口茶,主人也呷几口茶,再同时放下茶杯。很明显,为表达不同程度的诚恳和尊重,其间存在着众多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恰恰是外国人容易忽视、最后冒犯了中国人的地方。

当一个外国人对一位中国官员进行回访的时候,出现失误,显得自己荒谬可笑,甚至冒犯了主人,这些情况或许更多。被拜访者可能就住在附近,但不能步行前往。当来到主人门前的时候,要留在车里,而由自己的仆人呈上名片,直到主人邀请才能下车。进院以后,在每道门前都要停下来,侧身站在旁边,以让主人先进,实在谦让一番,不要轻易先走。进屋以后,主人会让其坐在尊贵的位置上,但不要轻易坐下,必须谦让,只有当力争无效之后才能就座。实际上,当主人没有落座的时候,客人是不能坐下的。如果第二个客人到了,先来的客人必须马上站起,把自己的位置让出来。第一次拜访,不要呆得时间太久,当然,也不能过于匆忙地告辞。每天,你

都会碰到许许多多的礼节和规矩，慢慢掌握就是啦，但是，如果和某些官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些礼节和规矩就逐渐成为次要的了。

对任何一位准备长期生活在某一城市中的外国人来说，希望自己的存在有意义，进而影响当地人的社会生活，那么，和各个阶层的人们密切交往，应该是非常有价值的。下层民众最容易接近，在他们中间生活和工作许多年，而对官员、贵族、文人，或有影响的商人知之甚少，这完全是可能的。导致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产生鸿沟的原因，除了上面所指出的特别突出一点，即对中国人“礼节规矩”忽视之外，还可以找出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语言，讲汉语如同说母语那样熟练，需要学习许多年，而且即使汉语相当熟练，也都带有浓重的外国口音。

起初，医生借助给患者解除身体痛苦的机会，有和中国人广泛接触的优势，从而为进入中国社会创造了方便条件。后来友好关系的巩固和维系，社会各阶层中朋友的增多，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己对这些礼节规矩的修养。三十年前，对我们来说，处理好和官员的关系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因为，关于我们和我们的工作，普通民众的看法很大程度上被政府官员们的态度所左右。在我们到达奉天之后的一个月內，很幸运，有位官员前来就诊。他在政府内有一定的级别，正忍受着下颚疾病带来的痛苦，几颗牙齿已经脱落了，甚至说不出话来，极大的疼痛已经把其弄得筋疲力尽。我很容易地摘除了有病的骨头，疼痛马上得到缓解，治疗效果非常理想。遗憾的是，几年后他去世了，但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保持着真诚的友谊。从他身上，我得到一些启示，礼节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这位病人的治愈，影响很大，上到盛京将军，下到各级官员，很多有病的政府官员纷纷前来就诊，而其他患者也慕名前来。盛京将军对我们给予的一点点帮助都特别感谢。他因脱落了两颗门牙而破相，这个丑陋面孔会使其在拜见皇帝时非常难堪，而且，也会影响他的官运。因为掌握一些牙医技术，我为他植入了假牙，这意味给他的仕途帮了大忙。

我最亲密的官员朋友之一是名道台,姓高^①,曾经在中国驻巴黎公使馆工作了几年,1870年,巴黎围城时就在那里。他游历过英国和美国,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官僚,完全赞同西方的思想和基督教。从很早的时候起,我就开始做他的家庭医生,和他们的全家相处了许多年。通过他,我们也和其他的清朝官员交往。当许多年过去的时候,我在中国官场已经有一个不小的朋友圈子,这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帮助,使我们的基础更为稳固,且有助于防止暴乱和其他非常易于出现的麻烦。

不久,军人也开始成为我们的患者。我们的第一个医院开业不久,在遥远的满洲东部,一小伙绑匪在农村中破坏农民的和平生活,制造了许多麻烦。政府派出由十六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前去搜捕,但数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没有发现绑匪的踪迹。最后,一些农民发现了绑匪们临时藏匿的地方。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士兵们包围了那座房子,但除了藏在门后的一名绑匪之外,其余都逃跑了。那个门很小,每次只能进去一个人。一名优秀的青年士兵主动请缨,率先冲过去,门很快被撞开了,但那名绑匪持有武器,拼命抵抗,冲入的士兵把绑匪的头部砍成重伤,但藏在屋内的绑匪也开了枪,击中了士兵的大腿。其他人一拥而入,终于制服了那个无赖,并把其绑赴奉天,处以极刑。

两个星期之后,一位军官前来拜访,并呈上奉天道台(巡回法官)的名片,请求我尽心去治疗那名受伤的士兵。由于从遭到枪击的时候起,他仍然坚持走路,受伤的腿已经肿胀,并且开始化脓。入院之前,他的身体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休息两天,调整合适的饮食,更换药品和绷带,炎症稍微消退,同时也确定了子弹的位置。

^①高道台(Tao-tai named Gao):查《清德宗实录》,有高同善者,咸丰十年(1860)进士,授内阁中书。光绪三年(1877)前做过奉天府治中,俗称道台。光绪四年(1878)山东巡抚文格为办洋务,从全国调一些人到山东,包括高同善,看来他是了解国外事务的,这与本书记载的有国外生活经历相吻合。后来在吉林和新疆做官。据《奉天通志》记载:光绪十二年(1886)至光绪十四年(1888),高同善曾做昌图知府。再据实录记载:光绪十六年(1890)曾做过奉天发审局委员。看来此书中多次提到的高道台就是高同善。译者注。

因为那种手术是当地医生想都不敢想的,所以,道台专门派了一位军官到现场观看。手术进行得相当顺利,没有太大困难,子弹就取出来了。那位军官把取出的子弹带给他的上司左宝贵将军^①。一个月后,那名士兵伤愈出院,能够和从前一样走路了。

这件事对宣传我们的工作和解除对我们的怀疑有很大的作用,特别在士兵和清朝军官中间影响更为明显。满洲清军的最高指挥官左将军,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后来,因为多次为我们提供巨大的帮助,我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使自己的部下得到救治,他不断地把受伤的官兵送到我们的诊所和医院里来,有时,甚至要经过数百英里的颠簸。那时,甚至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满洲根本没有为军队提供医疗服务和外科手术的尝试。是否为病者和伤者做一些事情,完全依靠左将军的仁慈,但是,即使有世界上最好的菩萨心肠,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提供有效的帮助都是不可能的。在为部下提供医疗服务方面,左将军利用手中的权力尽了最大的努力。对那些破坏纪律的人来说,他是严厉的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执法者,但是,却受到部下的拥戴和信任,受到各个阶层的尊重。他建立和资助一所育婴院,每年冬天,还为穷人开设一个粥厂,持续二个月时间。他是一位严格的穆斯林,但同时却慷慨地向我们医院提供捐助。

虽然,从开始我们就尽最大的努力去加深与当地人的友好感情,但有时我们也会无意识地给自己带来麻烦。在奉天住下的第二年,为到郊外观光,我们五个人,包括从牛庄来的客人,由一位中国绅士陪同,骑马出发了。在奉天城西郊一座喇嘛庙附近,有一片很大的开阔地,专供骑兵训练使用,那天,每年一度的骑兵演习在此举行。中国绅士说这个场面值得一看,我们就停了下来。参加演习的骑兵主要由沙漠地区的蒙古人和当地的满人组成,并非训练有素的

^①左宝贵(Tso Pao Kuei):山东费城人。1856年参加江南大营,先后任千总、都司、游击、参将、总兵。光绪元年(1875)以客军驻防奉天,奉命统领奉军,1889年授广东高州镇总兵,仍驻奉天。1894年入朝参战,在保卫平壤的战斗中牺牲。译者注。

军队。他们没有统一的制服,穿着悉听尊便。羊皮大衣,穆斯林头巾,粗野皮帽,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但所有人都是无所畏惧的骑手,许多人还带着长矛。他们的坐骑是体型矮小、野性十足、精神抖擞的蒙古战马,像他们的野蛮主人一样,对围观的城市居民很不习惯。

当我们走近校场的时候,糟糕的是,我们其中的一匹坐骑,由于惊恐,嘶鸣狂奔起来。突如其来的变故,使骑手束手无策,随之撞入蒙古马队之中。立刻,愤怒的蒙古骑兵团团围了上来,把他与我们隔开。那些蒙古骑兵紧紧地围着他转,叫喊声,咒骂声,恐吓声,乱作一团,使原本受惊的马更加难以控制。在蒙古人的推撞之下,那位骑手非常狼狈,为冲出重围,他抡起马鞭抽打距离最近的一匹马,而骑在马上的人则回身用一根很粗的木棍猛击骑手的头部。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其中的一个人策马而出,直接冲向那个蒙古暴徒,把他和他的马撞入一大片泥潭之中。与此同时,在人群的外围,我们已经成功地找到一些军官,向他们解释了马匹受惊之事,并为此而道歉。在他们的帮助下,为避免发生可怕的后果,我们以最快的速度集合起自己的小队伍,及时离开了那里。

尽管我们为避免那些会引起当地人反感的事情尽了最大的努力,尽管我们和许多官员,包括文职和军职官员建立了友谊,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许多人群中仍然存在着一股敌视的潜流,冲突一触即发。如果我们在调和方面不做任何努力,如果我们在社会上层有敌人而非朋友,很难说这股潜流会起多大的作用,我们在奉天的工作需要多少年才能扎实地开展起来。

第五章 在中国人中行医

也曾听说过世上信仰疗法的术士们，
沉浸在由无知所煽起的狂妄之中，
致病之因，诊疗之法，
一无所据，全是捕风捉影。

《卡希斯信札》——罗伯特·布朗宁

中国医学大约产生于 4500 年前，其主要经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或四世纪。那是一本关于医学和自然科学的著作^①，其中记载了治疗疾病要按照阴阳五行的原理进行，即阴阳二气，五种元素在体内的相生相克，以及疾病的种类和针灸方法等等。在此基础上，后来不断有新的著述问世，丰富了中国传统医学。但是，在许多世纪里，关于致病的原理和治疗的手段却止步不前。

按照中医的说法，当构成身体的五种元素，即金、木、水、火、土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身体是健康的。当它们失去平衡的时候，疾病也随之而生，而治疗的目的就是去恢复这五种元素的正常关系。五种颜色和五种味道与身体中的五种元素和五种器官相对应，据此再对药品进行分类。所有的治疗必须符合五种元素的不同循环状态，下面所列举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①作者此处所指应该是指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为汉代人所著，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但因《黄帝内经》假托为上古黄帝所著，故作者称产生于 4500 年前。译者注。

元素	金	木	水	火	土
颜色	白色	绿色	黑色	红色	黄色
味道	辣	酸	咸	苦	甜
身体器官	肺	肝	肾	心	脾和胃
器官功能	呼吸	韧带	骨骼	血液	肌肉
感官	鼻子	眼睛	耳朵	舌头	嘴
方向	西	东	北	南	中

例如,心跳较弱,那必定是缺火。火是由木产生,木与肝脏相对应,因此,要恢复心脏功能,必须先使肝脏健康,药品应该是酸味和绿色的,绝对禁食苦味的药品。另一方面,如果肝脏发生病变,需要土去补充金,必须先使脾和胃活动起来,药品应该是黄色和甜味的,避免食用任何辛辣的食物。中医的说道实在是太复杂了,我很难在细节上加以描述。

诊断疾病主要靠切脉,切脉也有五种方式。左手脉象显示心、肝和肾的状态;右手的脉象显示肺、胃和所谓“生命之门”食道的状态。当患者第一次走进候诊室的时候,医生什么也不问。患者平静地伸出一只手,然后换成另一只手,而医生依次用三个指头按在每只手的脉搏上,希望由此确定疾病的性质和位置。我刚在奉天开业行医的时候,为了观察我怎样诊病和治疗,一位友好的中医经常把患者带到我们诊所来。一天,他送来一位情况非常特殊的患者,按照中医诊法,此人已经没有了脉搏。我请中医朋友按照他的方法进行检查,结果根本没有发现脉搏。当我解释了其中原委的时候,他感到非常震惊,但同时也充满了兴趣。

在古代,中医就掌握了一定的外科手术知识。很明显,他们了解血液循环的道理;从事人体解剖实验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在公元3世纪能够使用麻醉剂做腹部手术。不幸的是,这些知识和技术似乎已经失传了。今天,关于人体内部各种器官位置和功能方面的知识已经非常模糊和不准确,现在的中医们也承认自己对外科

手术一无所知。他们不能扎一个动脉,切除一个手指,或做哪怕是最为简单的手术。

惟一可以称作外科的传统治疗方法是针灸,简直可以说包医百病。针有九种型号,经常在烧红或加热后使用,有时还要在身体里留几天。因为缺乏实用的解剖学知识,施针的中医经常把针穿入较大的血管或重要的器官,有时甚至会导致即刻的死亡。有个小孩被抬到一个中医诊所,病得非常厉害。那位中医告诉孩子的父母说:孩子的身体内火大,为排除那些多余的火,必须使用冷针。结果在孩子的腹部数个地方深深地扎了几根银针。可怜的孩子不久就死去了。对付霍乱,针灸是主要的武器。治疗某些儿童疾病,尤其是痉挛,银针要插在指甲下面。眼睛疾病,分别在后背两肩之间扎针,深达数英寸。当病人到我们这里就诊的时候,后背往往有大片皮肤脱落,其原因就是用这种不太卫生的银针进行过度治疗的结果。

另外一种非常有害的治疗方法是敷用黑色的树脂膏药。所有与疼痛有关的疾病如肿胀、创伤和溃疡等,都普遍使用这种药物。一个小小的疱疹或脓肿一经出现,马上就敷上膏药,毒素没法自由排除,结果常常引发更为严重的疾病。事实上,几乎每个送到我们这里的骨骼病和关节病患者,如果毫无道理地敷用这种致命的膏药,病情肯定会加剧,但中国人对这种药品却坚信不疑。一天,人们用箩筐抬来一个9岁的孩子,当完全覆盖着孩子一条腿上的膏药被揭下来的时候,正像中国人常说的那样,臭气熏天。胫骨的大部分裸露并支了出来。据他的母亲说:大约在15个月之前,孩子摔倒过一次,腿上有个地方有点疼痛,然后开始贴膏药,以后,除了膏药之外,没有使用过其他药物。当时,孩子已经非常消瘦,脉搏又快又弱,而且咳嗽得非常厉害,看来离死神已经不远了。我们收他住院,对其进行了合理治疗,并在几天之后把坏死的骨头全部锯掉。一个月后,他就可以四处走动了,脸上出现了红润的颜色,身体逐渐康复,无忧无虑的天性又回到他的身上,并且带着极大的热情学习阅读圣经和吟唱赞美诗。在任何一所医院,这样的病例都是非常普通的。

当身体的任何部分有某种外部疼痛的时候,当地医生经常敷用那种带有腐蚀性的药物,从而引起更大的损害。例如,一位年轻人得了当地常见的颈腺病。先是出现一个肿块,接着破裂出头,然后腐蚀性药物被放进去。当他带着极大的痛苦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我对其进行了检查,发现那些腐蚀性的药物已经破坏了肌肉下面的组织,并出现了严重的炎症。我们割下那些发炎部分,摘除那些坏死的组织,病人的痛苦得到了缓解。

最知名博学的中医和那些想当医生的人,都不了解人体骨骼的结构,在他们手里,病人经常受到很大的折磨。一天,一个小孩在玩耍的时候扭伤一只腿。虽然叫唤疼痛,但仍然继续瘸着腿四处走动。因为那个村里没有医生,家长就请一些老年妇女来看,尽管她们又捏又揉,可疼痛并没减少半分。无奈,只好把孩子带到奉天一位著名的中医那里就诊。这位先生猛力地拉扭那条伤腿,直到孩子因剧痛嗥叫不止才肯罢手。到奉天前,孩子还能行走,可经过这位著名的中医整治之后,站都站不起来了,而且那条伤腿已经弯曲,比另一条也短了一些。三个星期之后,当他到我们这里就诊时,臀部肿得很厉害,并且非常疼痛,不使用麻药,根本没法进行检查,关节已经错位了,毫无疑问,这是奉天城内那位著名中医粗暴治疗的结果。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难以治愈的疾病,入院后不久,小家伙就恢复了正常。

一天,我从一位严重枪伤患者创口里取出一块骨头。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创口里竟然流出了水银。

“这是溶化的子弹!”那位患者说。

中医不考虑从伤口中取出子弹,而是常常把水银灌入伤口。他们认为水银可以溶化铅做的弹头,患者也轻易地相信了这一点。

中医有这么多的缺点,难道没有优点吗?事实上,中医也有一些无害的,甚至有益的治疗方法,以及一些有效的药物。例如,他们经常用高明的手法进行按摩,虽然不一定符合科学。他们也了解,甚至有些高估反刺激的作用,在常规治疗情况下,采取某些特殊的手段。用两个手指节,或用两块小木片或用铜币,掐起皮肤,反复地

拧,用力地刮,直到其皮肤发红。拔火罐也是一个通行的方法,经常看到人们前额上有圆形鲜红的印迹。

“有什么病吗?”先是某人着急地问道,但常常得到一个既定的使人吃惊的答案:“没有什么,只是有点头疼。”

出现很多水泡也不以为然,而实际上就是皮肤灼伤。另外,在治病过程中,排汗的方法普遍受到重视,而且为了排汗,既不请医生诊治,也不用任何药物。

中医使用的药物,如大黄、龙胆根、马钱子、甘汞、泻盐等,都很有效。但是,这些药物在身体结构中的实际作用则很难说得清楚。

种痘技术使用的时间不长。以前,一种普遍使用的方法是把疫苗吹进入鼻孔,但实际效果很难确定,如今,通常采用国外接种疫苗的方法。

中国人所拥有的医治疾病最有价值的资本是他们神奇的恢复能力。在同样条件下,中国人能够痊愈的疾病,对欧洲人来说可能就是致命的。一位得了乳腺癌的妇女,经过手术摘除了乳房。术后,她住在一个长16英尺宽10英尺,低矮且弥漫着烟气的房间里。和她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侍候她的人,三个患者和一个孩子,其中一个患者脓肿之处散发出令人恶心的臭味。但是,她很快就痊愈了。在我们医院里,经常出现创伤和骨骼损伤患者奇迹般康复的病例,而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西方,不做切断手术肯定是致命的。

中国人在突发事件面前所表现出的镇静也是非常突出的。某人正在铁匠铺中修枪,不知道枪膛里有子弹,结果,枪响了,炸掉了一只手。他平静地拿出手帕,放在树桩上,用另一只手把那只受伤的手腕紧紧包起来,然后,走了三英里,穿过奉天城到我们医院就诊。

关于疾病和病因,中国人有许多古怪和迷信的观念。这些观念在佛教传入和道教产生之前,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就是等到这些宗教消失以后,在辽阔的农村地区,也无疑会延续下去。许多疾病的产生都与晦气的日子联系在一起,并往往选择黄道吉日吃药。为免于“毒火攻心”,一般要在腿部疼痛部位的上方缠上一根头发。当解释自己得病原因的时候,一位男患者明显地带着深深的悔意,低

着头说：

“我冒犯了山神。当我在山中狩猎的时候，吃了老虎肉，这是山神对我的惩罚。”

一位容貌出众的老年男子，带着已是肺病晚期的女儿来到我们诊所。他女儿的身体实在是太虚弱了，甚至连从轿子上下来走到候诊室的力气都没有。当我解释这种疾病性质的时候，患者的父亲礼貌但却肯定地辩驳说：

“您错了，根本没有什么肺病。我也算一位名医，只可惜不懂外科。我带女儿到您这里来，是因为听说您的手术高明，可以割除那正吞噬我女儿生命的邪恶东西。”接着，他解释道，“在很多个月以前，她的肚子里长了一只乌龟，而且非常迅速地增大，如今，已经有手掌大小了。它生活在血液里，靠人的血液滋养，每天喝三遍血。”

“瞧！”他说，“在心脏正下方的腹部，您用手能摸到那只乌龟的头，正在两边晃动。您能否把它取出来？”

可怜的老父亲！那只所谓的“乌龟”，只不过是身体内不断摆动的动脉。因为女孩身体特别消瘦，动脉的跳动就更容易被人触摸到。

外国人认为，中国的母亲们把自己孩子的尸体扔到荒郊野外，任凭野狗噬咬，是她们心地不仁慈，岂不知事出有因。一个小孩的早亡，是恶狗魂灵勾引的结果，而满足这些魂灵的惟一办法，是把小孩的尸体丢弃给现实生活中的野狗。如果不这样做，同样可怕的灾难将把家中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夺走，因此，出于对生者的爱，母亲只好忍痛献出死者的尸体。

邪恶魂灵的信仰是普遍的，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归因到他们身上。除了那些读古代医书的中医之外，还有巫师、巫医、邪恶的骗子，甚至有地位和有知识的人也去请他们看病。他们开出的处方千奇百怪。如在一张纸上写上神秘的文字，然后把其烧掉，再把纸灰和水搅和在一起，让病人喝下去；也可以把写有神秘文字的纸带在身上，作为驱除邪气的符咒；有时，用一块布把水杯盖上，不断地晃动，等到气泡在水中出现的时候，让病人马上把其喝下

去,与此同时,有人在旁边庄重地叨念些神秘的咒语。

精神病,癫痫病,特别是癔病通常被认为是由邪魔引起的。为了驱除那些邪魔,根本不对疾病初起的环境作任何分析,就采取最为残忍的办法。如强迫病人赤脚站在烧红的铁块上,以及常见的严酷和残暴的毒打。幸运的是,可怜的病人在那种极端的折磨下不能支撑太长时间,往往很快死去。一位十七岁的姑娘被带到我们医院,很明显是位严重的癔病患者。巫医们尝试了各种残忍的手段都没有达到目的,最后,为了探查邪魔,竟把一根烧红的拨火棍插入姑娘的喉咙,不久她就死去了。进口的电池也被中国人当作驱除邪魔的国外先进技术,因为使用了它,许多“邪魔”已经销声匿迹。

中国医学处于如此的混乱状态,治疗方法又这样荒谬和千奇百怪,期待患者对医生抱有更大的信心是不现实的。“家庭医生”的概念还不为人知。一位医生所开出的药如果在几天之内不见效,人们会认为药方无效的原因是冒犯了神灵。人们甚至在第一位医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去请另外一位医生。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医生不行,而另外一个医生可能行,因此,同时请几位医生治疗和开处方是相当普遍的。由于这样的原因,医生到病人家中出诊往往是最令人头疼的事情。

早年,我们医院曾经挽救过一位富裕商人的生命,结果,他成为一名很有智慧的基督徒。几年后,他得了严重的胸膜炎,要求来医院治疗,但气温刚刚超过零度,特别寒冷,因此,我们认为明智的做法是把他留在自己舒适的家中治疗。我们详细地向他解释了这种病的性质和治疗办法,而且我的一位助手每天到他家出诊数次。但他的病情发展却令人不可思议。某天,会非常迅速地好转,结果我们误认为他脱离了危险,可第二天,又会变得比以前还糟。如果此时我知道后来所了解到的事实真相,有一点希望,我也会冒险把他接到医院里来。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们一直在做着最大的努力,可他的妻子,暗地里却厌恶基督教,笃信中国的传统宗教,一直请当地的医生诊治。频繁地更换药物导致这位商人病情发展怪异,迅速地好转和突然地复发。我曾派专人一直陪伴着他,严格地执行医

嘱,希望最坏的结果不要发生。但是,我派出的人被打发回来,患者的妻子坚持说自己能够料理一切。第二天上午,患者的病情恶化。晚上,我查看留下的那些药瓶,里面的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只有白水,至此,挽救这位商人的生命已为时太晚。

患者很不习惯遵从医嘱,经常违反规定吃各种水果和糕点。按照医生吩咐必须卧床休息的患者,当感觉疲倦的时候,就起来四处走动。一位有胯骨关节病的妇女前来就医。手术后,用夹板把腿固定住,她马上开始抱怨难受,并不断地呻吟,结果不得不把夹板取下来。她答应平直地躺在床上,但数小时之后,人们发现她盘腿坐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她得了痢疾,这种病肯定与我们使用的药物无关。我们在她的床单里发现了一小片粗糙的西瓜皮。她的某位朋友偷偷地把西瓜带进来,而除了这小块西瓜皮之外,其余的全部被她吃掉了。当病情再次好转的时候,她开始叫嚷着回家。对我们在饮食方面的严格限制,她相当厌烦,根本没有看到饮食和疾病之间的密切关系。

“我想回家,在家里愿意吃多少水果就吃多少,”她说,“如果不死的话,我要回来把腿病治好,如果我命定要死,那也没有办法。”她回家了,4天后死去。

另外,盲目相信我们的人,也经常给我们带来麻烦,比如,一名患者把药方和药丸一起吞下去;在我们还来不及阻止的情况下,一名患者把诊所里的温度剂嚼碎了。一名男人被送到我们诊所,7个月前,他突然失去了讲话的能力。在此之前,他一直请当地医生诊治,但不见好转。很明显,这是一个歇斯底里失语症病例,因此,我尽最大努力使他坚定信心,然后送给他能够服用4天的药面。可他马上把药面全吃了,结果,引起了严重的呕吐,但是,他的讲话能力也立刻得到恢复。一两天后,他回到家中,到处宣传西医的神奇疗效。过了一段时间,从他们村里来了一群人,恳求立刻治愈他们的陈年慢性病。有位白内障患者,情况与此类似。他从自己和附近村里带来一大群盲人,其中大多数是不可治愈的,有的甚至连眼球都没有。为了使自己的视力恢复到那位白内障患者的程度,所有人都

跪下来向我恳求。

就一般情况而言,作为一名医生,如果能治愈某种疾病,就会尽其所能。一旦对国外事物的怀疑消失,某些庸医就会借此牟利,而人们也易于上当受骗。有个人,曾经在我们医院做过几个月的杂活,看过怎样包扎伤口,知道最常见药品的名称。后来他离开医院,花些钱买来蓖麻油、散道宁、硼酸和软麻布,到乡下的一个村子里,以自己曾经在外国医院里学习过医学为招牌,建立起自己的诊所。还有一位青年男子,在其垂死的状态下被送到我们医院,最后,腿截去了,性命保了下来。靠同样的原因,同样的借口,同样的方法,他也建立起自己的诊所。关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不能断定其出于恶意,也不能断言是无赖行为,因为他们不了解作为一名医生,自己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一名医生究竟需要多少知识。

铁岭有个人,甚至连我们医院附近都没有来过,而且销售的药品也不是真正的西药,但他发现如果称自己与我们医院有联系,所卖的药品是西药的话,就容易赚更多的钱。为使人们相信他与外国人有关系,他悄悄去过几次铁岭教堂,并且学会了一首赞美诗,然后每天在街上支起一顶小帐篷,唱着自己根本不理解的赞美诗,展示自己的药品,并向顾客们保证这些是真正的外国货。

第六章 满洲的气候、疾病和洪水

国家的富庶寓于人民的健康之中。

通常情况下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罗马和芝加哥距离赤道大约相等,事实上,他们和奉天一样位于北纬 42°附近。满洲的气候带有明显的大陆性质,即夏天非常炎热,冬季特别寒冷。因为受洋流影响较小,冬季,广袤无垠的平原一望无际,只能任凭来自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寒流的肆虐。另外,森林和植被的缺乏,对满洲的温度和湿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奉天的夏季是炎热的,但温度很少升到华氏 95°以上,因为肯定要有一段干旱时期,所以人们的感受并不代表着实际的温度。雨季,总是湿热难熬的。夏季降水很猛,往往几小时之内地面积水就深达数英寸。春季和秋季较短,冬季延续约五个月,期间有四个月,河流和湖泊封冻得相当坚实。在奉天,虽然有零下 33°的记录,但正常情况下冬季最低气温应在华氏零下 20°,极端情况下也绝对不会上升到零度以上。尽管如此,过分的干燥带来了灿烂的阳光,以及清洁和宜人的空气,从而阻止酷寒天气的出现。冬季,降雪通常很大,但在城内数英里范围之内,雪橇仍难以通行。春季,温度变化较大,也很突然,经常刮又大又干燥的南风。当然,宁静和潮湿的天气也不时出现,这倒使我想起自己的家乡苏格兰。

总的来看,满洲的气候还是宜人的,那里的欧洲人如果在食物方面注意一点,饮酒上适度一些,就能保持健康。他们必须注意防寒和避暑,因为这两种极端的气候最易致病。一般来说,如果采取极端行为,那么患病还是很容易的。满洲的气候中最令人讨厌的一点是特别干燥,尤其在冬季,刺激人们的神经,怂恿人们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过于疲劳,从而引发失眠、瘵病和神经系统其他疾病。

当我们研究满洲居民生活环境的时候,首先使我们吃惊的是,他们的身体发育良好,而且非常强壮和健康。

普通居民的房子与我们的卫生习惯大相径庭。地面或土筑或砖砌,与房子外面的地面齐平,甚至还要低一些。在奉天城内,民宅可能要比马路低数英尺。在设计房屋时就考虑到了能源的节约问题。一个砖砌的平台,即“炕”占用室内面积的一半左右。炕面铺着席子,人们盘腿坐在上面,白天吃饭工作,晚上铺盖就寝。室内一头,建有一个部分隔开的小厨房。其中有一个火炉,上面架着一口大锅,下面是焚烧谷物秆的灶坑,燃烧产生的烟气通过火炉后面的烟道进入炕下,产生的热量再传到炕的表面,形成能够维持数小时的适宜温度。每天烹调食物时随意烧火两三次,炕面的温暖就能保持一天。但如果谷物秆燃烧所产生的烟气散发到室内,眼睛就会流泪,喉咙也感到难受。

在小河中捕鱼



当地人没有保持整个居住环境清洁的观念,也从不打扫碗柜后面和房间角落,只要炕上干净就够了,因此,很难说大多数人家里有多脏。窗户不用玻璃,而用纸糊,室内光线很暗。屋顶很少安装天花板,陈年的灰尘和蜘蛛网自然悬挂在房顶檩条周围。一个房间里吃住的人过多,而且所有的痰都随意吐在地上。

房子周围的环境同样是脏乱和不卫生的。停滞的污水积聚在一起,各种垃圾和废品,成了狗和猪的食物。1905年前,奉天并没有建立卫生设施的意图,除一些敞开的地沟之外,看不到任何排水设施。下雨时,排水沟成为奔腾咆哮的激流,干旱时,又变为臭气熏天的污水沟。奉天,有些较大的死水塘,成为城内雨水的天然聚积处。就在这些水塘里,人们清洗着蔬菜和衣服。

要保持个人卫生,费用是昂贵的。许多人不得不从拉水车上买水,或者雇佣苦力从最近的井里担水,除非水井就在门口,否则妇女是不能担水的。每年冬天,长达六个月,室内温度很低。由于一家人常年拥挤在一起,结果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进行洗浴。奉天建有一些公共浴池,如果花钱,男人可以到那里去洗浴,但妇女则被拒之门外。用来过冬的棉衣在秋天就准备好了,虽然经济状况较好和特别讲究的人可以经常换洗内衣,但在春天到来之前,从来没有人更换棉衣。

对如何养育孩子,母亲们根本没有严格的观念。一般来说,孩子吃母乳到三四岁,既不喂牛奶,也不喂羊奶。当母亲不能哺乳自己孩子的时候,就给他们吃米饭,或面粉做的汤和谷物做的粥。在漫长的冬季,由于缺少御寒的棉衣,贫穷阶层家庭的孩子只能留在室内,蜷缩在既没有新鲜空气,也没有活动空间的炕上。

我们习惯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们不能茁壮成长,并想象在他们中间能看到很多佝偻病,但事实恰恰相反。按照一般的逻辑,像白喉、斑疹和伤寒等肯定会成为这里的地方病,可患病的人却很少,且流行的机会也不多;我们预计到处都会碰到矮小和发育不全的人,但实际上他们特别高大和强壮。这其中一定存在着某些与不利于健康的环境相抗衡的因素。

通过不能完全吻合的木板和纸糊的窗户,以及打开后就可以直通起居室外的屋门,室内温度从不过热,且保持着良好的空气流通。夏季,除了晚上,窗户和门整天敞开,在每年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孩子们实际是在户外生活,而成年人在户外活动的时间更长。人们过着“简朴的生活”,早早起床,勤奋工作,不使用刺激性药物,整天其乐融融。

通常的结果是强壮的身体,马一样的胃口,健康的体魄和抵御疾病的神奇能力。如果对婴儿早期生活适当关注,对肺结核采取预防措施,对疾病使用科学治疗方法,对卫生学和卫生设施普遍加以改善,从而使上面提到的结果锦上添花,那么,没有一个地方的居民会比满洲居民更为强壮和健康。

但遗憾的是人们还是忽略了一些事情。由于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和卫生条件不佳,无数的婴儿在出生一个星期内死于惊厥,很多幸存者成为瞎子,还有一些人身体健康永远没法恢复。

肺结核是满洲人苦难的根源。人们仍然没有疾病传染的观念,由于习惯于随地吐痰,加之很多人拥挤在一个房间里,环境中必然充斥着大量的细菌。

肺结核相当普遍,特别在学生和各阶层的年轻妇女中间。姑娘们一般在十五或十六岁结婚,而后,她们的职责就是呆在家里忙家务、烹调和做针线,许多年轻的妻子在婚后数年内死于“肺结核”。在我们医院的外科病房,肺结核患者占相当大的比例。

各种眼科疾病非常多,尤其是带有各种并发症的沙眼。很明显,烧炕时冒出的烟是主要的刺激性因素,如在一些农村地区,人们用木材作为燃料。另外一个因素是沙尘。当人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大风卷起沙子和肉眼看不见的尘土,钻进人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孔里,甚至最好房屋的角落都积满了尘土。天花在孩子们中间流行,造成大量眼病和瞎子。在孩子们成长的早期阶段,根本没有人注意保护他们的眼睛。如果患了眼病,就用脏布不断去擦,结果,许多来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患者,情况都非常糟糕,而这种状况,在我国国内从来不会发生。

各种消化道疾病是常见的。谷物和粗粮,很难消化。人们食用粗粮的量较大,又常常是在没有完全做熟,没有仔细咀嚼的情况下下咽。另外,人们也经常吃生的和没有烹调的蔬菜。在炎热季节,有大量的痢疾、腹泻和许多其他消化系统的疾病发生。因为无知,人们还没有把疾病和饮食联系起来。许多死亡是大量吃西瓜和黄瓜后引起的,因为在夏季的奉天,这些东西非常丰富和便宜。

传染病,如水痘、麻疹、猩红热和天花,在我们中间也或多或少,时有发生。但是,当地人们把这些疾病当作普通的儿童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采取预防措施遏制其扩散,结果,无数人死去,无数人脸上留下丑陋的麻子,也有无数人因身体残疾而抱恨终生。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数种可怕的霍乱曾经光顾奉天及其附近地区。最厉害的一次发生在我到奉天后的第一个夏天。在传染病肆虐的过程中,当地的中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用银针治疗,传染了更多的人。那种类型的传染病是最为恶性的一种,死亡率之高令人恐怖,仅八九两个月,从奉天各城门就抬出了2万口棺材。为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我们从早到晚一直忙碌。当时,我们没有医院,甚至连遮避患者的棚子都没有,但一天又一天,人们或用门板,或用担架接连不断地把患者抬到我们的院子里,在当时的条件下,为拯救他们的生命,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另一次严重的霍乱是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开始流行的。在两次大的霍乱中间,还有几次规模较小的传染病流行。

1888年夏季,我们遭受了比瘟疫更可怕的灾难。那是一个特别炎热和干旱的季节,整个6月和7月,奉天的大地烤焦了,干裂了,求雨的队伍也出现了,而在遥远的东部山区,浑河的上游,降雨超常,结果使距离奉天城东南12英里的河水陡涨,水势凶猛。接着奉天也开始降雨,倾盆大雨接连不断地下了两个星期。东部山区洪水暴发的凶讯传来,浑河水位逐渐上涨,可人们仍将信将疑。八月十三日,雨停了,夜深人静,医院和住宅前面小河里的水开始慢慢上涨,给人们带来了不祥的预兆。第二天早上,我听到外面有人大叫:“水涨了!”“水涨了!”

我跑出去,挤到前面去看我们的平台或码头。平台和小河之间的路完全被水淹没了,在灿烂阳光照耀下的平静河面上,突然出现

了涟漪，出现了漩涡，一个喧嚣的涌浪过后，河水已经上升了一英尺。接着再次出现涌浪，河水再次上涨，再次，再次，河水已经上涨到我们平台的边缘。大约在三个小时之内，河水上升了十五英尺。

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什么呢？

那天夜里，从东部山区下泄的大量洪水带着巨大的破坏力量涌入浑河河谷。一个接一个的村庄被荡平了，甚至在某些地方，没有一个人幸免于难。某村惟一幸存的一位妇女，抱着木头在洪水中挣扎了十多英里，才活了下来。在奉天以东大约十五英里有个小村庄，因为洪水来得过于迅速，破坏力又如此可怕，人们还没来得及转移到高处躲避，一座接一座的房屋就倒塌了。黑暗的夜色里，幸存者攀附在断垣残壁上，看不到一线希望。难熬的一夜过去了，第二天，村民们仍在坚持，没有可以充饥的食物，水也涨到腰部和腋窝，似乎完全绝望了，最后，当晚上到来的时候，洪水渐渐退去，全村有十一人死里逃生。

在洪水荡涤上游河谷的同时，下游两岸也淹没在滚滚的浊流之下。奉天城东约两英里处，有个很大的积木场，附近还有一座村庄，河水在那里决开堤坝，涌入奉天城郊平原。离开河道的洪流，就如脱缰的野马，翻滚着扑向小河沿，数英里范围内人口密集的低地顿成一片汪洋。

医院门前昔日平静而缓慢的河水，如今已经成为满是泡沫漩涡的深渊，目力所及，全是翻滚咆哮的浊流。水面上，孤岛似的簇簇树木，枝桠上攀附着无助的男人和女人。河面上漂浮着从积木场方向冲下来的圆木、作物秆、树木、桌子和大车等。还有马、骡子、牛和狗，一些已经淹死，另有一些还在水中挣扎。有人抱着门窗或其他东西随波逐流，也有人拥挤在自造木筏上急速下行。洪水仍然上涨，我们的平台变成了一座孤岛，与医院之间的道路也淹没在水中。医院门前，水深已达数英尺，整个院子已被淹没，居室内外到处都是黄浊的洪水。院子东墙被冲垮，部分门房也已坍塌，轿子和其他一些家具漂进了急流。终于，在下午4点左右，情况发生了变化，洪水停止上涨。此时，水位已经比平时高出二十多英尺。

洪水非常残酷,给那些随时有灭顶之灾的人提供更多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一些人从洪水中拯救出来。在一根绳子前面拴个圈,然后快速抛向在洪流中挣扎的人们,这种简陋的救生工具,使一些行将淹死的人得以生还。比如,漂下来一个粗陋的筏子,上面载有六个人,就是用这种工具把他们从洪流中安全拉到医院的大门前。傍晚,当水位缓缓下落的时候,人们看到一个人正在洪水中挣扎。没有片刻的犹豫,一位从山东海滨而来的强健的基督老人,水性很好,脱掉外衣,跃入水中,奋力游入激流。立刻,他的儿子也紧随其后,前去救援。那个在洪水中挣扎的人在老人到达之前就沉没了,但他们仍然水上水下慢慢地寻找。经过一段没有结果的努力之后,只好返回岸边。非常明显,他们并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扬才去做这样的事。

这场洪水所造成的生命损失是无法估计的。除了淹没的村庄外,奉天郊区的大部分已经成为泽国,数百人死亡。财产损失更大,许多家庭从安逸舒适的生活一夜转变为赤贫。满洲各地河流均暴发洪水,灾难相当普遍。

但是,洪水的直接影响,还不是最大的灾难,只有当冬天严寒到来的时候,厄运才真正降临到人们的头上。饥谨和伴随其后的热病随之而来。英国报纸登载了满洲洪灾的消息,一个“捐款官署”^①也建立起来。援救灾民的粮食不久运到了奉天,传教士们为救灾工作忙碌了几个月。由于饥饿和食物不洁,热病以及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很高。为治疗这些患者,我们医院忙得不可开交。最为艰难的时期,是第二年夏季,青黄不接,灾民生活相当困苦。左宝贵将军常常急灾民之所急,为他们准备了宽敞的木板房子,使露宿街头的数百名灾民暂时得以入住,避免倒毙街头的命运。数千灾民得到食物、药品和其他帮助。虽然这年秋天收成较好,但灾民明年冬天的处境,仍然非常困

^①捐款官署(Mansion House Fund):“中国赈灾基金会”成立于1878年1月26日,总部设在上海,由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和外国商人组成。后来,华北地区发生灾荒,在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提议下,英国组织伦敦赈济会,并设立“捐款官署”负责具体赈济事务。译者注。

难。恢复乡村原来的繁荣景象,用了好多年时间。救灾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外国人的怀疑和偏见在许多地区销声匿迹。

这次洪水所带来的长期灾难是疟疾流行。在洪水暴发之前,从1883—1888年,我们诊所总共收治霍乱患者28名,其中还有数人不是本地人。洪水暴发期间,由于池塘和沼泽变成一潭死水,为蚊蝇滋生提供了合适的条件,第二年春天,我首先注意到疟疾病患者人数在上升,夏季和第三年春天,患者数量更多,光我们医院每年接待的患者就多达4000多人。经过几个干旱的夏季,许多水泡干涸,沼泽开垦耕种,我们医院收治疟疾患者的数字才逐渐下降,如今,奉天附近地区疟疾患者已经极少了。

1893 年奉天气候变化表

月	温度							气压			降水			
	最高			最低			月均	海平面以上 320 英尺			次数		24 小时 最大 值	月总 量
	最高	最低	平均	最高	最低	平均		最大	最小	平均	降雨	降雪		
1	40.4	-0.6	16.29	25.3	-28.2	-9.8	3.51	30.31	29.63	30.09	—	5	—	.75
2	37	6.2	25.53	13.9	-25	-5.02	10.25	30.45	29.74	30.15	—	3	—	.45
3	68	20	43.34	39.1	-8.7	20.73	32.01	30.45	29.34	29.93	1	2	—	.4
4	77.2	42.2	63.45	52.4	29	38.5	50.75	29.88	29.42	29.69	5	—	.32	.93
5	86.9	58.1	73.26	59	32.7	49	61.13	30	29.51	29.69	7	—	.65	2.3
6	96.1	70.8	83.5	69.7	51.9	60.8	72.15	29.75	29.34	29.56	8	—	2.2	5.27
7	95.9	74.2	89.05	76.2	64.5	70.25	79.65	29.73	29.41	29.55	6	—	3.26	4.62
8	95.2	72.6	85.28	76.2	48.6	63.77	74.52	29.82	29.27	29.59	7	—	3.35	4.63
9	86.7	63.3	75.5	59.9	38.5	50.1	62.8	30.13	29.53	29.83	5	—	1.72	3.42
10	76.1	35.3	54.3	49.3	23.1	34.7	44.5	30.27	29.73	29.94	4	2	.8	2.58
11	54.2	29	39.7	42.6	-6.9	13.8	26.8	30.27	29.78	30.01	1	1	—	1
12	47.2	10.8	25.4	23.9	-17.4	4	14.7	30.29	29.62	30.11	—	5	—	.72
年	96.1	-0.6	56.2	76.2	-28.2	32.6	44.4	30.45	29.27	29.84	44	18	3.35	27.07

第七章 东方和西方的误解

虽然他们来自地球的两端，
但当两个强壮的人面对面站在一起的时候，
就没有了东方和西方，没有了国界、种族和血统的隔阂。

——拉迪亚德·基普林

在中国的外国人有个相当普遍的印象，中国人在所有事情上都与外国人唱对台戏，他们在感觉、思考和行为等方面与外国人格格不入。从表面上看，这其中有些道理：他们的风俗习惯、说话方法，行为模式常常完全和我们相反；他们观察许多事物的出发点我们难以理解。事实上，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发现这样的差别就越多，而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每天和自己亲密的朋友或同胞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的。然而，一旦我们从构筑于人类共同本性基础之上的自然感情出发，触摸到他们行为主要动力的深层情绪，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坚强、精力充沛和可以信赖，我们就会像兄弟一样紧紧抓住他们的手。他们对家庭的爱，对友谊的忠诚，对所爱者的无私奉献，家庭的和睦与欢乐，对孩子的关爱，对朋友和乡亲所表现的亲情，他们在报恩时的真诚，在困境中的坚韧，在痛苦中的忍耐，这些，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比较起来，都毫不逊色。

他们的行为方式可能常常与我们的不同，这也是我们轻率加以攻击的一点，但是，当我们在具体的环境中仔细探讨其原因和结果

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草率而肤浅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当一个男人独自在闹市大街上行走的时候,突然发病了。他摇摇晃晃,踉踉跄跄,最后倒在一家显然相当兴隆的商店门前。怎么回事?行人们睁大好奇的眼睛,看了看他,然后继续赶路。有几个围了过来,看着他,但没有一个人碰他,更没有人想办法去帮助他,而那位店主则躲的远远的,生怕别人看到自己。这个男人失去了知觉,而且是个外地人,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告知他的亲戚朋友,只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位店主给负责城市管理的衙门捎了个信,才把这个男人弄走了。从始至终,没有人给他送一杯水,或提供一点帮助,使其好受一些。

“无情!”某位外国人吼道。“冷酷自私的麻木!”

但是,中国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多少世纪以来所养成的习惯是什么?当地的法律又是怎样规定的?这种作为,或不作为的背后隐情又是什么?事实是,当地的法律规定:曾经为某人提供过住房、食物和服务的人,如果某人死去,这个人要对死者负责。如果没有亲戚朋友前来认领,这个人必须承担死者的丧葬费用。如果死者的亲戚朋友来了,还有可能控告其导致了此人的死亡。

我早年朋友高道台的女儿,那时已经和一位富有的著名官员结婚。一天,在大街上,她遇到一个可怜的人,由于饥饿和重病,躺在那里,奄奄一息。她雇了几个人把他抬到医院去,但在路上就死了,结果她为其支付了丧葬费用。死者的亲属听到这个消息后,像群秃鹰一样围上来。为了平息此事,这位了不起的女人不得不继续支付给他们数百两银子。如此看来,一个人倒在大街上无人问津而导致死亡,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那时,我到奉天时间不长,对当地法律中这样的规定不了解。一天,我见到一群人聚集在小河岸上,就走下去看个究竟。河水中有一个人行将淹死的人,已经失去了知觉,是投河自尽。使我大为愤慨的是,岸上竟没有人想去救他。为此,我让医院的工作人员下去把他弄上来,他们很不情愿,但还是照办了。出人意料的是,这个人竟然苏醒过来,并最后脱离了危险。有人告诉我说:如果我不是一

位外国人,一旦这个人死了,所有与之接触的人都难逃干系。

毫无疑问,这条法律是某个古老习俗的结晶,而它曾经在防止谋杀方面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人们认为它不是一个好的法律,但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时代^①的习俗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另一个攻击中国人的常用口实是中国人忘恩负义。许多外国人做了一些事情,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友好的和仁慈的,实践了圣母的慷慨品行,是在为中国人解除痛苦,而那些获益的中国人却忘恩负义,甚至用嫌恶来报答他们。在这些事情上,真实的情况通常是施与者和接受者之间互不理解。中国人认为,外国人所做的一切都已经得到报偿,或者,他们如此做,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既然这样,中国人为什么要感谢他们?或者,外国人可能用某种方式给予的仁慈,恰恰冒犯了中国人,而中国人的过于礼貌又使外国人感受不到,他们在表达谢意的时候有自己的分寸。

当中国人认识到别人在善待自己,而自己也得到意外收获的时候,他们的谢意是深情的和实际的。在盛京医院三十年的行医过程中,我们对此有切身的体验。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忘恩负义要比国内诊所和医院里少得多。除了那些由医院提供免费床铺的赤贫者之外,所有的患者都要支付伙食费用。而且,他们的捐助也很慷慨。一天,一个男人还给我一先令,并解释说那是他出院的时候欠下的。他家距离奉天很远,为了这一先令,回家之前,他到奉天附近的农村打了一个月的短工。

“你免费治好了我的病,”他说,“我总得花些饭钱!”

经常有患者带着礼品回到医院,或是一只家禽,或是一篮子鸡蛋,或是从自家树上采摘的一包榛子。一个蒙古男孩,肘关节脱臼,一年后,前来我们医院就诊。当时,他的关节已经僵直,不能移动。但经过一次手术后,恢复了正常功能,他和他的父亲高兴地回家了。数月后,一头漂亮的黑色蒙古奶牛被赶进医院的大门,同时也带来

^①亚伯拉罕时代(the time of Abraham):亚伯拉罕是《旧约全书》中的人物,是远古西亚游牧民族以色列人的首领。亚伯拉罕时代是人类从混沌的初民社会等级、血缘、意识形态而走向分裂的转折时期。译者注。

了蒙古一家人的敬意和感谢。在闹义和团的时候,有谣传说我没有逃离奉天,而是躲在郊外北陵的树林里。有一位曾经在我们医院接受过治疗的马贩子,一个职业骗子和无赖,当时如果告发我会得到很多好处,但他却买了一篮子各种各样的食物,偷偷溜进那片树林,白白地找了我一整天。那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任何人都知道,帮助一个外国人将被处死。

尽管流行看法认为中国人在金钱问题上比较吝啬,但慷慨仍然是中国人的显著特征。他们不善于系统化的赠予,实际上他们不习惯任何系统化的事物,但他们对所有捐赠的号召都积极响应。他们的礼尚往来主要表现在婚礼、葬礼、长子出生和其他一些场合,对我们来说,遵循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相当困难。当一位在他们中间生活一些年的传教士回国度假的时候,会接到大量的礼物,而这些送礼的人并不希望得到什么回报。在医院和医学院,我们一直在幸福地体验着这种慷慨,事实上,我们的医院和医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中国人自愿捐赠建设和维持的。

与慷慨相似的特征是盛情和好客,这出自于他们坦诚的自然本性。婚礼、葬礼和生日是举行盛宴的机会,为此目的,搭建帐篷,邀请很多客人前来。在这样特定的场合,他们显得非常好客,随时准备接待每位前来者。当我们停下脚步,和门前某人搭话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样的邀请:“您不进来休息一会? 喝点水吗?”这不仅仅是客套,也是一种真情。

某个夏天的午后,我们正在郊外散步,一场雷阵雨突然袭来。附近只有一座砖土混建茅草苫盖的小屋。因为雨太大了,衣服又过于单薄,为此,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向小屋跑去。当看到我们跑来的时候,主人马上打开房门,还没等到我们喘上气来,请求避避风雨,就请我们快些进来。他一边为自己简陋可怜的居住条件表示歉意,一边立刻为我们准备热水,同时也因没有为客人准备茶叶而感到不安。

“如果我知道有如此尊贵的客人要来,我会准备一些的,”他说。不用怀疑,他会这样做的。他把家里的孩子们一一介绍给我们。如果是一位绅士,招待我们的礼貌也不过如此。他不是一名基督徒,甚

至连医院附近都没到过,在此之前,更没有同外国人讲过一句话,我们仅仅是几个暂避风雨的过客,他却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愉快和欢乐。

我们经常听到中国人欺诈和不诚实的说法,——“不择手段”。但是,那些和中国商人曾经有过密切交往的外国人却认为:他们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商人一样可以信赖。在三十多年的经历中,我常常想起一位令人尊敬的商人的话,他的人品像他所签订的契约那样可靠。我了解外国人与那位中国商人所订立的契约,在履行契约过程中,由于某些不可预见的因素,那位中国商人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遭到损失,可他仍把履行契约当作光荣而理所应当的事。对与之交易的人缺乏信任和理解,从而引起欺骗和不诚实是普遍的事,然而,信任孕育着信赖。人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外国人,长期住在中国,但不说中国人一句好话。一位外国人,因为怀疑和气愤,或因为自己的生活习惯遭到冒犯,用中国人认为不公正的办法,轻易地解雇一名中国仆人。对他来说,很难找到第二个值得信赖的仆人。如果误解再次发生,他会因为雇不到一个好仆人而出名。在他的生活中,将承受着一连串的不快,而那些为他服务的人则背着他做着偷窃和其他的不义事情。

不诚实可以归因于中国通行的索取佣金的习惯,无论用英语还是用汉语,都可以用“勒索”来表示。在商品买卖过程中,不确定的百分比可能保留在那些不得不进行讨价还价的每个人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从上到下,实行人治,而不是法制,毫无疑问,那是一种糟糕的制度。无止境地滥用权力是公开的,而且得到普遍的认可。如果把这种滥用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就没有人再考虑不诚实和不公正的问题。事实上,在某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里,欺诈和阴谋要比中国人严重得多。但是不幸的是,中国人也开始沾染这种习气。

一天,我前去拜访一位官员,他是我的亲密朋友,家不住奉天。负责烹饪的大师傅走了进来,主人对他说:

“伙食这样差,一定是你兜里没钱了,这里有一点,拿去贴补一下。”然后,他交给大师傅一些钱。我对这个细节非常感兴趣,就问这是什么习惯,当然,我们对这个做法是反感的。

“他可以把所有经手钱的百分之五据为己有，”那位官员说，“其他仆人认为他拿的不多。盛京将军的仆人拿的回扣还要翻倍，很多人都有份，绝大部分钱由朝廷支付。”

同样的原则适用所有的官员，名义上的薪水仅仅是一个小数。

“我得到的薪水还不够买马料，”一个官员说，无数的办公补贴形成了实际的薪水。这个制度的危害在于它把决定官员利益的权力留给官员自己。许多有良心的正直的官员只拿应得的薪水，但也有不少官员根本不考虑人民的死活，竭尽全力进行搜刮。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人是麻木的，在某些环境下确实如此。然而，他们也是易于激动的人。如果一个中国人认为事情不可逆转，将表现出极大耐性，没有任何抱怨，其真实感受也不会在脸上轻易显露出来。但是，无理地对待他，或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有损于自己的尊严，他很快就会激动起来，以致完全失去自控能力。患者致病的一个普遍原因是“暴怒”。我曾经观察过一个病人，体温在几分钟之内上升了4度，惟一的原因是听到家里的一些消息后大怒。我们医院有个病人，一个晚上突然失去了讲话能力，并伴随高烧，出现危险症状。我发现，他的仆人刚刚离开，他非常生气，因此，我们想办法让那位仆人重新回到他的身边，那位患者才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

这种神经易感性常常受到东方天命论的影响。当一个人相信某件事情必将发生的时候，这种想法将有助于这件事情的发生。一位忍受着严重痢疾折磨的老人由他的儿子陪同前来就医。经过四天的治疗之后，病情有了很大好转。在同他谈话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他坚信自己就要死去。刚得病的时候，他请算命先生摇了一卦。那位算命先生说，他必定在某天下午四点钟死去。为避免此事发生，家人才把他送到我们医院。

“对于我的病，你们愿意怎么治就怎么治，”那位老人说，“但我仍然得死，那是天命。”尽管我们忠告，妻儿恳求，他还是让人们用担架把他抬了回去，在原来约定的那天下午，他逝世了。

有这种气质的人，自杀是很正常的，所以才有这种事情的发生。但就自杀的基本原因而言，中国人与欧洲人有很大的差别。

在中国,一个男人选择自杀不是因为厌倦生命,也不是因为逃避羞辱和难以忍受悲痛,而是由于两点,即难以控制的愤怒,或他的死将置对手于不义。你把钱借给某人,可到时他不能还钱,你做了些使他不愉快的事情,使他“丢脸”,在世人面前丧失了尊严。他以死来报复你,而因为他的死你受到世人的责备。或你与人打官司,结果你胜诉了,但是,你的对手自杀了,结果你的损失会更大。

奉天有一个富裕的家庭,乡下的土地与一些穷人的土地毗连。为争夺边界,矛盾越来越大,最后只好诉诸法律。因为有钱做靠山,那个富人胜诉。第二天,穷人的一个儿子在他家门前自杀,富人拿出很多钱去补偿自杀者的父母。这件事解决以后,穷人的另一个儿子做了同样的事。他在自杀前,召集所有的人说: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自己的父母受到这位富人的折磨和不公正的对待。这次,对方所提出的补偿费用更高,经过数月的讨价还价之后,富人还是拿了钱。接着,第三个儿子又去自杀,这一次,进一步增加的“血债”把富人变成了比对手更穷的穷人。案件重审,这次,农民打赢了官司。家庭荣誉感是强烈的,虽然表达的方式与我们有很大的区别。

当年轻的妻子痛苦的时候,跳井自杀是很常见的事。一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她的父母和亲属就要向其婆家索要金钱,因为没有遭到虐待,怎么会自杀。自杀可能是一怒之下所为,争吵也可能完全是她自己的错,但这些都难以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婆家同意支付这笔消停钱。这种习惯对婆婆虐待年轻媳妇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

人们把某种形式的复仇或报仇看作是正当的。如果某人伤害了你,如果你不采取一些办法回击他,就很丢面子。在粗野的和没有文化的人们中间,有时复仇的方式极端残忍。一个人来到我们医院,拿着自己的一块舌头,那是被敌人割下来的;另一个人捧着他的双眼和双手,那是被敌人剜出来和剁下来的;第三个人捧着他的四个眼帘,那也是被敌人割下来的。(为了让他的眼睛鼓起来,外观上好看一些,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用塑料眼球填充在眼眶内。)一般来说,中国人谴责残暴,他们认为语言是更有品格的武器。一次,我们

吃惊地看到,一位穿着体面的人用最肮脏的话破口大骂,这怎么可能呢,可他却平静地说:

“是他先骂我,我当然要以牙还牙,否则,就没有面子了。”基督徒的规则是:为那些诅咒你的人祈祷,不要赞扬那些野蛮人的行径。

西方人认为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装备着致命武器的现代陆军和海军方面发展比较缓慢。尽管其人口众多,但仍要屈从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因此,被各国所轻视。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与西方那种按照“强权即是公理”逻辑行事的文明相比较,中国的文明理念是否应该属于一种更高的形式?中国人一直认为:道与器相比,道在器之上;智力与体力相比,智力优于体力;诉诸于理智比进行战争更好;判断是非的根据是理。一定数量的士兵常常是必要的,但那些只能算是以省为单位的武装警察,而不是一支军队。另外,从文官和武官地位的差异上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是怎样看待武力的。

“理”被所有人当作至高无上的观念,适用于所有情况。这个词可以翻译成“道理”,“合适”和“正道”。说某人,某个家庭,某个共同体,某个国家不讲理,是比较严厉的指责。在刺刀的威逼下,当一个国家提出某种要求,而这个要求又是这个国家明显没有权力提出的时候;当中国已经屈服的时候,没有人认真地考虑外国人是否已经确立起优势,因为诉诸武力是一种糟糕的办法,中国人明确地认定外国人没有理。

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理的原则得到贯彻。呼唤一个人的良知比逮捕威胁有更深远的意义。由中间人或仲裁人解决纠纷是通行的办法。日俄战争给奉天带来西方的管理方式,而在此之前,奉天城内没有一个警察,其他城市也是一样,根本就不需要。城内有打更人,还有衙门的“捕快”,如果需要,他们会完成逮捕任务,但是,奉天城的和平掌握在它的市民手中。

家庭实行家长制度,一个大家庭有20到150人不等,因为出现家庭纠纷而常受诟病。但是,在西方社会,这样一种制度长期存在,是不可想象的。持久的争吵和烦恼,使人难以忍受,但作为一种客

观存在的事实,这些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实际上多数生活在一种和睦和友爱的美好气氛之中。一位老爷爷或老奶奶掌管着所有的家庭事务,他们的话就是法律,在每次争吵中他们都扮演着仲裁人的角色。

外国人已经习惯于自己的第一印象,便得出中国人与我们行为观念截然相反的结论,但是,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人中间,更密切地与他们交往,将逐渐改变自己的看法,最终发现我们和中国人是非常相像的。一个乡下家庭,有男孩,也有女孩,围绕在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身旁,愉快健康地成长。他们或在乡村学校里读书,或在农田里帮助父母干活。家里的繁重劳动都由壮年承担起来,而老人生活则非常悠闲。夏季,在明媚的阳光下蹒跚而行,冬季,则找个温暖的角落打盹。除了宗教背景不同之外,这和我们国内小农场的家庭生活又有什么两样。

实际上,宗教背景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区别。一般来说,宗教在满洲毫无价值。人们缺乏伟大的生活目标,缺乏高尚的理想,没有给他们每天单调的日常生活增添光彩。在这种生活中,没有道德和精神成长与进步的渴望,当然,对未来的生活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他们可以为修建寺庙捐款,或在某个偶像前烧香,但那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宗教活动。为了贿赂那些会伤害他们家庭的邪恶鬼神,或为了得到他们热切渴望的某些世俗实惠,或最大可能避开自己有意无意所干坏事而自然带来的惩罚,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以某种方式在购买保险。

那些和尚和道士,还有那些以宗教名义发誓的苦行者,都表白宗教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但同时却沉湎于各种形式的恶行之中。杰出且很有理

性的人承认宗教与道德的实际脱节,其结论是:在现实生活中,宗教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同时,就一种诚实的生活而言,即使没有实践,他们也非常尊重儒学所倡导的崇高道德,因为那是他们祖祖辈辈灌输和世代传承的精神。

虽然到处充斥着大量的迷信,但一般来说,除少数的佛教徒外,中国大多数人不信仰宗教。他们只了解和关心物质生活,甚至对诚实和道德的尊重都建立在能带来最大益处的长期经验的基础之上。怎么赚更多的钱,怎样使家人生活得更舒适,最重要的是保证来年的生活,而来年之后又是一个来年。人们忠诚于自己的祖先,在他们的神龛前虔诚的拜祭;等到逝世的时候,就回到长辈们身边,而那些一直接受这种教诲的孩子们,又要跪在他们的神龛前拜祭。我们问道:“祭拜有什么用呢?”无数的满洲人都给出同样的回答:“谁知道呢?”

第八章 远离狂乱的人群

一旦我明白感受到对这平原的依恋，
驻足回眸，左顾右盼，
来时的道路已经消失！周围竟是灰茫茫的一片！
无尽的苍穹之下，除了平原还是平原。

《罗兰少爷前往黑暗塔》——罗伯特·布朗宁

满洲现代化进程之快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如今，人们可以在星期一上午9点钟从伦敦出发，11天后，即星期五的下午，就可以乘坐舒适的小轿车穿行在奉天的大街上了。与30年前相比，确切地说与13年前相比，社会进步是巨大的，其幅度远远超出30年前相对于帆船时代所取得的成就。

过去，满洲一直被看作是中国边疆的一部分，在西方，没有几个人知道它，到这里游历的人更少。乘船从伦敦到上海要经过6个星期，然后必须在上海等候到牛庄港的沿海轮船，可能需要10天左右时间。再经过3至4天的航行，最后在牛庄港上岸。为准备马车和内陆旅行的各种物品，有必要在牛庄多逗留几日。一路上，要住客栈，许多东西是不可少的。为了休息，必须准备被褥；为了烹调，必须准备食物、壶、锅；为了用餐，必须准备刀叉、盘子和杯子等，这些事情都交给仆人做了。对那些不在乎客栈里粗鄙食物的外国人来说，足够的外国食物储备可以弥补当地食物的不足，而光靠客栈所提供的食物，外国人很难维持身体的健康。

到内地的旅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当年那条路还原样保留着,就在铁路线旁边。那时满洲还没有人工修筑的道路,穿越田野的凌乱车辙从一个村庄通向另外一个村庄。这些道路一般比两边地面低,前往附近市场的大车,满载着当地的农产品,在路上碾压出深深的车辙。雨季,道路成为一条条小河,或是一连串水泡子,精疲力竭的骡子不得不像蜗牛一样艰难地向前挪动,有时,一天只能走五英里,偶尔,也有骡子淹死在这样的路上。

旅行者要坐一种没有弹性大车。这种车是由三匹马或骡子拉,主要靠赶车人的吆喝来驱使牲口。摇晃是最难受的,特别是那些没有坐过这样交通工具旅行的人,非常容易头痛或呕吐。许多外国旅行者因此得出结论:乘这种车旅行,最好先步行,直到累得不行了再强迫自己去享受那所谓的舒适。天黑之前,必须停下来,找一家中国客栈住下。对曾住过这种客栈的人来说,没有什么难的,但对新来者而言,尽管带着垫子,仍然感到砖炕特别硬;冒烟的油灯发出的光相当幽暗;通过在窗户和隔扇上轻易挖出的洞,好奇的人们随时可以窥探客人房间,隐私暴露无疑,使人感到特别难受。冬季,早上的天气非常寒冷,而赶车人常常还要尽早上路。从牛庄港到奉天有120英里,根据天气和道路状况,过去坐马车常常要用4至8天时间。

夏季,可以雇一条船,不用马车。过去常常用简陋的木船来运输大豆和其他货物。旅行者可以坐在装载大豆的船舱里,上面有用席子做成的船篷来遮风避雨。坐船旅行还是相当舒适的,但整个旅程无论如何也需3到10天,而10天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如果顺风,船或穿行于绿色的原野之中,或行驶在长满柳树的高岸中间,使人感到非常愉快,只是在河道转弯处,需要用长杆把船从河岸或浅滩支开。当逆水上行的时候,人们常常用杆子撑,往往一次就是几个小时。赤裸着双脚的船工在两边狭窄的甲板上跑来跑去,单调的脚步声响个不停。当船逆风而行,或逆流而上,行驶困难的时候,全体船工就要“随机应变”,灵活调整风帆的角度。为了排除河岸上树枝和树干对船帆的阻挡和挂扯,要在桅杆顶上系一根绳子,只留一个人掌舵,另外两三个人在两边甲板上跑来跑去,用绳子来对付岸

上的树枝。那些通晓汉语的外国旅行者,还可以和船工,以及岸边的村民们交谈,这会使沿河旅行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即使船在沙滩上搁浅,需要耽搁一段时间才能前行的情况下,也不会感到寂寞。但是,对一个初次到内地的外国人来说,由陆路或者由水路都没有什么意思,由此看来,早期满洲内陆很少有外国旅行者光顾就不足为奇了。

冬季,进出满洲都很困难,这使人们更加感到与世隔绝。11月末,牛庄港,即满洲的门户“关闭”了,冰封期至少有4个月。信件由快速信使从上海经陆路送达,需用一个多月时间,沿着那条路旅行没有什么问题。离开满洲北部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想到铺设西伯利亚铁路问题。满洲的东部,是封闭的朝鲜王国,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进入那片国土。大连还没有建设,冬季跨越海峡的惟一办法,是先经过一个星期,或10天的陆路旅行,到达满洲南部的旅顺口,或附近的港湾,然后乘坐中国帆船出海,以后,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居住在满洲内地的外国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要留在家里。在他们的活动范围之内,没有避暑圣地,惟一可能且费用不高的调节方式是访问其他的传教点,或者进入更远的内地旅行。

过去和现在一样,巡回旅行常常选择在冬天。届时,大地冰封,道路坚硬,车轮碾压其上,嘎嘎作响。循着光秃秃土黄色大地的边缘,马儿一路小跑,每天能走四十英里。这个季节,人们已经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比较轻松,有时间聆听布道,也有机会带亲属就诊。春天旅行有助于陶冶人的情怀。在沉闷而枯燥的冬天过后,到处是充满着活力的绿色生命,尤其那些绽放的野花更使人欣喜不已。当然,马车在泥泞和深深的车辙中颠簸和跋涉,就是享受如此奢侈的精神盛宴所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夏季,万紫千红已经褪去,清新和嫩绿变得枯萎和呆滞,对外国人来说,炎热已经使旅行成为沉重的负担和具有很大的风险。大雨接踵而来,河水上涨,不能徒涉,道路变成条条小河和一连串的沼泽。

早秋的旅游就像在色彩斑斓的画廊中漫游。沿着乡村的道路

和小径乘车或骑马慢跑,两边是十二英尺高的高粱。除了头顶上高悬的蓝色天空,前面和后面的道路,只能看清数码之内的东西,旅行者完全淹没在高粱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有当不时登上某块高地的时候,才得以饱览面前的丰硕之美。一片一片的高粱,无边无际,粗壮的高粱秆上长着棕红色的穗子,沉甸甸的,在灿烂的阳光,下,不情愿地随风摇曳。偎依在树木中间的农场和小村庄,就如大海中一个个绿色的孤岛,还有那片片的庄稼,嫩绿的蔬菜,这一切的一切,都笼罩在蓝色的苍穹之下,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和谐,所有的单调和疲乏立时荡然无存。

第一次乡村旅行安排在 1884 年的春天,此时我已经在满洲生活一年半了。我把所有学习语言的书籍放到一边,带着一种轻松的心情,把随身携带的行李,和其他几件生活必需品,还有好大一包药品和医疗器械装上马车,前往南方的海城^①做了三天的旅行。为给我做伴,一位老资格的传教士,尊敬的约翰·麦金太尔先生也备有一驾马车,载着床铺和其他东西,当然还有福音书、圣经和一些小册子,而我们自己则骑马。这种旅行方式使人特别愉快。在海城,我们离开大路,直接转向东南部山区。我开始感到,满洲的大地多么美丽啊!一旦春天悄然到来,紫罗兰铺就森林的漂亮地毯,野风信子聚在一起欢快起舞,树木也急切地披上绿装。经过那些波浪起伏的丘陵,穿过隘口,就是那高耸的连绵不绝的山峰,这自然使我想起祖国的苏格兰高地。在山峰的最高处和石缝中,白色的冬雪仍然残留着,融化的雪水汇入山谷形成清澈的小溪向低处流去。在这些溪流上最为显眼的是那些渔梁和带着涡轮的水磨,它们在此地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时间。

在我们曾经逗留过的每个城镇和村庄,都要告诉人们我们是给大家看病来了,接着,惊异的人们聚集到我们的周围。许多小病当场就治愈了,并且还做了一些小手术,由此人们知道了奉天还有一所医院。传道的书卖了许多,数千人直接聆听了我们的布道。当告别的

^①海城(Haicheng):今辽宁省海城。译者注。

时候,所有人都说:“这个耶稣的宗教肯定非常好。”我们一直到达中国与朝鲜的界河鸭绿江边,然后折向北方,从另一条路回到奉天。

一天,接近黄昏时分,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我们发觉自己距离那座惟一的客栈还有数英里远,而且这个地方和客栈之间横亘着一条河流,因为冰雪融化,河水上涨,情况非常明显,马车是过不去了。

“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游过去,”麦金太尔先生说,“马也能游过去,我们就骑马过河吧”。我们进入清澈的河水里。幸运的是,没有必要游水,马走的很快,奋力通过急流到达彼岸。我们找到通向客栈的道路,在天黑之前到达那里。那是一座破旧的小屋,只有一间公用房间,由两位老人看守。有了一个歇脚和过夜的地方,虽然条件简陋,但仍然感到困倦和高兴。房间里既没点蜡烛,也没点油灯,只有一根挂在横梁上涂了焦油的火绳发出一点光亮。借助这昏暗的光亮,我看了看手表。

“那玩意有什么用处?”其中一位老人问道。

“它告诉我们时间。”我回答。

“什么时间?你说的时间是什么意思?”

“它告诉太阳所处的位置。”

这位老人一脸迷惑和不解,转向他的兄弟:“可太阳已经下山很长时间了,这玩意怎能告诉你它在哪呢。”

“唉呀!”他的兄弟带着敬畏的口吻说,“通过那块玻璃就能看见!外国人什么东西不能做?”我们饿极了,但是,除了陈年的干玉米棒子,客栈里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我们煮了一些,稍微缓和一下饥饿。最后,大约在午夜时分,我们的马车到了。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吃上了易于消化的晚餐,而且重新换上了自己的铺盖。因为准备继续赶路,第二天我们起来很早。在为马备鞍的时候,那位老人又开始问我们:

“您的国家距离这里有多远?”

“数千英里吧。”

“一路上您都是骑这匹马过来的?”

几天后,我们遭遇到一场那个季节少见的暴风雪。满洲的雪通常像面粉那样干,但冬天的第一场落雪和春天的最后一场落雪,则如同我们家乡的雪一样,湿漉漉地钻进每个角落和裂缝,甚至钻到马车的垫子和行李包下面,结果我们被困在路边的客栈里。为了看我们怎样吃饭,听我们相互间如何用外语交谈,观察我们奇异的服装和物品,述说他们自己的病情,问我们来这里干什么之类的问题,许多人聚集到客栈里。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人,一只眼睛上长了个非常大而且特别难看的瘤子。他对我们在奉天的工作有所耳闻,因此前来恳求我们把这个瘤子割去。很快,人们抬来一张桌子,接着进行消毒准备。在惊得目瞪口呆,看得异常兴奋的众人面前,瘤子被取了下来,伤口缝合上了。那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敷了两次药,接着让其自然恢复。后来我听说,伤口愈合得非常好。

在那个时期,奉天城里出现个外国人是件很大的事。1885年初某个冬天的夜晚,仆人进来告诉我,大门口有位外国人。很明显,他不知是否应该请他进来。我走了出去,看到一位老人,穿着非常肮脏破烂的中国衣服,从那杂乱蓬松的胡须颜色一眼就可以看出不是中国人。因为他听不懂英语,我也不懂他的语言,我们只好用汉语交谈。他是个波兰人,二十多年前,他所乘的船在满洲南部海域失事。根据他的叙述,他是这次海难中的惟一幸存者。驻牛庄港的英国领事曾经帮助过他,并派遣他前往满洲北部遥远的边境地区调查“鱼皮鞣子”。他一直向北走,经过无数天的跋涉之后,终于到达目的地。但是,他所带的钱用完了,只能靠给中国人做农活来维持生存,并且在那里住了下来。

那是个野蛮的没有法律的地方,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那时,一个土匪头子控制着那片土地,掌握着生杀大权。对那些反对他的人,常用的惩罚方式就是活埋。这位波兰人辛勤劳动,表现很好,赢得了当地人们的信任,分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后来和一位中国妇女结了婚,全家人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

然而,一场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可怕的洪水卷走了他的妻子、孩子、家园和粮食。孤独凄凉的单身生活,使他愈加思念自己的

母亲、姊妹和祖国。他艰难缓慢地向牛庄跋涉,希望在那里找到一艘船,回到自己的祖国。这些年里,他没有听到过欧洲的任何消息,因此急于想知道普法战争以及德意志帝国强大的事情。可波兰怎么样呢?当我告诉他波兰争取独立的最后努力以失败告终,这个国家已不复存在,然后把欧洲地图拿给他看,他竟然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中国的基督徒们对这个人特别关心,尤其当这个人告诉他们自己也是基督徒的时候,更是如此。为帮助他筹措回国的旅费,他们在中国人中募集了相当数量的钱。我们为他换上旧外国服装,招待了几天,然后送他去牛庄,并且给英国驻牛庄领事带了一封信。后来,我们听说他直接去了牛庄罗马天主教会,对他们说,自己是天主教徒,那无疑是正确的,神父们送给他一些钱。他也带着我的信到英国领事和其他人那里,又得到一些钱。然而某一天,他消失了,但没有上船,而且再也没有人听说到他。毫无疑问,他是一位政治流亡者,不敢回到自己一直渴望的祖国。

有时,我们要接待一些特殊客人。亨利·詹姆斯爵士(那时称先生)、弗朗西斯·杨胡斯班爵士(那时是中尉)、福尔弗德阁下(现在是总领事)等人,在他们前往长白山地区探查的路上,曾经和我们盘桓了几天。

一些年后,我们接待了一位杰出的旅行家伊莎贝拉·比尔德·比绍普夫人的来访。在那场引起中日战争的东学党起义爆发时,其他女士遵命撤出,而她却留在朝鲜。当她没法按照原定计划行事的时候,来到牛庄,然后乘船到奉天。在距离我们大门数百码的地方,为了躲开不知多深的臭水坑,马车翻了,她被抛出车外,撞到一块石头上,皮肤又青又肿,胳膊也受了重伤。在以后的五个多星期里,她留在奉天,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极大兴趣。她经常在我们医院里走动,调查每个病人的历史,并进行拍照。她面对疾病和痛苦所表现出的活力和敏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她的右胳膊摔坏了,马上学习用左手写字,用这种方法,完成了她的著作中关于朝鲜部分的撰写。中日战争开始的初期,在那险恶和令人焦虑的日子里,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大家都非常喜欢她,后来她成为我们的忠实朋友。医学院的部分建筑就是她用她捐助的钱和为了纪念她而建立起来的。

按照常规,如果没有铁路,数月之内,在我们生活的小圈子之外,看不到一个欧洲人。中日战争结束后的那年冬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正张开贪婪的黑手伸向满洲的平原和山岭。一天,我们迎来了没有料到的几位客人:一位俄国上校,一位俄国中尉,由四名哥萨克陪同前来拜访,这也是我们的第一次相见。他们穿越朝鲜,进入满洲,直奔奉天。我们邀请他们共进晚餐,相处非常融洽。那天夜里,当我站在医院的门前,看着他们跨上战马,在冬天闪烁的星光下疾驰而去的时候,听到远处坚硬的冻土路上传回哒哒的马蹄声,那似乎在发出一个警告:古老的时代就要过去,满洲将不再与世隔绝。

第九章 1883—1894 年的进展

担负起白人的责任,……

靠坦率的语言与正直淳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追寻他人的利益,为他人的收获而努力。

当离自己目标最近的时候,也就获得了他人所追求的东西;

坐视懒散和野蛮人的愚蠢,你所有的希望都会付诸东流。

——拉迪亚德·基普林

我在奉天度过的第一个礼拜日,仪式是在一个小房间里举行的,出席者都是中国人。那是个热诚和团结的小团体,也是非常有希望的小团体,尽管谩骂和迫害的存在,他们仍然企盼着自己的上帝征服满洲那一时刻的到来。但我认为,即使当时对前途最为乐观的人也不会相信有这种可能,即 30 年后,除了众多信徒外,满洲会有 26000 名常年在教堂活动的新教教徒,而在奉天就有大约 1000 名新教徒,他们每个星期天都聚集在三个分别不同的教堂或大厅里从事宗教活动。

一般来说,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满洲对基督教的接受一直比较积极,这与在此努力工作的外国传教士人数有关。另外与满洲人口的混杂性质也不无关系。那些从中国不同省份迁徙而来的人们,自然不会坚定地固守他们家乡传统的迷信和信仰。既然生活中那么多体验是新鲜的,接受新的宗教似乎不是不可能的。为找到可以坚持

的某种固定信仰的内在冲动，已经导致无数的满洲移民在摸索真理的道路上，误入某些佛教宗派的歧途。很明显，这些宗派一直靠寺庙为生，拥有一些最虔诚的信仰者和最深刻的思想家，但在同时，也有最强烈和最坚决的反对者。

基督教在满洲的发展，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从传教工作开始时就采取的政策。这个政策最突出的原则是教会必须是中国人的，而不是外国人的。传教士们鼓励中国教徒自己承担起在同胞中传播福音的使命。从一开始，

责任就落在中国福音传道者和教徒肩上，而恰恰是他们培养了如此多的基督徒。教会的组织和管理也由中国人负责。西方的规则 and 习惯已经引进满洲，但怎样改造他们则只能由当地人民自己去选择。宗派区别一直没有显著表露出来，至少，今天百分之九十九的基督徒不清楚，在满洲一直有几个独立的教会在从事传教工作，即苏格兰长老会、爱尔兰长老会，大不列颠及外国圣经会。从 1895 年开始，丹麦路德会也加入到满洲传教的行列中来。但在中国人心中，满洲只有一个教会，即满洲基督教会。

奉天的教会发展很快，需要一个专门用来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教堂。但是，这个教堂没建在传教士居住的院子里，也没建在传教士的住宅附近，而是建在接近市中心和交通便利的内城门附近。教堂完全按照中国的风格建造，能够同时容纳七八百人做礼拜，并有一座基督徒们引以为自豪的塔式建筑。后来，在与教堂



奉天基督教堂完全是中国的建筑风格

毗邻地方,先后修建了两所牧师住宅,里面居住着两位基督教会的中国牧师,因此,教堂中没有给人留下外国人统治的印象。

另外一个打破对基督教的偏见,并使基督教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的主要因素是医疗传教工作。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这种方式被广泛使用,效果尤其明显。医疗传教活动,首先在奉天开始,并使其成为满洲的医疗中心。几年后,在辽阳、宽城子^①、吉林和其他城市陆续展开。目前,18个城市建有医院,一个个医疗传教中心,点缀在满洲大地上。

在医疗传教工作中,就一般方法而言,各地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巡回医疗、出诊、开设医院,然后,我们传播福音。

首先,巡回医疗不但有很大作用,而且具有双重意义:它使当地的人民能够了解我们,同时,也使我们能够了解当地人民。它扩大了外国医生、医疗工作,以及基督教在当地的知名度,给我们提供了与当地人交朋友的好机会。关于巡回医疗,后来变得没有必要了,尤其和医院的工作比较起来,感觉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下面一段文字是从1886年旅行日记中摘录出来的,那次巡回医疗的路线是北到铁岭,东南到云岭,西到奉天,全程大约二百英里。

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一个寒冷的暴风雪日子,降雪非常大。出诊很早,然后造访两位官员患者。下午二点半,我们在暴风雪中踏上旅程。懿路^②是距离奉天二十五英里的一个村庄,有人告知我星期三到那里出诊,希望在此与韦伯斯特^③相见。为了告知我们沿着那条路前往,一名仆人已经提前赶到,告知我们此行目的的海报也张贴出去了。遍地车辙,路很难走,行进速度很慢。只走了三英里,就不得不停在一个村庄里过夜。客栈很小,充满烟气,

①宽城子(Kwangchengtze):今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译者注。

②懿路(Ilu):今辽宁省沈阳北一路镇。译者注。

③韦伯斯特(Webster):英国苏格兰新教传教士,与杜格尔德·克里斯蒂一起来东北传教。译者注。

而且很脏。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二:黎明时分,我们就冒着刺骨的北风上路了。大约上午九点半,到达一个比较大的村庄。客栈老板热情地大声赞扬英国人,表示急于想了解我们的宗教,但很难说他的话里包含多少真实的成分。有几个人把我当作“奉天的神医”,给以热诚的招待。下午五点钟,我们到达懿路,韦伯斯特正在那里等我。这个村庄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三:早饭后,看了三十四个病人。同时,也进行了布道,发放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下午,我们步行二十里路,到另外一个村子,在那里过夜。

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看了一些病人,并数次被患者请到家里。这意味着双方的信任在明显地增长。下午一点钟离开,五点钟到达铁岭。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周围环境十分理想。城内有两个酿酒厂和二十个当铺。在中国,当铺起着银行一样的作用,人们把其当作财富的可靠标志。不久前,罗斯先生和韦伯斯特先生曾经被人们从这个城市中赶了出来。

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患者早早就来了,我继续为他们看病。因为有韦伯斯特的帮忙,只要光线允许,我们就不停止工作。有一段时间,甚至在蜡烛微弱的光亮下坚持诊病。从早到晚,小教堂中的布道活动没有停止。看到前来就诊者人数众多,秩序良好,表现出十分友好的态度,使人特别愉快。一位老年患者,一年前曾在奉天治好了病,如今,现身说法,把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又一遍,而且非常自豪,这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信心。

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一直忙碌到中午,——给总计一百二十人看了病。离开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钟。向东南方向出发,进入美丽的山区。殷实富庶的农村,良好耕种的土地,密集分布的人口。当晚,在一个拥有四百人

口的村庄里过夜。睡在一个小外屋,房间里的温度在零下几度。晚上,为了看外国人,村民们聚集前来,我们坐在炕上,围着毛皮毯子,穿着大衣,开始为他们讲述有关我们的一些事情。所有的人都保证去读我们送给他们的小册子。半夜,猪的尖叫和狗的狂吠声把我们惊醒,叫喊和骚动持续了一段时间。一群狼从山里下来,其中一只闯入我们住宿的院子,与看门狗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

十二月一日,星期二:到了一个小镇,镇内居民一千人。镇里人对我们充满着敌意和怀疑,不断问我们的仆人,我们这次巡回医疗的秘密目的是什么。因为害怕,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也没有人相信我们的药品。终于,一个年轻人,因为受常见脓肿的折磨,自告奋勇让我们诊治。切开口子以后,立刻流出很多脓血,我们非常高兴,手术做得很成功。接着我们诊治了四十二个患者。

十二月二日,星期三:经过风景如画的山区。那里生活着老虎等动物。昨天,老虎吞噬了两头牛。去年冬天,在路边房子附近,老虎叼走了一个年青人,连尸首都没留下。

十二月三日,星期四:到了一座村庄,人们对我们的疑心很大。我一拿出听诊器,一个男人就吓得没命地跑了。

十二月四日,星期五:到达永陵,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满族城镇。我们不但料到了敌意,而且也遇到了敌意。一位曾经在奉天接受过我们治疗的满洲官员拜访了我们,这对整个城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次,诊所为我们接触当地人民提供广泛的机会。人们成群结队地拥入诊所。在我们刚到奉天的前十二年里,每个星期中,两天用来接待男患者,两天用来接待女患者,另外两天留下做手术。到1894年夏天中日战争爆发前,有时,我们一下午就接待200名患者。中日战争之后,我们建立起一所专门由女医生管理的妇女医院。我

们开始每周用 4 天时间为患者诊病。到 1913 年夏季,每天女患者的门诊量是 300 名,而男患者的门诊量只上午就超过 400 名。

这些患者来得很早,尤其是在夏季,候诊室里的布道活动整个上午都在进行。一些有空的患者,在检查和开方之后,为了听到更多的新鲜事,愿意多留一会。耳闻的东西多为道听途说,但不时也感觉有些道理。因为在候诊的时候患者无事可做,就开始听起来,“听听总没有坏处”,接着他可能继续询问。很明显,当他们离开医院的时候,许多人的心灵没有受到触动,但却留下一个印象。因此,到某个时候,或许以后的一些年里,基督教的光芒再次照耀到他们身上,他们会欣然地接受它。一些人购买了基督教的书籍和小册子,回到传教士从没有去过的遥远故乡。

第三,巡回医疗和诊所为建立医院做准备工作。无论在医疗效果还是在基督教传播方面,医院都是我们工作得心应手的地方。在医院里,我们能够看到发放的药品被合理地使用,进而观察用药后的效果;我们能够实施手术,进而如我们所希望那样给伤口敷药;我们能够发现病人真实想法,讨论所遇到的困难,解答其疑问;与其他的布道场所比较起来,在这里,我们能告诉患者更多的东西,能够让患者每天都看到真实的基督教。出席宗教仪式完全是自愿的,但大多数患者都欣然前往,唱赞美诗有很大的吸引力。为了向门诊患者布道,主持宗教仪式,指导那些已经离开医院,但愿意听,而且不断询问的人,在约两年时间里,我们常年雇用了一名医院布道师。但是,这种工作从来不是由布道师独自去做。医生、助手、药剂师,所有的人都各司其责,传播福音成了每个人的义务。今天,许多满洲基督教教会的重要成员都是在医院病房里第一次听到基督的。

1887 年,新医院开业。与以前的条件相比,我们的工作空间更为广阔。宽敞的候诊大厅使前来就诊的人数迅速增加。早年,患者常常在医院接受洗礼,因此,我们可以把增加的教徒人数计算出来,而那恰是我们努力工作的直接结果。4 年期间,有 54 名患者接受洗礼。后来,教会进行改革,对吸收教徒采用新的管理办法。在此之前,教会发展速度很快,大规模迫害教徒活动也已沉寂。有的传

教士开始担心某些人并不理解基督教,仅仅出于感激而进入教会。最后,大家取得一致意见:除特殊情况外,一名申请者,只有经过3个月考验之后,才能接受洗礼。过了几年,又把考验期延长到9个月。因此,我们的患者没有被作为医院的皈依者加以统计,而是像其他人一样,在自己的家里接受洗礼。在新教徒中,我们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是受医疗传教的影响而加入教会的。我们对那些过于热心,但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人是很谨慎的,因为有时,我们最寄予希望的人反而变得非常糟糕。比如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名已经出院的患者,通过自己的影响,几乎把全村人都变成了基督徒,可后来,他自己却吸食鸦片,干一些罪恶的勾当。

第四,训练助手。在满洲开展医疗工作,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找不到有才智的助手。医生要为病人诊断疾病,开处方,配制药剂,执行手术,而且要做所有的缝合和包扎工作。在中国,初级的医学教育一直在星散于各地的医院进行,对医务人员的需求使一些够格的中国人接受了训练。

起初,我雇佣了一位姓洪的男人做我的汉语教师。几年前,他就加入了教会。虽然,他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学者,但却非常贫困,只能靠绘画挣点可怜的小钱。几个月后,我开始教他英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拉丁语,药品的名称,以及如何配药。不久,他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成为医院药房的负责人。

魏是我的主要助手,是位非同寻常的年轻人。他出身于富裕的农民家庭,曾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在奉天的一家大药房干了一些年。从童年时起,他心中就有一种宗教倾向。在某个时期,他甚至想遁入空门,出家当和尚。因此,当他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很容易皈依了上帝。在满洲,有种风俗习惯,在某个时间,药店要派两名伙计去药王庙上供烧香。我们刚到奉天时,就该轮到魏去了,但他拒绝了,结果马上被辞退。再得到一个相似的职业是不可能的,他家里人非常生气,不想再帮助他,因此,虽然薪金少了点,他还是高兴地同意做我的助手。事实证明,他是位最忠诚、最有能力的助手,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加倍地工作。我一起教他们两个人,领着他们逐

渐地熟悉了医疗工作的全过程。

对一名医生来说,要接待患者,管理一所大医院,检查布道师的工作,到患者家中出诊,拜访政府官员,同时还要给学生们上课,很明显,不可能做得都很理想。但是,在那些年里不得不如此。这种工作方式的缺陷之一,是不可能把那些学生较长时间集中在一起进行系统培训。一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似乎是我们医院需要的人,刚刚学会一点医学知识,马上离开医院,去建立自己的西药店,并且自称精通医术。新医院开业的时候,我们招收了四名学生。一年以后,两个离开了,而另外两个,在为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之后,也不得不先后辞退。

在长达十年的有益工作之后,洪也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奉天罗马天主教圣公会提出:如果他去那里做医生,可以得到我们提供薪金的两倍。并且告诉他,他不必成为一名天主教徒,但可以像天主教传教士一样享受免费住宅。他去了,不久发现还是成为天主教徒明智。几年以后,他死于霍乱。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儿子,童年时常常到我们医院来看他的爸爸,并大言将来要做一名医生,而如今,已经成为我们医学院的一名学生。

1892年初,我们再一次宣布要招收和培养年轻的基督徒为医疗传教士,最后录取了八名,学期五年。理想地培养和训练他们是不可能的。但是,每年都开设正规的课程和临床指导。所有的药品都经过他们的手分发,每个人负责一个病房,在病房里,他要给病人敷药,并做大量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在我们国内医院是完全由护士们来做的。实践证明,在已经培养的学生中,有些人是非常优秀的和令人满意的,并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我们的工作,培养助手的事也停了下来。

第十章 中日战争爆发之初侧记

为了战斗的胜利,而今他们已踏上征程,
盔甲辉映,铁骨铮铮,阴郁低沉,战鼓相应,
只盼望着非凡的奇迹发生;
随着他们的怒吼,大地也为之震动,
号角呼应,似滚滚的雷鸣。

《阿尔库金战役》——迈克尔·德雷顿^①

很久以前,一般在奉天所能看到的外国人只有朝鲜人。他们怪异的高帽子特别引人注目,尤其当向宗主,即中国皇帝朝贡的朝鲜使团经过的时候。奉天人都认识朝鲜人,但却看不起他们,而且多数人也知道,比朝鲜更远有个国家叫日本,居住着一些矮子,当然,他们也是“天子”治下的臣民。即使这种不正确的知识没有渗透到遥远的农村地区,可不管怎样,不受“天朝”控制的国家还是非常少的。中国人认为不受天朝统治的所有国家都是一样,尽管分割为许多小国,如法国、英国和俄国等等。

^①阿尔库金战役(Agincourt):这是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次战役。1413年亨利五世继承英国王位,1415年乘法国内乱,入侵法国。同年,亨利五世率6千军队和法国3万军队在阿尔库金决战,大获全胜。迈克尔·德雷顿为十六世纪英国诗人。译者注。

1884年,当中法战争在中国南方爆发的时候,奉天的人们只知道此时中国“正在同外国人打仗”,因此,在长达数月的战争期间,我们在奉天是不安全的。1891年的情况与此类似,长江流域的排外暴乱在奉天引起了骚动。号召在某天烧毁外国人房子的布告再次出现。但是,因为下雨,气候非常潮湿,最后骚动消退了,那天没有谁前来烧房子。



满洲士兵前胸和后背都有一个很大的圆形标志

中国人对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公共事件和社会运动,缺乏基本的常识和确切的理解。他们认为这种事是官员的责任,表现得相当麻木。奉天距离中朝边界不到两百英里,但是,在奉天没有人关心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外国人每周阅读上海报纸,关注事态的发展和变化,但没有人料到,在一个无关紧要的国家里所发生的表面上无关紧要的争论,会成为国家之间冲突的前奏,而正是这种冲突一再把满洲撕得粉碎。

1894年初夏,一小块乌云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不久,整个天空都变得昏暗起来。战争的直接借口并不重要。在许多年里,日本一直为扩张自己的势力,为控制朝鲜而进行积极的努力。现在我们知道,即使没有这样的借口,不久日本也会找到另外的借口。近7月末,我们得到未来战争的第一个警告。此时,接到从北京传来的电报,命令我们的朋友左宝贵将军及其所部马上经陆路奔赴朝鲜。

在满洲,左宝贵所部是惟一真正意义上的部队,训练有素,一直保持着激昂的斗志,在剿匪战斗中一贯勇猛顽强。第一批部队在接到命令48小时之内就出发了,将军本人和幕僚们一天后出发。他先来向我道别,心情有些忧郁。在他看来,自己已经把士兵训练得最好,并尽其所能去装备他们,只要他发布命令,没有人害怕战死沙场。但是,他也知道,与已经现代化了的日本军队相比,自己所说的最好是多么可怜。他特别清楚中国军队和将军们之间的勾心斗角,而这些是我们所看不到的。

“这次战斗与以往的剿匪不同,”他说。

“我必死无疑。”他说对了。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从满洲各地召集起来的形态各异的数万部队陆续开赴朝鲜前线,从奉天到鸭绿江的路上,到处都是向东行进的散乱士兵。他们其中许多人是未加训练的新兵,直接从农村征召来的农民,或从大街上收集起来的乞丐,在开赴前线之前,集中训练一至二个星期。在我们医院后面的一个大兵营里,可以看到一队接一队的士兵正在接受“塑造”。把步枪放在那些从来没有见到过枪的年轻人手中,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教官去训练他们。武器几乎不够,因此,一些队伍仍然扛着已经锈蚀的前膛步枪,或者中国古代的火绳枪,甚至弓箭。许多人佩带着中国古代短刀,扛着红缨枪操练。这些法国长矛轻骑兵似的军人,主要的训练科目是同时向前突进,伸出手中直立的长矛,大叫“杀”,就是刺的意思。当人们问他们为什么发出这样大的声音时,他们回答说:那是为了恐吓敌人。

看到这些可怜的受蒙蔽的家伙们情愿去接受现代武器的屠杀,是件悲惨的事情。短暂训练结束以后,他们将兴高采烈地走向战场,穿着不怎么好的士兵制服,闪亮的红马甲上,前胸和后背都有个大大的圆形靶子,每隔十个人就有一人扛着杆飘扬的红旗。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人们的普遍看法是:既然日本已经放肆叛乱,那么中国定会粉碎他们,这是件容易的事。

大批士兵来自满洲的最北部,平生第一次南下辽沈,还有许多人是在满洲的预备军人,常年从国家领取兵饷,但从没打过仗。所

有的满人,预备军人,或没有参加实际军事活动的旗人,都顽固且盲目地排外。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和将与之战斗的外国人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们对敌人的愤恨情绪是由真真假假的传闻和其他一些偶然经历引起的。他们甚至轻蔑地看待汉族人,把他们当作理所当然的践踏对象。开始,走过一队士兵,扛着奇怪的火器和色彩鲜艳的旗帜,吸引所有的妇女和孩子出去观看。因为左将军的部队严禁抢劫和奸淫,几名违反军纪的人被处决了,这使类似现象在开始时就得到遏止。但在数星期之内,人们还是从行军路旁的村庄里逃走,把妇女儿童以及没有被掠走的牲畜都藏了起来,地里农活也停止了,可大客栈却被迫一直向军人开放。

“他们挥霍了我所有的粮食,”一位可怜的客栈老板抱怨说,“烧掉了我所有的柴火,砸坏了我所有的盘子,毁坏了我的房子。接着,我让他们看我空着的双手,我没有什么东西再给他们,他们就打我!”

“汉人士兵还没那么坏,”人们会压低声音说,“可怕的是满人。”天的报应很快落到他们头上:不久,我们听说,在途中的士兵正忍受着饥饿。

有一群很特别的满人,他们的狂暴和凶残远远超出他们的同类。按照他们的逻辑,干脆“去杀外国人”,而且随时准备动手。在奉天,一些人开始闹事,大多数商家关门停业,士兵们威胁盛京将军和他的警卫。在某个时期,似乎将有一场暴乱发生,但是,他们的长官设法使其平静下来,并把他们从城内撤到城外的兵营里。后来,一位友好的官员告诉我:那时,一位高级的满人官员曾经对他说过:“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耽搁功夫而不直接去朝鲜?奉天城里有没有外国人?让我们马上把他们杀了。”

与此同时,属于同一部队的大批人马已经开到辽阳。这座城市位于奉天以南四十五英里。那是8月10日,星期五,一个炎热的下午,一群满洲士兵在大街上四处闲逛,恐吓店铺老板,随意胡为。其中一些人看见传教的小教堂,出于恶意的取笑,在对里面的人大打出手之后,彻底把它砸毁了。辽阳教堂的负责传教士是尊敬的詹姆

斯·怀利牧师，住在距离教堂不远的一座中国住宅里。事件发生后，一个男人跑去告诉他，怀利先生马上步行前往衙门，请求那位友好的清朝官员出面采取措施制止。但是，从怀利先生的住处到衙门之间有段距离，不幸的是，在前往衙门的路上，遇到一伙刚才还在叫喊找到外国人住处，把他们全部杀死的暴徒。随着残忍的胜利狂叫，他们把怀利打倒在地，不久，失去知觉的传教士被扔在大街上，猛烈的殴打和刀砍，已经使其遍体鳞伤。

但是，因为殴打怀利先生，转移了暴徒们寻找其他外国人的视线。当地的行政长官听到有严重的暴乱发生，就带着警卫坐着官轿前去弹压。暴徒们根本不把这位职小位卑的汉官放在眼里，反而迁怒于他，砸碎他的轿子，殴打他的随从。为了活命，他趁着夜幕步行逃走了。黑暗阻止了进一步的暴行，满人回到城外的营房，城门上了锁。怀利先生受了重伤，完全失去了知觉。悲痛的中国人在天黑之前把他送到辽阳郊外的医生家里，六天后他死了。

在奉天，骚动发生的第二天，我们从官员们那里模糊地听到那个消息。接着叙述详情的信件到了，一个骑马的信使通知我前去会诊。那是雨季快要结束的时候，道路被水淹没，坐马车旅行根本不可能，因此，在这种天然的道路上行走只能骑马。可那时我的脚受了重伤，无奈，只好雇一顶轿子。

这样做带来了好处，因为我们在路上碰到的部队，恰好是数天前威胁过盛京将军的那伙人。他们已经听到自己的同伙在辽阳杀死一个外国人的消息。我把轿子的窗帘完全拉严，暴徒们以为是一位高级官员乘坐的轿子。而轿夫们也认为已经把这些入蒙混过去了，只是过于高兴，结果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直接来到河边，准备坐船过河。再藏在轿子里是不可能了，必须下轿才能上船。可是渡船刚刚离开岸边，一个士兵就发现了我，高声大喊：“外国人！杀呀！杀呀！”船工们大惊，使尽全力撑船。几个士兵已经举起了枪，准备射击，但有位军官出来劝说，给我们到达彼岸争取了时间，登岸后，我们很快逃离了对方的视线。不幸的是，我们到达太晚了，怀利先生已经死去。

在以后的数星期里,全省的外国人都尽可能保持平静和不引人注目,没有人想去旅行。在奉天,我们把自己限制在围绕住宅周围非常熟悉的地方。怀利先生死后数天,保护在华外国人的诏书在各城门张贴出来,全国各地都进行了宣传。

大约同时,一位杰出的清朝皇族官员,数月前,得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病,是我们医院的人把他治愈了。为了表达谢意,他赠送我们医院一块“牌匾”。这块匾来得太是时候了。在黑色木板上,镌刻着闪闪发光的金字,“妙手回春”。牌匾放在装饰华丽的托架上,用漂亮的黄色绸缎遮盖着。队伍前面是象征性的乐队,演奏着喧闹的鼓乐,护送牌匾的队伍用一上午时间游街,于是,全奉天都知道这件事。一般来说,我们不鼓励这种形式的感谢,也不愿意给吹鼓手很多赏钱,但这次,我们欢迎它,感觉花这个钱值得。同一天下午,那位官员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很多朋友和侍从,在一队骑兵的护卫下前来拜访。那位女士提议说:我应该做中日两国之间的调解人。

第二天,左夫人,即左宝贵将军的妻子,带着五个孩子来到医院。她听说我们要离开奉天,特前来送行。因为那天上午她接到丈夫非常安全的消息,显得特别精神。公开展示和官方的友谊,对我们有很大的价值,尤其对那些仇视外国人的士兵会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现在,普通百姓对我们是相当友好的。在奉天,老年患者特别多,因此这阶段虽然没有农村患者,但医疗工作仍像往常一样进行。众多的士兵开始涌入医院。在我们住宅后面军营里的士兵成为我们的朋友。有时,前来就诊的士兵一次就达二十多人。我们的安排是:他们一到医院,马上就给他们治疗,根本用不着等待排号,这使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东进时很多士兵逃亡,平壤战斗失败后又有很多人溃散,这些人大部分进山做了土匪,给某些地区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所以,人们带着极大的忧惧等待着冬天的来临。对于中日战争,所有人都认为战斗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像日本这样无关紧要的国家,打败中国是不可能的。

第十一章 中日战争的 严酷现实

命运的巨大阴影悄悄地掠过，
堆叠起未来噩运的模糊轮廓。

《波琳》——罗伯特·布朗宁

进入九月的金秋季节，传来了一个小道消息，中国在朝鲜北部已经彻底失败，而那里正是左将军开赴的战场。开始，没有人太在意这种传闻，但不久，事态明朗了，甚至有些夸张。中国军队溃散，很可能已被歼灭，左将军殉国，日本军队正在向满洲推进。在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奉天的官员们惊慌失措，乱了阵脚，接着的事态会如何发展呢？

出现这样的结局不难理解。在数星期内，朝鲜前线的中国军队总司令一直给北京拍发对日作战胜利的虚假报告，并接受朝廷的赏赐和荣誉，而实际情况却是，他们既没有战斗，也没有为不可避免战争做任何准备。许多中国官员滞留在鸭绿江西满洲境内，而他们的部分下属已经开赴朝鲜前线。多数将军对总司令表示出厌恶和不信任的态度，当然，将军们之间也是如此。从北京来的瞧不起从满洲来的，而满人对汉人又没有好感，似乎每个人都在争夺自己的利益。

由于平壤的安危关系到整个战局，因此左将军专门为平壤防御

拟定了作战计划。尽管某些将军妒忌,计划还是被接受了,但在关键时刻,中国军队的总司令和其他将军却从平壤前线撤出了自己的部队。虽然部分清军仍在城外与日军作战,但没法和左将军配合,保卫平壤城的责任只能落在左宝贵的肩上。与日军相比,力量实在悬殊。在战斗中,有数千满汉士兵前来支援,但在平壤附近遭到阻击,不能与左将军汇合。当日军可能取胜,平壤失陷的迹象非常明显的时候,所有的将军及其部队都以最快速度向西撤退,其中一些退到鸭绿江东岸的一个城镇,此地仍然属于朝鲜,还有一些退到鸭绿江西满洲境内,至此,他们认为似乎是安全了。

在平壤,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左将军率部进行了英勇的抵抗。部下将士们相信,如果左将军还活着,平壤仍然会在中国军队手中。三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战斗一直没停。日军占领了平壤周围的山头和树林,炮轰城防工事。十五日下午,左将军正在指挥一门重炮开火,炮手在他身旁牺牲了。此时,左将军虽已多处负伤,但仍然扑过去,亲自装填炮弹开火,结果,腿上又一次中弹,他马上用布条包扎了伤口,站了起来,督促部下奋勇杀敌。可就在他对部下大声呼喊的时候,另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倒下了,伤势沉重。几个部下把他放在马背上准备突围,此时一颗炮弹落在他们中间,结果除一名骑兵队长之外,所有的人都炸死了。就是这名骑兵队长,给我讲述了上面的故事。炮弹爆炸时,他被震晕了。等到他苏醒过来,夜幕降临,日军已经占领了平壤。为带回将军的遗体,他们费了很大的劲。但是,敌人正在向西推进,没有办法,只好放弃原定的计划,潜逃回国。对左将军这样的敌人,日本人非常钦佩,以军礼埋葬了他,并在其坟前立了一块纪念碑。

左将军牺牲后,中国军队不再固守平壤。冒着密集的炮火,骑兵开始突围。他们伏在马背上,穿过日军的步兵防线,以最快的速度飞奔而去。那位曾经带着将军遗体的骑兵队长也参加了这次拼死的冲锋。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右膝,打死了胯下的战马。在地上平静地躺了一会后,他成功地抓住一匹无主的战马,逃了回来。另一位年轻人,也是左将军的副官告诉我:穿过自己肺部的一颗子弹击

中了前面同伴的头部,这名同伴立时死去,而他却继续狂奔,直到胯下的战马中弹倒下。接着,他尽力在高高的蓬蒿中向前爬行,直到失去知觉。当他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咬紧牙关,继续向前挣扎,终于在第二天上午,碰到向后撤退的中国军队。约两个星期后,他住进我们医院,身体得到迅速康复。他和其他的中国士兵常常提到在战斗中日本军队的有条不紊。当把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加以比较的时候,大家马上打开了话匣子。

“战斗时,他们似乎在进行军事训练。”一个人说。

左宝贵不仅是名优秀的将军,而且也是满洲安全的保障,当人们得知其战死的消息时,奉天笼罩在巨大的悲痛和恐惧之中。无论官员还是百姓,人们都尊敬他,爱戴他,对我们来说,他的死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即使到了今天,缅怀他给我们留下的记忆仍然是亲切的,而在普通人们的心目中,没有哪个将军能够取代他的位置。

好多在平壤受伤的官兵住进了我们的医院。盛京将军下了一个与左将军同样的命令:把所有伤员直接送到我们这里。可是,绝大多数受伤的官兵仍然躺在中国边境的几个城镇里,在那里,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他们的痛苦。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不幸的插曲使我们非常不安。这年的夏天,德国公司的一名代理商前来向东三省的将军们推销枪炮。当他从满洲北部回到奉天的时候,正值左将军战死和中国大败的消息传来,城内人心惶惶。另外,数星期前怀利先生的暴死,可能还有商业上的烦恼,这些似乎一直噬咬着他的心,并使其神智颠倒。一个星期天,有人把我从中国教堂里叫出来,到客栈里给他看病。在此之前,他一直试图用剃刀割脉自杀。他的中国仆人为其进行了包扎,并派人来请我,自己则小心看护着。这名代理商已经四五天没有睡觉了,一直处在过度刺激和恐惧之中,忍受着狂想所带来的痛苦。我马上把他带到我们医院,并为其专门安排了房间。

注射镇静剂之后,躁动逐渐平静下来,但幻觉仍然存在,而且特别难于调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间谍,在某些方面已经给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不久,他和那些帮助过他的人都将被带到刑场处

死。最轻的脚步声都会使他战栗。“他们来抓我啦！”他会说。危险可能随时出现，他可能攻击别人，也可能自杀。在当时那种恐惧不安的环境中，任何疏漏，都可能酿成大祸，所以这绝不是他个人的安危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必须对他日夜监护。为了设法与他交谈，我们几个传教士轮流陪伴他，与他一起散步，解除他的疑虑。使我们非常宽慰的是，他逐渐地平静下来，完全有能力坐船到牛庄港。后来，他返回了德国。

随着时间的流逝，胜利的消息仍然十分渺茫，市民情绪低落，城内笼罩在骚动和恐惧的气氛之中。为减少恐慌而发布虚假的胜利消息徒劳无益，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混乱在加剧和升级，最无稽的谣言广为流传。据说，两百名英国士兵隐藏在我们医院的院子里，或根据某些人的说法，是藏在教堂的塔里。为了弄清这些谣言是否真实，一些官员拜访了我的助手，而我的助手就把其领进院子，让他们自己去找。大批上流社会的居民开始出逃，一些人经过陆路穿越长城进入关内，而另外一些人则乘船到牛庄港，然后从那里搭轮船或舢舨进入华北。

问题是此时外国人继续留在奉天是否是明智之举。除非绝对必要，我们是不愿意离开的，而且，如果我们全部马上离开，将可能引发一场恐慌。因为人们知道，我们有比他们更为可靠的消息来源，正密切地注视着我们的动向。可从另一方面看，走陆路到牛庄港是不可能的，而为了越冬，船在十一月上旬就得拖上码头，再不走，后路有可能被切断。最后我们决定，带上珍贵的物品和越冬的生活必需品，妇女和儿童，以及多数人应该马上分批出发。奉天人正准备去满洲北部和东部山区避难，一旦大规模的逃难开始，连到浑河岸边的马车都雇不到。辽阳的传教士已经走了，那座城市仍然处于动乱之中，而从满洲北部来的传教士也同时南下牛庄港。

此时，我们的医疗工作迅速减少，女医院已空无一人，男医院也只剩下一半患者。盛京将军再次发布公告，赞扬我们的工作，谣言一度消失了，但这只是暴风雨前的暂时平静。10月25日晚上，我拜访了一位姓高的官员朋友，也就是上文曾经提到的，我的老朋友

高道台的儿子。他私下告诉我,刚刚接到一封电报,说日军已经在夜间渡过鸭绿江,击败了防守的中国军队,并占领了西岸的城镇,如今,正向凤凰城挺进。他强烈建议我们留守的两个人立即去牛庄港,因为中国军队没有能力阻止日军前进的脚步,撤下来的散兵游勇将很快涌入奉天,谁也控制不了这种混乱的局面。

10月28日早上,战败的消息已广为人知。因为恐慌,城市处于骚乱的边缘,因此,我们不再迟疑了。教堂和医院,留下可靠的人负责,而我们离开以后,助手们感觉更加安全。另外,每处住宅也都安排了看门人。但是,我们意识到,在我们能够回来之前,这些建筑如果没被烧毁,也可能被抢掠一空。在克服了一些困难之后,才雇到前去浑河岸边的马车。可到了那里,已经没有几条船,如果再等一段时间,我们就只能留在奉天越冬了。

逃难不仅仅发生在奉天,当灾难即将到来的时候,无数人抛弃了家园。到达牛庄港的时候,我们看到舢板和轮船上都挤满了逃难的人们。不久,舢板停航,轮船也少了。一天,当码头上最后一艘轮船即将启航的时候,在当地木船上苦苦挣扎的人们围了上来。船舱已经满员,但决心要离开的人们用绳子和搭钩涌上甲板,爬上舱顶,甚至吊在桅杆和索具上,总数约有三千多人。最后,还是靠从外国军舰上过来的水兵才把他们赶回到原来的木船上。

日军正在稳步地向前推进,占领一座座城市,亚瑟港、盖州、海城先后失陷。一些城市和农村被破坏,无辜的人民遭到屠杀,当寒冷的冬天开始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以海城为例,战斗发生在距离海城较远的地方。为了在海城北部和西部重新部署力量,中国军队撤走了,留下一座没人保护的城市。第二天,海城地方官在打开日军前进方向的两个城门之后,平静地撤退,而日本人没放一枪就占领了这座城市。但是,根据清朝律条,这名官员因为没有能够阻挡日军占领海城而受到降职处分。我的朋友高,就是曾经劝告我们尽快离开奉天那位官员,被任命为盖州的地方官。他知道日军将夺取那座城市,可他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因此,只好装病,在上任前请二个月的病假。后来也受到降职处分,似乎是他故意把这

座城市送给敌人,并且此后再也没有接到新的任命。

整个战争期间,各主要城市之间的通信没有中断,因此,我们一直保持着和奉天的联系。每个战败的消息,都会引起人们的恐慌,城中的一半人口逃走了,出卖的家产特别便宜。军队控制着这座城市,而辽阔的农村地区则任凭掠夺成性的士兵们蹂躏。捉住任何帮助敌人的人都会获得奖励,因此,不断有无辜的人被逮捕和屠杀。村庄荒弃了,没有逃往满洲北部的人在山坡上挖个地窖子,用来隐藏妇女儿童,以及所有可以搬动的家产。许多逃亡的人遭到土匪和散兵游勇的抢劫,大车被劫夺,男人被杀死,妇女和孩子被掠走。像那迟迟不去的冬天一样,当地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将永远难以说清。

对住在牛庄港的我们来说,战斗是越来越近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我们得到一个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新信息。天空湛蓝,阳光和煦,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纯洁。越过平原,从特别遥远的地方,传来了低沉但清晰可辨的隆隆炮声。好像乌云就要遮住太阳,蓝色就要变为灰色,但整整一天,什么都没有变,天仍然是那么湛蓝,阳光还是那么灿烂,无情滚动着的隆隆炮声每时每刻都在表明:他们正在屠杀和撕碎我们兄弟的生命。从那时开始,我们对此已经习惯了。战斗正在逼近牛庄港。黎明之前,炮火的咆哮把我们惊醒。当炮弹尖叫着从头上呼啸而过的时候,我们的窗户在剧烈的晃动。在十年以后的日俄战争中,我们在奉天住了几个月,耳畔天天回响着这样的轰鸣。当遥远沉闷的爆炸声打破了安息日的宁静,我们已经感觉不到恐怖、血淋淋的现实,以及战争的非人性。

第十二章 救死扶伤的 红十字医院

白天是痛苦的折磨,夜晚是阴沉的恐怖,
黑暗的力量已经控制我们的心灵,
为挣脱燃烧的地狱,我们竭尽全力奔逃,
有人伸出手来,给我们疗伤,使我们康复。

——拉迪亚德·基普林

在1894—1895年的中国军队中,没有任何战地救护服务组织。士兵们在什么地方受伤,就躺在什么地方,即使躲过难挨的饥饿,也会在寒风中很快死去,因为当地气温在零下许多度,一个晚上就足以致命。如果一个伤员能够幸运地找到某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或同伴把他弄到相对安全的地方,那常常只是推迟了死亡的时间而已,因为没人能够为他疗伤。

当战场的硝烟距离牛庄港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开始做建立一所红十字医院的努力。在当时的环境下,建立战时流动医院是不可能,但是,在牛庄港地方官的支持下,我们租用了一家客栈,经过简单的整理,于12月3日正式运转。开始,来的伤员并不多,但早期接受治疗的人回去以后,讲述了在医院所受到的照顾,人们奔走相告,消息在军队中迅速传开,官兵对我们的信任与日俱增。随着战斗的进展,送到医院的伤员越来越多,因此,我们不得不租用第二家

客栈。1895年1月,战斗在距离牛庄港仅仅25英里的盖州进行,三天时间里,伤员不断送来,我们总共接收了169名。

幸运的是,此时牛庄港有八位医生。牛庄港的医务官戴利医生,全面负责红十字医院的工作。红十字医院工作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的能力以及他的有效管理。前来帮助他的主要有美国和英国两艘军舰上的医生,五名从事医务工作的传教士,另外,非医务性的帮助是免费提供的。我的一名学生在11月到达,后来,另一名学生也穿越战场,取道而来。由始至终,他们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已经在上海组建的红十字会^①慷慨地承担了牛庄港红十字医院的所有费用。

我们“医院”的条件还远不尽如人意。房间黑暗、破旧,屋顶低矮,泥墙上有裂缝,寒风和雪粒通过这些裂缝就可轻易钻入屋内。卫生条件极差,手术在那种既小又昏暗的房间里进行,事先,我们已经想尽办法对其进行卫生处理。我们的药品供应非常缓慢,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实际上已经被切断。因此,我们不得不使用当地生产的棉花和棉布,由女士们帮助制做绷带和手术包扎用品。

2月24日,一场战斗在牛庄港以东10到12英里的地方进行。此前战斗中所送来的伤员已经把医院挤满了,为给新来者腾出地方,我们把所有见好的伤员转移到其他地方。这次,中国将军直接把伤员送到我们这里,人数之多,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伤员们源源不断地送来,但那天晚上的温度达到华氏零下10度,许多人被严寒夺去了生命。第二天,医院里的悲惨景象实在让人难以描述。农民的大车和牲口挤满了院子,这些都是官员们花钱雇用的。许多重伤员躺在经过改造的担架、抬筐和椅子上被送到医院。一些人已经死去,一些人还活着,人们把死人和活人一起从车上抬下来。有个伤员死在医院门口,一个小时没有人过问。到晚上,我们的两个医

^①1904年在上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是中国最早的和红十字有关联的组织。同年成立的“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1894年12月营口所建立的红十字医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红十字医院。本文所说上海成立的红十字会是一种误解。1895年初,由于营口红十字医院药品不足,曾向英国传教士慕维廉求援,请其代为在上海募捐,申报馆也参与此事。译者注。

院挤满了伤员,甚至连门房都没有空闲的地方。第二天早上,租用了第三家客栈,然后是第四家。但是,伤员仅仅是有块可呆的地方,相当拥挤。炕上塞了两排伤员,能躺下就不错了,我们在地上走动的时候,因为不时要从躺在草堆上那些可怜的伤员身上迈过去,落脚时必须十分小心。

每个有能力的外国人都被临时动员起来,加入到为伤员们服务的行列。其中英国军舰“火炬号”上的官兵对我们帮助很大。从早到晚,我们的手术室一直不停,而海关官员、引水员、商人和传教士则在病房里承担起包扎伤口的工作。

对我们来说,这种医院似乎是简陋和肮脏的地方,但对伤员们来说,这里无异于享乐的天堂。他们曾亲眼目睹自己的伙伴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冰封的大地上,或躺在某个肮脏的茅棚里,没有药品,没有温暖,没人照顾,甚至连足够的食物都没有。而进了医院之后,躺在温暖的炕上,受到亲切的照顾,敷用放心的药品,如果能够进食的话,还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特别重要的是还可以接受手术治疗。不管房间有多么拥挤,气味多么难闻,护士的技术多么差,对伤员来说,红十字医院就是天堂。

在我们的医院里,各项事务逐渐变得有条不紊,伤员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3月5日,日军即将占领牛庄港的消息传开了。前天,经过一场特别激烈和血腥的战斗之后,牛庄港以北30英里的牛庄镇落入日军手里,看来牛庄港也要被包围。因此,中国军队正在撤退,集结于牛庄港西北10英里的田庄台镇^①。

处于极端恐惧和不安中的牛庄人民,对面前的灾难根本没有什么准备,那么,他们将怎样保护自己呢?找块粗糙的木板,用英语写上“英国人住宅”,或用大大汉字写上“外国宗教”,就成了保护神。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很多涂着红十字的木板挂在大门前,缝着红十字的旗帜飘扬在屋顶上。在主要的街道上,我们发现一座大烟馆的房顶上飘扬着红十字的鲜艳旗帜,而大烟馆的老板却振振有词,说

^①田庄台(Tienchuang-tai):今辽宁省大洼田庄台镇,位于辽河西岸。译者注。

自己完全有权利使用它,因为在数年前,他曾经为一位外国医生工作过。一座低矮的泥土棚子,窗户上糊着一些可怜的破纸,几个半裸的孩子挤在门口,看着他们的父亲在院子中竖立起一根木杆,上面系着一块肮脏的棉布,棉布上面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红十字。看到这些,我们心里非常难受。

“这是干什么用的?”我们问他。

“当外国人进来的时候,它可以保护我们。”

“可这旗帜代表什么?红十字是什么意思?”

“谁知道呢?人们说你有这个东西,外国人就不会碰你。”

在红十字医院里,却没有人敢于相信这面旗帜能够保护自己。伤员们非常恐慌。认定日本人会把他们全部杀死。尽管我们不断向他们保证甚至恳求,但在5日夜间和第二天上午,还是有很多人逃走了。幸运的是,大多数逃走的患者伤情并不太重,或处于康复期,但是,也有几个重伤员雇人用担架抬着逃走,其中一些肯定要死在路上。有名重伤员,被抬着走了大约10英里,但听说日军距离很近,雇用的人逃走了,把他扔在路边。经过6天的艰难挣扎之后,他却成功地返回医院。

6日早上,伤员已经逃走了一半。为了安慰那些留下来的伤员,减少他们的恐慌,防止更多的人逃走,我前往医院。我们把最近租用的两家客栈腾出来,把伤员集中在最初租用的两家客栈里,并且竖立起非常大,也非常显眼的红十字旗帜。牛庄的地方官带着自己的卫队,已经于昨天夜间渡过正在融化的辽河逃走了,此时,牛庄港已经没有了军队。在日军的前进道路上没有任何抵抗力量,从屋顶上就可以看到日军正在向没有设防的城门走来。

下午,离开医院后,我往位于郊区的家中走去。当经过一片开阔地的时候,附近突然响起清脆的枪声,从房子后面跑过来几个日本巡逻兵。一看到我,立刻端枪瞄准。我冷静地停了下来,对他们喊叫,同时举起双手,让他们看我并没带武器。他们缓缓地放下枪,然后点头笑了笑,继续向前跑去,追赶街道那边几个失散的中国士兵。他们边跑边小心地环顾四周,直到消失在城门方向,而在城门

之外,正是我们从屋顶看到日军向城内挺进的道路。

一个小时之后,日军顺利地占领了牛庄港。春天已经到来,几天之前,天气还特别寒冷,此时,冰封的大地开始融化,在温暖的阳光里,人们穿着过冬的笨重棉袄,在深深的烂泥中艰难地跋涉。居民们睁开好奇的双眼,从每间房子里偷偷地向外窥探。当日本人入城的时候,一些胆大的市民,有富人,也有穷人,向占领城市的日本人提供开水和茶水。牛庄港的市民松了一口气,一切都过去了,日本占领了城市,恐怖的事情没有发生。

日本人进城的同一天下午,附近突然响起了一阵炮声,炮弹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在空中爆炸。两英里外要塞中的中国军队向暴露在平原上的日本人开火。他们的目标并不明确,实际上,可能把整个城市当作轰击目标,在大炮轰击的数小时里,居民们非常恐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炮声停止,清军的小部队撤走了。

此时,中国司令部设在田庄台。此地位于辽河对面,从那里到牛庄港有十多英里的路程。一些打散的残余部队聚集到那里,保卫着那个巨大的战略物资储备基地。两天以后的黎明,接连的重炮爆炸声把我们惊醒,日军开始进攻田庄台。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第二天也没有停止,可接着中国军队逃走了。因为这个城镇不利于防守,日本就放火把其烧毁,以后的几昼夜,城镇上空一直笼罩着黑色的浓烟。

几天之后,我们几个人前往田庄台察看。战前,它是一座拥有上万人口的繁荣城镇,而此时却变成了荒凉的废墟。一些房屋仍在冒烟,为越冬而停靠在码头上的数百条木船正在燃烧。街道上遍布牺牲者的尸体,凶恶的野狗四处游荡,撕扯吞噬着自己的美餐。我们找到几个藏在废墟中的伤员,就剩下这几个。当这些饥饿的不幸者看到我们不是日本人的时候,或从藏身之处爬了出来,或向我们呼喊,接着,我们把这几个人救了出来,并想方设法送他们到红十字医院。田庄台战斗是中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战。

中日战争首先提供了把两种子弹所造成的枪伤进行比较的机会,所说的两种子弹,即老式的重铅子弹和新式的小口径高速硬壳

子弹。最近,日本部队已经装备了这种新式步枪,并在平壤战斗中使用,但好多连队仍然使用旧式武器,这可以从牛庄港红十字医院多数伤员的伤口上得到印证。因此,我有了一个把两者进行比较的机会,并在当时某个医学杂志上发表了我的观察结果。

在红十字会医院存在的数月时间里,一千多伤员得到治疗。尽管环境不太理想,但死亡率明显降低。绝大多数的死亡是因为用肮脏的棉布接触伤口造成的,其中许多人的生命可以由立刻实施切断手术来挽救。但是,直到败血症状出现之前,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手术,可等到败血症状出现,常常是太晚了。一些人,在手术和死亡两者的选择面前,平静而坚定地决定去死。许多伤员的冻伤相当严重。有个伤员,枪伤很快治愈了,但他失去了双脚,因为在人们找到他之前,他一直没有知觉,双脚已经冻坏了。

红十字医院的良好影响不仅表现在治疗伤员和抢救生命方面,所有接触红十字医院的人,都留下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直接的基督教宣传很少,但可以明显地看到那些逐渐康复的伤员自愿参加在中国教堂举行的礼拜仪式。数月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接受了洗礼,其中的一位我们现在也比较熟悉,他已经成为邻省教会中一位著名的基督徒。另外,至少数百人带走了一些基督教知识,数百人以更友好和感激的态度看待原来他们所讨厌和轻视的外国人。

中国官员公开承认红十字会,并表示随时为红十字会的工作提供帮助。因为我希望更多的学生到牛庄港来,但在路上没有军队的保护,那是不可能成行的。因此,2月,依照我的请求,牛庄港的主要官员拍电报给奉天的盛京将军和我的助手魏先生。马车、路费,卫队都由将军提供。不幸的是,走到半路,牛庄港就陷落了,他们只好返回奉天。

在战争开始时的几个月里,人们对日本的占领普遍怕得要命。无数的人宁可冒着危险逃跑,也不愿落入敌人的手中。春天,日本人成功地征服了大片人口稠密的地区,中国人却平静地接受了现实。这种态度的改变是日本统治特别仁慈和公平的结果。首先,出现很多想不到的事。日本占领牛庄港,人们即刻料到的结果是他们

的房子、财产被掠夺,家具被当作柴火烧掉,对妇女来说,从来就没有安全可言。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行进日本军队纪律很严。当新任命的日本行政官员接管城市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在一个公正有序政府管理下生活。

就行政管理而言,牛庄港是最为幸运的。起诉马上被接受,审判立刻得到执行。有几个因为日本人压迫中国人而受到惩罚的案例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卫生状况明显改善;街道整治工作有力地进行;主要街道两旁的路灯也竖立起来。在其他几个大城市里,推行同样仁慈、公正和文明的方法。^①

由于对自己政府的愤恨,特别对李鸿章,普遍认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导致了人们对占领者的沉默或顺从。事情很简单,甚至用不着说有什么根据,炮弹里面装的是沙子而不是弹药;数百装满弹药的箱子实际上是空的;枪支根本不能使用。肯定地说,弹药库中没有合适的武器,就是有武器也没有弹药。

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像行政官员那样,当地人民也许不会舍得他们离开。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如苦力和辘轳车夫等等,属于社会最底层,中国人对他们又蔑视又恐惧。他们粗俗的外衣,赤裸的四肢,经常引起人们的厌恶。在他们中间,酗酒和其他种种恶习比较普遍,不像士兵那样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

城市得到良好管理的同时,农村地区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肆意蹂躏,许多携带武器的军人也参与了劫掠。整个春季和秋季,辽河两岸土匪成群,活动猖獗,乘船或通过辽河旅行都非常危险。整个南满洲大地企盼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但是,撤退到天津的中国士兵所带去的消息却明显有些夸大了。据说,牛庄港被烧毁,农村变成了荒野,居民遭到屠杀。电报线被割断了,在数个星期内,牛庄港与外界断绝了通信联系,接着交通也中断了。当寒冷的

^①日本在旅顺口进行大屠杀之后,受到普遍的谴责,因此改变策略比较正常。更为重要的是牛庄战役之后,辽东半岛割让已成定局,从长远利益着想,自然要推行某些怀柔政策。译者注。

天气到来的时候,河水封冻,谁也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三月末,为了弄清外国人的处境,一艘英国巡洋舰奉命驶近牛庄港海域,放下一艘汽艇,溯辽河而上,驶到还没有融化的冰层。几名军人在此登陆,背负着沉重的邮包,走了六英里到达牛庄港。一个多月了,我们第一次获得了外部世界的信息。这些军人的到来使我们非常高兴,当他们带着沉重的邮包返回的时候,我们一直把他们送到来时的登陆地点。

5月8日,和平协定签字。根据这个协定,满洲将被分割,南部属于日本。其后,很快传来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某些欧洲强国出面干涉,日本将放弃已经征服的领土,南满洲仍然属于中国;日本吞并台湾,承认朝鲜独立。

此时,回到内地的时刻仍然没有到来。7月底前,我们得到证件,根本没有顾及两岸土匪的猖獗,就登上帆船,兴奋地向辽河上游进发。我们原以为房子已经被劫掠一空,但离开9个月后再次踏进家门,却完好无损,甚至不经意放在壁炉上的剪刀都没有人动一动。家是美好的,和平温馨的生活重新开始。

我们发现清朝政府非常了解我们所做的红十字工作。为表彰魏先生对伤员所做的贡献,政府特授予他双龙宝星五级勋章,这也是对我们医院所做工作的肯定。过了一段时间,光绪皇帝特授予牛庄港红十字医院几位主要医生双龙宝星三级勋章。^①

此时,设在上海的红十字會认为自己用一部分资金,直接参与了战争救护工作,因此,在那笔资金之外,拨出专款,以资助那些实际上一直做着红十字工作的医院。在这笔款项中,盛京医院得到1500百两(约240英镑)。我们用那笔钱购买了与医院毗邻的院子,而这块地皮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①双龙宝星勋章(the Order of the Double Dragon):清朝的授勋制度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此年十二月二十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勋章章程”,建议设置“双龙宝星”勋章,获得朝廷批准。“双龙宝星”勋章外形为星状,以龙为标志。勋章共分五等十一级,第一、第二、第三等各分三级,第四、第五等不分级。等级用满文标注于宝星之上,并镶嵌不同珠宝,以颜色区分等次。授予勋章的同时,发给勋章证明。译者注。

第十三章 出人意料的 战争结局

让我们像商人一样面对现实，
已有的无数教训，将给我们带来无穷的收益。

——拉迪亚德·基普林

因为人类能够从所有人为设置的羁绊中找到拯救。

《索尔德罗》——罗伯特·布朗宁^①

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对这次战争并没怎么在意，甚至很多人连中国战败都不知道。与中国北部其他地区相比，满洲的重要性要差一些，受到忽视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漠然和麻木的平静之外，人们也受到强烈的震撼。在历经数月之久的精神折磨，无法控制的苦难和恐惧之后，他们能够对这次战争重新加以审视和评价，并且对其后果和影响进行认真的思考。

外国人已经征服了他们！甚至这个外国人不是保留着野蛮特性，掌握着机器、枪炮、医疗等方面奇妙技术的西方人，而是他们常常看不起的邻居。日本人是什么东西？只是未开化的野蛮人。他们的文明、文字、文学还是从中国引进的，然而他们却征服了中国。怎么

^①索尔德罗(Sordello)为13世纪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行吟诗人。1840年，罗伯特·布朗宁创作诗歌《索尔德罗》，描写索尔德罗在权力和诗歌之间进行抉择时的内心矛盾。译者注。

解释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西方的技术。他们的士兵穿着西方的军服，按照西方的方法训练，知道怎样使用西方的武器，遵循西方的军事原则。当然，中国的方法确实是最好的，但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一个国家要赶上时代的步伐，必须掌握新的方法。

在幅员辽阔的满洲，每个城镇和村庄，人们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做同样的回答。国家的根基动摇了。在沉睡无数世纪之后，再不能如此下去了。人们开始寻找光明，但没有人领导他们。政府官员，那些名不副实的领导者固步自封，依然故我。人们所能接触到的绝大多数官员，是那些可怜的见多识广的保守绅士，他们仍然在传统的轨道上运行，对任何新生事物持反对态度。新就任的盛京将军是位没有文化的满洲老兵。他曾经指挥部队负责辽阳东部和南部山区的防御，日本人对他无可奈何。他坚信自己的英勇行为已经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在三年时间里，他一直在那个职位上，而这段时间，恰值人们渴望觉醒的最佳时期，急需一位文明进步的统治者。但是，在教育和其他方面，他没有采取任何改进措施。

靠人民自己，大多数人无力前行；他们嚷嚷，抱怨，但什么也没做。一些人参加了反清的秘密组织，私下讨论国家的悲惨和官场的黑暗。有个佛教宗派叫“在理的”^①，非常流行，其教徒都是严格的素食者，而且顽固排外。而另一方面，许多人尽量找现代书籍和翻译过来的书籍去读。无论在什么地方有教会学校、布道堂，或较小的聚会场所，许多人都想去了解“外国宗教”的内容，因为他们朦胧地感觉到外国人的宗教与外国人的胜利有某种联系。

从1896年到1900年春天这四年时间里，满洲基督教会的发展如同潮涌，一浪高过一浪，其力量逐年增强。因为前来求教的人数很多，教堂显得有些拥挤，传教士们应接不暇。要求布道师和传教士光临指导的村庄一个接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层出不穷。1896年，我们医院的一百多名患者在希望接受洗礼的名单上签字。出院

^①在理的(Tsai-li-ti)：即在理会，也称理善会，又名在理教。起于清朝初年，教义比较简单，仅严禁烟酒等。主要流行华北和东北地区。译者注。

的患者不断回来送信,告诉我们:他已经影响了一群人想要入教,就等着有人前来引导。宣传基督教的书籍卖出上千册。尽管满洲人口中文盲和贫穷人口占相当大的比例,但是,1897年,基督教的宣传材料和圣经单行本卖了200英镑,其他各方面与基督教有关材料也卖了300英镑,这说明,就同样的人口数量而言,满洲人所购买的基督教宣传品要超过英国人,因为当地一名普通工人每周的工资只有3先令,或3先令6便士。^①

许多年轻和进步的政府官员开始阅读基督教书籍,对教会的基本观点也有了些模糊的认识。有一天,沈阳的地方官审判一个案子,当事人原来是名基督徒,但此时不是了。此人原以为背叛了外国人的宗教,肯定对自己有利。进一步的证据显示,他是被教会开除的。

主持审判的地方官说:“如果你是一个好人,教会怎么会开除你!把这个当作恶行记录下来。”

数以千计的人希望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教会“询问者”^②的名单上。我们可以大致把这些人分为四个层次。他们中有许多人根本不了解基督教,对基督教的知识更是一无所知。

当你问一个人为什么加入教会时,得到的普遍回答是“他们说加入教会是好事”,这常常显示了此人所具有的全部基督教知识。许多这样的人对基督教的指导很快就厌倦了,因为心性懒散而退了出来,借口自己“根本听不懂”。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产生了真正的兴趣,成为接受洗礼的第一批候选人,然后正式加入教会。

有些人了解一点教会的知识,把教会当作友谊的团体。星期天,教友们聚集到一起听道,互相之间团结友爱。帮助穷人和老年人,在困难时刻相互支持。因为世人都有麻烦和困难,所以,教会是

^①先令和便士都是英国货币的辅币。1821年英国正式采用金本位制,英镑成为英国标准的货币单位,每英镑含7.32238克纯金,每英镑等于20先令,每先令等于12便士。1914年废除金本位制,金币停止流通。1971年英国实行新的货币进位制,取消先令,规定1英镑等于100新便士。译者注。

^②指那些已经接受基督教教义,并参加基督教活动,但没有正式洗礼的信徒。译者注。

一个好的团体。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对基督教的理解逐步加深,最后加入了教会。

也有许多人出于或多或少的不良动机想入教。诉讼中的胜败通常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诉讼人的金钱和势力来决定。此时,教会人数增多,声誉也好,影响很大。在私下或法庭上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如果教会能够施加压力,肯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能够劝说一名外国人参与某事,并派人把自己的名片送给某位官员,其作用就更为明显。天主教会提出:在审判任何涉及中国天主教徒的案件时,主教和神父有权参加。我们的许多同胞不理解为什么新教不应该享有同样的特权。佛教团体也随时准备帮助自己的成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经过几个月的指导之后,人们反感地离开了。因为人们最终相信,即使他们遵守出席宗教仪式时的讨厌规定,放弃赌博和吸毒,当他们遇到麻烦的时候,外国人也不会去帮助他们。开始,一些基督教的长老并不赞成这种不作为的政策。

“如果我们的兄弟遇到了麻烦,被欺诈或非难,如果我们有能力去帮助他们,为什么不去呢?”他们经常这样说。

但是,不管教徒们所遇到的麻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教会都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加以干涉,这是保持教会纯洁的惟一方法,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我们自己,逐渐地,这一点都越来越明确。为此,满洲各地教会的长老们开会,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最后,他们一致谴责以教会的名义参与诉讼活动。今天,整个满洲,没有几个热心的基督徒是因为期望获得世俗生活中的利益而加入教会的。他们前来寻找一块石头,却获得生命的面包。

除了那些对基督教无知和误解的人之外,还有很多人,他们阅读一些基督教的书籍,或经常和基督教的朋友们交谈,或观察基督徒邻居们的日常生活,或在医院住过一段时间,他们深思熟虑,坚信过基督徒的生活会有更大的精神收获。

当申请加入教会的人数增多的时候,严格把关是非常必要的。只有经过负责的布道师,或经过圣会会议的讨论,觉得他是一个优秀的有道德的人,不是一个鸦片鬼或赌博者;在其职业生涯的各个

方面没有劣迹;清楚为什么信仰基督教;在加入教会问题上不存在世俗的动机等等,才能从一名初信者,成为一名洗礼的候选者或申请者。成为一名候选者之后,在长达9个月时间里,还必须出席宗教仪式,熟悉宗教经典,继续证明自己对基督的忠诚和坚定。尽管采取了上面这些预防措施,但也有好多不良分子混入教会,成为满洲教会日后削弱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看,人数的迅速增加不完全是好事。

随着各地指导活动的迫切需要,受过训练的中国布道人员的不足愈加明显。那时,就是他们的数量增加两倍,也还是不够。回忆那些年的工作,我们不得不感到,这个伟大的机会来得多么不合时宜。因为当地基督徒和布道师们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许多人肯定对基督教失去了兴趣,从而离开了我们。

尽管存在这些缺点,初信者动机不纯,真诚难以考查,布道师在数量和培训两方面的不足等等,但是,基督教会各方面的进步都是飞跃性的。1896年,教徒总数是5788人,在申请者名单上有6300人,其中并不包括名字没有被登记的众多询问者。一年后,教徒总数是10255人,申请者达到9442人;到1899年末,教徒总数达到19646人,申请者超过7000人。中国人在教会生活中的独立、自助和自我管理等方面的进步是相当迅速的。没用外国的资金,教堂纷纷建立起来;当地人民支持自己土生土长的传教士;教会学校开学,资金完全靠从当地人民中筹集。为了以上的事业,1896年,从教徒中募集的资金数是261英镑;1899年达到2000英镑。圣会接连举行,被选举的长老们出席长老会议,决定教会的管理原则和处理教会事务。

这个时候,个体教徒感化他人的责任感大大增强,女性信徒的人数和灵智明显增长。在满洲,大批成为基督徒的中国人都不是通过外国传教士,甚至基本没有通过杰出的领导人布道。吸引人们加入教会的主要因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那些谦卑的,不识字的民众之间的私人友谊,以及那些无名宣教士们对一个接一个的人们进行耐心的指导。

很明显,此时,最急需的是训练有素的基督教牧师和有能力的布道师。外国传教士们没有占据圣会牧师的位置。他们认为,教会有权选择中国人作为牧师和精神领袖,而外国人则应站在幕后,充当顾问和朋友。直到现在,满洲不止有一个中国牧师在工作,支撑和管理沈阳圣会的就是中国牧师。比较而言,来自有教养阶层的基督徒很少,因此,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传教士并不多。一些前来接受培训的传教士不会写字,甚至有些根本不认字。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这些人建立了正规的培训制度。安排课程,指定学习教科书,并且每年进行一次考试。在工作中,他们大多数人都非常热心和真诚。我们发现,虽然讲授的课程很少,但对传教士的鼓舞和指导却非常成功,当然,履行牧师的职责需要具有更多的知识。现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两个传教使团合作,共同安排系统的神学培训工作,一些最为优秀的布道师组成第一班。同时,对课程方面增加了一些规定,在几个不同的中心对布道师和自愿参加的教徒进行讲授,每年考试时,约有120人参加。

在中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丹麦路德会派出一些传教士到辽东半岛,即从亚瑟港和大连^①向北开展传教活动。虽然范围较小,但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有种普遍的觉醒。

在教会蓬勃发展和人数迅速增长方面,盛京医院也有自己的贡献。1897年,开设了与男医院隔开的女医院及其门诊^②,由两位女医生负责,两个机构的所有人员都归她们管理。

①亚瑟港(Port Arthur):即今旅顺港,1898年沙俄租借旅大,开始称旅顺港为亚瑟港;大连(Dalny):即今大连市。1860年,英国人绘制《辽东大连湾海图》,为大连湾最早见于文献记载。1879年李鸿章呈光绪皇帝奏折,在官方文件中首用大连湾一词。1898年沙俄租借旅大,宣布建立新城市,即“Dalny”,达尔尼,意为“遥远的都市”。日俄战争后,日本守备军司令下令废止“Dalny”,改称大连。译者注。

②女医院和门诊(women's hospital and dispensary):分别成立男医院和女医院,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仍然还很保守,杜格尔德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把男女分开。盛京医院的主要科室当时有外科、内科和眼科,没有专门的妇科,所以不能把女医院等同于现在的妇科医院。译者注。

第十四章 太平沟瞎张的故事

神强求白昼的工作,何以拒绝给予光明?

——约翰·弥尔顿^①

在暗淡无光的日子里一直做着神的工作。

——罗伯特·布朗宁

多年前,在遥远的太平沟一个小山村里住着一位姓张^②的人,十里八村的人都熟悉他。他好赌成性,品行恶劣,同时又热衷于某个佛教宗派的活动,但这种热衷与追求真理的热衷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失明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奉天有位外国医生能使瞎子复明的传说引起了他的注意。张很不一般,个性极强,根本不管邻居们的担心、警告,甚至嘲笑,毅然决然地卖掉自己的财产,把钱捆在布包里,踏上前往奉天的道路。但是,路途遥远,也很危险,当还有几天就要到达奉天的时候,遭到了土匪的抢劫,原来藏在身上的钱全没了。但是,他挣扎着继续往前走,可又患了病,等到最终来到我们医

①弥尔顿(John Milton):英国17世纪著名诗人。此句选自作者十四行诗 *On his blindness*。译者注。

②瞎张(Chang):矢内原忠雄日译本《奉天三十年》第14章译作“瞎常”,“张”和“常”在本书的英文本中并没有什么区别,一般译作“张”,但矢内原忠雄译作“常”可能来自卫藤利夫的译本《满洲三十年》,因为卫藤利夫长期在沈阳工作,又长于东北地方史的研究,可能看到过某县城为瞎张所立纪念碑,故而译作“常”。为准确起见,今仍译作瞎张,但加以注释,以免失误。译者注。

院门前的时候,已经形同乞丐了。

我们摇摇欲坠的小医院已经过于拥挤,连给他找个存身的地方都没有。因此,我们给他一点药,让他找个客栈先住下来,等到有人出院,再请他进来。可他非常激动,讲述自己路上怎样患病,土匪又怎么样洗劫了他的钱财,如何经过 120 英里的长途跋涉到达奉天,乞求我们把他留下。最后,医院传教士把自己的床让给他,瞎张才住了进来。

经过治疗,他的眼睛只能看到一点光亮,完全治愈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他来说,这似乎不太重要。因为,他和我们在一起的那个月里,灿烂的光芒已经照亮了他的内心世界。从住进以上帝名义开设医院的第一天起,他就带着极大的兴趣倾听上帝所吩咐的一切。

当他贪婪地接受灵恩时,他解释说:“这正是我多年来一直寻找的真理。”似乎他的心每时都在期待着,不几天,他就开始雄辩地向其他患者讲起基督教知识来了。瞎张这样的情况并不常见,在他身上,神的恩典被如此欢悦地接受,神的呼唤被如此忠心地实践。正像古语所说:“看哪! 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①但是,教会制定的谨慎原则决定他必须先接受考验。必须回到自己的家乡,使人们了解他的新信仰,以后,传教士将去那里察访。他感到特别失望,再次踏上征途,返回北方的家乡。他是个瞎子。

6 个月后,尊敬的詹姆斯·韦伯斯特牧师前往满洲北部旅行,从大路旁一个城镇出发去寻找太平沟。道路很不好走,找到瞎张就更为困难。

“我们来到一个地方,”韦伯斯特先生写道,“马车再往前走似乎是不可能了。车夫告诉我们,车走不动了。没办法,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前往。可不知何故,车夫却保证马

^①见《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 8 章第 36 段:“And as they went on their way,they came unto a certain water: and the eunuch said, See, here is water; what doth hinder me to be baptized?”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译者注。

车会跟着我。最后,当我们到达那个村庄的时候,人们用很多礼节把我请到村中学校校长李先生的家里。我们喝了一杯茶,李先生向我讲述了瞎张的事,使我忘记了饥饿和疲劳。事情是这样的:瞎张从奉天回到家乡以后,开始走村串户,向人们宣传耶稣的宗教。晚上在柳树下布道,有时听众达到数百人。开始时,人人都嘲笑他,或认为他疯了,对他表示怜悯。(他们说:没有眼睛,就没法赌博了,是好事,有利于他改恶从善。)但他不顾人们的议论,也不管什么时候,仍然不停布道,继续向人们现身说法,讲述自己所经历的“改变”,因此,对他,人们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些人支持他,一些人反对他;一些人祝福他,一些人诅咒他。短时间内,在整个太平沟地区,引起很大的骚动。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瞎张每天祈祷得到高层的帮助,唱着从奉天学会的赞美诗,然后踏上征程,拄着棍子,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去向人们讲述上帝儿子耶稣的故事。“瞎张努力的结果是,”李先生说,“这里有许多人热心询问基督教的教义,并且有几个人完全信仰基督教,希望成为一名基督徒。”

可瞎张在哪?他去拜访一名询问者,我们在路上错过了。李先生离开学校,陪伴我前去找他。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上前和他说话。他木然地愣了片刻,接着脸上露出喜悦之情,大滴的泪珠从眼中流了出来,感情激动地颤抖着声音说:

“啊,牧师!您保证过,我常常说你会来!”

我们直接向那位询问者家里走去,边走边谈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事情。白天剩下的几个小时,用来向在家里等候的老人和青年宣讲基督教知识,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指导那些询问者。到了该回去的时候,那名询问者,瞎张,还有一直陪伴我的布道师开始谈话。提出和讨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解释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时间持续到半夜,

凌晨一两点钟过去了,在进行儒学和基督教比较的讨论中,我终于睡着了。我不知道是否睡了三个多小时,但是,当我醒来的时候,仍然如睡前一样,热烈的讨论还在进行。第二天一整天,我们的房间里挤满了人。我私下会见了每位洗礼的申请者,对这些人特别满意。加入教会的人是优秀的,而他们的领路人却是个瞎子。

此时,瞎张还能够看到光亮,但不幸的是,他信了一名当地的医生,而这位医生向他保证通过针灸的方法能够治愈他的眼睛,毫不奇怪,最后完全失明了。过了一段时间,教会安排他去北京默里先生开办的盲人学校学习,他在那里度过了3个月时间,学习阅读和写作。然后带着他的盲文书籍回到家乡太平沟。为了观看他用手指尖阅读的奇迹,倾听他对阅读内容的解释及其雄辩的发挥,很多人聚拢到他的身边。他记忆力惊人,当许多年过去的时候,把笨重的书搁置一边,便能默诵圣经。他通晓《新约》,每章每节都很清楚,同时,对《旧约》的大部分内容也了如指掌。当人们宣读《圣经》某段正文的时候,比如说《格林多后书2》的第九章第六段,^①他立刻就能准确地背诵出来。阅读《圣经》时,他常常陷入沉思之中,不断提出一些自己的新奇解释,当传教士们不赞成这些看法的时候,他即不高兴,也不固执己见。

瞎张对基督教事业的奉献,向世人传播上帝福音时的忠诚和热情,指导皈依者宗教原理时不知疲倦的精神,都是无以伦比的。他是个很难共事的人,也是个难以驾驭的人,但似乎正是这些缺点有助于基督教光芒的普照。他有一个不安分的灵魂,并且讨厌被束缚。有位安排瞎张作布道师的传教士,把他留下来负责某一地区布道和指导工作,但是,几个月后,当他回到这里的时候,发现瞎张已经走了。某种内在的冲动左右着他,使其放弃了既定的职责,前往

^①《新约全书·格林多后书2》第9章第6段(2Corinthians IX.6):“少种少收,多种多收。这话是真的。”译者注。

某个遥远的城镇和村庄,重新聚集听众,然后,继续漂泊,在这里呆几个星期,到那里住一两个月,然后再回去做原来承担的工作。他无论走到哪里,身后都会留下一些感兴趣的询问者。他似乎没有长时间系统指导的能力,但是,他所播下的种子似乎已经在听众的心中扎了根。

“如果张申^①没失明,”这片辽阔地区的一名基督徒说,“这里不会有基督教会。”

瞎张漂泊的一个落脚点是一条偏僻的山沟。此地处于遥远的东部山区,距离太平沟 100 英里,原来曾经是皇家的围场。此时,那里的土地已经向移民开放,而瞎张的一位亲戚也前往那里开荒。为了找到这个亲戚,瞎张走了很远的路,在那里,他再次聚集一群皈依者,重演了太平沟的经历。为了回应瞎张的请求,满洲教会派出两名传教士,走了几天的路,穿过不知基督教为何物的人烟稀少的地区。但是,他们发现在遥远的“胜利沟”,有一些要求洗礼的信仰者。一段时间以后,瞎张再次前往胜利沟,人们请求他留在那里。没有人支付报酬,也没有人发号司令,但是,他仍然走村串户,宣传基督教理想。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给他饭吃,而妇女们则为他缝制衣服。

由于中日战争和土匪的猖獗,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在长达两年时间里,没有一个外国人去过胜利沟,也没有一个外国人与胜利沟发生过联系。当中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在胜利沟有四个独特的聚会场所,礼拜活动在那里正常进行,而且还有一所基督教学校。胜利沟最早的信仰者之一,现在是一位管理附近山区圣会的任命牧师,山区人民完全支持他。在这个地区,还有数个其他的自给圣会。

给妇女儿童讲授教义是瞎张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男人们到田野里劳动的时候,妇女们则在家里煮饭烧菜,缝制衣服,舂米磨面,而瞎张就利用这个时机,坐下来向妇女和孩子讲授教义,一个视

^①张申(Chang Shen):音译,也可能是张臣、张琛,或常臣、常琛等。译者注。

力正常的男人就不可能被允许这样做。当他在附近地区走村串户的时候,常常由男孩子领路。他们边走边谈,今天,当许多基督徒回忆起山路上的那些谈话的时候,认为正是那些谈话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基础。瞎张就是通过分别引导的方式使数百人走上了宗教信仰的道路,但现在,这种方式已经很普通了。

那是不祥的 1900 年夏天。14 年前的一个晚上,双目失明,身患疾病,且身无分文的瞎张挣扎来到盛京医院的门前,使我们深受感动。当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时候,瞎张再次前往胜利沟。那里是山区,藏起个把人来没有问题,因为他是个著名人物,所以人们把他藏在山里一处秘密的地方,由可靠的人为他送饭。一伙义和团,因为失去了这个最为重要的猎物而暴怒不已,不仅威胁要杀死所有的基督徒,而且要烧毁胜利沟房子,杀掉胜利沟居民。当有人把此事告诉瞎张,他马上从隐身之处走了出来,束手就擒。他被带到附近的一座城镇里,而那个城镇的长官已经和义和团结成联盟。在一座寺庙里,人们告诉他,如果不崇拜神像,只有死路一条。

“我只能崇拜惟一存在的真实上帝。”

“可是我们要杀了你。”

“那不要紧,我将复活。”

“你不为自己追随外国人的恶行而忏悔吗?”

“我已经为自己犯的所有罪恶进行了忏悔。”

“那么,你信佛吗?”

“不,我信仰我的上帝耶稣基督。”然后他开始对这些人进行布道。

因为害怕杀了瞎张祸及自己,所以,逮捕他的人走了很远的路去请义和团前来。瞎张在监狱里躺了三天。接着,他被捆绑起来,推上一辆没有棚的马车,游街示众,基督徒们则跟在后面。当他兴奋地唱着从盛京医院学会的那首赞美诗“耶稣爱我,这我知道”的时候,人们不禁为其坚强不屈的精神所折服。在城外那座寺庙前,义和团迫使他跪下。“天父,接受我的灵魂吧,”他祈祷说。可刀迟迟没有落下,他又祈祷了第二遍,第三遍,说的还是那句话。接着“他

们用牙齿咬住他,大声地嗥叫,一齐扑向他”。刽子手从背后挥舞屠刀,把他砍为数段。

当行刑结束的时候,义和团感到有些后怕。他是一个瞎子,是受到鬼神特殊保护的人。他所说的“复活”是什么意思?为了防止可能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发生,他们焚烧了瞎张的尸体,并把他的骨灰抛洒在山间的河流里。但这些还是消除不了他们的恐惧。他是个好人,死得如此壮烈,会成为一尊神。据说,他的鬼魂一直在这个地区游荡。最后,义和团突然走了,没有伤害这个地区的其他基督徒。

一些年后,清朝政府在县城里为瞎张竖起了一块纪念碑,但没有坟墓。抛洒在河水中的骨灰,已经顺流而下,奔向远方,恰如他挚爱宣讲的福音,传遍天涯海角,深入穷乡僻壤。自从义和团运动爆发那令人恐怖的夏天之后,在满洲的大地上涌现出的众多教堂和较小的集会点中,瞎张和其他牺牲者确实已经“复活”。

第十五章 走上歧途的爱国主义

把我广大的王国换成一座坟墓！

一座小小的，小小的坟墓，一座荒僻的坟墓。

《理查二世》——莎士比亚①

当中日战争结束的时候，满洲人以及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过上从前一样的安定生活。然而，许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寻求从内部酝酿渐进而温和的改良，以及时地影响朝廷并推行到全国。但是，这次改良没有成功。中日战争的进程已经使许多冲突的力量得以调整，从那时开始，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没有人能够预测最后的结局。

与满洲基督教会迅速发展，人们对科学以及所有外国事物产生兴趣的同时，社会其他各个方面也在不断进步。那时，满洲人对北京以及全国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怎么关心，但不久，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麻烦自己找上门来，满洲再也不是从前的满洲了。俄国通过外交手段，迫使日本把已经占有的南满洲领土吐了出来，据李鸿章的敌人说，因为李鸿章花了俄国的卢布，很难拒绝与俄国人就一项条约进行谈判，而那个条约却是以一种现实的态度表达了中国的感激之情。起初，俄国只要求中国同意铺设穿越北满洲的

①理查二世(Richard II): 14世纪末期英国国王, 1400年被废黜。此句选自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理查二世》第3幕理查二世一段独白中。译者注。

西伯利亚铁路。这只是事情的开端。

一段时间里,奉天几乎没有人听说这件事。俄国工程师前来勘测,绘制地图,然后离开,据说,他们正在铺设一条铁路,在遥远的满洲北部荒凉的山区通过。逐渐,人们对俄国人的出现习以为常。但是,当亚瑟港和大连湾已经租借给俄国,而铁路也将穿越满洲中部的消息传播开来的时候,到处充满着强烈的愤慨和对李鸿章的咒骂。不久前,德国攫取了山东的胶州湾,那时,几乎没有人关注此事,接着英国占领了威海卫,人们才重视起来,而恰恰是俄国的行动,使人们完全清醒。列强瓜分中国的领土,仇恨外国人的情绪正在许多满洲和华北人心中增长和酝酿。

于是,情绪和本能两股潜流同时爆发。两者来自同一个源头,即第一次清醒的爱国主义激情。爱国主义一直潜藏在中国人的心中,只是中日战争失败的耻辱引发了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涨。西方列强的行为激化了中国人的感情和冲动。

一方面,那些认识到国家衰弱的人们,为了最后能够成功地抵御所有非正义的侵略,为了能够使一个强大和独立的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尽最大可能向西方国家学习一切可用的知识。

而另一方面,一些人的仇外情绪转变为一种狂热。他们不加区分地盲目仇视所有的外国人,以及外国人所从事的事业,他们以为是外国人给中国带来了苦难的噩梦,为了清除这一切,他们是不择手段的。

处于两者之间的,是那些老人、胆小的人、保守的人和安分守己的人,以及大批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他们每天为衣食而奔波,除了谋生所需的和平安宁环境之外,别无所求,很少关心外国或自己的政府会做些什么。

在某个时期,有利于改革的力量似乎将处于优势地位。中日战争刚刚结束,光绪皇帝就命令修建从上海到南京的铁路,从天津到北京附近的铁路,指示朝廷大臣在全国范围内倡导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后来,又批准修建到汉口的铁路。1898年,按照外国人的设计,建起京师大学堂,并聘请外国教授来校任教。私下里,光绪皇帝阅读《圣经》,以及其他基督教和科学书籍,并坚持与一些进步

的改革者的密切交往,因为此时,还没法任命这些人为地位最高的大臣。随着西方列强攫取胶州湾、亚瑟港和威海卫等港口,排外情绪高涨起来,为保护传教士的安全,光绪皇帝特颁布一个措词严厉的诏令,指示政府官员采取措施以免他的基督徒臣民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许多年轻的官员、文人、商人和贵族支持光绪皇帝。社会对各种基督教书籍,以及历史、政治、经济和科学书籍有很大的需求。各种报纸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且发行量较大,可以前却很少有人关心自己周围以外所发生的事情。

接着,1898年那个不同凡响的决定命运的九月到了。

在短短的两个星期里,朝廷连续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法令。教育要现代化,在传统的等级考试中增加科学和其他学科,寺庙改建为学校,即刻兴办大学和中学,鼓励海外留学;普通民众有向君主自由请愿的权利;公布每年朝廷的预算;审判制度也开始改革。最后,议会制度也提了出来。也有人建议国家应该废除既定的中国服饰,剪掉由满人强加的辫子。

生长和养育在深宫之中的光绪皇帝,与世隔绝,除了书本之外,对皇宫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他向自己的臣民表明,自己是一位热心和激进的改革家,而成千上万的人民则贸然去响应他的改革主张。但是,在多少世纪以来习惯铁链的束缚之下,数以亿计的人们并没有受到任何触动,这是一种悲哀。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问,如果光绪皇帝和他的顾问们精于世故,满足于渐进的改良,后来那些年的历史又会如何发展?

事实上,那位老太后警觉起来,当初,她让出国家权力不是要看到这样的结果。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存在着短暂而激烈的斗争,最后,保守派获得了胜利。在9月的第四个星期,所有的改革法令都被废止。6名最有前途和智慧的年轻爱国者被立即处决,而其他人则逃亡海外。光绪皇帝本人也遭到软禁,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坟墓里。国家的实际权力牢牢掌握在老太后手中,光绪只是个名义上的皇帝。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位于北京中海。湖面风景如画,异常优美,掩映在树丛之中平静的小岛,假山幽径,别有一

番情趣。①在这样的环境中,光绪皇帝会想些什么呢?

难以忍受的眼神,
这些可悲的本可以发生的事情,
这些空虚的不成功的昨天?

不久,关于北京政变的确切消息正式传达到各省。绝大多数官员习惯于按照传统办事,具有保守倾向,当他们接到光绪皇帝改革诏令的时候,感到惶恐不安,惊慌失措,北京政变发生后,他们自然高兴,因此迅速行动,取消改革措施,结果大多数人民对改革内容一无所知。在变法过程中,有阅读能力的人受到很大的启发,特别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他们为自己的失望而痛苦叹息,消极等待变法时刻的再次到来。来日,改革一定会再次开始,恰如一位牺牲的改革者曾经说的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变法的失败使改革成果荡然无存。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 1898 年 9 月 28 日改革者被处决,一场保守运动开始了,并在 1900 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期间达到高潮。此时,仇视外国人及其与外国有关事物的保守派占据了上峰,朝廷态度的转变非常快。京师所在的直隶省官员的表现最能反映那些朝廷掌权者的情绪。10 月 23 日,正在建设从北京到天津铁路的英国工程师遭到士兵们的袭击;11 月 4 日,一位传教士在中国遥远的西南省份贵州被杀;11 月 5 日,在一张劝告各城镇农村团练组织的布告上,最后补充说到:“为保卫家乡,那时整个国家都可以变为一座大兵营。”这里没有提到外国人,可以理解,需要防范的危险正是来自于他们。

中国政府已不再阻止反对外国人的抱怨。西方列强对三个北方港口的攫取;法国在南方、俄国在满洲、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活动;意大利对港口的要求;通商口岸的治外法权;外国对中国海关的控制;在中国铺设铁路,以及外国报纸上经常提到的“瓜分中国”的可能性等

①幽禁光绪皇帝的小岛是中海的瀛台,故作者称在北京城中心。译者注。

等,——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不平之事,但当时状态下的政府非常愿意让这些事情激怒人们。另外,如此多的传教士散布在全国各地也是一种刺激因素,条约对基督教的保护,也激怒了官员们。基督教徒乱管闲事,特别是天主教徒干预诉讼,煽动起了更多的对抗情绪。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人们引以为自豪,但德国人闯入这片神圣的土地,并把其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不能不激起极大的民愤。他们强占胶州湾,并迫使山东巡抚解职;^①他们坚持铺设一条穿越山东的铁路,为此与继任的巡抚毓贤一直争吵。山东有个古代的民间秘密团体,叫作“义和拳”,已经销声匿迹很长时间,后来有人模仿这种形式,改称“义和团”。山东巡抚毓贤,为了消灭所仇恨的外国人,纵容义和团的活动,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的民间武装,使其重新活跃起来。毓贤知道德国人要把他赶下台,后来,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清朝政府迫于德国人的压力,将其降职,这当然是权宜之计,但是,他在山东大地埋下了祸根,在那场排外运动中,祸水横流,让中国和世界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②

①这里所说的山东巡抚是李秉衡。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德国天主教堂的中国教民与当地群众发生冲突,教堂袒护教民,矛盾激化。当地群众冲入了教堂,将教堂拆毁,并将两个德国传教士 Franz Nies 和 Richard Heule 打死。这便是著名的“曹州教案”。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下令“火速破案”,短时间内就将闹事杀人的群众全部抓获,并照会德国公使。1897年11月14日,德国海军率先对中国炮台发动攻击,随即登陆,强占胶州湾。次年3月6日,清朝政府被迫与德国签下《胶州湾租借条约》,除了赔偿数百万两白银外,青岛及胶州湾租借给德国99年,山东正式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李秉衡因曹州教案被罢黜。译者注。

②毓贤:是清朝末年著名的排外人士。1897年山东发生曹州教案,原山东巡抚李秉衡免职,毓贤1899年升任山东巡抚。毓贤认为“民心可用”,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团练。于是义和拳成了合法组织义和团。毓贤纵容拳民烧教堂,杀教士;教士求保护,毓贤下令置之不理。后清廷受外国压力将毓贤撤职。1900年被重新起用为山西巡抚。任山西巡抚时,毓贤排外更加激烈,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1900年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万余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事后清朝为此付出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赔款计四百余万两白银,取消山西人士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若干年。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时,联军指毓贤为罪魁祸首。1900年9月革职,流放新疆。1901年2月,清廷下令加重对“首祸诸臣”的惩处:毓贤即行正法。译者注。

义和团组织最初的行为模式是其成员应该有特别强烈的爱国之心,这样神灵才能附体,赋予其超自然的力量,从而刀枪不入。他们的口号可以用四个意义明晰的汉字来表达,即“扶清灭洋”。

起初,义和团的影响仅限于当地。他们不敢袭击“洋鬼子”,首选目标是“二鬼子”,即中国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抢劫和焚毁他们的房子,勒索和监禁他们的人,有时甚至杀害他们。不久,义和团运动越过省界,蔓延到直隶境内,而那里的官员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义和团的勇气大增,1899年末,他们杀害了一名传教士,整个冬天,散布在山东直隶各地的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每天都面临着生命危险。

回顾这段历史,似乎难以理解我们对事态发展的认识何以如此肤浅。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警告的人被认为是大惊小怪。因为老太后和她的朝廷不断说好话,并向各国公使允诺,保证外国人的安全,而与此同时,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却在背地里怂恿义和团的活动。1900年3月,已被降职的毓贤被重新任命为山西巡抚,很快,义和团就在山西活跃起来。春天,朝廷派遣钦差前往各省,人们戏称其为“高级勒索者”。钦差此行的目的是给那些已经被朝廷控制的地方团练武装购置装备,而随着义和团的发展,义和团与地方团练已经融为一体,朝廷的用意非常明显。

说得轻松一点,叫作“不安”正在蔓延。因为生计受到轮船和铁路的威胁,船夫和车夫,以及对外国怀恨在心人,大批加入义和团。1899年粮食歉收,据说是外国人使得天不降雨,因此许多农民也加入了义和团。没有突然的爆发,但暴行却预演愈烈。传教使团的建筑遭到抢劫;电话线被割断;一个天主教村庄遭到二千人的围攻;两名中国传教士被公开处决;铁路车站遭到焚毁;铁路被掀翻;外国人的房子在熊熊燃烧,而朝廷仍然在做着看似真实的道歉。

接着,6月1日,两名传教士被蓄意谋杀,几天以后,北京段的铁路工程完全停止。终于人们认识到危险就在眼前,朝廷是不可信任的。在北京的传教士们逃往各国公使馆避难,6月10日,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二千联军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大多数人认为,为了

恢复秩序,这是必不可少的,骚动也会就此而止。

在满洲,一切都很平静,存在些排外情绪也属正常。在满洲的大部分地区,人们所知道的外国人只有一种,即传教士,他们认为,传教士是些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满洲也有俄国人,但他们与传教士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他们是从北方来,而传教士则是从西方的上海来。俄国人铺设的铁路逐渐有了轮廓,部分路段,运输建筑材料的火车已经开始运行。因为迷信的成见,铁路要铺设在奉天十英里之外,以免震动皇陵,破坏清朝的繁荣昌盛。对满洲人来说,俄国铁路和俄国人的存在都是既不能拒绝也不能改变的事实,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此时,惟一该做的事情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他们,然后乘火车旅行。

我们很少听到义和团的事,也没有兴趣轻信其所作所为。社会上流传着一些谣言,我们是在每周的上海报纸上知道这些的,感到庆幸的是,满洲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

5月,满洲基督教会每年一次的例会按时召开。长老会由中国和外国的牧师和长老组成,大约100人。满洲各地所提供的报告比以往更为鼓舞人心。教徒的人数在增多,教会学校在发展,妇女和姑娘的教育也在稳步前进。几个圣会希望供养自己的任命牧师。为了举行宗教仪式,资助自己的牧师和布道师的捐献已经达到2万美元,或约2000英镑,而当地一个男人每月挣5美元(10先令)的工资就相当高了。会议讨论了进一步的发展计划,然后,与会者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返回各自的家乡,根本没有想到数周之后,他们会为自己的信仰,藏身于山洞和土窟之中,甚至会献出自己的生命。

10天之后,约60名商人,其中许多人是基督徒,为讨论资助医院添置床位的事,在盛京医院的候诊室举行会议。这次会议的捐助只差一点,而且商人们保证,以后每年资助两张病床,而且,会议对如何接近奉天富有商人的计划进行了讨论。

5月30日,在奉天西部的兵营里发生了一次可怕的爆炸。一个小时之后,两名骑兵狂奔到盛京医院的大门前,送上盛京将军和军队总指挥的名片。两人都是保守的满人,迄今为止还没有和我们

医院打过交道。此时,他们请求我们能接受和治疗伤员。不久,伤员送到了,总计 11 人。接着,我去事故现场,为大约三十多名受伤的人疗伤。军官和政府官员对此事特别高兴。那位总指挥,或中将^①,派人送来一份谢礼,和盛京将军本人一封热情的信件,希望不久亲自登门拜访当面致谢。约两个星期后,一些军官来到医院,看望伤员,参观医院,同时表达他们的谢意。

此时,关于义和团的话题多了起来,但是,作为满洲之外的事物,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关注。6 月 10 日,城里流传着一条消息,“义和团来了!”义和团的几个山东领导人已经到达,正在寻求发展新的成员。他们开始操练,但反响很小,所有品行端正的人们都强烈地反对他们的行为,他们只好转向城市最贫困的部分,那里是乞丐、暴徒和流氓的聚集地,只要有利可图,这些人随时准备做任何无法无天的事情。

与天津上海之间的电报联系中断了。奉天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一无所知,14 日那天,北京有数百人遭到屠杀,前往救援的西摩尔上将正在路上徒劳地挣扎,——而奉天的传教士则带领家属前往浑河岸边郊游,孩子们在水中嬉戏,在沙滩上玩耍,大人们则在树阴下愉快地品茶。

^①陆军中将(Lieutenant-General):指清朝盛京副都统,育字军统领晋昌。译者注。

第十六章 疯狂的 1900 年

神要谁灭亡,必先让他疯狂。

——欧里比德斯^①

想到叛逆的世界里接连发生的事情,
天堂里的上帝也感到忧愁,
他便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奥罗拉·利》——布朗宁夫人^②

和平生活着的人们,买卖嫁娶,大家一起和睦工作,可是,突然发生了变故。人命如草芥,盲目的狂暴控制着人们的心灵,导致流血、燃烧和仇恨。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呢?

外国人的干涉给中国带来众所周知的耻辱这是真实的,但这不足以去解释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常常把此类事情留给官员们思考的国家。

对外国人的普遍蔑视和仇恨也是真实的,教会人数的稳步增长,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仇视。实际上,在中国,并不存在宗教狂热,信奉一神教的人很少,但如果提议用新的崇拜目标去取代人们所信奉的众神,就会引起宗教狂热。基督教遭到反对在于它是一个外国的宗教。人们所坚信的是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东西,对任何外国

^①欧里比德斯: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译者注。

^②《奥罗拉·利》(Aurora Leigh):是英国诗人布朗宁夫人于 1857 年创作的一首诗。译者注。

宗教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都难以容忍。尽管如此,这种情绪和偏见已经存在了数十年,很容易加以控制。就是在义和团发源地山东省,由于新任巡抚袁世凯采取强制措施,终止所有的公开煽动,因此,山东境内没有发生屠杀外国人的事件。

在满洲,明显可以看出,由于信仰问题所造成的仇视情绪很弱。日本的征服,俄国的侵略,在抵抗没有意义的情况下,人们先后无奈地接受了现实。排外情绪几乎完全沉寂下去了。在满洲南部的奉天和吉林两省,约有4万人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或生活在基督徒家中,或偶尔出席基督教仪式。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天主教徒。虽然各地还存在着某些矛盾,但在大部分地区,他们都能与周围的人们和睦相处。像对待外国人那样对待满洲的基督徒和普通信仰者,似乎是不可能的;危险能够降临到我们、教会,特别是医院头上,似乎也是不可能的。甚至在奉天所有的外国建筑遭到焚毁的前一天,满洲一位高级官员还对我的助手说:

“医生为什么离开?他在这里是非常安全的。没有人会碰他,也没有人会破坏医院。”

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盛京
医院的大门



义和团运动有两个特征：一是义和团仪式和说法的神秘性；二是老太后以及清朝政府的支持。这两个特点强化了已有的排外仇恨，引发狂热的残忍行为向各省蔓延。没有这些，义和团不会盛行。

起先，义和团超人的力量似乎主要依靠催眠术。为了使人信服，某个狂热的追随者故作怪异，装神弄鬼，扭曲夸大，直到痉挛昏厥倒地为止。有时，他还要嘟囔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发出些奇怪的声音，说这是已经附体的神灵昭示。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地道的货真价实的义和团。迷信和模仿也对中国人敏感的神经质性起了作用，许多人倒下，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会倒下，他们身边的伙伴倒下过。有个屠夫参加了义和团，是个彪形大汉。当他倒下的时候，催眠术、歇斯底里或极度兴奋起了作用，他把自己的头往石头上猛撞，结果头骨破裂，再也没有起来。

起初，尽管义和团宣传有某种神秘力量的帮助，但加入义和团的人数并不多，因为盛京将军^①本人对他们的奋斗目标没有什么好感，甚至还发布了一个反对他们的公告。在我们无忧无虑郊游的第二天，传来了直隶铁路遭到破坏，传教使团房屋被烧毁的消息，听说还有几个比利时人已经遇难，更可怕的是保定府和其他一些地方已经把传教士们关了起来（实际上，在两个星期之后，他们遭到屠杀）。不安和恐惧开始在奉天蔓延。6月17日，星期天，宗教仪式正常举行。在对时局的估计上，基督教徒们产生了意见分歧。一些人嘲笑会发生严重事件看法，——这些骗子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许多人摇着头，“不知这事将来如何，”^②——当义和团神志恍惚的时候，进入他们体内的邪恶神灵难道不正是魔鬼自己吗？

①此时的盛京将军为增祺。增祺，原为密云驻防八旗。后调东北练兵，官至齐齐哈尔副都统。光绪二十年（1894）署黑龙江将军。光绪二十四年（1898），为福州将军，充船政大臣，兼署闽浙总督，旋迁盛京将军。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副都统晋昌率众附和，增祺不能阻止。俄军侵入东北以后，增祺一直在盛京将军任上。光绪三十一年（1905）离任。译者注。

②不知这事将来如何（doubted whereunto this would grow）：见《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5章24段。原文为“Now when the high priest and the captain of the temple and the chief priests heard these things, they doubted of them whereunto this would grow.”译者注。

那天夜里,我们听说西摩尔上将已于一个星期前率军前往北京的消息。这是那些天里我们所获得的最后的可靠信息。像其他地区的外国人一样,我们也认为这些麻烦会很快结束。

此时,奉天当局对义和团无动于衷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反对政府的布告公开张贴,义和团在城内的操练没有受到限制,义和团的信使出没在市场和人群聚集的地方。据说,贫民区里已经没有一个乞丐了,所有的人都参加了义和团。许多渴望刺激的青少年加入到义和团的行列里,使其队伍迅速膨胀。如“在理的”等民间秘密组织,常常是排外的,此时也大批涌入义和团。在奉天附近的一些兵营里,公开痛骂外国人,并对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大肆吹捧,逐渐地,一个恐怖的符咒放在奉天人面前。说到义和团,理智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没有人赞成义和团的奋斗目标,但是,很多人对他们超自然的神奇力量却深信不疑,人们害怕了。

墙上贴着的布告,人们传阅的传单,都在讲述外国人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从输入鸦片到攫取中国的港口,包括在井里投毒,以及残害儿童等等,许多人甚至认为接触外国的东西都非常危险。据说外国的纽扣是施了魔法的,能迷惑人,否则为什么能燃烧呢?而真正的纽扣应该是金属或骨头做的。在我们家的厨房里,我们的厨师把纽扣从罩衣上割下来,放在火上燃烧,而其他人则惊慌失措地看着。这些纽扣是德国制造的,没有任何害处,也没有假冒金属。6月20日,星期三,蛊惑人心的布告贴得到处都是,攻击的对象就是外国人,内容非常恐怖,同时号召所有忠诚的人们起来,把外国人赶出中国领土。并且确定24日为焚烧外国人建筑的日子,承诺任何提供帮助的人都会获得奖励。

第二天早上,我给盛京将军写了一封信,并且把一张传单也装入信袋,指出继续允许这种煽动是非常危险的。他的答复缓慢,而且态度冷淡,打着官腔,使人特别不舒服,与三个星期前的友好态度相比,判若两人。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虽然牛庄那边的公共电报线被割断了,但是还保留着一条从北京直达奉天的秘密政府专线,因此盛京将军掌握的情况,我们却茫然无知,一直蒙在鼓里。

联军舰队已经占领大沽口炮台；义和团正在炮轰天津租界；清朝军队与义和团联合作战；德国公使在北京被杀，接着使馆区遭到围困。盛京将军已经接到朝廷根除外国人的命令，中将坚持下发和执行。盛京将军增祺不是一位很强硬的人，要么像一些省做的那样，拒绝执行命令；要么马上执行命令。他不想去杀害我们，但也不敢告诉我们实情，因此，他想了一个真正仁慈的办法，即用这种冷淡打官腔的方式给我们回信，目的是想把我们吓跑，毕竟时间还来得及。

我们把盛京将军态度上的突然转变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来看。经过商讨认为，让妇女儿童暂时撤离是个明智的选择。当天晚上，我们的一位官员朋友穿着普通衣服，在夜色的掩护下步行前来拜访。他诚挚地督促我们不要再犹豫，马上离开。

“盛京将军已经从北京接到命令，”他说，“这与你们密切相关。我不能告诉你们里面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今天已经下达了命令，奉天清军的两个军营要像义和团一样操练。”这是我们所听到最为严重的消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自信，在西摩尔上将的压力下北京朝廷会很快改变态度，相反的命令不久就会到来，一切还会回到原有的和平状态。

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所有的人都要撤离，因此，星期五一天，都在做着这方面的安排。星期六上午 5 点 30 分，撤离的人已经出发，随身只携带着夏季的衣服，还有很匆忙收集来的在外面生活一两个月可能缺少的东西。那是一次奇怪的旅行。一行人由两位男士，八位女士和五个孩子组成。铁路上运行的火车是不定期的，幸运的话，马上就能登车，倒霉的话，要等一整天，而且根本没有客车。撤离的人被安排在有棚货车^①中，在超过两天两夜的路途上，他们吃在这里，睡在这里。首先有一种“逃跑”的耻辱感。常常有人威胁着要烧毁我们的房子，但最后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而想到中国公然向世界挑战似乎也很荒唐。接着他们得到消息，数万义和团和清

^①有棚货车(covered trucks):最初出现的火车货车车厢是普通的棚车,车的四面好像箱子,旁边有可以打开的门。译者注。

军士兵包围了西摩尔上将的部队，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可怕的结果；天津已经成为废墟，幸存的外国人退守塔楼，在义和团的炮轰中苟延残喘（这是真正的十足的夸大之词）。

此时，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留守奉天，但不久，事情就明朗了，我们也必须离开。当我护送撤离的人去车站回来的时候，大街上挤满了激昂的人们，大部分商店已经关门。

“您为什么回来？”“您不害怕吗？”人们一再问我。因为此时人们都清楚，士兵们将成为义和团，一群群青少年正在城内各处操练，这些都意味着什么？6月24日，星期天，就是布告和传单上所既定的烧毁外国建筑的日子。像往常一样，我们去教堂参加宗教仪式，但已经在院子里安排了马匹，以备不时之需。好多人聚集在教堂门前，有些士兵也在人群里面，但还没有马上动手的迹象。四百多名基督徒站在一起，进行认真的祈祷。他们渴望从上帝那里获得力量、引导和保护。最后唱的圣歌是由苏格兰古战歌改编的“上帝的战士，起来！”仪式结束后，教徒们悄然离去，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再也没有见面，然而，那只不过是生活中一些破碎的片段。

那一天，形势急转直下。写在皇家专用黄纸上的煽动性布告公然贴在城门上。天津附近的所有外国军舰全被击沉的谣言广为流传。我们在奉天城内一个布道的小礼拜堂被洗劫一空。朝廷根绝外国人的命令最终发布，杀一名外国“魔鬼”赏银2500两，杀一名“魔鬼的仆人”或一名中国的基督徒赏银500两。医院的患者惊慌失措，许多人走了。我们接到了有关西摩尔上将和天津方面的消息，牛庄来电报催促我们马上离开。我们找了一些最可靠的帮手商量应该怎么办。他们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过了一会，有个人开口说：

“如果您留下，我们将支持您，然后我们一起死去。如果走了，您脱离了危险，我们也能照顾我们的家人和我们自己。”

星期一早上黎明时分，在捂着窗帘的马车里，我们溜出奉天，及时搭上一列南行的火车。我试图警告俄国车站站长所面临的危险，他很清楚，但表示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几天之后，他便落到义和

团手里,经过残酷的折磨,然后被杀害了。我们离开的时机选择得很好,因为第二天,一座桥梁被炸毁,火车再不能向南运行。满洲其他地区的传教士,离开就不是这样容易,但所有人都逃走了,当然某些人遇到一些困难和危险。几个人的健康受到了永久的伤害,又由于过度的惊吓和紧张,两个人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几天之内,我在牛庄港不断接到助手们送来的有关消息。贸易停止了,所有的店铺关门,患者逐渐减少,但仍然有几个没有出院。星期三,圣经会的院子遭到抢劫。6月30日,星期六晚上,我接到如下内容的电报:

今天大约四点钟,教堂被烧毁了;医院和住宅正在燃烧;不知刘牧师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遇难。

第二天早上接到另一封电报,是两个小时以后拍的。

男医院、女医院、住宅和圣经会等建筑,以及教堂和小礼拜堂都已经被义和团烧毁。

那是我们从奉天得到的最后消息,接着,寂静和黑暗把我们和奉天隔绝开来,对那里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不能呆在牛庄,只能分散去日本、上海,或回国。在日本,我们度过了疲劳和忧愁的两个月,没有得到来自满洲内地的消息,反而听到其他地区人们受难和牺牲的可怕故事。我们想象满洲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想象很清晰,就像我们自己的人民正在经受磨难。从后来所听到的详细叙述中,我们能够重新梳理出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

6月30日星期六下午两点,男医院里还有几名患者。我的助手魏医生^①,每天在门诊接待患者七八十人,小河沿的一切都很平

^①魏医生(Wei):矢内原忠雄日译本《奉天三十年》第16章译作“卫医生”,可能来自卫藤利夫的译本《满洲三十年》,因为卫藤利夫长期在沈阳工作,可能知道此人,甚至可能见过此人,故译作“卫”。为准确起见,今仍译作“魏”但加以注释,以免失误。译者注。

静。距离教堂附近差不多一英里远,是牧师们的住宅,刘牧师的家就在那里,他是奉天教会多年的领导人。听到门前有一伙暴徒大喊大叫,他走出来,去和他们“讲理”,并斥责了那些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关上大门之后,外面棍子和石头飞了起来。他很快意识到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他返身回到室内,携带妻子、儿女,以及孙子孙女,并带上容易携带的东西,翻越高墙进入基督徒邻居的院子,而他自己则准备去见盛京将军,寻求对教堂的保护。

当他从墙上跳下来的时候,听到窗户粉碎的声音,接着轰隆一声,大门被撞开了,暴徒们叫喊着一拥而入。从他隐藏的地方,看到了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这些人根本没有纪律,完全是为所欲为。两名穿着官服的军官在现场指挥,混在人群中的士兵大约一百名。刘牧师意识到,政府正在帮助义和团搞破坏活动,向盛京将军请求已没有什么用处。他看到那两名官员走进自己的房间,查看里面的东西,然后才让人们哄抢。他们把大捆的高粱秆子运到教堂里堆起来,然后在上面浇上煤油,几分钟后,火焰升腾起来,在院内院外的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看,外国人完了!”人们大声地叫喊。但是,有些人转身走了,唉叹着中国倒霉的时候到了。多数人老实守法,关起门来,躲在家里;而少数人则无法无天,在外面胡作非为,此时奉天成了他们的天下,黑暗笼罩了一切。时间不长,传来剧烈的爆炸声,教堂的高塔倒下了,飞溅起来的砖瓦砸在刘牧师全家和朋友们躲藏的房屋上,极度的恐惧使他们蜷缩在一起,连大气都不敢出。接着有人大叫:“到南郊去(天主教传教使团的驻地)!”“到东郊去(盛京医院和传教士住宅在那里)!”然后人群分成两股,每股都有士兵参加。南郊的罗马天主教大教堂及其附属建筑,周围环绕着高大厚重的围墙。当人群冲击大门的时候,院内向外射击,有几个人受伤倒下,其他人很快逃走了。在义和团到达小河沿之前,多数助手和看守者,以及仍然留在医院的几位患者都逃命去了,但魏医生希望医院能够幸存下来,准备迎接前来不速之客。在女医院的五座建筑以及女子学校遭到劫掠的同时,一伙义和团来到男医院,魏医生在大门口迎接他们,

说话非常礼貌和客气,并请求他们保护建设得这样好的医院。这些人同意了,并离开了这里,但几分钟之后,更多的义和团闯了进来。魏医生请他们喝茶,他们根本不买账,粗鲁地把他推到一边。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医院,窗户,瓶子,遇到什么砸什么,想砸什么砸什么。很快,魏医生知道没希望了,害怕他们砸完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但还心存侥幸,四处查看,直到房子起火,大势已去,才直接去电报局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告诉我。

在放火之前,义和团对医院进行了彻底搜查。他们找到一副人体骨骼标本模型,那是在爱丁堡购买的;同时还找到一副珍贵的纸质人体结构标本模型,那是为了给外国学生上解剖课,花了大约 100 英镑购买的,这些都被拿走了。后来义和团在奉天城内游行时,把其当作外国人作恶的证据来展示。他们认为这副人体模型是外国人杀害某人后留下來的。在我们房间里,他们还找到一枚清朝官员的“勋章”,以及接受双龙勋章的时候,同时赠送给我的清朝官服。很明显,我们曾经杀害了一位清朝官员,留下了他的勋章和衣服。

同一天晚上,奉天西郊爱尔兰传教使团的建筑和圣经会被烧毁,全城六个布道堂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基督徒们很快意识到,义和团劫掠和焚毁外国人财产的时候,正是自己逃命的绝好机会。因此,当后来义和团把注意力转向基督徒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那天夜里,几乎奉天所有的基督徒和他们的家属都逃走了。第二天上午,义和团逐户搜捕基督徒,劫掠他们的财产,没有一个家庭能够幸免,许多房屋被烧毁。接着义和团的恐怖统治开始了,而且迅速地蔓延到整个满洲。

满洲的中将,军队的总指挥,带着满腔热忱投入到根除外国人影响的斗争中。士兵们受命去帮助义和团,但仍然保留着独立组织,但是,在急于参与抢劫的渴望推动下,参与义和团行动的士兵越来越多。俄国人完全惊呆了,许多铁路工作人员遭到杀害。部分俄国工程师从铁岭突围,撤到满洲北部,并慷慨护送一些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逃走。满洲北部的所有传教士都是在俄国人的帮助下才幸免于难的。一队又一队的士兵和义和团被派往城市、乡镇、村庄,

甚至偏僻的山沟,一个接一个的教堂、医院、学校和外国人的住宅遭到焚毁,许多基督徒遭到杀害。在奉天,有几天时间,义和团的注意力集中在罗马天主教会身上。盛京将军不想杀害法国天主教神父,希望他们逃往牛庄。但是,中将急于要执行朝廷的命令,安全逃离是不可能了。无论如何,他们都拒绝离开教堂,并在院子里构筑工事。据说,有数百名天主教徒已经武装起来。

恰在此时,盛京将军增祺从心里厌恶义和团,命一位聪明的军官设计去奚落他们,使其当众出丑。他邀请义和团的领导人前来参加宴会,并装得非常诚恳。

对义和团表现出的奇迹进行一番恭维之后,他说:“还有许多人不相信你们的神奇力量,我们必须使他们相信你们真的受到神灵的庇护,请你们当众表演一下刀枪不入,也好让大家开开眼。”

这些领导人同意了。在众人面前,十二名义和团站成一排,等待射击,而他们的领导人事先安排取出了弹头,结果枪响之后,没有一个人倒下。

“真是妙极了!”增祺说,“但是你们没有使用外国人使用的枪。我有一些新式步枪,就是外国人使用的那种,让我们来试一试这个吧。”

领导人抗议也没用,新式步枪响了,三个人倒下,其余的全跑了。

义和团马上编造借口,说这些人不是真正的义和团,而且从那天开始,恼怒的领导人对盛京将军产生了怀疑。城里传播着很多不利于他的流言飞语,甚至有这样一种谣言,说他是个秘密的天主教徒,因此,他不敢行使自己的权力去继续保护基督徒。

天主教徒们不断遭到进攻,但是,在严峻的苦难面前,他们没有后退,并打死打伤很多士兵和义和团。最后,按照中将的命令,组织强攻。士兵们把大炮拉到城墙上,居高临下轰击天主教堂,一些建筑着了火,大门被撞开。一位法国主教,两位神父,两位修女,很多中国神父,以及数百名天主教徒被枪杀、刀劈或活活烧死。所有的天主教建筑都被烧毁,因此,人们认为外国人留在奉天的毒素已经遭到彻底的清洗。

在奉天城内，已经很难找到基督徒。一位老年布道师当街被杀；奉天有位著名的人物，一条腿曾经做过截肢手术。某天，几名义和团成员在大街上遇到一位老年患者，不是基督徒，同样也失去一条腿。“他在这儿！”他们大声叫喊，然后不由分说，就把这个人杀了。一位老寡妇根本不想逃走。她八十多岁了，身无分文，而且特别愚笨，但她是名基督徒，教友们以供养一位老使徒的方式照顾她。她来到还在燃烧的盛京医院废墟附近，看到一些义和团正在搜查基督徒。

“我是基督徒，你们杀了我吧！”她大声喊叫。“你们已经砸了我的饭碗（即那些给我食物的人），我怎么活呀？我信仰基督，杀了我吧！”人们大笑起来，戏弄这位老太太，给她一些食物和钱，然后走了。

已经逃走的中国基督徒怎么样呢？那些分布在满洲各地城镇和乡村的基督徒们又怎么样呢？义和团成员和士兵们正在四处搜捕他们。因为一般情况下，小礼拜堂里都保存着教会成员和询问者的名单，这对他们非常不利。七八两月是名符其实的“流血月”。如果满洲真的存在着对基督徒的普遍仇恨，死亡肯定不是数百人而是数千人。人们的情绪不是对基督徒的仇恨，而是对义和团的恐惧。有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由于多年积累的怨恨和妒忌，一些人希望基督徒邻居家里遭殃；但在另一方面，众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能够生存下来，正是由于他们非基督徒邻居的沉默，甚至面对高额的赏金，人们也无动于衷。许多人是靠异教亲戚朋友的帮助才得以避免饥寒。在筋疲力尽的逃亡路上，许多人是靠陌生人提供的帮助来度日的。

有位基督徒，在一座佛教寺庙的天花板上躲藏了 14 天，他的朋友是那座寺庙里的一个仆人。从藏身之处，他亲眼目睹了一个个基督徒被带到偶像面前，当其拒绝向偶像磕头烧香时，当场就被杀害。而另一个人在一个村庄附近转悠了很长时间，因为他的一个朋友就住在村里。当他听到一群人走来的时候，赶紧躲进树丛里。从这里，看到一个接一个的教友被处死。在一座教堂的门口，挂着 18 颗

基督徒的头颅,因为教堂是租用的,所以没有被烧毁。在偏远地区,许多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家里的姑娘,被劫掠到山区,成为土匪的压寨夫人。在那一望无际的大地上,由茂密的庄稼所形成的轻纱帐里,躲藏着数以千计胆战心惊的逃亡者。当义和团和士兵们在几步远的小路上走过的时候,男人屏住呼吸,母亲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空气凝固了,仿佛心跳都能听到。害怕出去暴露,他们就生吃粮食,蔬菜和野果。夜间,他们偷偷溜出去,从村中的水井打些水喝。因为不健康的食物和野外露宿,一些人身体日渐消瘦,十分憔悴,在那充满厄运的茂密庄稼地里,不知平添了多少坟墓。雨季来临,地里到处是水,泥泞不堪,逃难的人只好到村子里找个地方躲一躲,但这非常危险,即使这样痛苦度日,仍然有些人被抓走。

在义和团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抓住基督教徒不加任何审问就地砍头。但不久,他们开始给基督徒提供一个生存的机会。对基督徒来说,或者选择去寺庙向偶像烧香磕头,宣布脱离基督教,或者选择被折磨后处死。许多人选择了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学校的孩子和没有接受洗礼的询问者,然而,应该质疑那些选择生存的人吗?他们加入教会的时间很短,撒个谎,然后说放弃自己的信仰,似乎是很简单的事情。处死的方法要根据杀人者的残忍程度来定。砍头是最常用的死法。另外还有:把受害者裹上棉布或毛织物,浸泡在油里,然后活活烧死;还有一种所谓“烈焰皇冠”的死法,即用浸油的棉布或毛织物做成厚厚的一圈,戴在受害者的头上,然后点火;甚至在一两个人身上使用了千刀万剐的办法,割一块肉,问一句,如果不屈服,就继续割下去。

“是,我信仰耶稣,”一位男教徒坚定地回答。义和团已经割去了他的耳朵,剜掉了他的眼睛。接着又割去他的嘴唇,说,“这回你该闭嘴了!”他的小女儿也拒绝放弃信仰,义和团就在男教徒身旁砍下她的头。

当几个星期过去的时候,为了阻止继续屠杀,一些特别慈悲的人提出一个新办法,即拟定一种证明文书,说明持有者已经和基督教断绝了关系。不同地方在明确放弃基督信仰的措词上有些区别。

这些文书卖给数千名基督徒,或者代表基督徒的亲戚朋友,而有些基督徒自己并不知道。在野地里经历数星期的苦难煎熬,看着自己妻子儿女在眼前憔悴和挣扎的许多人,特别欢迎为挽救他们的生命天父所做的仁慈安排。他会继续拒绝到寺庙里向偶像烧香磕头,或明确表示脱离基督教,但愿意花钱买份文书,在他看来那张纸没有什么了不得。其中男性基督徒占很大的比例,事情常常是这样,当男人出去躲避的时候,是非基督教的亲属保护着他的家庭。此时,人们给许多流亡在外的基督徒送信,告诉他们可以安全回家。但是,当一些人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些说谎的文书,却非常生气,把其撕得粉碎,然后再次走上流亡的道路。还有人解释说,不能因为他们从中获益就责备他们,因为亲朋购买这种文书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

奉天基督徒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刘牧师。为了抓到他,义和团提出很高的赏格,但一直没有如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连基督徒们都不知道他是死是活。目睹教堂和自己的住宅起火之后,他和家人逃出了奉天。起初一段时间,他们四处流浪,有时托身于朋友,有时则躲藏在青纱帐里,有时又在废砖窑里藏身。当意识到自己和家人在一起,会给全家带来更大危险的时候,他决定独自离开。他把家属托付给满洲一些非基督教朋友,自己则逃往东部山区。因为害怕基督徒投毒,这一带的水井都上了锁,为了得到食物和水,他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人们不止一次把他认出来,并且告诉他赶快逃走。九天过后,他剃了头,装扮成已经丢了钱的和尚,大胆出来乞讨。可人们怀疑他的身份,说看起来不像个和尚。无奈,他只好忍饥挨饿,继续流浪,寻找谁都不认识他的地方。一天晚上,在一个山区的客栈里,他遇到奉天的一位基督徒,但没敢相认就溜了出来,结果在一条溪谷中两人再次相遇,在那里过了一夜,交换了消息。过了一些天,刘牧师仍然装扮成和尚,到一个农民家里打短工。此地距离城镇相当远,他在那里呆了将近两个月。一次,雇主派他到五英里外的某个地方办事,在那里看到一座小礼拜堂在燃烧,一名女基督徒遭到杀害,这使他心里非常难受。直到八月份,才给家里报

了个平安。

整个夏天,从所发生的一些事来看,人们还没有忘记盛京医院的慈善工作。医院的一名药剂师遇到一群士兵,其中一位叫道:

“那个人是盛京医院的!”药剂师想,这次必死无疑,但那个士兵继续说:“你不认识我了?我在那次兵营大爆炸中受了伤,你们的人为我治疗,对我很好。”

“不要害怕,”负责的军官说,“你们医院对我们的人非常好,你可以和我们呆一两天,然后就没有事了。”

另外有名学生一天,义和团准备把他,还有他的父亲和哥哥一起处决,一群兴奋的义和团围在外面。其中一人叫道,自己刀枪不入,然后用力把刀刺向自己的腹部。那位学生已经跪在那里,正在等待刽子手刀落下来,看到这一幕,就不停地大声喊道:

“如果你们放了我父亲,我能救那个人的命,治好他的伤!”结果他们达成协议,那个人的伤一治好,马上就放了他和他的父亲。但不包括他的哥哥,结果哥哥立刻被砍头。那位士兵康复后,他和父亲获得了自由。

我的助手魏医生,躲藏了数星期。但是,8月初,来了一群义和团和士兵,威胁说,如果他不脱离基督教的话,就烧毁他们的村子,杀掉他们全家三十口人。无奈,他只好回家,拜会那位领队的军官,提醒他自己在医院里曾经治愈了很多士兵的病,帮助过他们。这位军官并不否认这些,所以暂时恢复了魏医生的自由。后来不久,魏医生听说中将正在辽阳城南布防,准备阻止俄国人向北推进,打算请他去做一名军医。那似乎是挽救他的村子和家庭的惟一方法,因此他再次被迫前往。将军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了他,并且为我们治好了他的伤,却没有前往医院亲自拜访而致歉,竟全然不顾盛京医院是按照他的命令被烧毁,而他恰恰是面对基督徒在讲话的事实。他建议任命魏医生为总军医,魏医生没敢拒绝。但在能够得到器械和药品之前,却成功地推迟了明确的任命。几天之后,当他回家探亲的时候,俄国人占领了他们的村庄,那个讨厌的任命也不会再来了。

在洗劫和查抄一切可用的基督徒财产后不久,义和团开始寻找新的财源。他们勒索城乡的商人和富人,征收赋税,干涉贸易,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在大街上,当坐着马车的盛京将军遇到由骑兵卫队簇拥着的义和团领导人的时候,也必须谦恭地躲到一边为他们让路。他们对权力和金钱的欲望使整个奉天城为之颤抖。人们怀念比较繁荣和安定的过去。

8月初,义和团的支持者中将带着部分部队到辽阳以南布防,在他离开的时候,通过直达北京的政府专线,盛京将军接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外国人已经占领天津,义和团和清军连吃败仗,一支联军正在稳步向北京推进。此时,义和团在奉天的统治已经持续了41天,盛京将军决定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一个强硬的布告贴了出来,公开斥责义和团的行为。当人们看到这个布告的时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8月11日,盛京将军命令士兵们掉转枪口,杀掉每个能够找到的义和团。结果,好多人被杀,更多的人从奉天逃走了,其余的则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义和团终于在满洲消失了。

第十七章 沉重的代价

失去善将永远不会完整！像以前一样生活又会怎样？
邪恶不值得一提，邪恶不值得思考，邪恶的沉寂意味着完好。
善的就是善的，恶很多，善更多。
辽阔的大地凸凹不平，可在无限的苍穹中却是一个完美的圆形。

《阿布特·沃格勒》——罗伯特·布朗宁

不要让神经过于紧张，
擦干你的眼泪，
笑对失败，不惧挫折，
站起来，我们再重新开始。

《在爱中生存》——罗伯特·布朗宁

义和团已经烟消云散，但代价仍然要付，而且是一个沉重的代价。对老太后来说，她有一段不光彩的经历。当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她匆忙带着那位形同虚设的倒霉皇帝，逃到西部一个条件异常艰苦，与世隔绝，且鲜为人知的地方。联军已经占领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羞辱和不幸。为了筹集赔款，整个国家一直处于列强的长期压迫之下，而且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仍然没有结束。

联军向北京推进，想重建那里的秩序。俄国人就在满洲，重新征服铁路沿线地区，赶走所有敌对势力。因为俄国事前对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所以在他们采取实际行动之前还需要

一段时间。第一次暴行发生在6月30日。8月，俄国人才开始缓慢但稳步地向北推进，可遭到陆军中将所率领部队的坚决抵抗。中将的这支部队接受过严格训练，和6年前与日军交战时的大多数中国部队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与此同时，另一支俄国部队正从满洲北部向南推进。

传教士们渴望尽早与基督徒们取得联系，了解他们的遭遇。9月，麦克唐纳·韦斯特沃特作为一名红十字会的医生，随同俄国军队前往辽阳。由于他对满洲和满洲人民比较了解，在俄国人里也有些故交，所以作为调停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俄国军队在辽阳南部扎营，准备夺取辽阳城时，他先期进城，告诫辽阳的地方官员，抵抗无异于愚蠢的自杀，没有任何用处。劝说他们打开城门，让俄军和平进城。这样，城里的人们得救了。

不幸的是，中国士兵控制着奉天。帮助义和团杀戮和抢劫，鼓起了他们的冲动和激情。许多人按照长官的命令，掉转枪口对准昔日的盟友，转而劫掠和杀戮他们。而另外一些人在被俄军打败之后，也变得非常愤怒和难以驾驭。盛京将军和陆军中将之间爆发了公开的冲突，陆军中将对屠杀他的朋友义和团之事非常愤慨。当俄国军队距离奉天只有几英里的时候，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9月29日，增祺逃出奉天，而大多数官员也随之而去。

这些官员逃离奉天所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士兵们摆脱了所有的限制，整整一夜，第二天又整整一天，他们毫无顾忌地抢掠和恐吓那些根本没有自卫能力的商人和百姓。最繁华的银行和商店被洗劫一空，昂贵的丝绸和毛皮随意扔到大街上，在尘土中被任意地践踏。价值数千镑的商品就这样糟蹋了。第二天晚上，他们开始放火焚烧已经洗劫过的商店，然而，当听到俄国人已经到达南门的时候，就仓皇地从北门逃跑了。奉天城最忙碌最繁华的街道上火光四起，迅速蔓延。一支由300名哥萨克组成的俄国先头部队骑马接近南门，进行侦察。当他们发现城市没有设防时，就直接闯入城门，占领了奉天。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火势，扑灭火灾。如果俄国军队耽误到早晨的话，士兵们就会继续他们的破坏活动，肯定会

烧掉半个奉天。

第二天是10月1日,俄国大部队陆续进城,韦斯特沃特医生也一起来到奉天。街道两旁烧毁的建筑仍然冒着浓烟,到处都是房屋和店铺的废墟。出于对俄国人的恐惧,人们纷纷挂出一些旗帜,上面用中文写着:“顺从俄国人”,“顺民”,“我是一个基督徒(这当然不是真的)”等等。俄军司令是苏鲍季奇将军^①,前年他访问奉天的时候,我们彼此成了熟人。首先,他把自己的住处安排在几个世纪没人住的皇宫里,并把恢复满洲的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主要责任。几天后,南北两支俄国部队会师,这样,贯穿满洲,形成了一条从西伯利亚到海滨狭长的俄国统治地带。

消息很快传开,基督徒们纷纷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冒险回到奉天。10月7日,星期天,即教堂焚毁后的第14周,数百名教徒聚集在教堂的废墟上举行圣会。教堂山墙的一部分还挺立着,上面可以看到曾挂在那里烧焦的祝福词印迹,字仍然很清晰,“哀恸的人有福了”。^②许多人成了赤贫,瘦弱憔悴,形容枯槁,正忍受着饥饿的折磨。他们既没有《圣经》,也没有赞美诗,但是,当围拢在已经剃头的刘牧师身旁的时候,他们的心灵是充实的。大家一起祈祷,一起唱圣歌,一起聆听刘牧师用嘶哑的声音布道,而脚下正是过去他们聚集一起平静崇拜上帝的地方。

9月,把家属送上回国的轮船后,我从上海返回牛庄港,打算立刻前往内地,但这并不容易。俄国军队占领了主要交通干线上的重要城镇,控制了通往北方的所有道路,而且,各地又混乱不堪。许多义和团和散兵游勇成了杀人越货的土匪,对动乱中没有破产的富裕农民进行无情的勒索和敲诈,因此,除了身无分文的赤贫之外,没有强大的卫队保护,没有人敢于外出旅行。最后,我们三个人得到了

^①苏鲍季奇(Satoitisch):俄军中将,南路军总司令,1900年9月18日率领俄军占领沈阳。译者注。

^②哀恸的人有福了(Blessed are they that mourn):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4段。原文为“Blessed are they that mourn; for they shall be comforted.”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译者注。

乘火车前往辽阳的通行证。因为军事铁路仍然没有重建,所以,我们在那里稍事停留后,就在俄国护送人员的陪同下由陆路前往奉天。整个满洲,到处都是凄凉的景象;大片的庄稼没等收割,就遭到无情的践踏和破坏。村庄成了废墟,房屋被烧毁或劫掠,看不到几个男人,更看不到女人。

11月9日上午,天空昏暗,气候寒冷,我们进入奉天,驱车穿过残破不堪的市区。只有几辆马车和少数几个人在城内晃动,看不出有重建的迹象。所有的客栈都已关门,因此,我们只能找家破坏稍微轻些的空客栈住下。这个客栈曾经连续遭到洗劫,先是中国士兵,然后是俄国军人,现在已经家徒四壁,只有一位孤独的老人在那里照应。我们的仆人很快升起了火,准备吃的。

当我们回到小河沿的时候,眼前的景色使我们的的心沉了下来。除了残垣断壁,成堆瓦砾,以及挺立的山墙之外,医院和住宅都消失了。甚至连生长在这里的树木和植物都没有了,他们或被连根拔走,或被砍倒在地。当我们站在那里的时候,呼啸的风吹过灰色的荒凉,似乎我们的终生理想已埋葬在周围的废墟之中。远处那些残垣断壁是被烧毁教堂的标志,是叛离宗教和虚伪撒谎的标志,同时也是我们同中国人民友谊崩溃的标志,毕竟这些年来他们一直要把我们赶出去。接着,我们又察看了教堂的废墟,然后返回冰冷的死气沉沉的客栈。基督徒们陆续前来看望我们,在那天晚上和以后的几天里,他们悲惨的经历把我们的心都撕碎了,我们最终感到教会并没有被摧毁。

一位70岁的老人走进我们的房间,可我没有认出他来。他是个叫卖《圣经》的小贩,因为长着飘洒的白胡子而远近闻名,但是,此时他的胡子几乎完全被拔光了。一次又一次的捆绑和毒打,甚至被绑上双手吊在树上,等到昏死才放了下来。在一座寺庙里,有两百名义和团,他们刚刚屠杀了一些天主教徒,手中的刀还滴着鲜血。义和团把他带进来。

“你跟随那个外国人吗?”义和团问他。

“不,我追随耶稣。”

“你愿意放弃那种骗人的宗教,然后改信佛陀吗?”

“我礼敬真正的佛陀,我只信仰惟一真实的上帝。”

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他想自己死定了,但是,因其年事已高,有人出来说了几句好话,结果,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挨了一顿毒打。第二天,使他吃惊的是,义和团竟然把他放了出来,只是出来之前,他们让他反复清洗前额,说是要清除传教士在为每个基督徒洗礼时在上面划的十字。

“你们不能洗掉我心中的十字架。”他告诉义和团。

这样的故事,以及那些像烈士一样死去的人使我们意识到,教徒的信仰比叛教更伟大;教徒的忠诚比虚假更真实。甚至那些嘴上否定主的人,在其内心却对主充满着热忱。此时,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怖统治结束了,他们又恢复了自己的忠诚。

我们的一位布道师,也是学习怎样做传教士的一名学生,向我讲述了他的经历。在义和团迫害教徒的时候,他逃走了,在庄稼地里躲藏了几个星期。但后来,听说母亲病故,回到村里为母亲料理后事,结果被义和团抓住了。由于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被戴上重重的镣铐,关在监狱里等候处决。此时,他听到士兵们争论究竟应该由哪个人来砍他的头;士兵们还让他看将用来砍他头的大刀,并公然在他面前磨了起来。接着,他被押出去处死。

“如果他们那时杀了我,”他痛苦地说,“我就万事大吉了。”

因为有人替他说情,义和团没有杀他,而是连踢带打后把他扔到一个肮脏的洞里。洞里闷热得使人喘不上气来,蚊虫叮咬更是难以忍受,加上镣铐太紧,最后脚都肿了。几天里,他一直躺在那里,既不能睡觉,也不能吃饭,接着,义和团再次把他拉出去处死,此时,他盼望着死。一些朋友想用钱为他赎命,但是,义和团说他们要用他的血祭新旗。终于,在耽误数天之后,他被带到一座寺庙里,那简直生不如死。当他给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在这里停了下来。

“啊,医生!”他含着眼泪说,“就在那里,我否认了我的上帝。”

另一个人给我讲述了他和妻子以及全家如何躲藏在庄稼地里,因为风吹雨淋和忍饥挨饿,一个接一个的孩子死去。后来听说他们

可以购买免除证书。

“我们知道不应该那样做，”他说，“但是，那是抢救剩下孩子的惟一办法。”那年夏天，在外逃亡的许多家庭，没失去孩子的很少。

我们也听到许多感恩的话。人们一再提到是高粱地救了他们的命。而且说到由于天气暖和，在野外生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现在知道那句话的真正含义了，”某人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①如果这次逃亡发生在冬天，没有人能够活下来。”

奉天的混乱局面令人忧虑。大部分有地位的居民都已经走了，满洲道德素质最差，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们涌入城内。盛京将军用自己的公正和善良给所有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俄国人不能区分谁值得信任，谁不值得信任。社会上层离他们远远的，他们的翻译是一些只关心自己利益的堕落分子，雇用的许多人，甚至警察都是以前的义和团成员和散兵游勇。即使在城墙之内，每天晚上都有偷盗和抢劫事件发生。对基督徒的迫害虽然没有公开，但仍然存在。攻击外国人，特别是俄国人的标语不断在墙上出现。

直接的传教工作没法进行了，但我们还是尽其所能去鼓舞和安慰基督徒的心，提供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我们不可能携带大量现金，但商会主席预先垫付了一些。他们也处于极度的贫困之中，从他们脸上就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商人的货物没有了，很多人靠亲戚的施舍生活。贸易停滞，人们找不到工作。那年冬天，某些人确实发了财，但人们不知道究竟谁使他们发了财。在寒冷的冬天到来之前，奉天基督教会租用一座闲置的剧场做教堂，每到星期天，大约 200 名男教徒前去做礼拜，有时也有三四个女教徒。但是，因为当时妇女上街很不安全，所以必须女扮男装。多数人没有《圣经》，也没有赞美诗，仅有的几本，曾经被埋在地下，此时已是破烂不堪，脏兮兮的。除了牛庄港之外，整个满洲都找不到一

^①《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20 章 24 段。原文为：“But pray ye that your flight be not in the winter.”译者注。

本新的《圣经》和新的赞美诗。

医院和住宅旧址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瓦砾堆中只能找到一些陶瓷器皿和装饰物的残片。一名俄国士兵在一座政府衙门里发现一本英文书,有人把它送给了我。这是一本旧的哈默顿所著的《理性生活》,作者把它赠给我在苏格兰的姑姑,因此,这本书对我来说很有价值。真是怪事,那么多东西都毁掉了,这本旧书竟然保存下来!我们的解剖模型,已经被弄坏了,也是在一个衙门里找到的。有人告诉我,盛京医院那副有关节的人体骨骼模型,在游街示众之后,堆放在城外一座寺庙里。我前去寻找,发现庙门关着,一时敲也白费。和尚们害怕士兵们骚扰,假装听不见。我大声叫门,说出我的名字,并保证不会伤害他们,终于,门打开了。和尚说根本不知道人体骨骼标本的事,但是,我坚持说它就在这里,否则就对这座寺庙进行搜查。最后,他让步了,命人把骨骼标本拿出来。

“他被弄坏了可不关我的事,”他说,“送来之前就是这样。我精心照看他,还为他搞来一口棺材,并经常供奉他食物。”

一口简陋的棺材抬了进来,里面放着我们的教学模型,损坏很严重,有些部分丢了,同时在棺材里还放着几个装着各种粮食的碗。

因为医院的工作没法恢复,几乎什么都不能做,继续留在奉天也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又回到牛庄。

1901年1月,在回国度假之前,我再次前往奉天。此时,铁路已经重建,但是,因为火车只能定期行驶,旅行仍然非常困难。一天下午,我们得到通行证明,从牛庄登车出发。然而,约在半夜时分,在某段铁路的连接处,突然接到通知,火车要调头向南开往大连。我们被赶下火车,随身行李都扔在雪地上,眼看着相当舒适的车厢灯光逐渐消失在夜色里。车站还没有重建,黑沉沉的夜色什么都看不到,只有炫目的积雪还闪着白光。因为知道附近一定有俄国人,我们沿着铁路跌跌撞撞向前走去,边走边喊,最后我们看到一位提着一盏灯的俄国人。

“盎格鲁!”他用一种兴奋的语调解释说,“纽卡斯尔!盎格鲁!纽卡斯尔!”他把我们领到一条岔道上,那里停着一列火车,只是没

有车头。谢天谢地，我们爬上一节里面装有火炉的货车，暖和多了。他帮助我们点着火，然后带着友好的神态，兴奋地重复着“纽卡斯尔！”微笑着走了。很显然，他记住的这个词是从好久以前到过英国的某位人士那里学来的。我们心里充满着感激，很快就睡着了。大约黎明时分，感到车厢在动。我们非常着急，赶紧探出头去向前瞭望，想弄清火车向哪个方向走。向北！肯定向北！我们安下心来，给炉子添些燃料，最后到达了奉天。此时，铁路在距离城市不到两英里的地方通过，车站建在路东。如今，俄国建筑仍然保留着，日本车站和旅馆在它附近修建起来。

除了铁路沿线，整个满洲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的勒索和劫掠司空见惯。据说陆军中将正在北方集结大批部队，人们不断流传着预期起义的谣言。我们发现奉天比以前安定多了，一些店铺也开门营业。盛京将军无声无息地回到奉天，留在一座私人住宅里，我曾前往那里拜访。他穿着官服，接待我时特别客套。首先，他对盛京医院为他的人民和士兵所做的一切，非常礼貌地表达了谢意，但同时也为盛京医院不幸遭到破坏而表示遗憾。我提醒他，正是他的士兵参与了对医院的劫掠和烧毁。他的脸马上沉了下来，向我解释说，为了避免事态的发生，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控制不了义和团。

“他们说我是罗马天主教徒，要杀了我！”他气愤地大声叫道。他把全部责任都推到陆军中将身上，并且说，如果他重新掌握权力，将保护基督徒。我在官场上的许多老朋友都曾因为和我的关系而受到严重的迫害。其中催促我扔下所有东西赶紧撤离的那位朋友，后来为了活命，也不得不逃走。如今，在民国的奉天，他掌握着一个重要部门。但最近，他已经接到新的任命，前往某市做地方官。

此时，满洲的政治前途根本没法确定，传教的前景并不乐观。俄国人控制着重要城市，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在大多数地区，中国官员仍然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据说，奉天的权力也会很快移交给中国官员，当然俄国人还要在幕后不同程度地加以控制。因为中国人缺少抵抗能力，人们普遍担心满洲将逐渐沦为俄国的殖民地。希

望这个不影响传教工作是不可能的。俄国人对我们一直非常友好,并热情地帮助我们,就个人而言,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会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为教徒的集合、救助和组织提供方便。但是,从官方的立场上看,我们也不能不担心,当我们和中国的基督徒再次传播福音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俄国人的干涉。

但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令人沮丧的不祥之兆。事情逐渐地恢复到从前的状态。盛京将军恢复了职位,并一步步地夺回昔日的权力。土匪们放下武器,去从事合法的职业,或编入正规部队;贸易重新活跃起来;1901年获得了惊人的大丰收。传教士们回到自己的岗位,找到一些临时的住所,帮助教徒重新租赁或修缮已经毁坏的教堂。教徒的人数减少了许多。明确报告被杀害的只有大约三百人,另有数百人下落不明。在这些人中,许多人无疑是被害了,还有人死去,另外也有许多人逃亡到外省。在坚决放弃宗教信仰的那些人中,大部分是在义和团运动爆发那年,或前两年基督教高潮时期加入教会的新成员;而绝大多数人虽然暂时被剥夺了正式成员资格,但仍然把自己看作是基督徒。从前对基督教的普遍友善态度已经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冷漠、躲避和害怕。

“谁和宗教发生联系,谁就遭殃!”这是一种公认的说法。人们仇恨外国人和与外国人有关系的人,因为是这些人引发了义和团暴乱并且导致俄国的占领。“在理的”仍然是人数最多、力量最为强大的排外和反基督教组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难于在满洲开展工作。部分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确实不安全;部分原因则是俄国人也认为这样,不允许我们外出旅行。因此,在基督教会的重建过程中,基督徒们做了很多工作,这大大地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和自治能力。从依赖到自治和独立的转变过程总要遇到困难。回首过去,我们能够看到,那些无法控制的事件和影响对我们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外国牧师不能前往,加上来自同胞的敌意、怀疑或蔑视,许多基督徒团结起来,不再依靠自己圈子之外任何的世俗帮助,不管是来自精神上的还是来自物质上的。他们把所学的教会管理方法付诸于实践,最

后,当传教士能够到那里去的时候,发现他们在自立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另外一种情况对基督教会的发展也有过很大的影响,部分是因为善,部分是因为恶。政府决定补偿基督徒的损失,约为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对财物原本胸无杂念的教徒们也无法避免烦扰、忌妒和贪心。这表明,这笔意外之财是最具灾难性的。值得庆幸的是,据说好多基督徒把他们的大部分赔偿金捐献给教会。赔偿金的发放耽误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他们自己已经重建了家园,虽然还很贫困,但不是那样如饥似渴了。这些捐款主要使用在修建教堂和学校上面,依靠这种方式,许多教会开始自立。

以后几年的工作同 1900 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时局动荡,谁也不知道日俄之间什么时候会爆发战争。人们的情绪很不稳定,新的询问者很少。更多的工作集中在巩固教会、教育教徒和吸引放弃信仰的人们重新归队等方面。那些受过洗礼的人还是值得争取的。他们经历了迫害,走出了阴影仍然是基督徒,无论如何,不管他们多么无礼,也会被这些生疏了的说教所吸引,因为,为了这些说教,有些人甚至会放弃自己的生命。

教育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基督徒们渴望为男孩和女孩开设尽可能多的小学,而且在几个中心地区开设了中学。为培养学生将来成为出色的牧师、布道师、医疗助手,或学校的教师,还开设了一所艺术学院,专门招收年纪稍大的男孩。另外,神学讲堂也重新开放。

到 1903 年末,我们的工作再次出现全面发展的势头,只是不断受到政局不稳和战争阴影的影响。在一座临时的院子里,医院早就重新开业了。1903 年,重建了盛京女医院,并计划于 1904 年建设男医院,而那时,战争的乌云再次笼罩了满洲大地。

第十八章 1904 年的战争风云

我的漂泊生活必定要在愤怒和咆哮声中度过。

《索尔德罗》——罗伯特·布朗宁

长期以来,俄国把满洲和朝鲜当作自己的未来领土,一直谋求在东方获得一个不冻港,以满足其殖民扩张的野心。1894—1895 年间,日本占领了朝鲜以及满洲的部分领土,这在俄国人看来,是个无法忍受的鲁莽行为。因此,在历经三年的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只能以获得福摩萨^①为满足,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看着俄国以中国批准为借口把那个不冻港湾,以及已贴上俄国标签的亚瑟港装入自己的口袋,接着在大连湾,或达尔尼建设新港口,并铺设一条穿越满洲的铁路,进而干涉朝鲜事务。

对俄国来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仅仅是一个暂时的挫折,实际上却巩固了俄国在满洲的地位,并为其侵略活动找到了合理的借口。虽然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愤恨,但俄国人还是在布拉戈维申斯克^②进行

①福摩萨(Formosa):我国领土台湾。1590 年葡萄牙水手乘船经过台湾海峡时,看到岛上山川秀美,草木葱茏,不由发出 Formosa 的感慨,意思即美丽之岛。从此,福摩萨的名称被西方广泛使用。译者注。

②布拉戈维申斯克(Blagovestchensk):今俄罗斯阿穆尔州的首府,中国地名“海兰泡”。此城位于黑龙江北岸,原名孟家屯,后改海兰泡。1858 年俄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璦琿条约》,俄国把其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1900 年此城居民约 3.8 万人,半数以上是中国人。此年 7 月,俄国出动十万多军队分五路入侵东北,制造骇人听闻的海兰泡事件,屠杀中国居民 6000—7000 人。译者注。

了不必要的残忍报复,并且用军事占领来镇压满洲各地的抵抗活动。尽管 1902 年俄国与中国签订的条约规定,俄国只在铁路沿线驻军,^①但是,据外界估计,满洲不再属于中国了。一条受到强有力保护的俄国军事铁路纵贯东三省的心脏;除了领事之外,每个省会住有一名拥有相当数量部队的俄军司令;甚至在奉天的盛京将军如果不与这位司令协商什么都做不了。哈尔滨是一座拥有三万俄国人和无数中国人的城市,1898 年,那里只有几间草屋,数年之间,它如雨后春笋一样从地下冒了出来。许多中国人已经学会讲那种半生不熟的俄国行话,而两国的下层人民则如同兄弟一般自由交往。

恼怒的日本人正密切地注视着满洲事态的发展,同时秘密而稳步地为那场决定自己生死存亡的战争做着准备。如果任凭俄国人把满洲抓在自己的手里,那就意味着同时放弃了朝鲜。如果这只北极熊控制了满洲和朝鲜,日本哪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野心?甚至独立和发展都要受到威胁。俄国人承诺的撤离只是一个借口,赖在满洲不走才是实情,当这种意图表现得非常明显的时候,日本人认识到,在俄国人认真反省之前,战争爆发越早对自己越有利。日本间谍到处都有,他们装扮成中国人,也有许多受雇于俄国人,因此,日本人了解俄国的所有部署,只剩下确定开战的具体时间了。

奉天有相当多的俄国人,包括军官和文官,所有的人都以相同的轻蔑态度看待即将爆发的战争。

“什么战争?”一个人傲慢地说,“那也能叫做战争。开战三个星期,就得在东京签订和平条约。”

“那无异于愚蠢的自杀吗,”另一个人说,“日本敢向我们挑战,到了把他们从地球上抹掉的时候了。”

1904 年 2 月 8 日夜间,日本人对亚瑟港俄国军舰发动突然袭击,而此时很多俄国军官却在宴会的餐桌旁和华丽的舞池里。鱼雷

^①1902 年条约(the Treaty of 1902):指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俄签订的关于俄国从中国东北撤军的条约。又称《俄国撤兵条约》或《交收东三省条约》,结果俄军迟迟不撤,终于导致 1904 年日俄战争的爆发。译者注。

的爆炸给俄国人的傲慢自大以强烈的震撼。当然,他们很容易为这个“不幸事件”找到借口,并迅速恢复他们十足的自信。最后,许多军官还是非常确信俄国将很快取得伟大的胜利。

关于日俄战争,已经出版了许多书,我们没有必要对这场记忆犹新的战争发表任何相关的评论。回顾过去,我们对使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战争结局迷惑不解。自1895年以来,日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从中日战争的成功和失误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部队装备精良,对每个细节,每个个体都有详细的规定,对各种可能偶然发生的事件做了充分的准备。更为重要的是,存在着对战争的普遍热情: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决心拼死一战,而且没有低估自己的对手。

另一方面,俄国人则依靠传统的勇猛名声,依靠对这些小个子的蔑视。很显然,满洲最不经意的观察者都会看到:俄国人对战争准备粗心大意;放任自流;腐败和渎职猖獗;在将军和各个部队中充满着妒嫉,缺乏凝聚力;许多军官只知吃喝玩乐,不知效忠国家;无论军官和士兵都对战争持冷漠和厌恶的态度。一天,有人给我送来一张名片,并告诉我一个外国人急于拜访我。他英语讲得很好。为一些小病开了一些药后,他倾诉了自己的经历。他是一名俄国犹太人,多年前曾经去过伦敦,在黑修道士桥^①附近经商。当他回到俄国探望年迈的双亲时,政府把他抓住,强迫他参加这场战争。虽然他是名普通士兵,但穿得很好,明显有些钱。

“我是个犹太人,”他痛苦地说,“因此,既没有奖赏,也没有提升。我将被送往前线,像狗一样死去。”然后,他激动地转向我,大声地说:“我不想去杀那些日本人!你可以救救我吗?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给我找一个地方做仆人。我要活下去,回到黑修道士桥!”

战争的胜利应该属于反应灵敏、准备充分、精诚团结的一方,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在中日战争初期,满洲之外很少有人了解实际情况,或预见到俄国会失败。

^①黑修道士桥(Blackfriars Bridge):位于伦敦泰晤士河上的著名桥梁之一。译者注。

我们决定让妇女和儿童先行离开奉天,这是十年时间里的第三次了。据官方宣称,从满洲到天津和北京的中国铁路将马上停运,那么,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就会中断。因此,妇女和儿童很快撤走了,可结果是,整个战争期间这条铁路并没有关闭。非常不幸,后来由于家里有人生病,我不得不去天津。因为俄国不允许外国人越过这条铁路线的终点新民屯,去奉天附近的战区,就这样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迟迟不能回家。

此时,俄国人的战略意图是迟滞日军前进,等待援军决战。但是,日本人并没有放慢速度。他们渡过鸭绿江,重创俄国舰队,包围了亚瑟港。然后,兵分三路,冲破俄国人设置的数道防线,稳步地向辽阳推进。到八月初,他们已经重新夺取了除亚瑟港之外中日战争期间所占领的全部土地。俄国人准备在辽阳以南与日军拼死一搏,8月末,我们听说那里发生了一场大战。因为这可能导致俄国人松动对道路的严格控制,找到从西部进入奉天的机会,我和另一位传教士决定马上出发,前往新民屯,然后再想办法穿越俄军的防线。

战争之初,我为自己和家人弄到一张俄国官方通行证,以便于离开奉天。这次,我回奉天,就是靠这张通行证,虽然在路上被抓了,但很快就被放行。在我离开奉天到天津去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因为我所去的地方与通行证上所写的方向一致。然而,这次却在路上被拦阻了四次,还在一个喝醉酒的哥萨克监视下留在客栈里过了一夜。虽然这些哥萨克不识字,但却知道盖有印章并有长官签字的俄国官方文件的分量。此时,这将是我第四次使用这个通行证了,而且也不是最后一次,因为第二年二月,我的妻子和全家穿越俄军防线回来的时候,还得用它。

正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在辽阳附近,经过十一天生死的搏斗,俄军战败,整个防御体系陷入一片混乱。我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就离开了新民屯。新民屯距离奉天四十英里,走了七八英里,到了宽阔的辽河岸边,再往前就进入战区了。当我们的渡船靠上东岸的时候,几名俄国士兵走了过来。他们允许中国人通过,却把我们带到军营里,让我们在那里等了三个半小时。通行证被拿走了,如果他

们识字的话,会把我们直接送回去,这使我们非常担心。后来,一位军官走了进来,打量我们一下,拿起手中的通行证不经意地瞟了一眼,签了字,我们就可以走了。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一家中国客栈里,刚刚吃完晚饭,一些哥萨克就闯了进来。他们看上去很饿,狼吞虎咽,津津有味,把我们剩下的饭菜全吃了。第二天,我们遇到了数千从辽阳战场上撤下来的士兵,他们已经筋疲力尽,好在没有骚扰我们,1904年9月9日下午,我们安全回到家中。

那年冬天,我们在奉天可以说是过着一种奇怪的生活。周围正进行着一场残酷的战争,而我们身边的中国人却根本不关心它。日俄两国在中国土地上厮杀,虽然不干中国农民的事,但他们却白白承受着痛苦和死亡。他们既不想让日本人,也不想让俄国人来统治自己,而是希望继续做清王朝的臣民。尽管许多人抱怨俄国人的军事统治,期望日本人取而代之,并错误地认为那会给他们带来自由,但在这次战争中却没有支持任何一方。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保持中立,但是,我们从内部亲眼目睹了战争的血腥。

在我们周围,无数的俄国人随意地议论着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的轻松乐观,以及面对失败和灾难所表现出的不以为然,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们不禁想到俄国人可能迁怒于我们,但我们遇到的大多数军官都是非常友好的。英国和日本之间的同盟关系,使得俄国人增加了对我们的怀疑。如果知道我们是“盎格鲁”,普通士兵都会公开地表示愤怒。一位俄国军官坦率地告诉我说:所有的俄国军官都这么看,日军的接连胜利和指挥有方并不神秘,只不过有许多英国军官在日军中服务罢了。

俄国人在辽阳以南的抵抗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当我们到达奉天的时候,城内人心惶惶,不知该如何是好。夏季,来自各个国家,各个行业的商人们聚集到奉天,其中许多人都是品行卑劣的人,他们在俄国人采买军需时大发横财。因为俄军没有阻止住日本人的前进步伐,此时,急于要逃离奉天。但是,不久,传来确切消息,俄国人在奉天和辽阳之间,沿着沙河两岸构筑阵地,又不想走了。已经撤离的医院、银行、邮局和其他部门也悄悄地返回,恢复了营业。从欧

洲调来的增援部队从北方源源南下。库罗巴特金将军^①完成了对部队的重组,准备采取新的攻势,在冬季来临之前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10月初,俄国人发布了一个宣言,祝贺部队成功地撤退出来;宣告他们现在有足够的力量前进,“使我们的敌人屈服”;鼓舞将士们“为维护俄国的荣誉而战”。在战地记者和各国武官以及普通的俄国民众中,有一种普遍的看法,似乎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次俄国会扭转战局,取得胜利。

10月7日,沙河战斗打响了。我们开始听到重炮的轰鸣,从此以后的5个月里,这种声音再也没有停止过。我们不可能知道每天的战争进程。某天晚上,一位俄国军官告诉我,俄国军队进展非常顺利,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第二天上午,平静得出奇,使人有些惶恐不安,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得知,俄国人正在撤退。17日午夜,我们站在阳台上,夜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正在展开。在隆隆的炮声中,我们能够清楚地听到步枪和机枪的连续射击声,其间不时夹杂着重炮的轰鸣。激烈的枪炮响了一个小时,然后戛然而止。后来我们了解到,这天夜里,俄国人对日军占领的一座不太重要的小山头发动了袭击。在损失1800人之后,消灭了日军的守备部队,夺取14门大炮,后来在城内举行的游行活动中,我亲眼看到了这些东西。从那以后,这座山就以夺取者的名字命名为鲍迪罗夫山。

局势很快明朗了,在第一次袭击之后,俄国人连续发动多次大规模的进攻都失败了。接着俄国人在沙河与日本人决战,也失败了,双方损失都很惨重。辽阳之战后在奉天所见到的情景再度重现,人们争先恐后,蜂拥而逃。但是,日本人停止了进攻,没有乘胜夺取奉天。恐慌消退了。悄悄逃走的人回来了,随军商贩们也悄悄溜回奉天,重操旧业。

冬天,双方部队都停了下来,隔着沙河对峙。许多俄国军官住

^①库罗巴特金(Kuropatkin):日俄战争时期俄国陆军大臣,满洲俄军总司令。译者注。

在奉天,还有一些军官住在铁路车站舒适的车厢里,也有一些军官和自己的部队生活在一起。在封冻前的几周,所有的俄国部队都在开挖战壕,构筑工事,修筑掩体,用一条条从东到西的防御平行线,把沙河以北的平原连结为整体,建成一个巨大的组织严密的地下堡垒。为了支撑地下工事,乡村中的树木砍光了,防线附近居民房子上面的檩子也被拆了下来,结果,在那片人口分布十分密集的地区,相当多村庄遭到破坏,居民无家可归。

在沙河之战和奉天之战间隔的四个月里,不断有一些小规模接触,有时甚至发生相当激烈的战斗,不时,大炮就连续轰鸣几天。各国武官和战地记者穿梭往来。有些人住在奉天,过着舒适的生活,随意收集记录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然后立刻把其拍发出去。也有一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前线,观察战争中所发生的真实事件,然而,等到他们回到奉天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落在那些事业心很差的兄弟们后面,获得的消息已经不是新闻了。

一位经常呆在奉天城内的记者,决定参加某个俄国连队在山区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士兵们费力地将几门大炮拉到山上,从那里看到不远处有些日本人正蹲在地上抽烟,俄国人开火了,打了几发后,发现由于操作失误,炮弹没有命中目标。当他们争论怎么办的时候,一发日本的炮弹打了过来,接着第二发在前面不远处爆炸,还没等第三发炮弹打来,所有人都跑下山来,当然也包括记者本人在内。突然,他发现两名哥萨克冲着自己奔来。他们把他打倒在地,因为他长得很黑,和日本人发型接近,他恐惧地意识到哥萨克把他当作日本人了。他的抗议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其中一个士兵举起带着刺刀的步枪,庄严地在自己身上画了一个十字,马上要杀了他,正在这时,一位俄国军官走了过来,看到他,记者大声叫喊,几分钟后,误会解除了。

在沙河两岸的士兵们中间曾产生了一种怪异的友谊。在既定的时间,俄国人和日本人从同一口井里,或河面同一个冰窟窿里取水,互致问候或交换香烟。虽然,一有机会,在那天的其余时间里他们将互相“狙击”。无数的日本宣传画散布在俄国的军队中,上面主

要描绘那些有幸成为日本战俘的人生活得多么好。毫无疑问,这些吸引人的宣传画发挥了作用。随着宣传画传播的是用俄文写的传单,在战壕里,那些识字的士兵乐于给那些不识字的人解释这些画的内容,由此去打发这难熬的时间。除了国内很少的消息之外,在前线的俄国士兵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一些消息在全军都传遍了,否则这些士兵可能永远被蒙在鼓里。比如俄国征集新兵时各地出现的动乱和反抗;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兵变^①;俄国国内普遍的反战情绪;1905 年 1 月冬宫前枪杀请愿者的恐怖事件^②,等等。我们可以肯定这些宣传所起的作用应该非常明显。

对双方士兵友好交往最严重的干预出现在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本人已经夺取了亚瑟港,冬宫的惨剧留在俄国人心中的烙印又难以除去,那年冬天是最寒冷的冬天,在这最冷的月份里取得一次战斗胜利似乎是政治上的需要。因此,离开舒适的战壕,向奉天南部和西南部发动进攻,把日本人赶回到俄军的外围防线。在接着的五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拼死的争夺,伤亡总数中死亡比例之高说明寒冷所造成的损失有多么可怕。但是,需要的胜利没有如愿,部队分散开来,重新回到原来的阵地,固守在各自岗位上。很明显,在俄国人中弥漫着悲观情绪,他们开始把这次战争当作一个不幸的事件,难逃失败的命运。

快到年末的时候,我有过一次有趣的经历。12 月 29 日,我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让我去开原为传教士治病。开原在奉天以北 70 英里的铁路附近,起先,到达那里的困难很大,似乎很难克服。铁路上除了军车之外,没有别的车辆,而且也没有通行证。最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得到一张乘坐帝国红十字会专列的通行证,而那列火车将在当天夜里向北方运送伤员。那列火车是老太后赠送的,极尽

①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兵变(the naval mutiny at Sebastopol):1905 年俄国黑海舰队官兵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下,此年 6 月,在“波将金”号装甲舰上爆发起义,11 月又在塞瓦斯托波尔港爆发起义。时间不久先后失败。译者注。

②1905 年 1 月冬宫前屠杀事件:即 1905 年的第一次革命。该年 1 月,彼得堡工人游行请愿,沙皇军队在冬宫前枪杀游行群众,曾死伤千余人。译者注。

豪华和舒适。我住在一个大包厢里,吃饭和睡觉都相当奢侈。负责的医生们对我非常礼貌和热情,并带着我参观了附设有完善医疗设备的整列火车。第二天,我们到达开原。完成任务之后,31日早上,我回到距离开原有数英里远的火车站^①。迄今为止,一切顺利,但是返回奉天却出现了麻烦。

我在开原车站等了26个小时,心里非常焦急。日本人已经切断了铁路,不知哪天才能通车,因此,我没法走。一位伯爵夫人负责开原车站附近的红十字会医院,她英语说得很好,而且曾经在爱丁堡住过一段时间。在她所领导的护士中,有亲王夫人和公主,有伯爵夫人,还有其他的夫人和小姐,他们的丈夫都在前线作战。她和护士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并请我到医院取暖和休息,我和她们一起进餐,伯爵夫人安排我住在一名医生的空房里,并安排两名哥萨克陪伴我。两人轮流值班,以便火车进站时及时叫醒我。我也睡得很少,躺在床上倾听着士兵们的阵阵歌声,完美而宏亮的齐唱不时插入和谐的旋律之中。由于火车到了,我被唤起数次,冒着刺骨的寒风等候上车。但是,不是方向不对,就是已经满员,总之没能上车。

最后,大约在中午时分,我成功地登上火车,离开了开原。从标志上看,我乘坐的车厢是最后一节。这是一节污秽的四等车厢,挤满了奔赴前线的士兵。气候非常寒冷,但窗户封闭得过紧,空气不能流动,令人感到窒息。1905年新年那天,我就挤在那些人中间,占据一个角落,一言不发,默默地坐在那里,但能够上车,仍然心存感激。午夜时分,到达奉天。通过俄军防线,盘查非常严格,等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一二点钟了。

1904年末,一些女士回到奉天。1905年2月,我的妻子孩子也回来了。一位仆人前去新民屯迎接他们,多次使用过的通行证就缝在他的衣服里。他们在天亮之前坐马车从新民屯出发,冬天的道路

^①开原城在今辽宁省开原市老城镇,而火车站在孙家台(今天开原市),故此处说有数英里。译者注。

既坚实,又平整,只要俄国人不加拦阻,很快就会到家。因为俄国人都喜欢孩子,所以我的妻子告诉孩子们要好好表现,见到俄国人要笑脸相迎,使他们感到高兴。在路上,哥萨克骑兵数次粗鲁地拦住马车,但是,那张他们读不懂的官方文书起了很大的作用,况且,除了一位女士,一位女仆和几个笑眯眯的孩子之外,车上没有什么东西,结果每次士兵们都把那张通行证还他们,然后打马离去。因此,路上没有耽误,上帝保佑,在天还大亮的时候,他们回到了小河沿,而那一天恰好是奉天大战的前一天。

第十九章 奉天大战期间

当命运女神的拖裙，
无声地从我们面前飘过，
结局早已注定，
死亡，她阴郁的忠仆，紧随其后。

——威廉·欧内斯特·亨利^①

1905年2月中旬，最冷的日子已经过去。天气特别暖和的时候，有的地方开始解冻，几周以后就是春天了，到那时，坚硬的道路，冰封的大地会变得相当泥泞，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行动。日本人的进攻指日可待，为固守阵地，俄国人也做了充分准备。但是，不管人们怎么说，我们对结果都深信不疑：迟早，日本人会占领奉天。我们对任何严重的麻烦都不担心。因为，中国政府很稳定，各种事务照常运转，日本人肯定会尽力避免炮轰奉天。有人建议把我们的菜窖改建成防炮掩体，但根本没有动工。

那次战斗，称作奉天战役，由很多次战斗组成。战役开始于2月19日，持续到3月10日。在此期间，各处大炮的轰鸣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很难找到片刻的安宁。据估计，大约有一百万士兵投入了战斗，伤亡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俄国人捷报频传，他们坚信会取

^①威廉·欧内斯特·亨利(W·E·Henley)：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的英国诗人、批评家和剧作家。译者注。

得战役的最后胜利。在超过一百英里的弧形防线上,在全局失败的同时,完全有机会在局部取得很多小规模战斗的胜利。

在奉天东部和东南部山区,日俄双方进行了殊死的拼杀,库罗基^①所在部队和其他一些部队都投入了战斗。库罗巴特金将军误以为这里就是日本人的主攻方向。在奉天南面,俄国人沿着沙河构筑了由战壕和堡垒组成的坚固防御体系,日本人很难前进一步。在这里,连续的炮击一直没有停止。奉天正南方向八英里处的彼德罗夫山曾八次易手。后来,我到那里察看,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在一英里范围之内,地面上厚厚地堆积着废弹壳、火药桶和炸翻的石头。由战壕和地下掩体等工事组成的防御网,密密麻麻,形同蜂巢,所有的开口都对着北方,或俄国一边。日本人把在亚瑟港夺取的重炮运到这里,整个山头都削平了。这是目前已知陆战中所使用的威力最大的炮,就是利用这种炮,日本人攻破了俄国人在这里修建的坚不可摧的防线。在这里,我们从弹片中发现有十一英寸炮弹使用的痕迹。

更往西一些,双方为争夺那片平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一月份,俄国人曾经在这个方向发动攻势,结果无功而返,最后,在日本人的压力下,一步步撤回到原来的阵地上。在这里战斗正酣之时,有支部队假装前往东部山区支援那里的战斗,而实际上则向西转到俄国人的身后,然后从新民屯北攻击库罗巴特金的侧翼。

在奉天,我们继续平静地为许多受伤的中国人和大量投奔我们的难民工作着,而各国武官、战地记者以及俄国军官前来就诊的很少。我们对每天炮火声音的变化有着极大的兴趣。听到奉天南日本新运来的重炮轰鸣可能在27日,随着日本人一步步从西南压过来,那个方向的炮声也越来越近。接着,在一天夜里,远处燃起了熊熊大火,那是俄国人撤退之前,正在破坏自己的火药库。以前每天,都有难民从俄军战线后边的村庄涌来,而此时,大量的难民则来自

^①库罗基(Kuroki):一名参战军官,详细情况请见Frederick Palmer著的*With Kuroki in Manchuria*。译者注。

于双方战线的中间地带,或日本人的控制区。他们痛苦地向我们讲述俄国火药库爆炸所引起的冲天大火,并提到一个细节:在俄国人没有破坏仓库之前,附近仍然有一些中国人留在残破不堪的家园里,结果,一位仁慈的俄国指挥官给他们留出四个小时抢运东西的时间。爆炸发生以后,那里什么都没有剩下。

突然间,奉天的正西方向传来了炮声,第二天,一些难民告诉我们:他们在新民屯附近的辽河岸边,被日本人拦住了,而俄国人则不见了。也就在同一天,整个冬天一直经由新民屯接送邮件的大清邮局停止了营业。我们清楚,日本人已经大批运动到奉天北部,半圆型的包围圈形成了,开始向东包抄过去。俄国当局宣称:最迟到3月6日,俄军将取得重大战果。据说,俄国人取得了一次战斗的胜利,活捉了40名日本人。各国的武官告诉我们,俄国人完全可以坚守住阵地。听着中国人的讲述,留意变化的炮声,看到堆满行李的俄国运输马车,沿着城墙外的道路不停地向北方驶去,我们对战争的结局已经非常清楚。

一天下午,我们在野地里散步,同时听着远方传来的炮声,试图分辨哪些炮声是日本人的,哪些炮声是俄国人的。我们突然感觉到,除了所习惯的隆隆炮声之外,还有一些明显特别刺耳的爆炸声从西北方向传来,那种炮弹是由较小的炮发射的。这是为了彻底切断俄国人的交通运输,日本人正在向铁路方向展开。经过三天的苦战之后,3月7日,星期日,日本人切断了奉天北面俄国铁路线;在奉天以南,日本人突破了俄军的防线,把俄国人赶到浑河岸边的战壕里,同时,东西两翼也在步步进逼。那天晚上,库罗巴特金给圣·彼得堡发了一封电报:“我被包围了。”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铁路并没有被占领,被突破的防线重新得到恢复,从北方南下的援军及时地顶住了日本人进攻,可就在当天夜间,库罗巴特金为了保存大部分部队,下了一道有秩序向铁岭撤退的秘密命令。新阵地距离奉天40英里,因此,转移需要一段时间。在奉天城内,人们认为俄国人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在未来几天内,也一定会打退日本人的进攻,他们根本不知道俄国人已经下

达了撤退的命令。

第二天上午,3月8日,星期三,奉天的正北方传来重炮的爆炸声,震得窗户嗡嗡直响,炮弹在上空飞过时所发出的尖利声音听得十分真切。俄国人据守着离铁路较远的北陵森林,两天内,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再近一些,随风飘动的气球依稀可见。在城墙外,距离盛京医院数百码的地方,俄国骑兵和运输车队不断向北开去,我们听说,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铁路和马路两旁都挤满了人。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从我们的房顶看到一个极其恐怖的场面,即奉天以南4英里的俄军火药和粮食仓库正在熊熊燃烧。桥梁和房屋也着起了大火,整个天空闪烁着火光。离我们最近的火光是从一个很大的骑兵营房中升腾起来的。这天晚上,奉天周围的战斗一直没停息。

3月9日,发生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沙尘暴天气。滚滚黄尘笼罩着大地,对面南防御的俄国人非常不利。强大而温暖的南风卷起这一带地面上特有的黄土,遮天蔽日,有时透过家里的玻璃连18码远的院墙都看不到。当俄国人战斗的时候,大风卷起的黄沙迎面扑来,使人很难睁开眼睛。但大风对日本人却非常有利,他们在大风的掩护下冲破俄国人的防线,在就要融化的冰面上渡过浑河。可一天后,浑河融化,河面满是浮动的巨大冰块,如果面对俄国人强大火力,于此时渡河,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人议论说:“真是连老天都帮日本人!”俄国人的撤退是稳步的和井然有序的,从这个角度看,沙尘暴也帮助了俄国人。火车在不停运行;大路和小路都挤满了人。持续的战斗迟滞了日本人的前进步伐,撤退的道路打开了。俄国防御战线的东西两翼先行后撤,正面战线逐渐收缩,砰!砰!步枪声离我们越来越近,只是因为呼啸的风沙而减弱了许多。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那些酗酒的俄国士兵有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们闯入难民营,恐吓妇女,而当我们出面干涉,让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甚至威胁要杀了我们。这种情况在星期二夜间特别严重。两名全副武装的俄国炮兵闯入女医院,掏出顶上子弹的左轮手枪,抽出佩剑来威胁我们,最后,经过很多周折,才化解了危机。同一个星期四的上午,即战役的最后一天,一个俄国士兵要闯

进我们家的院子,看门人不让进来,他就威胁着要杀看门人。这些威胁都不是吓唬人的空话,每天都有因这种事情受伤来医院的人,同时我们也听说很多人因此而丧命。就在这个时候,俄国负责治安的官员前来看我,主动给我们派来一名警卫。他立刻逮捕了那个前来闹事的人,为防止出现更大的麻烦,坚持要给我们派一些俄国士兵。当天晚上,他们就上岗了,我们为他们准备了晚饭,并提供一个房间让他们轮流休息。

天黑的时候,风停了下来。南方和东南方的枪炮声离我们更近了,那是殿后俄军的行动。战役结束的时间不会太远了。那天夜间,也就是第二天凌晨一点,大声的呼喊和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一个通信兵匆忙前来呼唤我们的俄国警卫,因为晚上11点已经下达了马上撤出奉天的命令。俄军撤退前的炮击一度特别凶猛,炮弹爆炸的轰鸣震耳欲聋,甚至连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很难听到。砰砰的子弹爆裂声,刺耳的步枪射击声,形同暴风骤雨,片刻不停。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借助月色的保护撤退,边走边打,就在我们东面不远的地方经过。接着的二个小时,外面比较平静,我们也睡着了。

3月10日,星期五,早上黎明时分,震耳欲聋的日本炮击声把我们惊醒。日本人把大炮拉到前面来,猛烈炮击正在撤退的俄国人。而我们听到俄国人只用步枪还击。炮弹凄厉的尖叫声几乎就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其中一颗炮弹落在院外的路上,但没有爆炸。还有一些炮弹在小河中或小河沿上爆炸。一颗子弹打在附近的土墙里,还有几颗子弹落在我们家院子里,但没有人受伤。在城墙外的小河沿,一些俄国士兵战死,距离我们家只有二百码。接着,步枪射击停止,战场推向北方。

下午,许多日本军队平静地进入奉天,但是俄国人的撤退仍然没有结束,数千人没有及时离开。当天下午,一些人试图从城北的东门突围,但遭到城外日本人的阻击,双方展开了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斗。一些俄国人隐藏在外城墙内,依托土墙,向东南两个方向的日军开火。当时我们正在做手术,突然,一连串子弹打在房顶上,我们不由得大吃一惊,看到医院的苦力们到处乱窜,寻找藏身之处,

用双手抱着自己的头,似乎这样会起到保护作用。子弹继续倾泻到院子里,谣传说有数千俄国人隐藏在奉天城内。不到一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那些试图冲出日军防线的俄国人有的被打死,有的成了俘虏,还有一些退守俄国教堂的大院,后来也投降了。

整个星期五一天,城北的炮声不停轰鸣,后来,炮声逐渐稀落,终于完全沉寂下去。晚上,日本人于城北十五英里处,切断了数千俄军的退路,奉天战役结束了。

整个战争期间,中国人无疑是同情日本的。十年前,日本给中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时,他们不知道日本占领情况如何,但了解俄国人占领所带来的灾难,因此推测出日本占领可能比俄国好的结论。再说,中日属于同一种族,这次也是第一次证明,东方能够战胜西方。但同时,中国人在战争中采取中立态度,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他们常说:“这不关我们的事。”村民被迫收集情报,担任向导,侦察敌情等等,但是,他们对日俄双方都是如此。至于满洲的传教团体,一直奉行绝对中立的原则,除了在红十字医院治疗外,我们不对任何一方提供帮助,也不阻碍任何一方接受帮助。

日本人所掌握有关俄国的详细情报应该归功于自己的间谍,而不是中国人。在战前的数年时间里,秘密的现役军官和其他人装扮成中国人,被派遣到满洲各地。他们留长发,梳辫子,操着南方口音,只是脸型稍微有点像中国人。他们受雇于俄国人,并且学习俄语。战争开始之时,就是他们报效国家之日。这样的冒险者可能无计其数。

一位“中国的”理发师,经常侍候奉天俄军司令部的高级官员,最后逃走了,证明是日本间谍。像他一样,在俄国军队中充当服务员和贴身仆人的日本人还有几位。用这种办法,他们在满洲的俄国军队中,建立了一个完全秘密的机构,送信人经过新民屯把情报送到日军司令部。

战役结束后不久,一天,一位中国人前来拜访。从他的外表和口音来判断,我认定他是一个广州人,但不久他就不瞒我了,下面是他的故事:他是一名日本间谍,已经在满洲生活了多年,对这里的情

况特别熟悉。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他在奉天城开了一家店铺,手下有一百名伙计,变成一名真正的商人。很多俄国人成为他的朋友,交往非常频繁,并和俄军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关系。他要定期到日军指挥机关递送情报。奉天战役期间,他与中国合伙人发生财产纠纷,因为担心对方告发自己,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某天夜里,他插好了门,可是半夜时分,外面有动静,过了一会,俄国士兵闯了进来,开始敲打卧室的门,他急忙抓起两把手枪,推开后窗,当门被撞开的时刻,两支枪同时射击,几名士兵应声倒地,然后他跳窗逃走,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路顺风,直到新民屯。”

第二十章 无辜者的苦难

经过数次战争的浩劫,故乡变成鬼域;
经过数次大火的燃烧,万物终成灰烬;
当军队再从此地路过,
只有饥饿的野狗前来寻找旧日的主人。

——拉迪亚德·基普林

整个战争期间,交战地区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是深重的。刚刚入夏,许多家境殷实的人们就带着自己的财产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慢慢地,大批贫穷的乡下人也拖家带口涌入城市,或租房居住,或和亲朋挤在一起。在奉天以南以西一望无际的肥沃平原上,无数村庄中的大多数农民仍然困守在自己的家园,企盼着战争不会蔓延到那里,从而躲过这场劫难。

当9月份俄国人从辽阳败退下来的时候,这里的许多村庄被俄国部队占据了,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成群结队的难民如潮水般涌入奉天。在南郊的主要大街上,有时会出现连续不断的难民队伍,而城市居民则挤在门前和胡同口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们。骡、驴、马、牛,所有能用的牲畜都用上了,拉着农用大车,上面载着粮食、烧柴,或家里的铺盖和衣服,而妇女和孩子就蜷缩在上面。还有很多步行逃难的人,多数情况是男人挑着东西,妇女抱着孩子,拖着疲倦的双腿,慢慢地走着。

这么多人到哪去住? 很多人暂时呆在寺庙里;更多的人则睡在

大街两旁的屋檐下。奉天城内房租疯涨,高得吓人,无奈,盛京将军只好发布公告,明确规定每间房屋的限价,凡无视规定,漫天要价者均以违法论处。很多基督徒前来寻求教会的帮助,在数星期之内,先后有几百人住进教会的大院里,或在其他的建筑里安身。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因为了解盛京医院的慈善性质,就在大门附近住下。不久,我们开设了第一座难民营,接纳基督徒,也接纳非基督徒,对两者一视同仁,不加任何区别。



从战争焚毁的农村逃亡的难民:
“这么多人到哪去住?”

随着冬天的到来和战争的继续,人们的处境肯定更加艰难,很显然,有计划有步骤的援助是非常必要的。与十年前的中日战争相比,这次战争的规模要大得多。义和团运动后,为征服东北,俄军向南挺进,但却被限制在铁路两侧有限的区域之内。但在这次战争中,俄军占领了从遥远的东部山区直到辽河东岸的宽阔地带,随着战场向北推移,参战的部队越来越多。

在我们举足无措的时候,上海红十字会和难民救济会向我们伸出手来,承诺提供资金和医疗药品,稍后,天津和其他地区也对我们提供了一些支持。在牛庄做书记官的尊敬的詹姆斯·韦伯斯特牧师,为我们向外界求援,并把外界支援我们的钱和物资转运奉天,实

际上,他充当了我们与外部世界相互沟通和联系的重要桥梁。由我和尊敬的詹姆斯·W·英格利斯牧师^①管理资金和指挥奉天的救济工作。同时,盛京将军增祺,像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一样,由政府出资对难民进行救济,急于与我们合作。关于难民救济问题,我们商谈了数次。整个冬天我们的合作相当默契,增祺经常派代表到委员会与我们会晤和协商。一个接一个难民营建立起来,有的是短期的,有的则是长期的。有时,一个家庭在难民营住了几天之后,又在亲戚朋友那里找到了房子,然后就离开了。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男人把妇女和孩子安顿在某个难民营,自己却还要回到家里,看看在废墟中能找到些什么。因此,在难民营中,男性一般很少。

因为俄国人征用了所有的大车,不久,我们就面临着粮食供给的困难,实际上,城市正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在这危急时刻,中国政府介入此事,与俄国人达成协议,特许北方运载粮食和燃料的大车进入奉天,灾难避免了。但是,与往常相比,粮食价格上涨了数倍,高粱则达到正常价格的六倍。与此相应,所有的粮食价格都很昂贵,而我们家里使用的煤则每吨高达5英镑。

当十月份沙河战斗打响的时候,俄国人对村民的友好态度发生了转变。看起来他们已很生气,指责中国人背叛他们为日本人做事。俄国人逐村清理,为了活命,村民们什么都不顾,赶紧逃走了。沙河战斗结束后,俄国人对这里的村庄进行了全面的破坏。民房改为营房,拆下柱子和檩条去修筑地下掩体。结果,原来这里数以百计的富庶村庄,此时除了残垣断壁和孤独挺立的烟囱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逃到奉天的村民可以说是绝对的赤贫,他们已经失去了世间的所有财产,因此,难民营的人数急速增加,有时,我们一天接纳的难民就高达一千人。

1905年的前3个月,我们收留的难民超过1万人,清朝政府收留的难民超过3万8千人。据估计,从战争开始到结束,除逃

^①尊敬的詹姆斯·W·英格利斯牧师(The Rev.James W.Inglish):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医生的妻子伊泽·英格利斯的哥哥,当时也在沈阳传教,住在沈阳城西基督教堂。译者注。



1905 年的红十字会工作：救助无辜的受难者

到新民屯和其他地方的数千难民之外，进入奉天的难民总数约九万人。

这么多人的居住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在冬季，没有藏身之处，暴露在野外，会造成很多人死亡。解决居住最权宜的办法是利用现有的房屋。因此，我们征用一二个较大的院子做难民营，而院子的主人已经跑了，如果将来他要钱，我们再支付租金。我们原来的医院，虽然烧毁了，但在院子里仍然安排了大约 700 人。在霜冻之前，难民们自己修建住处。他们在地面向下深挖约两英尺，没有灰泥，用土和从废墟中捡来的旧砖砌墙。再用几根木柱子，支撑起高粱秆和泥土铺就的房顶，然后在上面抹一层薄薄的石灰。在室内，用废砖砌了个炕，然后铺上席子，这样就可以在上面休息了。

奉天一座最大和最著名的寺庙向难民们敞开了大门。在院子里所盖的半地下房子与我们上面描写的差不多；外边的房子和塔楼里面住了一些人；长长的走廊称作“佛道”，经由那条道，无形的佛会变换自己的影像，此时，这里也住满了人。庙里安装了两个炉子，这

和庙宇中的气氛很不相宜,但室内的温度也仅能高于零度一点。庙里的大殿没有住人,和尚仍旧上香,善男信女继续前来。僧侣们对每晚在此举行的基督教仪式没有什么反感,而事实上,这也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一点乐趣。浙江会馆也借给了我们,另外,我们还征用了两座剧院,一家银行,还有几座其他的建筑。

在所有这些原始和经过改造的房屋里,尽管我们认为条件和环境很艰苦,但难民们对此却非常满足。他们自己起火,忙自己的事情;他们和邻居们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们有食物可以填饱肚子,有住处可以遮风避雨,如果缺少棉衣和被褥,我们可以提供;妇女们在做针线活,在阳光下,孩子们在院子里打闹;每到晚上,基督教的仪式,活泼的圣歌,打破了单调的生活;他们可以参加宗教仪式,也可以不参加,完全出于自愿。很显然,管理这么多难民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的工作。

不言而喻,此时奉天的卫生状况非常糟糕,传染病频发。在我们的难民营里,有很多孩子患麻疹、痘病和猩红热;而且天花也开始流行,夺去了很多小孩的生命。除了斑疹伤寒症之外,我们安排了一个特殊的院子给这些病人居住,但隔离是不可能的。幸运的是,虽然这里的环境易于流行伤寒性传染病,但并没有发现这种病例。

总的来说,整个战争期间,医院的工作是相当繁重的。夏天,在我离开期间,我的助手们在女医院继续坚持工作。秋天,我们建立了四座不同的医院。战争开始前夏季重建的女医院,此时,由于男患者太多,仍然占用女医院扩建的部分,而不论男女,凡门诊患者都在这里诊治。把住院的女患者安排到门对着盛京医院废墟的一座旧庙里,也就是所谓的“三义庙”,即三位正直的人的庙。守庙的道士是个鸦片鬼,他愿意把房子租给我们赚点钱。偶像用席子遮上了,而患者就躺在这些偶像的脚下。还有两个临时的发热医院。幸运的是,此时,我已经有一位医疗工作的伙伴,即 W. A. 杨医生,女士们到十二月份也将回来。

我们不仅要诊治按照常规每天前来医院就诊的患者,为我们难民营和政府难民营的众多病人看病,而且还要为来自附近战场的数

百名受伤的农民疗伤,其中大多数是男人。许多可怜的家伙,其中有些是妇女,因留恋家园,迟迟不肯离开,结果在俄军防线或在双方对待地带受伤。沙河之战后,听说距离奉天 10 英里处的一个村庄里有 100 名受伤的中国人,我们马上派出红十字小组,穿越俄军防线前往救援,但是没有成功。正在此时,一位俄国男爵前来拜访,了解我们的困难后,深表同情。

“如果您能找到一名中国的马车夫,”他说,“他愿意去,我将带他穿过防线,再给他弄个通行证,把所有的伤员接出来。”

中国车夫特别不愿意受雇于俄国人,因为不知道将会冒多大的危险。我们知道这些情况,非常容易就找到一个人,而且他保证一定尽力。我们从医院派了个人把他送到我们的男爵朋友那里去,此时,男爵就要离开奉天。然后,我们耐心地等待着伤员们的到来。几天之后,那位车夫非常生气地回来了。男爵和他的朋友一直使用这辆大车运送自己的行李,既没有到村庄附近,也不允许他去寻找伤员。如此的无理欺骗,与大多数俄国人的性格实在相差太远。

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恐惧远远超过对战争本身的恐惧。战争初期,普通的俄国士兵和中国农民关系非常友好,但战场的杀戮改变了一切,俄国人的行为实在是太恐怖了。有的中国人因为听不懂俄语被杀;有的则因为不愿意放弃牲畜被杀。有个中国人被迫带领一伙哥萨克到某个村庄去,因为跑的太慢,俄国人就用刺刀把他挑死了。俄国人指控 18 名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是土匪,就把这些人用绳子拴在哥萨克的马后,直到奉天,整整拖了 40 英里。其中两人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当场死去。到达奉天后,剩下的 16 个人被宣告无罪,只是白白经受了这么多的折磨。当俄国人到来的时候,有家人躲在地窖里。一个俄国人说他们是间谍,所有的士兵开始向地窖内射击,结果,除了剩下一名妇女收尸外,全家人都死了。过了一段时间,另一支俄国部队经过这里,听了这名妇女的哭诉之后,出于怜悯,把她带到奉天,最终,来到我们医院。在俄国人中,怀有仁慈和怜悯之心的人很多,但也不能否认,极其凶残的人也不少。

在奉天大战期间,很多中国人被杀害。有时炮口会突然掉转,

铺天盖地的炸弹随之倾泻下来，一村人根本无处藏身。当他们从燃烧的房屋里逃出来的时候，死亡和受伤的绝不止一两个人。我们圣经会有位妇女，虽然处于炮火连天的战场，但一直留在家里，没有离开。俄国人占领了那个村子，在她家的墙上挖枪眼，接着他们被赶走了，日本人占领了那个村子，此时，她仍然和年岁大的丈夫蹲在家里祈祷，因为幸免于难而赞美上帝。日本人雇他的儿子做饭，但儿子提出，只有母亲留下来，他才能同意。当俄国人的火力特别猛烈的时候，子弹从窗户打进来，日本人告诉她躲到两个窗户之间的北墙后面去。

俄国人从奉天撤退以后，“战火”烧到我们门前，大批伤员涌入医院。在战役最后一天的清晨，伤员陆续到了，不久，我们忘记了周围仍然在响的枪声。当听到许多中国人和一些俄国人受伤后倒在城墙外面，我们派出一些红十字会的担架队员前往抢救。到上午9点钟，手术室开始忙碌，一个接一个的中国人和俄国人被抬了进来，整整一天，我们一直忙个不停。当留在奉天的一些俄国人逃不出去的时候，其中有两个人似乎疯了。就在北墙的东门外，有个中国的大兵营，后来政府把其改造为难民营，约2000人住在这里。疯狂的俄国人闯了进去，遇到谁就向谁开枪。一位妇女正在照顾几个星期前出生的婴儿，一个俄国人闯入她的房间，开枪了。子弹打中母亲和婴儿，婴儿死了，母亲受了重伤，接着12岁女儿也受了伤。在那个房间里，有2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

我们的援助对象不仅限于中国人和俄国人。就在这一天，一名日本兵踉踉跄跄走进门来，显然，已经筋疲力尽，患病在身。我们把他请到屋里，喝杯茶提提神，然后送到医院里住下。由于我们医院的红十字性质，人们欢迎他的到来。接着，另一位日本人，看到医院上空飘扬的红十字旗帜，前来告诉我们，在城墙外还有一些伤员。医院派出一些人去帮助他们，载回满满两大车日本伤员。因为他们很不愿意和受伤的俄国人住在一起，我们就用最快的速度为他们准备了一个房间。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我们接纳了大批的日本人和俄国人，并且尽其所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和治疗条件。起初，

俄国人害怕日本人杀了他们,庆幸能和我们在一起。但是,当他们以战俘的身份离开的时候,不害怕了。当日本医院正常运转之后,日本伤员也离开了我们。对我们所提供的不偏不倚的红十字帮助,俄国和日本政府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奉天城外,在俄国人撤退的道路两旁,棉帽和毡靴,还有因匆忙以及天气太热而扔下的东西,到处都是。奉天城周围的兵营,如距离我们比较近的骑兵兵营,也留下很多对中国人来说有用的东西。战斗刚刚结束,中国人就冒着被日本人当作劫匪射杀的危险,悄悄溜出去拣那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而同时日本人也开始收集俄国人所留下的马车、手推车、枪支和许多其他的物资。

在中国人所拣到物品中,不幸的是,有很多还没有爆炸的炮弹和手榴弹,结果导致许多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有人在北陵附近发现一个仍然残存部分引信的巨大炮弹,认为是盏灯,就把它带回家,放在桌子上让全家来看,然后点着了引信,结果,除一名受伤的男人外,全家无一幸免于难。还有一个人,拣到一颗炮弹,回家后把其放在火上熔化,结果整个房子被炸毁,里面的人非死即伤。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许多孩子和成年人因为玩弄这些危险的爆炸物而受到严重的伤害。炸坏眼睛,失去手脚,很多人当场死去。当春耕开始的时候,犁和锄头偶尔也会碰到炸弹,引起爆炸,带来不少灾难性的后果。甚至两年之后,这类事件仍时有发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除了治疗其他的伤害之外,仅因为爆炸引起的截肢手术,盛京医院就做了一百多例,有的是整个上肢,有的是部分上肢,还有许多人失去了下肢。

战后,奉天周围地区的环境非常恶劣。日本人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危险性,并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加以补救。无家可归的狗以死人为食,已经变成凶猛的野兽。一条狗竟然闯进建立在我们医院废墟上的难民营,从炕上叼走一个孩子,人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赶跑,但孩子已受了重伤。

战役刚刚结束,难民营中的男人们就迫不及待地溜回自己的家中。但是,由于日本大批部队驻扎在奉天城北,难民营中的妇女和

儿童仍然不断增多,因此,一段时间内,难民营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继续增加。因为耕种的时间通常在四月,所有的难民都不想错过这个最佳的时节。但是,在这些贫苦的人们面前,存在着很多的现实困难。至少有一半的家庭遭到了破坏,其他家庭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抢劫。门窗和家具被当作燃料烧毁了。牲畜和农具也没有了,甚至连种地的种子都没有。我们和中国政府商量,代表他们和日本当局接触,最后商定在那些损害严重的地区,允许人们使用冬天时俄国人和日本人住过的防空洞。最后,盛京将军给每户户主一小笔钱,用来购买种子。

人们慢慢回到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以争取一个好的收成。结果,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在冬天到来之前,大多数家庭建起了能够遮风避雨的房子。但是,夏季到来之前,日俄双方部队一直在奉天以北很远的地方对峙,结果,仍然有大片的土地不能及时耕种。即使在和平条约签署之后,日本撤军的速度也很缓慢,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满洲人还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另外,由于战争,满洲大地上的景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树木消失了。从前,每隔数百码就会看到的白杨、松柏和柳树丛,现在都不见了,举目四望,都是光秃秃的大地。

在日军占领期间,我们与日本官员的关系非常融洽。他们特别感激我们收留了他们的伤员,这成为友好交往起点。日军总司令大山岩元帅^①亲自前来拜访。他温和而迷人的魅力,简朴而自然的高贵,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我与大山岩元帅的谈话只能通过翻译。日军在奉天驻军司令是奥保鞞将军^②,在战争中他的部队损失惨重,我与他谈话,也要经过翻译。但是,福岛将军和其他人都懂英语,他们经常来访,是我们家里的常客。总之,我们和日本驻军司令部人

①大山岩元帅(Marshal Oyama):近代日本陆军的奠基人。1891年晋升为上将,中日甲午战争中任集团军司令。1898年被授予元帅称号。日俄战争期间,任满洲日军总司令。译者注。

②奥保鞞将军(general Oku):日俄战争期间日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最先进入沈阳的日军就是他的部队。译者注。

员之间的交往,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另外,在日本和俄国军队中的各国武官和战地记者中,我们也结识了许多朋友。最后,日本的军事占领结束了,军队撤到铁路两旁。从亚瑟港到宽城子的铁路此时已经归属日本,只有一些地位较低的官员留在奉天和其他地方。在经历了战争的恐怖和残酷之后,再次过上和平生活的中国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幻灭和极度失望。他们高度赞扬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人的公正和仁慈,甚至忽视了日本军人的放肆。因为经常的战争折磨,满洲农民真心地把他们当作兄弟和值得信赖的人加以欢迎,如今,日本人有与他们建立永久友谊的天赐良机。因此,像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此时容易铺设永久占有满洲的道路。但是,无论他们的领袖和高级官员们确立什么样的目标,那些来到满洲的普通士兵和民众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一个偌大的国家被打败了,日本是崇高的,无与伦比的,中国算什么。他们不是作为可信赖者,而是作为胜利者,把中国人当作被征服者加以蔑视。

随着和平时期到来,日本民族中最下层和最令人讨厌的那部分人来到满洲。像从前一样,中国人继续遭受着折磨,失望使他们的愤恨更为强烈。中国人能够宽恕战争中的士兵,因为己方的士兵也同样残忍。但是,现在战争结束了,他们没有理由再忍受日本人对于战争幸存者的不公和勒索。正像有人所说的:

“俄国人有时拿我们的东西不给钱,但很多时候要给4倍的钱;日本人表示给钱,但从来没有超过价格的四分之一。”

结果,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对日本人厌恶,对日本动机的怀疑,不愿与日本人交往的情绪不断增长,而且这种东西很难根除。

第二十一章 1905—1907 年的重建

你的,我的,每个人的,共同存在的问题。
倘若能够想象,
为什么不去想象生活中哪些应该是美好的东西?
但是,首先要知道什么事物可以成为美好,
然后再找到使其成为美好方法,
这可是两个迥然不同的问题!

《布洛阿格拉姆主教的道歉》——罗伯特·布朗宁

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满洲进入了新的时代。此时,老太后已经把国家事务轻易地交给那些保守的官员们处理,而这些人大部分愚昧落后,不了解国外事物,把儒家经典看作教育中惟一有价值的东西,对全国绝大多数青年心目中的渴望和需求茫然无知。但是,这些官员中的许多人是仁慈的,无私的,尽责的,根据他们自己的能力和知识尽力去造福一方,应该说,把权力授予他们还是合理的。

义和团运动和日俄战争时期的盛京将军增祺就是这样一位官员。他既没有坚强的性格,也没有洞察事物发展的能力。一方面不能决然镇压义和团的发展,另一方面夏天的悲剧又刺痛了他的心。当所有这一切都过去的时候,他非常愿意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事

后,他亲自会见外国人,其中主要是俄国人和传教士。他对俄国人抱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矜持和超然的态度,而对传教士则持一种谦卑和礼貌的态度,但稍微有些敬而远之的意味。他的善良品格在救济难民期间表现得最为突出。在他看来,难民就是自己的儿女,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帮助难民,他不惜倾其财力。

日俄战争好像慢慢地唤起了中央政府对于满洲重要性的认识。朝廷第一次任命了一位有杰出能力的盛京将军。他不像从前的将军那样

是位满人,而只是一个汉军旗人,叫赵尔巽^①。他是一位难得的干才和优秀的理财家;年纪有些大了,又没有留过洋,不懂外语,接受的完全是儒家教育,更不同情革命党推翻朝廷的活动。尽管如此,他确是一个现代派,不是顽固派。他知道中国需要什么,治理满洲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因此,尽其全力投身于最为紧迫的各项改革。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他采取一种平静的,渐进的方式,没有干扰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在其不到两年的任职期间,满洲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赵尔巽总督:一个干才、著名的理财家——面向未来的人

^①赵尔巽(Chao Er Sun):汉军正蓝旗人。清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1904年任户部尚书,次年出任盛京将军,1908年3月调任四川总督,10月兼任成都将军。1911年调任东三省总督。武昌起义后,任奉天保安会会长,阻止革命。民国建立,任奉天都督,不久辞职,以遗老身分居北京。设清史馆后,主编《清史稿》。1927年病逝。译者注。

赵尔巽的人生格言可以用“进步、效率、节约”来概括。他免去了那些只食俸禄而无所事事人的职务,把一些有事业心的人聚集到自己周围,委以重任。他把自己的开支降到最低点,生活朴素,轻装简从,从不矫饰张扬。起初,任何人要进府拜见,首先要向府里的六名随员交纳一笔不小的费用,赵尔巽上任以后,废除陋习,取消门禁,广开言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极力抑制贿赂,鼓励正直和尽职。为了查明事实真相,他经常微服私访,用这种方法,来检查司法和其他公共机构官员尽职与否。他的所作所为有利于提高社会的道德风气,影响相当深远。当然,这样做也会树敌过多,况且他的高尚品质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可也需要一段时间。

他著名改革措施之一是禁止吸食鸦片。满洲的鸦片毒害虽然没有某些地区那么严重,但吸食的人仍然很多,主要是家道殷实的人和衙门里的官僚。这个恶习已经使很多人沦为社会的渣滓。虽然吸食鸦片很时尚,但是,商人们绝对不会雇用吸食鸦片的人,而且所有人毫无例外地把其当作一种恶习。种植罂粟是非法的,但却有利可图。1900年以后,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一些负责查禁鸦片的官员也从中获益。一年又一年,罂粟一直不知羞耻地摇曳着它们美丽诱人的花朵。起初,我们看到的罂粟是在接近城市的交通闭塞的偏僻山谷里。后来,人们的胆量越来越大,逐渐向外扩展,到赵尔巽上任那年夏天,在我们门前几百码外,就能看到它们妖艳迷人的色彩。到鸦片收获季节,很多孩子在地里转悠,去拣剩下的烟桃,吸吮里面残存的汁液。

依照此时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朝廷法令,盛京将军赵尔巽发布新的命令:禁止种植鸦片;曾经在满洲兴盛一时的大烟馆在6个月之内关闭;超过60岁的吸食者到政府领取许可证;其他吸食者或者在限定的时间内戒除,或接受政府的惩罚。

这些法令均得以实施。城内的鸦片馆一个接一个的关门了。人们可以看到一帮帮的男人在士兵的监督下整修城市道路,他们就是那些违反法令吸食鸦片的人。对这些人的惩罚没有采用把其关在监狱里的做法,而是让他们在户外劳动改造。等到夏季到来的时

候,已经看不到罂粟,也听不到罂粟种植了。由于采取了如此强有力的措施,满洲成为停止印度鸦片进口的第一批省份。

一两年以后,我们在附近再次看到了罂粟。城外的一个农民,胆大妄为,认为赵尔巽已经离任,种植鸦片保险能赚钱。数星期过去了,他忧郁地看着罂粟慢慢长高,开放出无数美丽动人的花朵。但是,当罂粟就要收获的时候,来了一群粗鲁的士兵,砍倒了罂粟,践踏了花朵,而那位农民只能痛苦地攥着双手,一点办法都没有。

鸦片消失了,但不幸的是,非法的吗啡买卖又出现了,而且大多数吗啡来自日本。吗啡片剂和皮下注射器公开销售,小贩们奔走于满洲各地,每注射一次只要二分钱。有的病人来到我们医院,在他们身上,经常可以看到由于使用不卫生注射针头所引起感染而形成的大片瘢痕。现在,中国政府对这种新的危险已经有所警觉,可以预料,为了禁绝这种邪恶的贸易,国际社会不久将采取行动。

赵尔巽还特别关注教育。在此之前,满洲没有一所公立学校。教育由私人来办,掌握在那些保守的私塾先生手中。每位先生教十几个,或二十几个孩子,教室或安排在先生的家中,或租来的房子里,或学生的家里。富裕的家庭,要请先生到家里给男孩授课,有时女孩也跟着学习。课程主要有阅读、书法和背诵古老的经典,而对那些有一定基础的学生,要为其解释经典,并开始按照取自儒学经典的题目撰写八股文章。老太后颁布诏令,进行教育改革,其实质内容就是前些年皇帝在改革过程中曾经推行过的措施。根据新的诏令,现代的科目将取代传统的科举。最后,要建立公立学校。

就教育改革而言,条件已经成熟,或者说已经非常成熟。各地开办现代教育的热情很高,急需开设各类科学和英语课程。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满洲的教育并不怎么发达。大量的移民都是文盲,农村识字人口比例很小。在城镇,受过教育的人相对多一些。基督教会一直重视孩子们的识字问题,但许多乡村学校的教师仍然由老先生们担任。在很多有传教士居住的中心地区,设立了比较先进的中学,讲授一些现代课程。女子学校开设的较早,已经逐步完善,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满洲惟一一所学院类型的教育机构是基督教

艺术学院,但是,这所学院以及其他学校的发展,都受到日俄战争的严重干扰。与其他省份相比较,满洲与各国的交往更为频繁,对现代知识的需要最为迫切。要不是先后发生在境内的三次战争,满洲会按照新颁布的诏令,马上着手自己的教育改革。此时,精力充沛的新任盛京将军立刻开始行动。

几所较大的男子学校和一所女子学校建立起来,设置的课程全是现代的,书本和文具由政府免费提供。只有几名经过培训的教师,教学内容也很肤浅。一位老先生会买来算术、地理、中国历史、科学入门等课本,努力学习两个月,然后就可以当教师了。许多讲授的内容没有什么价值,但在现有条件下只能尽力而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得到不断改善。

因为国家法令规定女子学校的教师必须由妇女担任,一时到哪里去找那么多女教师呢?这个特殊的困难呈现在人们面前。满洲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是初级女子师范学校,并承诺所有经过两年免费培训的人,均可拿到一份较高的工资。入学考试正常进行,内容相当简单。在金钱的诱惑下,许多基督教女孩和年轻妇女参加考试,而且轻易地获得了较好的成绩。正因为这样,奉天基督教女子学校失去了大部分好学生,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基督教会确实为满洲的现代教育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尽管还要收些费用,餐费和书本费自理,但申请入学的人数远比实际能够招收的人数为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加到一起达到 160 人。今天,许多公立学校的女教师都是基督徒。

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人们的某些观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到目前为止,一直有人认为,品行端正的年轻妇女或超过十岁的女孩,没有长者的陪伴在大街上抛头露面是不合适的。此时,她们必须每天去上学。因此,所有的女生都戴上了校徽,用这种显著的标志保护自己免遭非议。从那时开始,人们的观念逐渐变化,校徽当初的功能已经不存在了。

赵尔巽来到奉天不久,一份中国日报创刊,后来,又有一份报纸创刊,不久,它们都有了很大的发行量。

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引进,人们的精神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物质方面的改革也被提上了日程。在这些改革中,最为明显的是奉天城市面貌的改变。奉天的街道,雨季泥泞不堪,旱季尘土飞扬。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俄国人强迫在主干道旁居住的所有商家和居民去平整和维修自己门前的道路。而且,此时铺设了简易的碎石路,压路机和洒水车投入使用。随着道路的改变,交通工具也发生了变化。在大街上出现了数百辆黄包车,俄式无盖四轮马车已经非常普通,官员们出行则乘坐国外封闭的四轮马车。

由于与俄国人有了多年的接触,奉天人已不再过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从前黑暗和寂静的街道,现在被许多手提灯笼的人打破了。显然这么一点光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所有的政府机关和公共建筑门前都安装了路灯,如今政府已经颁布命令,要求每户居民都要在门前安装路灯。几年后,政府在所有的主要街道上安装了电灯。

此时人们开始感到奉天需要警察了。战争带来了很大变化,有好的也有坏的。传统而简单的生活方式正在成为过去,因此,政府组织了一支半军事化的强大的警察队伍,小小的蓝色岗亭出现在街角,这些维持社会治安的卫士们日夜监视着城市,不久,这些岗亭甚至出现在城市要道上,去指挥城市交通。卫生委员会也组建起来,虽然不太完善,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且在奉天历史上第一次颁布了有关城市卫生方面的法律。

社会对医疗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赵尔巽将军就开设一座公立医院和诊所一事征求我的意见。地点选在奉天城北部的一座院子里,由天津公立医学校两名中国毕业生负责。他们与我们的关系非常友好,两座医院之间一直保持着真诚的交往。

很自然,所有这些变革都要花钱,实际上这也是对赵尔巽财政能力的考验。他推行自己改革计划所使用的经济手段主要是紧缩开支和重新组织,而不是增加税收。因此,当他被调到别的省工作的时候,满洲财政收支基本保持平衡。

我与赵尔巽阁下的私人交往一直非常愉快。他到任不久,我前

去拜访,使我吃惊的是,他对我们所有的事情都非常了解,而且相当熟悉我们在最近救济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带着浓厚的兴趣询问了我们医院的事,从那时开始,我们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经常来看我,有时还相当随便。

那时,我们的医院还在一个摇摇欲坠的破三义庙里,地点在小河沿,是一个临时设施,很不方便。病房更是少得可怜。门诊和药房共用一个房间,药剂师几乎没有地方配药,许多患者只能在露天等候。那些破旧的雕像虽然有部分用东西遮上了,但患者住在他们中间,感到很不舒服。夏季,一些患者只能住院子里搭建的帐篷。这些建筑陈旧漏风,很不卫生,加之地面潮湿,土炕不断冒烟,条件是相当恶劣的。但就是在这样的医院里,我们诊治了比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还要多得多的患者。

日俄战争打断了我们的重建计划,但是,到 1906 年春天,我们终于可以继续工作了。皇家陆军医疗队的麦克费森上校是随奥保鞏将军部队一起行动的英国武官,是医院建筑方面的专家,在规划方面一直指导我们。我们现在倒是有点感谢义和团了,他们竟然把原来的建筑扫除得这样干净,使我们没有一点负担。我们最大的困难是缺钱。材料已经上涨到原来价格的数倍,工钱也同时上涨,结果,清朝政府付给的赔款还不到建设新医院所需款项的一半。尽管如此,我们决定仍然坚持原来的计划,用有限的财力建造更多的病房。大山岩元帅出于对我们救助日本伤员的感谢,曾下令从牛庄港运来的建筑木材免收火车运费。因为,这个时期,当地没有合适的木材,所需的松木必须从美国购买,而从牛庄港到内地的运费要花数百英镑,实际上,如果日本铁路承担木材的运输,这对我们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

在开工前的数星期,我拜访了赵尔巽将军,他详细地询问新医院的建设情况,以及我们建设资金的缺额有多少。

“留给我来解决吧!”他说,“一切都会好的。”

三个星期后,他前来拜访,并交给我 4000 两白银,约合 600 英镑。我们用这些钱建设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病房。其他朋友也纷

纷伸出援助之手。一个朋友承担起全部砖瓦的运输任务,光马车费用就等于捐助了 80 英镑。清朝铁路公司总办下令医院建筑所需的“波特兰水泥”^①可以由唐山免费运到新民屯。此外,我们还收到许多小额的捐助。

1907 年春天,医院准备投入使用。整个医院包括一座两层的门诊大楼,楼上有助手和药剂师专用的房间;一个明亮的、通风条件好的、现代化的手术室;能够同时容纳 60 位患者的三个病房;另外还有门房。要完成原定的计划,还必须建设两个更大侧楼,和一些其他的建筑,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

我们的将军同意在 3 月 5 日举行开业典礼,三天里,小河沿一直充满着浓厚的节日气氛。举行典礼的前一天,一辆接一辆的马车送来了各种各样的礼品。其中有鲜亮的丝绸画卷;横幅;上面绣着龙的漂亮锦旗;崭新的红十字旗帜;各种式样的灯笼;还有钟表等等。许多礼物是基督徒赠送的。在那个重要的日子里,人们手拿旗子和彩带,非常高兴。为了表示尊崇,清朝的黄龙旗挂在旗杆的顶部,下面是红十字旗。包括将军在内,各国驻奉天的领事以及奉天的主要官员都到场了,约有 120 多人。来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位大喇嘛,他们是满洲喇嘛教的首领。在宽敞的候诊大厅里放了许多桌子,参观结束后,大家用些点心,接着就是演讲。我们有意回避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灾难,但将军自己却顺便对我们遭受的不幸和损失表示歉意,关于这一点,他说:“今天,中国感到羞愧。”在仪式举行之前,他已经额外赠送我们 1000 美元(100 英镑)作为建设资金。此时,他呼吁奉天的富人们行动起来,补足医院建设的资金缺额。

“这是我的愿望,”他说,“希望这个慈善机构能在年底前建成。”他的愿望实现了。

第二天,在医院举行了一个有数百名基督徒参加的隆重捐赠仪

^①波特兰水泥(Portland):波特兰水泥也称硅酸盐水泥,1824年由英国利兹城的泥水匠阿斯普丁发明,因该水泥硬化后的颜色类似英国波特兰地区建筑用石料的颜色,所以被称之为“波特兰水泥”。1889年,唐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启新水泥公司”,所以盛京医院所买水泥应该是唐山所产。译者注。

式。吃了点心之后,他们参观了医院的设施。第三天,招待商人。以奉天商会会长为首,共来了大约 150 名著名的商人。就餐期间,他们纷纷表态,医院建设中无论缺什么他们都将努力解决。在三天的庆祝时间里,每天晚上都要施放焰火,这些都是商人们提供的,地点就安排在医院前面的小河沿。届时,小河两岸挤满了前来观看的人们,他们有男人、女人和孩子,人数达到四五万人。许多人想起了 7 年前,无数人聚集在小河沿边,观看医院在熊熊大火中燃烧。这时的人们与 7 年前大不相同,他们爱好和平,本性善良,甚至连一个维持秩序的警察都不需要。

第二天,商会会长前来拜访,对我说:“商人们授权于我,你可以继续建设你的医院,需要钱就来找我。”在夏季里,商会完全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他们满足了我们的所有要求。到 11 月,全部建筑工程竣工,共有 110 张病床。

那座医院临时占用的破三义庙,在我们离开之前就已经由政府购买,但是允许我们免费使用到新医院建成。在我们医院开业仪式举行几天后,为了扒倒寺庙,满足政府工业学校建设的需要,雇用的工人们到了。但是,他们马上遇到了难题,即怎么处理这些偶像。他们请奉天所有的佛教寺院接受这些无家可归的神像,但人们认为只有一尊还值得搬运。其余的,在人们的哄笑和嘲弄声中,被抬到庙前狭窄的台阶上,任凭风吹日晒。但即使放在那里,也妨碍着工人们干活,一天,一个工人抓住一只破损的巨大胳膊,扔到了面临河水的台阶边缘。

立刻响起了笑声,人们很快聚集到一起,开玩笑似的把那些破旧的神像一个个砸得粉碎,并把那些碎片扔到了河里。

盛京医院的走廊:两边都是病房



第二十二章 精神境界的升华

在我们愿意的时候,不能点燃心中之火,
精神吹拂,表面仍然寂静,
灵魂在神秘中等待,
渴望领悟的使命终能穿越困扰我们的阴暗王国。

——R · W · 爱默生^①

像满洲教会这样遭受一系列灾难性战争和残酷迫害的基督教团体,事过境迁之后,理所当然希望安定下来,进行平静的发展和休息,事实上,在一段时期内,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义和团的苦难已经过去,难民救助工作非常有助于消除公众心目中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界限。教堂和礼拜堂在满洲各地重新建立起来。奉天建起两座基督教堂,因为此时西方风格流行,所以这次没有采用中国的建筑风格。1907年在奉天东教堂举行圣会的时候,人们蜂拥而来。第二天,为了表达非基督徒公众对基督徒的良好祝愿,政府官员、商人和其他人纷纷前来参加活动。教徒人数再次增加,虽然缓慢但较为稳定。那些因以不同方式退出教会而一直延缓入会的人重新成为基督徒。基督教会在教育方面的工作,发展特别迅速,而且标准有明显的提高。

在平稳的繁盛背后,一种潜在的不满渐渐在基督徒心中滋生,

^①R·W·爱默生(R.W.Emerson):19世纪美国著名的散文家和作家。译者注。

尽管这种不满是有益的,但此前教会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中国人没有自我分析的习惯,普通基督徒的标准是最简单的。如果一个人信仰基督教就是一名基督徒,如果不信仰基督教,就不是一名基督徒。由此,可以自然而然地把世人划分为两类,但随着义和团运动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变节行为,使这种方法遭到人们普遍的质疑。有时,恰是那些品格最为优秀,心地最为纯洁,作风最为正派的人,在义和团活动猖獗时期,没有经受住考验,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而那些处世随意,根底浅薄的人,由于环境的压力,有时也出于单纯的血气之勇,却保守了自己的信仰。许多基督徒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所激励。他们思考许多以前不曾设想的问题,灵智的深度和高度前所未有地增长。

除了自身的原因之外,满洲基督徒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影响。这种变化可能由于为了扩大教会的影响而一度采取的积极宣传活动;然而或多或少要归因于某种环境的变化,即强调个人在教会生活中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传教士和新教徒们反应最为敏锐,认为是非常必要的。在每年的宗教例会上,特别是1907年的例会,为了把工作推向前进,与会者热情很高。传教士协会成立;选择没有受到基督教福音波及的满洲北部省份齐齐哈尔,或黑龙江作为开展工作的首选目标;出自神学讲堂的两个人被任命为牧师,在中国同胞的支持下,前去开辟新的局面。一个规模很小的教会正在那里逐渐壮大,他们从没有得到外国传教士的指导,也没有得到外国金钱的帮助。在基督教活动的老区,接连任命中国牧师去管理自立的教会;自主和独立精神鼓舞着人们。

与此同时,人们普遍意识到基督徒自身也需要改造。为坚定信仰,多数教会在中国旧历年初,时间比较空闲的时候,用一个星期时间,采取开特别会议的形式,对基督徒进行教育,而且出席情况良好。1908年,在奉天和辽阳这些按例组织的平静会议上,没想到一件小事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导致满洲复兴运动的展开。韦伯斯特先生已经详细地介绍过这个著名的运

动,①我再说太多是不合适的。客观讲,它是朝鲜复兴运动的继续。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那块被蹂躏的土地上,由唤醒的自治所引发的对福音布道热情的故事,在我们听来,一直有些怪怪的感觉。一位加拿大传教士,尊敬的乔纳森·戈福斯牧师在游历朝鲜之后,受邀前往奉天和辽阳,分别在当地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讲述了朝鲜见闻。这个主题很吸引人,希望能给教会带来更多的活力,但是,发生如此普遍的运动绝非人们能够预料的。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够震动满洲的基督徒,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人瞧不起朝鲜人,明显把他们当作劣等民族来看待。

“朝鲜人进步这样快,为什么我们落在后面?”就是这个问题刺痛了许多有良知的人。

接着,在这些会议上,各种各样的思想激流汇聚到基督徒的心中,但这并不足以解释那种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满洲教会奠定在坚实基础之上的强烈精神力量。惟一合理的解释是:“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意志的灵光。”因为仅仅追求教徒人数的增加,事业的繁盛和教育的发展,基督教会面临着变为世俗机构的严重危险。教会被一时的荣耀蒙住了双眼,盲目把世俗的召唤当作上帝的召唤,从而暴露了他的自满和堕落。

中国人的罪恶感常常是模糊的。在中文里没有与罪恶一词完全对应的词汇。同样一个词使用在下面的短语里就会是这样:“一个罪犯”;“我的错”;“他冒犯了我”。一个词有表面和暗示两种意思。关于罪恶,一名普通的基督徒像他的措词那样不严密。他逐渐认识到正直的个人品质的极端重要性。但是,整个运动中最著名的特点是对个人罪过的忏悔。

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一个比较大型的会议上,一个雄辩的演说使人们感动,一种同情的情绪使人们失去控制,最后,许多人因为自己的“罪过”而痛哭起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只是每个人的处境有所不同。某位一直受人尊敬的基督徒,此时却站在朋友和熟

①见尊敬的詹姆斯·韦伯斯特著《满洲的祝福时期》。

人们面前,坦率承认自己行骗,然后把钱还给人家;某位著名的基督教领导人此时把自己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曝光;某位因在义和团淫威面前经受住考验而名声大噪的基督徒,此时却痛苦地说出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曾经向偶像磕头;某位人所共知在政府的折磨下没有低头认罪的基督徒,此时却痛哭流涕,坦白了事情的真相。或许更令人信服的是在祈祷时对较小罪过的从容而痛苦的忏悔,比如说谎,不诚实,生气,怨恨等,而在此之前,这些一直没有引起基督徒们的注意。整个满洲,感恩献礼滚滚而来,塞满了教会的库房,虽然时间较为短暂,但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在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无意识的模仿和歇斯底里的激动,因为像中国人这样神经非常敏感的人,特别容易受到这类事情的影响。何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最近才从异教的无知和迷信中解脱出来。回顾已经过去的五年,正像我们所预料的,那些人们特别兴奋的地方,出现极端体验的地方(比如常出现类似全身痉挛的身体“显灵”),无论精神成就还是实用成就都很难持久。非常明显,从这次运动中受益最多的常常是那些加入教会多年的老教徒。

如果尽量不去考虑外在因素,运动中受到触动的基督徒人数也是很多的。通过诚恳的忏悔,他们从内心深处清除了隐藏的或被忽视的罪恶,出现了和上帝交流的新的可能性。如果说这场运动没有取得其他成效的话,经过几个月,罪恶的概念也深深地留在教徒的意识里,从而把正直的基督徒标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有数千人,他们领悟了不可忘记的理想,并认识到自己与这个理想的距离,几个,几十个,或数百个,我们说不清楚,对他们来说,在自己的基督徒生活中,神圣的幻想就意味着一场彻底的革命。我们的判断并不是由他们的话,而是看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实际行动。毕竟,幻想会消散,生活要继续。

在奉天,我有一个受过培训的助手,是刘牧师的儿子。从义和团运动爆发那年开始,一直到自己开业行医。他是一位优秀的基督徒,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对他来说,新的灵光具有很大的

启发力量,改变了他的全部生活。在更高的审判面前,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在其他人看来,这种忏悔是没有必要的。他首先进行了公开的忏悔,接着把已经积聚的财富奉献给上帝的事业。他总共有 7000 美元(约 600 英镑)投资在自己的药店里,拿出 700 美元捐给盛京医院、学校、圣经会、传教士协会,以及作为举行宗教仪式的资金。接着,开始考虑如何能更好地服务于上帝,因此,他决定除了继续维持药店营业外,每年拿出部分时间自愿做些医疗传教工作。从那时开始,他做过多次的布道旅行,走村串户,边治病边布道。经常有人问他:“你干这些事,外国人给你多少钱?”当发现其行医和旅行全用自己的钱,而且纯粹出于自愿的时候,人们深受感动。在奉天,他的存在和影响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奉天,这次运动在妇女中的效果特别突出,而且作用也较持久。在我们中间,女基督徒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当回首过去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看法有多么偏激,而复兴时期形成的推动力量又有多么巨大。早年,普通的中国妇女都是文盲和无知,甚至可以说是愚蠢,囿于传统习惯,根本没有学习的动力。在农村,让一位年轻的妇女去考虑识字和学习,实在是强人所难。即使在城市里,除了从前读过书的女孩能够使用圣经和赞美诗外,其他的女性都不识字。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奉天的教会里,虽然妇女的人数仍然很少,但她们和男人同样出色。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她们手中拿着自己的圣经和赞美诗,并且能够阅读,因为,除了老年人外,有一定的阅读能力是接受洗礼的必备条件。她们选举自己的执事,主持星期天的妇女捐助,接受和保存妇女捐助账目,安排妇女会议和管理所有有关妇女的事务。

最近,这些妇女的活力和热情充分迸发出来,使女基督徒的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她们建议,在每年一度的庙会上,在妇女活动最多的地方搭建一座帐篷,进行布道。在一位女牧师的指导之下,一些妇女组织起来,约有 12 位教徒轮流进行布道,从上午 6 点钟开始,到黄昏结束,连续坚持 6 天。在后来举行的两个庙会上,搞了同样的活动。庙会的组织者非常热心地支持她们的行动,一方

面,为她们提供空闲场所,另一方面不收帐篷的占地租金。在他们看来,这些妇女布道活动是一个“积德之事”,而且可能给庙会带来新的吸引力。一群群的妇女聚拢过来,因为宣教者同她们一样,年轻时代是在偶像崇拜和无知中度过的,所以这些朴素的基督徒语言特别容易理解。

在女基督徒中,类似这样独立活动的发展和责任感的增强,是非常缓慢的,文化水准的普遍提高仍然要走相当长路程。中国妇女,至少在满洲,恰当地说,从来没有被“践踏”。在她们年轻的时候,必须承担起侍候婆婆的重担;在她们的一生中,服从自己的丈夫天经地义。对很多人来说,这不仅仅是现实,而且也是合理的现实。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性格坚强的女性,如果她不是这样无知,在许多年里,都将不可避免地维持自己的个性,寻找自己的生活空间。在无数的家庭里,管理者和精神上的领导者都是一位中年或老年妇女。因为她处理家务特别公正,所有人自然俯首听命。当这样聪明和有能力的人在我们学校姑娘班接受教育之后,或在圣经妇女培训之家接受培训之后,在基督教的未来事业中,她们将会成为不可抵挡的力量。

女子学校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健康的基督教家庭生活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的毕业生是未来基督教家庭的母亲和家长,公立学校不能取代它们的地位。在基督教的氛围下,特别看到外国女人把自己全部投入到工作中去的情景,学生们的人格逐渐形成了。而在公立学校里,常常缺少明确的原则,而且纪律松弛,没有崇高的理想,男子公立学校也是如此。受过教育和培养的中国妇女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从那些女药剂师和学校的女教师身上,我们已经看到未来的希望。她们和圣经会的妇女们一样,特别热爱学习,高兴地探索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识,从而弥补年轻时期所耽误的时间。我们坚信:当新中国完全站起来的时候,她的妇女将处在最伟大最真实的社会进步的前列。

近些年,基督教男女青年的普通教育一直在不断进步。奉天已经建立了一座女子师范学校,看起来,不仅要向基督教女子学校提

供教师,而且也要向公立学校提供教师。基督教艺术学院(只招收男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当1910年城西新的教学大楼建成剪彩的时候,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其他官员热情地出席了仪式。这个学校最令人鼓舞的特点是,大多数毕业生决心献身于国家基督教事业的进步,而不是去追求个人的富有。

由于以上原因,神学讲堂似乎变化不大。迄今为止,我们的十六名牧师,已经做了多年的布道师;没有接受多少,或根本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在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神学培训。现在需要新型的牧师。不久这样的牧师将会出现,他们来自于我们学校和学院,在人民中间做了一段实际工作之后,然后回到学校,进行与从前神学学生学习内容完全不同的学术训练。这样,我们才有理由相信,有经过良好教育的人领导着中国教会的思想。

第二十三章 医疗传教的准则

耶稣说：去，你去照样做吧。

——《乐善好施者的比喻》^①

1907年，即第一个新教传教士到达中国后的一百周年，在上海召开了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②大会邀请我做医疗传教委员会的主席，并准备有关医疗传教问题的文件。在我所起草的文件中，阐述了医疗传教在基督教会工作中所应该占有的地位，并表达了我的坚定信念。最后，在大会决议中，草稿所拟定的基本准则获得一致通过。

从医疗传教开始，这个工作就受到上帝的特别眷顾。其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所起的先锋作用非常显著。各地的人们都会感受到，治愈病患一直是克服怀疑、厌恶、敌视、打破偏见、消除误解的最好办法。特别在伊斯兰教徒聚居区，事实上，除了医疗工作与那里的人们有所接触之外，其他方面没有任何进展。在所有的人民中间，在世界各个地区，医疗

^①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0章38段。原文：Go, and do thou likewise。译者注。

^②1807年9月，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达中国澳门，开始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1877年、1890年分别召开两届传教士大会，1907年恰逢新教在中国传教一百周年，召开第三届传教士大会，也称百年大会。主要讨论百年来在中国传教的得失，提出更适合中国社会的传教方针。译者注。

传教工作开辟了传播福音的道路。因为在我们传教士和中国人民生活之间存在着排外偏见的高大围墙,所以,与世界大多数地区相比,基督教进入中国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大约在70年前,传教机构开始认识到:要赢得如此骄傲和充满敌意人民的心,应该做一些比布道和文化更有必要的工作;西方的武力征服和文化渗透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反而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竖立起一道围墙,因此,最好用上帝心中仁慈与爱的行动去推倒它。帕克、洛克哈特、霍布森等位医生先后在主要的通商口岸把医疗传教工作开展起来,中国人蜂拥而至,接受治疗。从那时开始,人们一直认为,在新开辟的地区和充满敌意的地区,医疗传教是开展工作的最好办法。

这种先进方法的独特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作为传教工作的范例一直受到推崇,结果可能导致人们对这方面工作的过分关注。关于医疗传教工作的目的和理由,许多人都已经总结过了,即开辟新的地区,为布道提供听众。这种观点的逻辑在于:只有当用其他方法吸引布道听众有困难的时候,只有当那里的人民对传播福音抱着敌对情绪,或不以为然,漠不关心态度的时候,医疗传教工作才应该存在。一旦克服了这些困难,许多人乐于听讲,布道很受欢迎,医疗传教工作就应该结束,医疗传教士转而去开辟新的地区。如果仍然留在那里,人们常常认为他们的工作已经无关紧要了。

作为一种布道手段,医疗传教工作是富有成效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其建立和继续存在的理由。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医院门诊室一样,可以有规律地向聚集到这里的各种各样的人布道。而前来就诊的人们,以前从没有机会与福音接触。住进医院的人们,对基督教的真理,有了系统倾听和接受指导的难得机会。当人们因生活的折磨而深受触动的时候,当人们因受到特别的关爱而心存感激的时候,当人们从日常的劳作中得以空闲和休息的时候,福音就会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

医院和诊所的价值还在于他们充分地展示了基督教

的关爱和仁慈。他们是乐善好施寓言的实际范例。他们使异教徒确信基督徒做好事,发善心;他们也在不断地提醒当地的基督徒我们的责任是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在中国,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那里的整个法律制度和文化体系都在鼓励人们只顾自己,冷漠地对待别人的痛苦。中国人非常追求实际,他们很快就去理解和评价基督教有用的一面。中国人常常说:“救死扶伤,善莫大焉。”

医疗工作对基督教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样一个观点是否合适?或者,从圣经中上帝的显现与历史回顾中,把医疗工作放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弄清这个问题,对教会的工作至关重要。我们所采用的观点,本质上立足于世界基督化的整体蓝图之上,将影响我们所有的政策和方法。

让我们看一看一位医疗传教士的生活。很明显,在他任职的三年半时间里,诊治患者所用的时间与向患者布道所用的时间至少差不多。看起来他很有吸引力,在独自处理各种各样的病例期间,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医疗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敌意,事实上许多医疗传教士的奇迹恰是产生敌意的原因。也不是为了吸引听众,布道活动似乎就足以吸引听众,而且为了避开人们的议论,有些人尽量隐瞒自己的病情,不让周围的人知道。更不是为了证明救世主的存在,实际上基督始终都明确拒绝创造任何奇迹。虽然他的治疗工作自然会带来好的结果,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患者和旁观者的信任感。当然,更不是出于道德说教的目的。每个奇迹都包含着一个寓言的萌芽,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但那不是他们工作的原因。的确,那不是随随便便的行为,顺便说一句,作为事物的一个方面,医疗工作做了,还是没有做,对基督的生活都没有实质上的影响。如果不考虑医疗工作,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福音。那么,医疗工作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基督在其短短的世俗生命里用那样长时间,仅仅是为了缓解人类身体的痛苦?而且根据自然规律,这些生命不久必定死亡。

上帝的启示是通过基督传达给人类的。显然,有关人类身体在启示中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创世之初,上帝在安排人的时候,就曾考虑过他们的现世康乐问题。在历史发展的早期,上帝的承诺和命令主要是为了这个现实的世界,比如上帝给亚伯拉罕的那些承诺和命令,虽然上帝从未提过,但却暗示了灵魂和肉体存在的到来。在摩西法律中,对公共卫生和健康有许多详细的规定,同时也很具体地谈及个人身体健康的一些细节。在预言中,连同最高的精神过程,是现世祝福的承诺,世俗灾难的警告。肉体的救赎是弥赛亚王国未来的希望。因为,当罪恶进入世界的时候,整个世界都遭受到折磨,肉体上的,精神上的,道德上的,灵魂上的,上帝化身是完整的人,所以对身体的怜悯就像对精神的怜悯。因此,当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不仅仅关心精神的事情,人们的灵魂和拯救,而不顾他的肉体,任凭其遭受折磨,且尽可能早地死去。他关注人们的肉体。与其告诉他们上帝是什么,不如在他们面前展现神圣的生命,以实际行动让他们看到上帝心里想些什么。只要基督遇到罪过和痛苦的时候,他就开始用全力与之抗争,如此,才真正体现了上帝的意志。在基督对约翰所说的话中,他要求在布道的同时,或在布道之前,作为精神特性的表现,采取仁慈的行动。似乎他不能抑制自己内心的上帝之爱和同情,他们涌现出来,本能地付诸于救死扶伤的行动。

如今,基督教会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上帝与人沟通的渠道,这一点是人们所公认的。我们所知道的启示必须是完整的。我们必须把基督带给我们的一切带给人类;把上帝显示给我们的一切展示给人类。如果基督说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如果基督发现行动和语言同样重要,那么,为了向世人显现上帝的伟大,即使有人愿意听,我们并不过于指望只通过布道的方式使异教徒了解上帝。如果基督是上帝精神在人间的体现,那么,他就会致力于拯救人们的身体和人们灵魂,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关心完整的人,在解除其身体痛苦的同时,使其灵魂得到提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基督一样生活在这

个世界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提供给人们完整的福音。

从这个角度看,医疗传教不仅仅附属于布道工作,而且是教会传教工作中基本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能够想象基督让自己远离罪恶的同时,而不管身边人们的痛苦吗?没有医疗的传教工作是不合情理的,是片面的。我们确实不具备非凡的天赋,但取而代之,我们具备所有现代科学的资源,那就相当于上帝的天赋。随着时代的进步,医学的发现和发明提供了越来越多神奇的治疗方法和手段,这都是上帝的旨意。对我们来说,使用这些东西都是以上帝的名义,为了上帝的荣耀。他们显示上帝的力量和仁慈并不比往时出现的医疗奇迹的效果要差。

现代教会已经不可思议地渐渐承认了上帝召唤内容的丰富。在最早的基督徒中间,身体和精神的康复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去减轻周围人们的痛苦。在非凡的力量和慈爱的温暖双手与虔诚之心的帮助之间,似乎没有任何界限。在古老的中世纪,教会应该关心肉体 and 灵魂的原则,似乎被朦胧地理解了,本能地照此行事,而且对此问题,根本没有做任何理论探讨。统一教会的传教士们前往异教徒的土地,他们边治病边传播福音。

但是,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医学脱离了教会。当伟大的新教传教运动开始的时候,其完全在布道、学习圣经和翻译圣经这个轨道上运行。人们假定,上帝与人类的沟通只能以那种方式进行,甚至那个时代传教士中间最热心和杰出的人也这样认为。为了现身说法,他们站出来给那些奉献者和牺牲者做榜样,但是,在传教过程中,在争取更多异教徒的问题上,一个更完整的福音,应该有更大的力量,看来这种情况似乎没有发生。在许多情况下,个体传教士们为了解除周围人们的痛苦已经尽了最大力量。感到他们不能做得太少,仍然表现他们的主。马礼逊医生,第一个到达中国的新教传教士,虽然他不是医生,但在一个友好医生的帮

助下,他开设一个诊所,并在许多年里管理着它。有许多基督教医生自愿帮助传教的例子。但是,直到最近,教会才认识到没有被使用的伟大力量,号召他的传教士们前往行医和传教。

基督教的工作像其他领域的工作一样,我们不愿意超然于我们的目标工作。迄今为止,教会的目标,派医生前往异教徒的土地,被过分限制在三点:即初创阶段;布道工作;慈善事业。任何特别工作的成功,除了开创方面之外,很大程度上要按照加入教会的人数来估计。但是,让我们现在把目标定得高一些,让我们考虑那个行动在我们主的终生工作中曾经有的位置;让我们考虑他们在教会的工作中应有的位置。让我们认识到诊治一位患者,就等于给他周围的黑暗环境透过一缕神圣之光,即使他对基督教一点兴趣都没有。让我们努力使异教徒和充满敌视的世界在我们基督教的环境中明白地辨认福音,在众多福音中找到同样的福音。让整个医疗传教工作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并把其作为传教工作的基础和必要的地位,而不仅仅作为布道的辅助。让这个成为我们的实际目标,我们应该抓住我们一直盼望的契机,到那时,整个世界都将向上帝伸出手来。

医疗传教是基督教会传教工作中不可或缺永久组成部分。很明显,教会必须尽最大努力去保证这项工作的建立,还要保证这项工作的持续。目前,我们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借助外国人进行基督教宣传只是权宜的办法。中国必须彻底的基督化和完全接受教育,但这要由他们儿孙来完成。因此,很显然,使我们工作不朽的办法是培养接班人,由这些人接过我们的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只培养一些助手和药剂师,使其掌握一点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经过良好教育的基督徒,作为接受过全面教育的医疗人才,他们有能力有资格站在工作的前列。

在过去的6年时间里,在中国各个省份,接连涌现出一些医学院。但总有一些人反对这个运动,认为这不是基督教会的分内工作,而应该由政府和人民去做。但是,这样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背离

基督教医疗职业的发展,最后造成医疗传教的停止。我们有责任采取措施以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必须注意,中国的基督教将能够继续上帝的旨意传达到整个人,包括人的肉体 and 灵魂。信念正在成长,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基督教的医学教育是我们医疗传教工作的重要部分。人们确信这种教育必须是最高水平的。地方政府为医学教育提供帮助的责任已经得到确认。中国政府和教育部对医学教育的必要性,特别是和公共事业的关系比较清楚。政府医学院已经建立起来,为培养高水平人才,这个方面发展很快。问题随之出现,这两个责任怎么能够协调呢?一些医学院已经建立在纯外国和传教士资助的基础上,但是和中国人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而且明显被感受到。人们也认识到政府承认毕业文凭十分必要。现在,我们正在奠定一个基础,将来有一天,我们尽可能与他们密切合作。如果要使基督教理想融入中国的医疗事业,必须从现在开始,加强各个医疗学校之间的联系,也要同政府和其他许多有关的人们建立联系。中国医疗传教士协会三年一度的会议于1913年1月在北京举行,讨论的主题就是医学教育,并且形成了一系列明确的政策。会议决定:基督教的医学教育是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应该比医疗传教的其他工作优先考虑。下面是会议通过的并用中文公布的决议:

中国医疗传教协会经过大会议决,特公布如下决议:

一、建立医学院和医院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对身体和心灵的治疗为中国人民乞求神的赐福;通过对有文化有智力年轻人在医学方面的全面培养,使他们成为完全合格的医生,从而为自己的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我们并不想创建永久性的外国机构,我们希望中国人自己逐渐和最终解决人员、资金和管理问题。

三、协会希望把基督教医学院纳入政府教育部管理体制之中,在各个方面与民国政府合作并获得民国政府的支持,这样,一个强大的装备完全的医疗职业才可以在这片伟大的土地上建立起来。

第二十四章 满洲医学教育的起步

让某人以生命为赌注,去和极限抗争,
结果会是怎样的情形!

《雕像和胸像》——罗伯特·布朗宁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在包厢中》——罗伯特·布朗宁

在处理满洲问题上,中央政府没有保持政策上的连续性,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从日俄战争到如今,8年时间里,已经换了5任将军和总督,而且没有一个人任职超过两年。他们都是显赫的大人物,但是,除了表面上礼仪性交接之外,一直没有形成新任职的官员与前任相互协商的习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策,自己的计划,而两年时间又不足以去推行这些政策和计划。

1907年,中央政府决定改革满洲官制,与其他地区接轨。盛京将军改为总督,原来盛京将军赵尔巽的职位由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接任。^①徐世昌也是一位出色的人物,但与赵尔巽的风格完全不同。

^①徐世昌(Hsü Shih Chang):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兼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三省官制改革,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下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巡抚,徐世昌就任东三省总督。1919年徐世昌任中华民国总统。1922年退出政界,1939年病逝于天津。译者注。

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满洲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满洲已经打开了对外通商的大门,除海关税务司,邮政官员和商人之外,各国领事馆也先后建立起来。新总督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坚决维护中国政府在世界上的尊严和地位。在这方面,以及他后来所制定的政策,都得到了新任奉天巡抚唐绍仪^①的大力支持。唐绍仪及后来相识的梁先生都曾留学美国,英语说得非常好。他们迫切希望自己的祖国早日与最先进的西方国家一样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唐绍仪刚来奉天就任的时候,人们



徐世昌总督:他维护着中国政府的尊严

们传言他很“排外”,但我没有看出这一点。他是一位爱国者,热诚地维护国家的权力和自由,对任何不利于国家的行为都非常愤慨。但是,在我们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他很有正义感,随时真诚地欢迎对中国有益的外国人,并赞同能使中国进步的每一件事情。

在他执政的两年时间里,奉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突出的是那些漂亮的现代建筑。老式蹩脚的将军衙门以及城内各处的大小衙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层的政府办公楼,各个部门的工作便利多了,而且总督也搬到这样的楼房里办公。为了与此相协调,

^①唐绍仪(Tang Shao Yi):光绪十三年(1887)选派赴美国留学,是袁世凯的得力幕僚,1907年被任命为奉天巡抚,与徐世昌同时到任。1912年出任第一届内阁总理,1938年死于上海。译者注。

整个设计显得富丽堂皇。官方所举行的宴会采用最流行的外国风格,在宴会上,有中国军乐队的表演,使人振奋的是,他们竟用外国的乐器演奏外国的音乐。当总督前来视察盛京医院的时候,有很多骑兵排列在医院附近道路两旁担任警戒,另外还有很多骑兵簇拥在总督车前车后,好不威风。人所共知,东三省总督和奉天巡抚的马车是奉天最漂亮的。

在这两年以及以后的几年里,教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每个大镇和许多小镇都有小学,每个城市至少有一所中学。奉天也建立起一所较大的师范学校,一所科学学院,一所法律学院,一所军事学院,一所农业学校,一所工业学校,一所外语学校。除了女子师范学校之外,还有两所女子学校,以及一些幼儿园。其大部分建筑,如政府银行和图书馆等设施,都修建得非常壮丽和宏大。

电话通讯系统已经正式开通,因此,我们医院免费安装了电话。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特别在鼠疫爆发期间,对红十字会的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同时,奉天也建起发电厂,向政府机关和公共建筑提供照明服务。后来,逐渐普及到民用,主要的街道安装了路灯,现在许多商店和民宅也都安装了电灯。按照政府的命令,盛京医院和医学院享受着半价电费的優惠。

地方的事业也很活跃。奉天组建了一个轨道电车公司,从奉天城西门内到火车站铺设一条三英里长的轨道,由马拉电车车厢运载旅客。此时,从北京到新民屯的清朝铁路,已经延长到奉天。日本的铁路贯穿南北,向东分出一条三十英里长的支线通往煤矿,并且计划铺设一条新的支线到达东南方向的朝鲜边界。^①

徐世昌和唐绍仪二人到奉天就任不久,我们就相当熟悉了。东三省总督,奉天巡抚和其他九位官员向盛京医院捐赠了3100两白银(440英镑),表达了他们对我们工作重要性的肯定。我和唐绍仪先生进行过多次谈话,主要是关于公共健康和急迫的医学教育问题。

^①距离奉天以东三十里的支线应该指奉天到抚顺煤矿的铁路;而从奉天到中朝边界的支线应该是奉天到丹东(当时叫安东)的沈丹线。译者注。

事情从开始就非常清楚,不管外国传教士怎么多,甚至都不能指望他们暂时满足人们的医疗要求。因为一旦当满洲一千五百万或更多的人口意识到医疗需求的时候,所需的医学人才是远远不够的。我到中国不久,就开始梦想在这片土地上到处活跃着中国的基督教医务人员,从而开辟基督的医学事业。这似乎太理想化了,事实上,除了献身于眼前的紧迫工作,和为了培养日常工作需要的助手和药剂师所做的有限培训之外,并没有做太多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医务人员的需求日益明显,教会医院助手的需求相当急迫。如果有适当数量的医务人员,完全可以缓解人们的痛苦,避免大量的死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人们对西医的信任正在逐步增长,中国西医人才的需求量相当大。可一旦遇到庸医,落到学得一知半解知识就离开我们医院的药剂师和助手手里,那就太惨了。另外,在民政和军政领域内,也逐渐需要卫生方面的官员。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我一直带着学生,给他们开设相当完整的医学课程,并且颁发了证书,只是人数有限。其中两个人继续在盛京医院里帮助工作,其余的自己出去营业。他们很努力,产生了相当好的影响。其中有两个人家住奉天,一个就是魏医生。他随时帮助我们,从来不计任何报酬。特别当我的助手生病和度假的时候,他常常到门诊来帮忙。他们知名度很高,省内的政府、军队、基督教会、满洲传教士协会(当地的)和各个城市,都要求他们到那里工作,而且经常问我:“把您的人给我们一个!”

我曾不止一次向联合传教会议提出建议,要求建立一所小规模的有效医疗学校。可既没有人,也没有钱,计划不得不一再推迟。因此,我准备像以前一样继续独自培养助手。接着,我们的工作遭到了义和团运动、政局动荡和日俄战争的破坏,当和平时期到来的时候,赵尔巽将军请我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并承诺给予实际支持。但是,那时,我正准备重建医院,非常遗憾,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到1908年初,因为设备充足,我们的医疗工作再一次展开了翅膀。

然而,靠传教使团去建立一个医学院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做了一个谨慎的安排,每年把药剂师和助手们集中到奉天,进行短期培训,以解决医疗人才的迫切需求。北京联合医学院在两年前就已经成立,传教使团催促我们与其联合,放弃在满洲独立建立医学院的既定打算。我确信,虽然北京会为我们提供一些合格的助手,但永远不能满足东三省对医务人员日益增长的需求。然而,面前的大门似乎是关闭了,我无奈地承认必须放弃长期以来的热望。

正当满洲医学教育前景看来是最为黯淡的时候,在我们面前突然敞开了一条光明大道。

1908年5月,我们得知一个不幸的消息。盛京医院隔壁那个院子,以前我们想买,但一直没能如愿,虽然我们曾不止一次地租用这些破房子,很久以前做医院,日俄战争期间做避难所,但是,由于院子的主人不在,它被抵押了,不能出卖。此时,有人告诉我们,院子已经出卖了。这使我们很失望,而且这样做也有悖于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即邻居应该有购买地皮的优先权。新房主是南方某省商会,他们计划在这里建设两层商会大楼。楼里有个用来演戏和宴会的大厅,从这里可以相当近地俯瞰医院,嘈杂的吵闹声,锣鼓的叮当声,将一直持续到深夜,会给我们的患者带来极大的伤害。

我非常失望,拜访了一个又一个商会的领导,但是,他们都无能为力。买卖已经成交,钱已支付,计划商议妥当,而且契约也签订了。不久,工人们到了,扒倒陈旧的房子,运来新的木料和砖瓦,并开始挖掘地基。而此时,总督了解到我们的困难处境,立刻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总督说:“这些年来,盛京医院为奉天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他们想要那块地皮,那就必须给他们。让工程停下来!”

磋商用了些时间,但是,最后政府出面把建筑材料运走了,又按照购买价格进行了支付,然后把地契交给我,而购买院子的钱是用中国人的募捐凑集起来的。当这些磋商仍然没有结束的时候,在东方旅行的一些朋友前来拜访。我们畅谈了未来的发展前景,认为在这个地点建立医学院是非常理想的。由于对这里的发展前景留有

深刻的印象,这些朋友承诺每年捐助 100 英镑,资助在这块新地皮上将来无论从事什么样的事业。

此后不久,我和唐绍仪先生就满洲对西医人才的迫切需求进行了一番长谈。他表示盼望我能承担起医学教育的责任,希望医学院应该在政府的帮助下建立起来。几个星期后,也就是唐先生前往美国之前,他和徐世昌总督以及其他官员前来医院拜访。我领着他们参观了整个医院,看到这样多的患者,所有的一切都这样的清洁,唐先生似乎非常吃惊。

“我们知道您在做善事,”唐先生说,“但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接着总督告诉我:如果我能承担医学教育,政府将在十年之内,每年投入 3000 两(420 英镑)。并任命梁先生和我安排一切。我们感到一所医学学校,虽小了一些,但现在已经有了资金保障。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设计出一个详细的计划,提交传教委员会和联合传教会议,同时和梁先生进行了讨论。第二年春天,我回国度假。满洲传教组织授权给我,向国内教会和大众汇报满洲的情况,让人们了解此事,并为奉天医学院募集资金。那是一个相当大的事业。我们只有一块空地,从当地中国人和外国人获得的捐助总数为 112 英镑,承诺每年捐助 520 英镑。我们需要建筑和设备,以及至少两名教授。在奉天的大多数年月里,我一直单枪匹马,但是,当外国人增加的时候,除了其他工作,关照他们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我来之前,就对新人的费用进行了安排。基本上比照英国人从中国铁路、邮局和海关所得到的工资,按照第二等医疗传教士的工资标准,并参照了我的工资。因此,我们此时已经有两位工作人员,形成一个核心。

经过讨论决定这个医学院应该是个统一的整体,由在满洲的三个传教使团共同管理。充分反映中国人意愿的规章也制定出来。学院将获得境外常规传教资金的完全支持;而且我所属的苏格兰自由联合教会把其当作自己传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募集资金和委派人员方面给予诸多关照。

1909 年 10 月,我们印刷了一个简短的呼吁书,分别寄出了 4000

份,主要在苏格兰。在这份呼吁书上,我们写道:“学院的目标是在内科和外科的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年轻人进行全面培养,为医疗传教事业储备尽可能多的后备力量。学院基本上是一个传教组织,将按照基督教的原则进行管理,受基督教的渗透和影响,……我们建议为整个建筑草拟计划,如果资金允许,我们将马上开工,……但我们不能负债。”

除了要付两个人的工资之外,直接使用的建设资金就需要4000英镑。这个呼吁所带来的反响表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我们共募集到4889英镑,并且物色到两名高水平杰出的合适人选。我们得到的第一大笔捐助使我们特别兴奋。我们的老朋友毕晓普(伊莎贝拉·伯德)夫人留下一笔遗产,由她的一位女朋友负责,在她认为最合适的时候,资助医疗传教事业。很久以前,毕晓普夫人曾经把我介绍给这位夫人,此时,她对我们的医学院计划很感兴趣,认为“这正是毕晓普夫人应该支持的事业。”她交给我1000英镑,用这笔钱去建设医学院的一座侧楼,作为对毕晓普的纪念。



盛京医院的一间病房

在我离开奉天不久,徐世昌总督就被解职。毫无疑问,由于老太后死亡,光绪皇帝逝世,袁世凯也垮台了。那位有名无实的皇帝没有活过老太后,在一般人看来,老太后也不允许自己死后他还活着。在小皇帝未成年之前,由摄政王进行统治。他对各类官员发泄自己的情绪。为保持新统治者的国家有个和平的局面,袁世凯在位置上呆的时间稍长一些,然后,摄政王礼貌地把他赶走了,而他所安排的亲信,包括徐世昌,唐绍仪和梁先生等也大部同时解职。

考虑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将有什么不同是相当诱人的。如果摄政王很有远见,并且和袁世凯成为朋友,然后放手让他去推行自己的发展计划,人民会逐步获得教化和解放,中国革命还会发生吗?

第二十五章 黑死病

我对自己的角色满意，
一旦天赐良机，
为了他人的幸福愿把这条生命抛弃。

《索尔德罗》——罗伯特·布朗宁

1910年至1911年冬天，一场肺炎型鼠疫^①在满洲各地蔓延，其毒性之可怕，使我们不由得想起流行于中世纪欧洲的鼠疫，以及夺去欧洲无数生命的黑死病，还有伦敦的大瘟疫。^②目前，满洲鼠疫的起源仍然没有定论。人们最早认为是由旱獭的一种土拨鼠传染的，可细菌检验并没有确认这种说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最早的病例是于1910年秋天在土拨鼠捕猎者和有关人员中间发现的。起初无数的人聚集在草原上捕猎土拨鼠，在中俄边界附近俄国境内西伯利亚铁路两侧的村庄里开始有人发病，但是，因为以前这里曾流行过瘟疫，结果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从前齐齐

①肺炎型鼠疫(pneumonic plague):鼠疫分为两种,一种是腹股沟腺炎型鼠疫,简称腺鼠疫;另一种是肺炎型鼠疫,简称肺鼠疫。译者注。

②黑死病(the Black Death):即鼠疫,中国俗称为瘟疫。其第一次袭击英国是在1348年,后来蔓延到欧洲,断断续续肆虐了300多年时间。英国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黑死病;伦敦大瘟疫(the Great Plague of London):1665年至1666年伦敦大规模流行鼠疫,死亡人数超过10万。英国作家迪福于1722年出版《伦敦大瘟疫亲历记》一书,十分畅销,此处作者即直接引用其书名。译者注。

哈尔省^①的荒凉山区是个有力的屏障,但是,现在西伯利亚铁路已经横贯东西,因此,在十一月份,鼠疫蔓延到哈尔滨及其附近城镇。年末,传来非常可怕的消息,在哈尔滨的中国人聚居区^②死亡率相当高,但是,人们一般不会料到鼠疫会向南蔓延,因为传染病曾多次在哈尔滨中国人聚居区肆虐,都没有向外传播。

这次爆发的鼠疫不是腺鼠疫,其传染也与老鼠和跳蚤无关,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传染,显现出肺炎的病症。在其他地区,伴随着腺鼠疫的流行,相似性质的肺鼠疫也曾小规模爆发过,但是没有扩散。这是数个世纪以来,世界上第一次肺鼠疫独自的大规模爆发。这次鼠疫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一旦感染必死无疑。见于记载的病例共 43942 人,死亡 43942 人。没有出现可以验证的康复病例。无情的死亡摆在面前,震惊和恐惧刺激了人们的想象力,对瘟疫逼近的普遍恐慌使人们无限地夸大了死亡数字。这也好,如此的气氛有利于我们采用系统的科学的方法遏止鼠疫的蔓延。



锡良总督:他对治下的人民怀有父亲一样的情怀

①齐齐哈尔省(Tsi-tsi-har province):即黑龙江省,因当时黑龙江省会在齐齐哈尔,故称齐齐哈尔省。译者注。

②哈尔滨的中国人聚居区特指当时的傅家甸,与俄国人聚居的哈尔滨还有一段距离。译者注。

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①，是一位蒙古族出身的官员。其就任之时，正当袁世凯去职之后，因此，人们多多少少要把他当作摄政王身边的保守分子。就个人而言，他是进步的，乐于倾听任何对自己的人民有益的建议。对其治下的人民，他有着父亲一样的热心肠，与民同乐，与民同忧，是中国传统官僚的典范。

对满洲北部两省抗击鼠疫的斗争他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责任。从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前往哈尔滨抗击鼠疫的医生们，曾一度受到庸碌无能且反应迟钝的主要官员的阻拦。但奉天的情况则不同，总督似乎有用人的天赋，负责的官员都是最有实际能力的中国人，我乐于与他们共事。最突出的一个人是韩先生^②，他是外事专员，在抗击鼠疫斗争中所采取的重大决策都与他有直接关系。他不懂外语，更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但读了许多书，通晓现代知识，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而且行动敏捷，乐于接受有创造性的建议。

我与锡良总督和韩先生两人关系密切，1911年初，他们正式聘请我为政府的首席医疗顾问。总督了解肺鼠疫的致命性质，为了把满洲从鼠疫的魔爪中解脱出来，他特别着急。奉天鼠疫防疫局成立，除韩先生为负责人之外，主要成员包括道台、警察署署长，还有公立医院的院长王医生。为即将到来的战斗，无论在会上还是在会下，我不断和他们商量，制定一个又一个计划，慢慢地，西方的标准成了准则，而且做事也远远快于我在中国所熟知速度。

然而，在我们的预防措施还没有讨论的时候，公立医院接收了一名患者，并死于鼠疫。在二三天内，高度戒备的警察又发现了数名鼠疫患者，这些人都是从满洲北部乘火车刚刚到达的。很显然，铁路是主要的危险源，如果铁路继续运转，不仅奉天会被传染，而且

①锡良(His Liang)：锡良，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曾任知县、知府、湖广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宣统元年(1909)，授钦差大臣，调东三省总督，宣统三年(1911)解任。译者注。

②韩先生(Mr Han)：此人当为韩国钧。韩国钧，光绪五年(1879)举人，曾为河南候补道、广东劝业道，宣统二年(1910)八月，为奉天交涉使，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为吉林民政使。译者注。

将通过清朝控制的铁路,传染天津和北京,从而在人口稠密的中原地区蔓延。糟糕的是,限制或停止铁路运输遇到特殊的难题。中国旧历新年就要到了,苦力们正从遥远的北方匆忙南下,奔波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俄国和日本的铁路,每天有一千人从满洲北部南下。在中国控制的铁路线上,安排了从奉天到天津的专门列车,全程两天时间,票价相当便宜。从北面而来的火车,清朝政府没有权力干预,但对自己控制的铁路,他们首先设法使苦力列车



亚瑟·杰克逊医生

停运,然后切断铁路交通。过了一段时间,日本人也关闭了三等车厢和停止了苦力运输。

此时,我们医院有三名英国医生,即杨医生、杰克逊医生和我。在这场战斗中,我们都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进行分工是十分必要的。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抗击鼠疫的斗争中,做总指挥和指导工作。杰克逊医生自愿到中国铁路车站去工作;杨医生则负责管理医院和给外国人看病。

亚瑟·杰克逊医生于去年十一月刚刚到达奉天。他在国内的工作很出色,已经被我们聘为医学院的教授,无论是人品,还是业务水平,他都很适合那个岗位。他是剑桥大学文科和医科毕业生,已经获得了热带医学的文凭。在国内医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是位具有特殊能力的人。每个和他接触的人,都特别喜欢他。我们结识许多新来的传教士,但从来没有人这么快地适应环境,与中国人相

处得这样好。他好像天生就该是医学院的教授,一直急切地盼望着早日投身到教学工作中去,在新建设的学院中施展自己的才华。

瘟疫的魔爪悄悄地伸了过来。从1月2日到12日,奉天城总计死亡23人,而在1月13日这一天,就死亡了10人。1月14日,星期六,关闭奉天到北京的中国铁路。那天上午,最后一列专门用来运送苦力的火车离开奉天,大多数乘客是从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火车上下来的。虽然对这些苦力进行过医疗检查,但是,肺鼠疫的前期症状并不明显,在发病的早期找到患者几乎不可能,这给我们的防疫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出现了两例死亡,所以列车载着478名苦力直接从山海关返回奉天。

星期日下午,天气特别寒冷,杰克逊医生从6英里外的中国车站打来电话说:因为列车正在返回,他必须等着去照看那些苦力,因此要晚些时候回来。当时的情况很糟糕,既没有准备好的隔离营,也没有空房子。当局有人想让那些没有发病的人自由离开,可那意味着鼠疫从奉天大规模地向外扩散。还有人建议让苦力们在车厢里呆到第二天早上,但是当晚的气温已经降到华氏零下25度,许多人肯定会冻死。“我们必须为这些可怜的穷人尽最大的努力。”杰克逊医生说。中国火车站是一个临时的地方,没有合适的建筑,但在车站附近却有一些较大的客栈,所以,当火车到达的时候,匆忙把这478人全部安排到里面,并用武装警戒,严防其逃走。

当天晚上,又有几个人死去,第二天,杰克逊医生前往车站,投身到抗击鼠疫的斗争中,直到8天后病倒为止。留出一个较小的建筑专门给那些鼠疫感染者住,虽然称不上医院,但在那里离开人世也算作温暖舒适。安排另外一座房子隔离那些疑似患者,后来,其中的大多数人陆续搬到隔离营。曾经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住在一个客栈里,并且尽可能阻止住在不同客栈人员之间的相互来往。在这些筹备工作中,我尽量去帮助杰克逊医生,而且现场还有两位自愿的助手。由于客栈里面肮脏、黑暗、潮湿、房顶过低,加之这么多的人挤在一起,相互传染,实在不利于阻止鼠疫的蔓延,因此,与杰克逊在车站组织防疫工作的同时,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苦力

们能够居住的地方。

所有人每天必须接受两次检查,我们尽量把这种工作安排在室外。一个又一个不幸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发病,挣扎着回到多数人的队伍里,直到瘫倒在医生脚下,才被抬到某个地方去等待死亡。室内的检查也很必要,每天都有许多疑似病例被发现,并很快加以观察和确认。星期二,为了便于工作,杰克逊医生住在车站里。为了尽力挽救那些仍然有生存机会的人们,他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同时,也关心那些就要死去的人。住在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任何人有事相求,这位外国医生都会给予热情的帮助。他精力充沛,富于同情心,给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位政府指定前来帮助杰克逊医生工作的官员,甚至把他的优秀事迹报告给总督。车站的人们都信赖他,周围的人们每天都在帮助他,杰克逊医生全心全意的无私奉献精神给他们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起初,这似乎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斗。每天,都有人在身边倒下去。在五天时间里,死亡 70 人。幸存者心中充满恐慌,由于武装警戒不怎么严格,一天夜里,一些人逃走了,把鼠疫带到奉天城里。但是,此时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在一座客栈里,没有任何人死亡。1 月 23 日,星期天,里面住的 60 人全部恢复自由,在刮脸、洗澡,穿上政府提供的新衣服后,乘坐火车返回家乡。第二天,那些还没有脱离危险的苦力,被移到距离奉天城 8 英里外通风条件很好的院子里,后来,大多数人陆续从那里获得自由。车站的斗争胜利了,但在同一天,杰克逊医生却病倒了。

他清楚自己从事着的工作所面临的危险,并且小心地采取了预防措施。当不得不和患者接触的时候,他总是对助手说:“退后!退后!不要冒险!”但是,哪里需要的时候,他却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对工作中出现的科学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在他工作的最后一天,他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星期一,他精力充沛,高兴地送走了 60 人,期望第二天把所有剩下的人都送走,并且谈到他很快就会回到我们中间,接管隔离营的管理

工作。但这些都没有发生。他已经注定要成为鼠疫的牺牲者。我们不清楚他在什么时候感染了鼠疫。是搀扶着步履蹒跚的病人进入客栈的时候？还是给垂死挣扎的人送水的时候？他已经注射了抗鼠疫血清，戴着非常严密的面罩，像我们原来想的那样，应该不会受到传染，但不知鼠疫病菌通过什么途径感染到他的肺部。

每天早晨，我们都通过电话沟通信息，商量办法。星期二，他不经意地提到精神不太好。我直接去了火车站，发现他在发烧，脸色也不怎么好。尽管他坚持说用不着担心，但我仍然劝他卧床休息。一天时间里，他的病情逐渐沉重，我们都很紧张，没有多说什么。我和杨医生轮流照看他。晚上，他独自呆着的时候吐了血痰，这是确定无疑的鼠疫症状，但他无私和勇敢地面对了这个事实。当杨医生回到房间的时候，他告诫杨医生不要靠近。只要一息尚存，他所关心的就是别人的安全。我和杨医生使用了所有已知的抢救方法，但都没有起作用。病情发展很快，24 小时后，他死去了。

杰克逊医生的死震动了所有认识他的人。这样一位精力充沛，行为敏捷，诚实可靠，同时富于幽默和开朗性格的人怎么会突然离去呢？直到此时，我们才意识到：他对与之接触的中国人有多么大的影响。对杰克逊的死，这些人的悲痛是真诚和深沉的。更为突出的是杰克逊的死对官员的冲击，对大众，甚至那些从未见过杰克逊大众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当总督得知杰克逊患病，特别在住所外安排专门信使传递有关杰克逊的消息。杰克逊因公殉职，使总督深受感动。此后的 6 天时间里，我和杨医生接受了隔离。我们接到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表示同情的电报和书信，中国报纸也接连登载有关的赞扬文章和书信。最触动中国人心灵的是他的青春、乐于奉献和舍己为人的精神。中国人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同时他们也清楚地看到，杰克逊虽然死了，但更多的人将会踏着他的足迹前进。

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他已经做了数千年前耶稣所做过的事情。

他为我们国家而捐躯，实际是履行了为拯救世界可以

献出自己生命的基督的生活准则。

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行为,是因为坚信基督教为了拯救他人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的伟大信仰;杰克逊医生并非死于鼠疫,而是死于崇高的道义,虽死而犹生。

他遵循上帝的旨意,为人类而牺牲;他来到中国要去做一位医学院的教师,但是,他为了拯救他人而献出了所学的全部知识;他所从事的事业没有结束,他的死也不会有损于他的事业。

这些不同寻常的评价分别来自四个非基督教徒的作者笔下,刊登在非基督教的中国报纸上。

在杰克逊死去一个星期后,奉天英国领事馆举行了一次追悼会,东三省总督和约二十名高级官员,以及在奉天的所有外国人都出席了仪式。在仪式结束的时候,总督宣读了后来广为流传的演讲词:

我们辜负了皇帝对我们的信任,备觉惭愧:我们已经让可怕的瘟疫蹂躏了神圣的故都盛京。

当灾难袭来的时候,大英帝国的国王陛下对每个国家都表现出同情。他的臣民,杰克逊医生,被他君主的精神所感动,以一种救世主的襟怀,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世界,在我们国家需要且请求帮助的时候,他豪爽地答应了。

当我们在瘟疫肆虐的地方战斗的时候,他毅然前来帮助;在垂死者的呻吟声中,他挣扎着照顾那些罹难者。

因劳累疲倦,瘟疫抓住了他,使其过早地永远离开了我们。任何办法都不能掩饰我们的忧伤,任何语言都没法表达我们的悲痛。

杰克逊医生是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且具有很高天赋的年轻人。他抱着传播医学知识和传播福音的崇高理想,来到满洲。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他倒下了。长老会失去了一位最有前途的成员,而中国政府则失去了一位乐于帮

助自己的伟大朋友。

啊！杰克逊医生的在天之灵，我们代表满洲两千万人民恳求您代为求情，请万能的上帝结束这场瘟疫吧，那样我们就可以重新享受天伦之乐，高枕无忧。

在活着的时候，您是个勇敢的人，现在，您是一位尊贵的神灵。高贵的神灵，您为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一直在帮助我们，那么就请永远保佑我们吧！

痛苦和灾难蹂躏着我们的心，但我们也感觉到，他的死亡比他活着所做的贡献要大得多，即使按照我们原来给他安排的前途，成为非常有用的人也是如此。在许多年里，他一直为此做着准备，然而，他到中国十个星期就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他终生的工作都被压缩进最后繁忙的几天里，他的死是他一生中最为闪光之处。

杰克逊医生被安葬在平静的城郊，距离盛京医学院大约一英里。政府拨出一块地皮，周围用墙围起来，作为墓地。他的传教士朋友们在他的墓前竖起一块石碑。

锡良总督马上派人送来给杰克逊医生母亲的一封信，另外还有一万美元（约 900 英镑）作为“抚恤金”，并捎话说：“他心想着拯救这个世界，他对这里的付出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杰克逊夫人马上把这些钱捐给了医学院，用这笔钱完成医学院的部分建筑就是对儿子的最好纪念。听到这些话，总督深受感动。“多么伟大的母亲！”他感叹到，“多么优秀的儿子！”他个人愿意增加对医学院的捐助，那座建筑定会成为有价值的纪念物。为此目的，他捐助了 4000 美元。

在医学院的大厅里挂着一块匾额，上面铭刻着如下这些话：

纪念亚瑟·杰克逊·弗雷姆

文科学士 医学学士 外科学士 热带病学博士

为在这所医学院教书，杰克逊来到奉天，相信服务于中国人民就是对上帝的最好报答，在 1911 年 1 月 25 日的

工作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终年 26 岁。

在奋力阻止肺鼠疫蔓延的时候,杰克逊的母亲杰克逊夫人和东三省总督锡良阁下捐资建造起这栋楼的西半部分。

在匾额的对面悬挂着杰克逊医生的放大照片,那是 1913 年莫特医生放置在那里的。

杰克逊医生死后不久,我们便着手组织医学院“杰克逊纪念讲座”的募捐活动。总督带头捐款 5000 美元,交通部捐款 2000 美元。为了表达对这位献身外国人的尊敬,很多不认识杰克逊的人也捐了款。尊贵的肃亲王和两位东三省前总督赵尔巽、徐世昌都捐了款;而地位卑下的雇工也尽了力,虽然只有十分,或两个便士。在中国的捐款总数达到 1000 英镑。但英国国内对此事知之不多,因此,反响不太强烈。

对于医学院的学生来说,杰克逊医生是他们所为之奋斗的基督教理想的现代榜样。“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①杰克逊留给我们的最大的精神遗产,是为青年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他的精神感召下,青年人的思想和抱负被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他们要像杰克逊那样服务和奉献,要像杰克逊那样随时听从上帝的召唤。



杰克逊医生的坟墓

^①“他虽然死了,确因这信,仍旧说话”(He being dead yet speaketh):此句选自《新约全书·希伯来书》第 11 章七段。译者注。

第二十六章 抗击鼠疫

我们要涉足事情危险的一面。

——罗伯特·布朗宁

奉天采取防疫措施较早,防疫局的人个个都精神饱满信心十足地投入了工作。由于鼠疫通过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很显然,彻底扑灭是完全可能的。首先,必须把新出现的鼠疫感染者拒之城外;其次,把曾与感染者密切接触过的人们隔离起来,直到危险期过去。不幸的是,把鼠疫感染者拒之城外是不可能的,因为刚刚把曾与鼠疫感染者接触的人们隔离起来,新的感染者又从北方进入了城市。因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对鼠疫传播范围的控制,由此而制订相应的对策。

在火车站和奉天城之间有一座寺庙,马上被改造为鼠疫医院。在城外不同的地方设立了6座隔离营,其中3座是特意修建的。建立一间细菌试验室。同时,选择一块地皮作为墓地,雇用一些掘墓人,他们要花很大的力气,在冰冻的大地上挖出很深的墓穴,以便那些死去的人马上得到安葬。把城市划分为几个区,每个区由一个人负责,虽然缺少合格的医生,但这个人也必须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在他领导下,有一名医疗助手,一些卫生警察和消毒苦力,还有担架工。我们决定采用逐户排查制度,以便迅速发现和转移所有的鼠疫感染者,并把接触者送往隔离营。这些措施需要一段时间去完善,但尽可能快地投入了使用。



防疫工作者整装待发

当我们采取措施进行积极防疫的同时,有关鼠疫及其爆发的荒诞不经的某些说法开始在满洲流传,甚至直到今天,还有些人对此坚信不疑。人们把鼠疫归罪于日本人,还说他们为了占领满洲的土地,残害满洲的人民,怂恿,甚至促使鼠疫蔓延。从前攻击所有外国人的那种老掉牙的谣言又活跃起来,重新派上了用场,作为攻击日本人的口实。人们到处都在议论,日本人要在井里下毒。没有人知道这种说法起源于哪里,但是,每个城镇和村庄的水井都用木头盖子锁上了。清洁水井的工人非常忙碌,工钱也涨到原来的4倍。起初,虽然大多数人相信这种传言,但苦于没有证据;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听说在一些水井口发现了白粉,情节非常详细。在许多村子里,家中有这种白粉的人都被抓了起来,据说,他们承认是日本人付钱让他们把这些白粉放到井里。为化验分析,我们终于搞到一包,那是一名警察在城内一个锁着的水井旁拣到的。实际上包里只是些含蔡的无害混合物以及一些白粉,那是为了在市场上卖中国

猪肉时使用的。这种东西只是增加了些神秘色彩。那么是谁在这个地区散布这些没有意义的白色粉末？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在抗击鼠疫的斗争中，奉天政府面临着许多困难，这和70年前，英国当局在扑灭英格兰霍乱时的处境一样。起初，人们对防疫措施的必要和效果普遍持怀疑态度。在中国人看来，试图大规模地检查鼠疫传染绝对是件新奇的事，而受宿命观念的影响自然对此抱冷漠的态度。“这是天灾，”许多人说，“大限到了的时候，所有人都得死，谁也逃不掉。既然那样，为什么还把人送到隔离营去？为什么把好好的衣服被褥都烧了？”

人们厌恶人身自由受到干涉，更加怨恨买卖和生意受到干扰。有个店铺因为死了一个人，被迫关闭和消毒，其余29人全部被送往隔离营，在此情况下，店主却暴跳如雷。因此，期待人们的普遍合作是不可能的。当逐户排查实施的时候，居民更加恐惧。听说所有病人都要送走，那些已经病了几个星期的人都挣扎着起来，装作没有病的样子。几天过去了，警察的检查并没有带来可怕的后果。发给健康和没有感染鼠疫的官方证书受到许多人的欢迎。当然，由那些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人们所进行的检查很不彻底。但是，效果很好，这很大程度还要归因于鼠疫没有在奉天大规模肆虐，而对哈尔滨和北满其他城市则毫不留情。

起初，隔离营使人胆颤心惊，因为害怕被送到隔离营，许多人扔掉死尸和隐瞒病情，特别在客栈和出租房中发现的鼠疫感染者都被赶了出来，死在大街上。据说送到隔离营的人都会死去，一些没有感染鼠疫的人也被送到鼠疫医院，一些人没死之前就被埋了。还有很多没有根据的流言飞语广为传播。但是，隔离营里有温暖的火炕，丰富的食物，而且那里也不需要做事。每个家庭都住在一起。经过十天的隔离之后，人们回到家中，发现家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些被警察烧毁的东西也都得到政府的全额赔偿。人们的恐惧逐渐沉寂下来。

防疫局遇到的另一个巨大障碍是缺乏经过专业训练的助手。回想当时，医院的学生不得不当作医生来使用，而且根本没有时间

对检查人员和警察进行更多的实际指导,能够取得那样好的成就简直就是个奇迹。当然,人们一旦感染肺鼠疫,发病症状非常明显,这对检查人员有很大的帮助。每天早上,穿着洁净的白色大衣,戴着面罩的卫生警察陆续出发,分别在指定的街区进行巡查。客栈、出租屋和茶楼,以及曾经出现过鼠疫病例的地方,每天检查一次,其他地方每两天检查一次。如果警察发现某人值得怀疑,就向队里的负责人报告,如果此人确实可疑,就把他记录下来,过几个小时再来查看。如果明显是鼠疫感染者,就招呼担架队直接把患者送往鼠疫医院。然后通知那个地区的警察所,把曾经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送往最近的隔离营,并烧毁患者使用过的被褥和其他生活用品,对房子进行消毒,然后布置人看守。

一天,在城内大街上的一家饭店里,一位外国人看到人们突然骚动起来,一个人倒在地上,很快失去知觉。人们召唤来警察,两个小时后,所有的工作都已做完:把院子里的人员送到隔离营;进行消毒;关闭饭店;在饭店周围布置岗哨。当那天的工作结束的时候,参与防疫的所有人员都要到消毒站去,在那里洗澡,并留下外衣消毒。

当隔离营准备投入使用的时候,需要人去管理。盛京医院共有12名助手和药剂师,隔离营需要4个人,我让他们自愿报名,结果没有一个人退缩。此时,杰克逊医生刚刚死去,每个人都清楚这种工作有多么危险。不久,我们的另一名传教士承担起管理所有隔离营的任务,发现他们表现很好,而且管理水平很高。

对政府防疫措施的抵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强烈的反应来自部分商人,他们认定商业活动不应该受到干扰,联合起来建立起自己的鼠疫医院。起初,他们前来找我,请我负责,并由我的助手具体管理。我尽力劝说他们,这种工作只能与政府合作,必须遵守防疫局所制定的统一严格的规章制度,否则事情将会更糟,但是他们不听。他们开设了自己的医院。院子的一边是隔离室,另一边是鼠疫感染者病房,所有的工作由两位中医负责,并用针灸和其他方法进行治疗。既没有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也没有戴面罩。很快,鼠疫扩散,在院子隔离那边住的人也被传染,几乎所有的人都死了,

包括那两位中医。接着,惊慌失措的商人才允许警察消毒,把那个地方关闭了。这个隔离营运转了12天时间,死了251人,多数是在最后那个星期死去的。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试验,但给奉天人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

由于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奉天市内死于鼠疫的人数实际上并不高。死亡的大多数人集中在西部的贫民区,从外地迁入的劳动者聚居在那里,而细菌似乎也喜欢在黑暗、肮脏和人口过于拥挤的环境中繁殖和生长。那些身体强壮和充满活力的人似乎同身体较弱的人同样易于感染,而老年和儿童却常常能够幸免。

在抗击鼠疫的斗争中,各个城市张贴的布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种布告用最简单的日常用语解释了鼠疫的危险,鼠疫的传播,以及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有一种小型报纸称作“鼠疫公告”,发布每天的官方消息,发行量很大,流传很广。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消息公布。其中一份布告上讲述了鼠疫怎样传入一个村庄的真实情况:一天,两辆满载着烟草和其他东西的大车到了一个客栈,在其中一辆大车上的货物里,藏着两具用烟叶裹着的尸体,有人出高价雇用这名车夫,秘密把这两具尸体运到距离此处很远的祖坟。由于某种原因,这名车夫很害怕,第二天早上他坐另一辆车离开,把装有死尸的大车和货物全扔了。等了一两天之后,店铺的老板要用烟草去顶车夫的住店钱,结果发现了尸体。由于害怕当局关闭他的客栈,他二话不说就秘密地埋葬了尸体。时间不长,客栈老板,他的家人,以及住店的人,大约有20人死于鼠疫。

中国的春节就要到了,这是访亲问友的重要时间,每个人都要进行多次的拜访。在一个公告中,总督用长辈的口吻告诫他的人民,为了大家的健康,不要相互拜访,同时严厉命令那天所有人都要呆在家里。春节除夕,开始降雪,一直没停,最后达到14英寸深,这给人们四处走访带来极大的不便,比发布多少公告都管用。在以后的两个月里,下了一场特大的雪,还下了两场一英寸深的雪,数场四五英寸深的雪。许多路段常常不能通行,毫无疑问,这对减少鼠疫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城市当局雇用了数百辆大车运走积雪,先

是街道,然后是院子。在政府的一张布告上宣传说:一名车夫通过运送藏在雪里的尸体,已经赚了很多钱,他总共做了十次,接着他感染了鼠疫,死去了,他的家人也先后死去。布告还具体提到车夫的名字和地址。并且告知公众提防这种行为。在奉天,家家户户都在讲述着这样的故事。

除了省城奉天之外,政府对其他地区也特别关心。每个城镇都接到了印刷的布告,防止鼠疫蔓延的说明,以及关于执行这些措施的严格的命令。在一个约2万人口的小镇里,发现了鼠疫感染者,官员们什么也没有做,既没有隔离,也没有消毒,甚至没有埋葬死者。我从一个外国人那里听到消息,鼠疫正在迅速扩散。一个很有才智的官员,了解奉天的防疫措施,总督任命他为全权防疫专员,迅速前往此地,三天后,整个事态发生了变化,积极的防疫措施发挥了作用,整个城市因此而得救。

鼠疫并不限于在铁路沿线和大城市中传播,而且很快沿着乡村公路蔓延到各个村庄。起初,无知的人们没有防护意识,对鼠疫的传染非常轻视。一个小村庄里有个男人,从奉天赶回家来,病了,接着死去了,他的家人陪伴他,并且按照习俗进行埋葬。几天之后,除了一名婴儿在死去的母亲身旁哭嚎之外,24小时之内,全家7口人全部死去。邻居们帮助埋葬了尸体,然后动手拿走了屋内的东西,包括衣服、被褥,甚至病人曾经坐过的垫子。在以后的几天时间里,一个接一个人感染鼠疫,除了一名七十多岁的老年妇女和三名婴儿之外,全村约150人都死去了。

类似的悲剧在远近各处村庄里都曾有过,巨大的恐怖使人们惊魂落魄,就是可怕的霍乱也从未产生过如此大的冲击。自卫的本能战胜了宿命。成千上万的布告和传单从奉天送往各个村庄,有关鼠疫的信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村民们迅速行动起来,自己制定令人惊奇且非常有效的防疫措施。许多地方,客栈全部关闭,外来人员,就是亲朋好友也一律不准在村中过夜。不允许外人靠近村庄,大车也不允许外出。村民们经常合伙出车把农产品送到城里,然后由可靠的人购买消费品,并规定此人不能进入客栈,除绝对

必要外,更不准和任何人接触,而且要在当天返回。就是用这些方法,奉天附近的村庄才免遭鼠疫的蹂躏。

一天下午,某位青年人从城内回到 15 英里外的村庄看望自己的父亲。令他失望的是,村民们拦住他,不允许其进村。当天夜里返回奉天实在是太晚了,因此,父亲为他求情,允许他在黎明前离开,村中的长者们终于让步了。当天夜里,他病倒了,拂晓时分,父亲扶着他向远方走去,让他在雪地里死去。但是,这种牺牲也没有起什么作用。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父亲死了,家中的所有人都死了。由于村民们从一开始就与这座房子保持隔绝,其余的村民得救了。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一对卖药的朝鲜夫妇到了某个村庄,村里对外人的限制不太严格,但也没有人愿意接待他们,最后,他们绝望了,准备离开,一位心地善良的基督徒出于怜悯,把他们让进屋里。早上,朝鲜妇女死于鼠疫,他的丈夫逃走了。那家人和几个村民先后死去。

奉天抗击鼠疫的斗争持续 3 个多月,动员了所有能够动员的力量。斗争的前阶段是最为艰苦的,每天,死亡的数字在连续的上升。当防疫人员由于不清楚自己的职责而不断出现失误的时候,当商人们的反对和人们的冷漠使人绝望的时候,谁也不知道究竟要死多少人,或最终能否战胜鼠疫。商人们自杀性的冒险是个转折点。到 3 月份,死亡人数开始断断续续地缓慢下降。终于,出现了一天没有死亡的记录,这是从 1 月初鼠疫出现以来的第一次。人们掌握了科学的方法,而且较为温暖的气候也有利于鼠疫的控制。但鼠疫并没有消失,到 4 月份,最后一个病例出现以后,情况完全好转。在最后几个星期里,几名外国医生从中国其他省份赶到奉天,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但是,奉天抗击鼠疫的斗争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起来的,在与外国同事并肩战斗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了他们的智慧和热诚。

当鼠疫到处肆虐和迅速蔓延的时候,能否扑灭它,似乎还不能肯定,因此,中国政府召开一次国际专家会议,邀请各国专家到奉天研究鼠疫的性质,讨论防疫和根除的方法。共有 11 个国家,派出 33

名代表莅临奉天,我有幸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会议。这是一次著名的会议,住宿和招待都很有特色。

在我们马上要建设的医学院隔壁,有一个非常宽敞的院子,原来是公立的工业学校,此时由于鼠疫关闭了。政府决定改造部分校舍作为会议场所,整个3月,准备工作一直没停。从前到后,有4栋房子,都是一层,很适合这次会议。前面的一栋改造为会议大厅、秘书室、制图室和餐厅,其余3栋作为寝室,总计大约有50个房间,因为除了代表之外,还有秘书和其他人员在此居住。每个房间都安装了电灯,布置得非常舒适。政府不惜金钱,经常向我请教怎样使外国客人感到舒适的问题。面对东方,是一座古老的三义庙,在中日战争期间我们把那里作为医院,此时已经成为工业学校的一部分;本次会议的试验室就设在那里。医院挨着会场,各方面都非常便利,我要求政府允许腾出盛京医院的部分房间作为会议的备用场所,结果,政府在整个医院都安装了电灯。所有的筹备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会议大厅,布置得极为有品味——绿色地毯、窗帘和椅子都很漂亮,在周围的墙上没有装铸造的檐口,而用优雅的能够滑动的紫藤木杆来代替。

从始至终,中国政府对会议特别重视,把与会成员当作国宾,许多代表都表示,在他们以往参加的会议里从没有受到过这样好的招待。他们不但像住在私家宾馆一样方便,而且会议还为他们专门准备了马车,整装待发,信件也可以随时邮寄。

1911年4月3日,会议正式召开。此时奉天的鼠疫病例已经非常少了。东三省总督锡良和朝廷专员施肇基先生在会议大厅与各位代表,以及各国的外交人员见面。会议的主席是伍连德医生,是一位杰出的剑桥医学毕业生,以前的几个月,一直在哈尔滨领导抗击鼠疫的斗争。他主持各种会议,举止端庄,才智超群,得到所有与会者的尊敬。会议多数情况下使用英语,但是,汉语、德语和法语也作为正式的语言,有时也使用俄语和日语,但要翻译成英语。

从大会开幕到4月28日闭幕,一直在开会,有关肺鼠疫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经过了讨论,如肺鼠疫的起源、传染途径、临床症状、细

菌学和病理学上的意义、抗击鼠疫的措施,以及鼠疫对贸易的影响等等。会议的完整报告已经出版,其中摘要了会议所达成结论,因此,如果相同的传染病再次在世界某地爆发的时候,人们会发现,为迎接和抗击它们,医学方面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日本政府邀请会议代表到亚瑟港和大连度周末,俄国政府也邀请会议代表到哈尔滨度周末。当会议结束的时候,中国政府邀请会议代表前往北京,在那些天里,我们受到第一流的招待,并允许我们参观了很少人能够光顾的首都名胜。摄政王和其他几名王爷在冬季宫殿里接见我们。在一些聚会场所,我们见到了一些地位显赫的对历史有影响的大人物,并且和那位对我特别感兴趣的庆亲王进行了交谈。

鼠疫会议结束了,鼠疫也已成为历史,但是,几个月来的经历却不能轻易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现代防疫方法的价值已经融入很多人的心中,人们常说还有用的西医知识被当作满洲最重要的财富。人们担心明年冬天或以后,肺鼠疫会继续在满洲肆虐,奉天政府请求我在医学院的教师中确保增加一个人,其工资由政府来付,他的任务就是在鼠疫或其他严重的传染病爆发的时候,专门做防疫工作。清朝政府采取了最为重要的步骤,在哈尔滨设立防疫总局,由能干的伍连德医生领导。他已经组织起一些相当合格的医生,建立起装备优良的医院和试验室,并从哈尔滨向北,在鼠疫爆发的重要地点建立起调查中心。这样,已经做好了把鼠疫发现和消灭在源头的准备,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满洲将不会再次遭到这种可怕灾祸的袭击。



第二十七章 奉天的革命

新的希望应该使世界充满活力，
源自新的启示之光
应该给长期受压抑和被遗忘的民族带来希望。

《帕拉塞尔苏斯》——罗伯特·布朗宁

满洲再次更换了政府首脑，那位曾经在各省开创进步事业的赵尔巽重新回到奉天做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职约一年半，恰是满洲历史上最为关键的时期。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应该有这样一位意志坚强、态度谦和、做事稳妥、有政治眼光的人；应该有这样一位愿意抛弃个人观点和情感去努力维护和平、保护人民利益的人，来掌管着满洲事务，这对中国和满洲都有好处。数年前，还是在作盛京将军的时候，他纠正了人们的排外情绪和偏见，通过完全诚实的工作赢得了满洲人民的尊敬。每当社会进步启动的时候，人民就会想起他的开创之功，因此，赵尔巽重回奉天，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制定了许多满洲发展的计划，对他的就职我们满怀希望，但是，那一年半的工作实在出乎我们的预料。

从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和1898年维新运动夭折以来，在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一直存在着某种骚动，而且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利用教会学校进行启蒙教育，为国家的自由和解放做着精神上的准备。为了学习，无数的年轻人前往日本和其他国家，然后带着新思维返回祖国。康有为和孙逸仙等人的学说就是这种环境

的产物。那些对杀害改革者充满义愤的冲动少年,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他们能够读懂连载在基督教文学社刊物上的现代作品,商业性的新闻,以及其他的东西。各地的报纸都在尽最大努力,以期通过新办法引导公众的观点。在许多人心中,逐渐燃起对自由和自治的渴望。

自1898年以来,改革者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朝廷颁布了一个又一个进步的法令,而且过去已经废除的法令大部分也得到承认;尽管摄政王政府开始筹备有名无实的宪政,但改革者仍然不满。他们的要求已经今非昔比。正像那位古代女巫所说的:他们要求为迟误付出代价。朝廷要按部就班进行改革,把权力逐步移交给人民,看来现在不行了,改革者宣称,人民自己应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且要把自己的意志转变为政府的行为。

在遥远的南方各省,革命与强烈的反满,和决心利用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清朝政府的支持义和团运动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盲目和愚蠢,结果给国家带来赔款的沉重负担,朝廷从北京仓皇出逃使国家的尊严丧失殆尽,而现在的革命就是朝廷腐败的必然后果。只要老太后活着,没有人想,也没有人敢于行动。但是,1908年,她的专制统治结束了。当摄政王迫于进步力量的压力,表示自己愿意逐步推进改革的时候,作为这些进步力量的代表,却没能够提出任何大胆的政策。不满和背叛开始以某些公开的形式激烈地表现出来。在国家的权力中心根本没有一个有力量的人能够驾驶这艘船从这场风暴中安全地脱险。而很有能力的袁世凯已经被解职了。在内外政策上,朝廷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在应该屈服的时候,政府却非常坚定,而在应该坚定的时候,政府却屈服。因此,革命爆发了。

与中国其他省份相比,不论对革命的兴趣,还是对革命的恐惧,满洲都稍微有些不同。在南方城市,满人的驻军要提防他们所征服的人民,这些满人穿着与当地人民不同的衣服,说着与当地人民不同的语言,与当地人民分开来住。而在北方,种族之间的差别几乎消失了,种族对抗更无从谈起。在若干年里,满洲治理得非常好,因

此,没有理由对现状加以抱怨。而巨大和一直存在的恐惧则来自于满洲之外。1911年,在南满洲没有人对政治运动如此无知,而没有意识到存在着像朝鲜一样被日本吞并的危险。“帝制或共和,怎么回事?”这是普通乡下农民一般感觉,“别当亡国奴就行啊!”因此,我们明显地感到,革命运动还有待于时日。革命主要发生在城市,而且主要在青年学生中间有很大的影响。

1911年10月1日,长江岸边的武昌首先升起革命的旗帜,形势发展很快。在奉天的中文报纸每天都有事态的详细报道。大街上的报亭每天都有报纸贴出来,人群聚集在报亭周围阅读。对于此事,奉天城的绝大多数人多少有些兴趣,但没有人愿意为此而战斗。11月,从南方来的革命党开始四处活动,人们普遍感到,很快就要出事了。11月9日,教会的中国牧师收到一份手书的布告,上面写着:满人在奉天的统治即将结束,但基督徒们不必担心,如果不站在政府一边,人民军队将保护他们以及外国人。教会匆忙召开了会议,做了一个谨慎而又不失尊严的回答:基督教会热爱和平,为了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社会进步而奋斗。第二天早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是那位送布告的人来取答复。

整个城市都骚动起来了,特别害怕再次爆发战争。人们普遍意识到,能否发生战争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总督的态度。他是知名的帝党成员,因为军队中可能有一半人会支持帝制,而另一半人可能急于要戴上革命的袖标,如果总督旗帜鲜明地捍卫帝制,满洲肯定会卷入到一场战争之中。流血固然可怕,但比流血更可怕的是俄国和日本会采取什么样的相应行动。

11月10日,人所共知,全副武装的警察已经接到命令,一旦革命爆发,他们将保持中立,坚决维护社会秩序和防止趁机劫掠。同一天,召开了有重要官员、大商人和贵族参加的会议,计划组织保安会,由总督做主席,从而阻止动乱发生,在冲突中维护满洲中立,调解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人们普遍相信,在革命爆发的时候,赵尔巽保证不会抵抗。但是,考虑到满洲的特殊环境,他主张等到中国其他省份大局稳定之后,再决定共和。

但是,热心的革命者并不满意,在这些人中,有一位是军队的主要将领。11月11日下午,将军们开了个会,在会上他提出以其他省为榜样,杀了总督,然后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这对奉天和满洲来说,都是关键的时刻。但是,幸运的是,其他人,特别是张作霖将军反对他的做法,并取得了胜利,最后决定支持总督赵尔巽以及保安会。总督已经得到这次会议将召开的消息,因此把警卫派往政府大楼,而这些人誓死去保卫他。天黑以后,来了两名军官,要求面见总督,真是令人恐怖,但是,门卫礼貌地告诉他们,他不在家。

“我们必须把信亲手交给他,”他们坚持问,“他去哪里了?”

“在省政府办公大楼。”

两名军官和他们的骑兵护卫匆忙跑了。带着极大的惊慌,卫兵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总督。

“我必须马上跟他们去。”总督说完,骑上马就走了。卫兵想去陪伴他,但被他阻止了。“我独自去办这件事,可能回不来了。”

到达会议厅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作为保安会主席受到热烈的欢迎,军队也表示坚决支持他。11月14日,保安会正式宣布:一些著名的革命党人加入保安会,赵尔巽为保安会主席。在此之后,因为总督得到各个阶层的信任和欢迎,骚动一度沉寂下去。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在重大决策时所表现出的明智、老练、低调和勇气。

当冬天慢慢过去,赵尔巽拖延政策的英明显现出来,满洲宣布中立。尽管有骚动、期待、密谋,以及不时出现危机的接连影响,但社会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满洲没有流血,也没有给任何列强侵略满洲提供所谓“平定叛乱”的借口。风雨飘摇中的帝党召回了袁世凯,并把国家的权力交给他。在经过规模相当小的流血斗争之后,革命的战场已经从长江流域的武力对抗,转变为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恰当年末,朝廷颁布诏令:采用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制度,应该由人民来决定。这好像发生于皇帝退位前的几个星期。

在这种形势下,很难看清满洲革命党的意图和活动。虽然他们明显感觉革命进展太慢,如果还是同样一些官员掌握政权,革命没有什么意义,为了创建共和,谋杀几个人也是必要的。

十一月，一直强烈反对赵尔巽的那位将军离开了满洲。此时，最有权力的人是张作霖将军，他只有三十六岁，但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是一位人所共知的帝党。他原是左将军的部下，曾经参加平壤战役。俄国占领满洲期间，他率领一帮土匪，从事游击活动。后来，政府发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将其部队编入清朝正规军中，他才找到了充分发挥自己天赋的活动空间。此时，张将军已经成为当地的实际总司令。根据他的经验，绝对权力似乎自然是统治的惟一正确的方法。每个农民和工人都应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这在张作霖看来，实在难以忍受。他的士兵崇拜他，因为他关心他们，而且公正和慷慨。但是，他们也惧怕他，知道他握有生杀大权，而且使用起来从不手软。因此，身为保安会主席的赵尔巽，为了让两个极端的政治势力平静下来，为了等待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为了继续拖延下去，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手腕，而作为身系地方安危的张作霖，正率领高度戒备的军队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张作霖将军：他正率领军队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革命党最痛恨的两个人是赵尔巽和张作霖，为了杀掉两人，革命党开始秘密准备，一旦行动得逞，马上宣布共和。许多拥护共和政体的优秀人物受到牵连，其中有一位保安会的著名人物，也是我们医院的老朋友遭到杀害。张将军可能得到秘密消息，“进步协会”

召开的会议是一个阴谋,而且已经开始行动,因此张将军没有告知总督,就擅自调动军队,搜捕和屠杀革命党人。

1月24日夜,就是革命党人确定奉天革命的一周前,张作霖将军采取了行动。事先没有透露一点风声,突然对革命党人进行坚决的镇压。在他看来,正式的逮捕、起诉、审判似乎是多余的。一些参与密谋的革命领导人在离开秘密会议地点时落入士兵们手中,并在大街上遭到杀害。上文提到的那位保安会成员就是其中之一。士兵们闯入他的家中,进行彻底搜查,然后杀死了他的兄弟。在他的家里,找到许多罪证,其中包括:由遥远南方的革命领导人颁发的委任状;承诺支持奉天革命信件;在奉天各处同时起义的计划细节;将要杀害者的名单,包括总督、张作霖和另一位将军;一张接到的汇款单;所有这些证据中最为重要的是一张奉天支持者的名单,上面列有1500人。

黎明时分,人们就开始悄悄传递消息:昨天夜里张作霖的部队闯进一些人家里,杀了很多。但是,没有人敢于说三道四。以后的几天里,奉天到处弥漫着恐怖气氛。传言固然有些夸大,但遭到屠杀的至少有数十人,而且大多数发生在夜间。据说,天黑出去很不安全,每个街口都有士兵,检查过往的行人。蓄辫子原来就是满人的风俗习惯,也是非满人服从满人统治的标志,而近几年,奉天的所有学生都剪掉了辫子,此时,即使在大白天,街上再也看不到剪了辫子的人。据说,前两天,总督根本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事情,第三天,他马上命令把革命者的黑名单烧毁。

这段时间,我们医院的助手和药剂师非常恐慌。若干天前,我们接待了一位年轻人,他曾经是我们医院的学生,但是,由于学习成绩不怎么好,后来沮丧地离开了。此时,他回来了。穿着西装,打扮非常时髦,并特别庄重地宣布:他来自大连中国革命红十字会,并邀请我做他们的会长。有一位非常富有的中国绅士,如果我同意,会给红十字会捐助一大笔资金。同时,他也邀请医院的所有工作人员加入红十字会,这样,当革命者接管奉天的时候,大家就会并肩战斗。但是,助手们赞成我的意见,拒绝和他的所谓红十字会发生任

何联系。我劝他在被捕之前尽快离开,结果他独自离开奉天,及时逃走,挽救了自己的性命。后来,有人偷偷告诉我的助手王医生,他和医院其他两人的名字都在从叛乱者家中搜出来的黑名单上。毫无疑问,这是那位来访的年轻人所呈报的。那几天,王医生他们没有人敢于离开这个院子。

两个星期之后,颁布了皇帝退位公告,中华民国成立。

一二两个月,直到进入3月,张作霖的部队每晚都在城内巡逻。一队士兵占领了医院门前的码头,或者说是平台,如果我们碰巧天黑后经过那里去医院,也要受到盘查。某天夜里,一个人没有惊动这些士兵,想在高墙黑影的掩护下,跳过隔壁的院子溜回家里去,但是,一把明晃晃的刺刀突然对准他的胸口,让他站住。士兵对我们相当友好,设置岗哨确实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期间,在中国没有发生任何攻击外国人的事件。皇室成员在各方面也没有遭受到什么迫害。而且,民国的建立实际上是由朝廷的诏令颁布的。

革命开始之前,赵尔巽是位身体强壮,精力充沛的人。虽然69岁了,但外表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性格开朗,对前途抱乐观态度,使人充满信心。可6个月后,他变成了一位老人。内外的极度紧张把他击垮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遭到谋杀,也不知什么时候会被关在政府大楼里。他送走了家人,使其脱离了危险,而独自在奉天等待。做四川总督的弟弟遭到暗杀,而凶手就是弟弟的部下,这无疑是前车之鉴。对于朝廷退位,他有切肤之痛。他确信民国的人民不能管理自己。但是,他坚守自己的岗位,尽最大的努力把满洲从政治混乱的威胁中解救出来,而对满洲来说,政治混乱是毁灭性的。对他来说,降下龙旗肯定是非常痛苦的,但是辞职和逃离更不容易。在2月那个特定的日子,他忠于满洲的和平就像忠于从前的皇帝一样。民国的五色旗在政府大楼的上空高高飘扬。

说也奇怪,满洲与革命有关的战斗大多发生在宣布共和之后。对那些狂热的青年共和主义者来说,和平不是最终的目的。他们需要一场革命,推翻政府的革命。的确,民国的旗帜逐渐取代了衙门

上的龙旗,所有清朝的官员摇身一变为民国的官员。中国实行共和制度,一些官员肯定很不合适。

“他们都是假的!”那些抱着革命偏见的人激烈地抨击说:“他们在心里并不忠于共和。让他们滚开!”结果,到处发生叛乱。这些人打出了“民军”的旗号,由头脑发热的青年人率领,在地方土匪的帮助下,与靠民国的钱养活的军队作战。

年初,我受红十字会之托筹备分会。召集奉天领导人开会,向他们讲解红十字会的奋斗目标和工作方式。总督同意提供资助,投入很多资金供红十字会使用。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很小的执行委员会成立起来,指定我为会长。在此期间,与张作霖将军有过一次有趣的会面,我发现他非常诚恳。当时,张作霖的许多部下在我们这里住院,他认识所有的部下,并能够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来。他支持成立红十字会,承诺将在各方面给予帮助和便利。“因为满洲要流更多的血了。”他沮丧着说。这种悲观的预计并没有成为事实。总督的调和态度起了作用,除了影响不大的规模较小的叛乱和战斗之外,没有发生大的动乱。

其中有次战斗发生在开原,一队民军开进县城,占领了衙门。我们接到电报,伤员需要帮助。红十字会安排辽阳的韦斯特华特医生,以及我们医院的几名助手,在一名武装警卫的陪同下立刻前往。红十字会及时而有效的帮助给军官和士兵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幸运的是,战斗持续的时间并不长,革命者溃散了,领导人乘火车逃往南方,造反民军被军队收编,受伤的人被送往各个教会医院救治。

除了少数年轻的狂热分子之外,与全国其他地区的革命相比,这样不流血的革命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就权力而言,军队中有许多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根据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传统习惯,劫掠是征服者的特权。军队可以按照现代方式建设,但这种观念很难根除,义和团运动时期八国联军对北京和其他地区的大规模洗劫就是证明。由于战斗的规模很小,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抢掠。但是,在皇帝退位两个星期之后,由正规军发动的兵变和大胆地劫掠却时有耳

闻。在此后的6个月里,类似的城市叛乱此起彼伏,其中有些是因为没有及时发放军饷引起的。六月份,奉天发生了叛乱,参与者有1000人,但不是张作霖所控制的部队。当局及时发出警告,奉天城大门匆忙关闭,结果叛乱者只抢劫了城北郊区的银行和商店。为挽救危局,张作霖迅速行动,号召士兵们坚决平叛。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之后,叛乱遭到镇压,好多伤兵送到我们医院。

秋天,当共和已是既成事实的时候,在上海召开了红十字会会议,邀请各省代表参加。我受赵尔巽总督之邀,代表满洲参加会议。在我离开奉天期间,总督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在此之前,他一直催促中央政府,最后还是被接受了。满洲已经安全地度过了危机时期,而他也已精疲力竭,终于可以光荣退休。接着,他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客观地说,赵尔巽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公仆。

第二十八章 盛京医学院

十年树木,百年育人。

——中国谚语

1911年春天,因为鼠疫而耽误很久的盛京医学院工程终于可以施工了,同时,工作人员的住宅也开始建设。4年前,赵尔巽总督为医院的开业剪彩,对几年里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他非常高兴,并诚挚地表示愿意为医学院捐款,而且保证医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时,再次莅临剪彩。

秋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险些使仍然没有竣工的医学院建筑遭到彻底的焚毁。11月的一个夜间,约午夜时分,警察急促的口哨声和街道上嘈杂的脚步声把我们惊醒。有人告诉我们,曾经作为奉天鼠疫会议会址的工业学校着火了,我匆忙赶到现场。此时,天正刮着大南风,火势很猛,一时难于控制。结果,四栋由廊道相连的建筑很快起火燃烧。这里装有水泵和灭火器,但都生锈不能用,结果不得不使用水桶。我们组织人们集中力量切断火源,然后再抢救燃烧的建筑。从河边到火场,人们排成两排,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传递水桶救火。虽然水量有限,但源源不断。同时,院中的水井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最后,当危险就要过去的时候,水泵才开始抽水。医学院的办公房恰好位于燃烧建筑的西面,似乎一度保不住了。如果办公房着火,在附近的木结构储藏室也不能幸免。而储藏室与医学院大楼之间只隔着一条狭窄的小径。大楼的脚手架还没

有拆,工匠们刨下的刨花,锯下的木头遍地都是。紧邻医学院的是医院。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靠从河边传递上来的水把办公房的房顶淋湿,房顶多次着火,又多次被扑灭。在医学院的院子里,我们的人一直不知疲倦地忙碌着,浸湿木制品,踩灭刨花里散落的火星。如果风向稍微转一转,这里就不可想象了。危险逐渐过去,火势得到了控制,最后终于熄灭了。

医学院由三层楼房和一层地下室组成,建筑紧凑而坚固,因位于这一带的至高点上,有如鹤立鸡群,显得特别醒目。附带正楼的西半部是为纪念杰克逊医生而建的;东半部是为纪念著名的旅行家毕晓普夫人而建的。暖气、电灯、给排水装置、设备、陈设品、实验室、还有其它设备都用学院的资金购买。所有的学生,总数不超过50人,将住在楼上。顶楼暂时做学生宿舍,等到宿舍楼建立起来,再搬过去。

医学院宣布的开学时间在1912年初,学生入住的宿舍已经准备好了。但一个非常重要的疑问仍然没有解决,那就是能有多少学生符合医学院的录取标准。我们知道很多人想来学习医学,但他们

盛京医学院



能通过入学考试吗？以基督的名义在这里从事医学教育，培养我们的同行和接班人，以确保我们的工作不会因为我们的离去而沉寂，这是我在奉天生活的岁月里，一直梦想的事情。如今，医学院的建筑已经竣工，多年的梦想就要变为现实，可是结果究竟会怎么样呢？

所有的中文报纸，教会学校和公立学校，都收到了医学院的入学考试通知，上面对考试科目和考试地点、医学学制和所需费用都做了详细介绍，并要求报考者于11月内报名。各报免费刊登了这则通知。奉天著名的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感人的社论以提醒公众对此事的关注。但是，还没到11月，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在青年学生，特别是政府机关中普遍弥漫着焦虑和不安的气氛，而公立中学正是我们希望从中涌现大批报名者的地方。因此，进入11月的时候，我们真有些担心。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申请者一批批涌来。最后期限截止之前，已经有270人报考。毫无疑问，如果社会秩序正常，前来报考的人会更多。

冬天，局势更加的动荡不安，真不好说届时能有多少报名者前来参加考试。既定的考试日期是1月25日和26日两天，共在满洲设立13个考点。由于政治局势紧张，12月，所有的公立学校关门停课，青年学生分散回到各地的家中。商业活动几乎停止。因此，以前能够轻松担负得起大学学费的人，此时也不敢肯定将来会怎么样。土匪多如牛毛，乡村道路非常危险，交通困难。尽管如此，仍有142人参加了考试。考生可以在下面这些科目中选择5个科目进行考试：汉语、算术、地理、历史、古代经典、代数、英语、化学、物理。除了古代经典之外，上面这些科目都已纳入到以后6年的课程设置中。

仅在奉天就有73人参加了考试，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其中半数以上的人都剪了辫子。当考试正在进行的时候，城里突然抓起革命党来。第二天早上，学生们激动地议论着昨天夜里发生的大屠杀。等到考试结束的时候，到处都笼罩着恐怖气氛，可以说是人人自危，特别是那些剪了辫子的人更是不敢出头露面。如果考试时间延迟两天，没有几个人会前来应试。

我们从参加考试的 142 个人中录取了前 50 名,其中近四分之一是基督徒。由于政治局势严峻,赵尔巽总督不能在集会上露面,因此,我们连一个正规的开学典礼都没法举行。在形势好转之前,正常的教学也必须推迟。1912 年 3 月 28 日,学生们来到医学院,平静地走进课堂,开学了。

几乎在我们筹建医学院的同时,南满铁路公司(从大连到宽城子的日本铁路线)以奉天火车站附近铁路医院为基础准备从事医学教育。从那时开始,一栋大楼已经竣工,并且在不断完善。教学中使用日语,大部分学生是日本人,也掺杂着一些中国人。在医学院附设的学校里,用日语和德语给中国学生们授课。

起初,我们的教学人员稍显不足。苏格兰自由教会的传教士缪尔医生,已经在满洲工作了 15 年,前年,我们已经商定要在医疗传教和医学院的工作中进行全面合作。无论在贯彻我们的计划,还是在推动医学院的运转方面,他的加盟和能力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位有着丰富经验和精湛技术的丹麦传教士艾勒贝克医生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到 1913 年秋天,我们已经有 8 位工作人员,其中 7 位是医务人员,一位是有资格的药剂师。在其他城市还有一些医疗传教士,他们也将承担起学院的一些课程。在我们的工作完全就绪之前,还需要一些中国和国外的教学人员。

医学院和医院的紧密结合对临床教学最为重要,而且,还可以使医务人员同时在两个机构中工作。我们现在有 110 张病床,根本满足不了临床教学的要求,而且由于病房不足,很多患者根本不能住院治疗。两年前,我们非常担心在医院和医学院周围修建公路,那样,就没有向周边政府土地扩展的可能性了。我们向政府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把医院后面那片狭长的土地拨给我们。我们计划在那里建设一座两层楼房,以增加 50 张病床。在外国患者提供的资金帮助下,1913 年这个建筑开始施工。在盛京医院的日常工作中,一直坚持免费治疗的原则,保持着医疗传教工作纯粹的慈善性质,但是,患者自愿捐助的钱比我们的收费还要多。然而,现在富裕的患者要求住私人病房,而且愿意付费。为此,我们正在做准备工作,

同时寻求帮助以应付越来越多的支出。

我们计划要一名女护士来担任医院的护士长,管理所有的护理工作,并培养一些男护士。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护理水平。

与从前相比,我们的门诊患者增加了许多,在过去的12个月里,总共有45000人前来就诊,这为临床实践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医院的所有工作都由一个人控制的时候,一切都井井有条,但是,当几名医生和许多学生插手之后,则显得相当混乱。因此,我们做了很大的调整。现在,我们有3个候诊室,即外科、内科和眼科,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处置室,以及电疗室。结果,我们4位医生可以同时接待患者,学生们也可以轮流进行实际锻炼。一个手术室不够,靠一位老朋友遗赠所提供的费用,我们现在已经有两间明亮的现代化手术室,使学生们能够进行直接的观察。

医学院的学制五年,我们国内医科大学设置的一般课程这里都能开设。学院的水准和专业考试尽可能接近国内标准,在毕业证书上将盖有政府的大印。所有学期都开设英语课程,如果学生毕业后想赶上世界医学发展脚步的话,必须有阅读英文资料的能力。在我们所举行的第一次课程考试时,奉天教育厅按照我们的请求派一名代表亲临现场监督,政府对盛京医学院各方面的发展越来越重视。

由于我们的教员有限,每年都招一个新班是不可能的。第二届招生工作将在1914年1月进行,入学标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预计新的宿舍楼将在1914年春季开工,等到其竣工的时候,现在的教学楼将完全用于教学的目的。

培养合格医务人员的工作已经开始,美好的前景展现在学生们面前。多年的经验使我确信:中国人特别适合做优秀的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他们的智力水平很高,乐于学习科学知识,记忆能力很强,惯于观察细节,而这些在诊断中是最为重要的。加之他们手指灵巧,成为优秀的外科医生不成问题。当然,他们对我们的教学方法还很陌生,我们开始遇到的一个主要困难是许多学生还没有养成专心思考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习惯。

在中国的毕业生中有一种不良倾向,即满足于自己已经学会的东西;不思进取,热衷于眼前的利益,而对科学进步则漠不关心。我们所能做的,是唤起学生们的职业自豪感,为工作献身的敬业精神,以及无私奉献的热忱,虽然在我们的国家,这一切被视为理所当然。

在一般人看来,医学院所宣称的基督教性质根本不是缺点。毫无疑问,基督教与人类的健康有着天然的联系,有这么多非基督徒申请或正在申请入学,说明他们把基督教当作好东西,至少没有当作异类看待。1917年,当学院第一批学生毕业的时候,他们的前途将一片光明。我们希望留下几个人在学院做教师,使其发挥外国教师同样的作用。另外一些人将成为我们医院和其他医院的内科和外科医生。还有一些人将进入政府机关,那里特别需要合格的毕业生。中国基督教会已经表示要拥有自己的医学传教士。除此之外,全国的私立医院和诊所,对医务人员的需求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如果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中,有意识把服务于上帝和服务于人民结合起来,我们将为满洲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十九章 革命过后

离开往昔低矮的洞穴，
建起一座比一座更为富丽的殿堂，
抛开茫茫无际的苍穹，
在你自由的王国里翱翔。

——O · W · 霍姆斯^①

随着民国的建立，在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官称和新的规则。总督改为军事长官，或都督，其权力受到更多的限制。赵尔巽的继任者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到奉天的第二年，城内有位低级官员张锡銮^②请我到他家去，为就要死去的孩子看病。我断言这个孩子活不到第二天早上，做再多的努力也没有什么用处，结果，让我言中了，从此，全家人对我特别信任。不久，我们就成为好朋友。因为关系特别密切，张锡銮和他的家人经常到我们这里来坐坐，不拘礼节，非常随便。后来，他到各地任职，几年都不能见面，但他无论什么时候回到奉天，我们都会相互看望，频繁交往。在任职期间，他深受人

①O · W · 霍姆斯(O.W.Holmes):19世纪美国著名的诗人、幽默作家、散文家和医生。译者注。

②张锡銮(Chang His Lan):监生出身，“智谋胆略，学识兼备”，光绪元年(1875)任通化知县，锦州、凤凰厅候补道。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中，授东边道。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安东开埠局总办。1914年，以镇安上将军节制东三省军务。1915年，任湖北将军。1917年退出政界。译者注。

民的爱戴。当人们听说他做奉天都督的时候,都非常高兴。在这个边疆省份,任职很不容易,但在张锡銓任都督期间,却天下太平,没有发生大的动乱。

满洲有在其他省份难以理解的希望和忧虑。满洲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满洲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满洲与中国其他部分有着共同的语言习惯,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文化信仰,在共同的政治体制管理之下,因此,任何列强对满洲的统治都是人民难以接受的。偶尔乘火车的外国旅行者会留下一个非常不真实的印象。他从西伯利亚边界登上俄国的火车,穿越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的荒野,包括那些已不再属于中国的俄国领土,然后,改乘设备完善的日本火车,他会更加确信:除了名称之外,整个南满洲真正成为日本的领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铁路不是沿着人口稠密地区铺设的,居住在铁路附近的中国人很少,因此,他没有看到人口密集的众多村庄和城镇,无论是日本还是俄国的影响和势力都没有波及到那里。他不熟悉满洲城市居民的生活,教育的发展,政府的运作,这些外国根本没有涉足的事务。实际上,自从革命以来,满洲充满激情的中国人要比过去多得多。

目前奉天最有权威的人物除了都督之外,就是张作霖将军,众所周知,他对政敌从不手软,但也为保卫和平做了许多事情。人民惧怕他,同时相信他能使国家摆脱所面临的现实危险。只要皇帝在位,他会极力镇压任何革命企图,即使孤军奋战,也会坚持下去。现在,民国取代了清朝,他又效忠于民国,把袁世凯当作可以信赖的人。

参观盛京医院之后,张将军决定在军队里建立医疗机构,宣布需要一些医生,结果各种请求蜂拥而至。春季里的一天,他来看我,满脸不高兴。

“您能为我推荐一位值得信赖,又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医生吗?”他说,“要多少薪水都行,但我要一个好人,我不信任那些夸夸其谈的家伙,这样的人我一个都不要。如果您能为我物色一位像您医院王医生这样的人,我就非常满意了。”我答应尽最大努力满足他的要求,但此事并不那么容易。

多少年来,王医生一直是我的得力助手。21年前,他从学校毕业就直接到我这里工作。自从义和团运动以来,他已经成为我的主要助手,在各个方面都要依靠他。事实上,他和一位外国医疗传教士做着同样多,同样重要的工作,而且他的平和、稳重的善良品格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日俄战争后,因为他对中国伤员所提供的帮助,清朝政府特授予他五级勋章。在奉天,他很有名气,并且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不断有人用很高的薪水诱使他离开盛京医院,只是几年前,有人通过我请他去别处工作,薪水是每年150英镑,而我们每年给他的薪水是45英镑,我把决定权完全交给他,但他根本没有怎么考虑就拒绝了。

“医生,”他说,“自从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您就是我的主人和老师,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您教导的结果。只要您需要我,我永远不会离开。”

然而,从那以后,环境发生了变化。现在,在我们医院和医学院已经有许多位外国医生,过去王医生常常要做的工作,可以由他们承担起来。当医学院的学生到医院临床实践的时候,王医生肩上的压力会逐渐减轻。除此之外,学生们在校期间,要完全系统地学习医学知识,数年之后,他们将作为住院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而王医生则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这些事他看得非常清楚,也常常和我谈起。因为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人选,我就



王医生:像王医生这样的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把张将军的意思讲了,问他愿不愿意去。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他决定接受这个职务。张作霖授予他很高的军衔,职务大致相当于总军医,有组织和管理全省军事医疗机构的绝对权力,只对张作霖本人负责,在满洲,从来没有一位医生享有过这样高的地位和掌握这样大权力。像王医生这样纯粹的基督徒在这样重要的位置上,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几天后,张作霖将军前来拜访,非常热诚地感谢我为他找到这样优秀的人才。在交谈时,我提到了X光的作用,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要马上看一看。但是,当听说我们没有钱买的时候,感到有些失望。

“马上买,”他说,“我花钱。”结果全套X光设备很快运了过来。我从张将军那里得到2000美元(约170英镑)的支票,解决了费用问题。

迄今为止,民国的道路一直充满着荆棘,长江流域的流血冲突自然会影响到满洲。关于政治形势,虽然奉天城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一切都很平静。以前,很少有人知道或关心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看来时代真的改变了。在民国建立后的混乱和动荡局势下,由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掌握方向,对国家是非常有利的。这个人应该有足够的力量引导国家渡过这场风暴,把国家从无政府状态下挽救出来,这远比应该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制定出持久的英明措施要重要得多,而他的垮台必然导致国家的混乱。袁世凯的政治才能和稳固基础使他获得成功:保持了国家的完整;南北有统一的可能;建立起稳定的政府,而且得到各国的承认。

我们仍然焦虑地注视着可能出现的意外麻烦,但当局显然准备应付任何反抗。可以预料,在接着的一段时间里,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巩固统治基础上。事实证明,袁世凯总统就是国家危机时期所需要的那个人。通过明智公正的立法和组织,平息国内的战争,从反叛的革命者手中收回土地,这是现在摆在他面前,以及身边干练内阁面前的首要任务。

过去两年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莫过于公众对基督教态度的完

全改变。在清朝统治下,对基督教仅仅是宽容。在省议会选举中,基督教的神父和牧师没有投票权。当某人的观点从没有人理会的时候,政治的运作环境就会导致任何基督徒都没有担任官职的机会。基督徒实际上被剥夺了参与国家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权利。在导致革命的启蒙教育过程中,基督教的书籍和教会学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讲英语的年轻人中,很多人至少有部分时间是从师于传教士的。在革命以及后来发展中涌现出来的大部分杰出领导人,是那些多少能讲些英语的年轻人。除此之外,成千上万人迫切需要的关于历史、政治、经济等中文教科书,其中绝大多数是按照基督教观点撰写的。

袁世凯刚刚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明确宣布废除对基督教徒的歧视政策,所有人都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政治平等的权利。如今,在许多地方,基督徒占有重要的位置,许多政府官员不是基督徒,但却对基督教的奋斗目标表示理解。大约有60名基督徒被选入国会,参议院的副议长就是一名基督徒,外交总长一度也是基督徒。1913年1月,中国医疗传教士协会在北京开会,总统极为热情地接见了出席会议的80名代表,并对医疗传教士多年来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相信他们会继续帮助中国。

有一个在全国各地都受到热情支持的基督教组织,称作基督教青年会^①。与我们国内所说的基督教学生联盟类似,中国通称为“青年会”。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青年加入这个组织。自辛亥革命以来,满洲境内的大小城镇都想建立青年会的支部,但是,由于缺乏人手,目前,只有少数城镇建立起这样的机构。在比较大的中心城市,青年女子也有建立相似组织的愿望。

^①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1844年6月6日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创立于伦敦,希望通过坚定信仰和宗教活动来改善青年的精神生活,1851年传到美国后,逐渐从单纯以宗教活动为号召的青年职工团体,发展成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的社会活动机构。清朝末期传入中国,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译者注。

1913 年春天,著名的约翰·莫特医生^①来到中国,在广州、北京和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的聚会和演讲。各地方当局都给予热情的支持,会议规模空前,最后,莫特医生来到奉天。两星期前,我拜访了都督和奉天教育厅厅长,向他们解释了要召开会议的性质,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请他们配合找到一处较大建筑作为会场。他们非常高兴地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工作。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厅长说,“每个学生都应该出席。”

奉天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建筑,因此政府出资,在古代狐仙庙附近的一片露天广场上搭起一个巨大的席棚。3 月某个星期六的下午,五千奉天的优秀学子,包括在读的学生,已经毕业的学生,教师以及许多政府官员聚集到这里。年龄稍大一些的中学生组成乐队,挥动旗帜走进会场。大会由教育厅长主持。莫特医生做了很有说服力的演讲,鼓励年轻人提高生活品位,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并且强调说:只有基督教才能净化人们的灵魂,建设完美的社会。接着,教育厅长也讲了几句话,号召大家很好体会莫特先生的忠告。

因为只有凭票才能入场,外面还有很多人听不到演讲,感到非常失望。为了满足这些人的要求,莫特医生就在狐仙庙的台阶上进行了演讲,而在庙中,最为原始的狐仙崇拜也在同时进行。30 年前,就在附近,人们用石块攻击传教士;1900 年,就在席棚立起来的地方,义和团砍下了一些基督徒的头颅。第二天,又一次召开学生大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教育厅长再次主持了会议。共有 1500 人出席,其中许多人开始学习《圣经》,真诚地听从上帝的呼唤。

根据安排,莫特医生拜会了都督,而都督马上礼貌地进行了回访。都督热烈欢迎莫特医生到奉天来,衷心感谢莫特医生对学生的教诲。然后他转向我,动情地说:

“为了把青年人引导到更高的境界,莫特医生的演讲非常及时,但愿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①约翰·莫特(John Raleigh Mott):美国宗教家,是世界青年联合会的创始人,因为他在推动青年进步上的卓越贡献而获得 1946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一个月后,奉天的负责传教士和教会的中国牧师同时接到从北京来的电报,通知政府:要求所有基督徒为国家祈祷一天。

都督也接到了如下的电文:“为现在正在召开的国会,为新建立的政府,为仍要去选举的总统,为民国宪法,为中国政府能够得到各国的承认,为和平降临到我们的国家,为有能力有道德的人当选,为政府基础的巩固而祈祷。接到此电报后,要求你通知本省的所有基督教会,定于4月27日为国家祈祷日。所有人必须参加。”

那个礼拜天,教堂里挤满了人,在我们东教堂,专门给官员们留出了座位。都督不在家,派了一位代表。几位高级官员也到了现场,其中包括省议会的副议长,还有几个以前从来没有到过教堂的人。在教堂的门口,每名祈祷者都接到一张仪式单子,上面有经常齐声重复的“上帝的祈祷者”字样,以及赞美诗,还有祈祷时专门选择的祈祷者说的话,总之,仪式的内容都在上面,印得满满的。在刘牧师一段特别雄辩的布道之后,一个接着一个的官员都说了几句赞美的话。这次祈祷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真挚最为突出,人们诚挚地希望上帝的力量能够庇护新中国。那一天,一些普通的基督徒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平静地聚会,为满洲上帝王国的到来而祈祷,他们记得所有的细节,心里非常充实。

随着对外国人传入宗教的接纳,出现了对外国服饰、建筑和各种知识的渴求。但是,在新建立的民国中,也有一种厌恶外国人在各方面干涉的情绪,在每件与外国相关的事务中都可以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年轻国家自然的敏感和古老排外情绪的结合。在满洲,传教士们一直鼓励独立精神,因此,满洲教会中强烈的独立愿望能够水到渠成。

在这方面,奉天是幸运的。满洲有三个传教使团在工作,都很有实力。不像一些省份那样,不同宗派之间相互竞争,给中国人留下不良的印象。同年春天,在莫特医生来奉天期间,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在他的邀请下,来自满洲各地的传教工作者代表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议。与会者共75人,约占从事传教工作总人数的一半,其中有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丹麦人,以及百余名中国的传教

士、长老、布道师、教师和医疗助手,有男人,也有女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团结,即中国人和外国人,长老教会和路德教会,应该结成兄弟,从而促进满洲基督教事业的发展。反对宗派主义,来自不同教会的不同管理方式,只能看作是满洲基督教会建立过程中的权益之计,教会是中国人的教会,只有中国人才有最终的选择权。

在人间建立天国的过程中,我们期望中国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基督教会”不能长期处于西方教会的监护之下。虽然中国教会正在挣脱束缚,而且逐步前进,但仍然需要我们国内基督教会的理解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携起手来,迅速推进运动的发展,让上帝的光芒普照中国的大地,使其成为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世界强国。

第三十章 展望未来

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但在落日余晖的宁静之中，我们不能够分享。

——W · E · 亨里^①

中国未来会怎么样？为改造国家，三亿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卓绝奋斗的结果又将如何？至少智者会有所预见。

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性，这个特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即使在今天的革命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尽管时有王朝更迭的发生，征服洪流的激荡，但是，这个国家依然存在。中国人的固有观念很难改变，如天命难违、祖先崇拜、家庭神圣、敬奉鬼神等等。孔子生活和写作在基督诞生前5世纪，他的理论观点、哲学思考、人生态度基本上为今天的中国人所传承。中国人不仅仅信奉孔子，而且已经把孔子的著述融入到思想中，并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这一点是没法改变的。

如果没有难以恢复的灾难，我们能够闯入这片平静的土地吗？这些年来，尽管中国表面上逐渐衰落，可仍然是一个整体。然而，如果存在着西方不断侵略这样的干扰因素，如果存在着依据现代观念改变国家体制的各种尝试，难道中国必定四分五裂吗？当然，基督

^① W · E · 亨里(William Ernest Henley): 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诗人、批评家和剧作家。译者注。

教本身并不是分裂的力量。

不管她的历史有多么漫长,前些年有多么衰落,如今,中国正在强大起来,摆脱萎靡不振的状态,越过各种各样的阻碍,生机勃勃地屹立在世人面前。王朝会灭亡,但人民常在。与那些不利的观点和质疑相反,他们的生活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中国人民恒久的特质永远不会改变,而且,事实正在证明这种特质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能够融入世界的潮流,能够吸收迄今对他们来说还是陌生的优秀思想。爱国主义、自由主义、政府自治、权力平等、社会进步、义务教育、国教运动^①等等,这些新鲜名词挂在人们的嘴边,萦绕在人们的心里。要那些迄今为止不善辞令的人民群众理解新的思想和新的精神还有待时日,但是,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正是那种曾一度威胁到中国统一的进步力量,会将中国塑造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的国家,我们对此坚信不疑。

最初,中国似乎只是在模仿其他国家,但是,或迟或早,她将开辟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西方的影响显然很大,但大多是在表面上发挥作用,并没有触及到社会的基础。当中国人吸收了西方的精华之后,其思想和内心世界的独特个性将逐渐再次肯定自我,而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思想和内心世界是很难理解的。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中国的发展将走什么样的道路,但是,那些对中国人内在人格力量深有感触的人们确信:中国有着光明的未来。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吸收了年轻的文明之后,这个国家完全可以走上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青年。无知而守法的农民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在宣传的刺激下,对民国的期望值很高。千百万人的心中已经燃起希望之火,国家很快就会进步,教育,文化以及物质繁荣也会惠及到穷乡僻壤。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已经出现,渴望永久的和平、稳定的政府、公正的规则,由此,中国可以发展和繁荣,从而完成其伟大的历史使命。在那些为这场革命和共和制度

① 国教运动:指民国初年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将孔教立为国教的主张。译者注。

奔走呼号的年轻人中间,许多人具有非凡的才干和智慧,国家的兴衰就落在他们的肩上。没有富有经验和权威的长者以及其他人的合作,他们自己不能重组政府和改造国家。但是,可能的情况是,他们不能容忍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措施和不同的人,正因为如此,最终却阻止了他们对国家的重组和改造。中国将收获多少革命的果实,完全取决于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多大发挥作用的机会,而这些年轻人是否愿意或能够抛开个人偏见和得失以及党派观念,为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全心全意与其他人共同奋斗,同样至关重要。

中国政治原则的全面变革自然要冒很大的风险,然而,益处也相当明显。这个益处主要体现在将来,在整个国家完全安定下来之前,人们无论如何都很难看清这一点。现在,已经选举了正式的总统,叛逆集团也遭到镇压,安定局面指日可待。但是,在我们中间,危险明显地存在,有思想的人都能看到这一点。为了获得参政权力,西方人经过数个世纪的斗争和思考才建立起议会制度,而中国的议会制度并没有经历一个发展过程,轻而易举就成立了国会。事实上这样的议会并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目前,存在着一种不良倾向,即轻易抛弃旧的东西,因为它是旧的;盲目采用新的东西,因为它是新的,既未尝试,也不了解。嘲笑传统的礼仪制度;模仿和夸大西方两性之间的自由,而没有考虑到这种自由是在基督教文化土壤中形成的,并且由这种土壤来保证其安全;公开嘲弄佛教和道教及其偶像崇拜,却忘记了无知的崇拜总比什么都不信要好得多;因为儒家思想有利于专制制度,许多人放弃了这个学说,孔子的道德理想也被弃置一边。在孔子国家和社会制度的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五种关系^①,现在实际上被颠倒了。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孔子主张把忠诚和服从作为人们内在和恒久的义务,但是,现在,首先君主被彻底推翻了,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君臣关系不存在了,还有必要奴颜屈膝地去遵循其他四种关系吗?因

^①五种关系(The Five Relationships):这里所说的儒家五种关系,应该指五伦,即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君臣五种伦常关系。译者注。

此,孩子们开始藐视和反抗父母;青年人不再尊敬长者;学生们决定教师必须教什么,什么时候教,以及如何教;少年宣称有自己的原则,而对老者的经验嗤之以鼻。

在有身份有责任感的中国人眼里,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缺乏道德自律,这是现实生活中最为急迫的危险。为了抵制充溢那片国土上放荡不羁的洪水,抵制不顾传统束缚鼓吹挣脱所有克制的自由,许多坚定的老儒生看到自己的后人成为基督徒甚至非常高兴。当听到许多人对宗教的精神方面没有一点兴趣的时候,难道不使人震惊吗!

“如今中国青年缺少的是道德(信仰,道德标准)。”张作霖说,“为了使士兵们强健,我愿意在我的部队里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我读过许多有关拿破仑的书。他是位杰出的将军,但是,在道德方面缺乏修养。他掌握国家大权,但没有道德标准。因此,他对全世界造成威胁。”

道德和信仰是人们普遍向往的事物,对许多人来说,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受到欢迎。在各个省,对西方教育的开放是非常显著的,宗教说教如同科学教育一样易于为人们所接受。教育是如今社会进步的关键。假使每个卓有成效的教会大学和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能够成倍地增长,但仍然难于满足社会的需要。为了抵制今天社会上的不良倾向,为了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摆脱只为个人利益和幸福而奋斗的困扰,进入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是很好的选择。

大事编年

- 1583 年:在努尔哈赤领导下满族势力开始壮大。
- 1621 年:努尔哈赤占领奉天,并把奉天作为后金的首都。
- 1644 年:满族夺取北京,把北京作为首都。
- 1838 年:法国罗马天主教会开始在奉天传教。
- 1870 年:天津大屠杀:18 名法国人,2 名俄国人被杀。
- 1872 年:系统的新教传教工作在满洲开始。
- 1876 年:系统的新教传教工作在奉天开始。
- 1883 年:新教传教士在奉天有了永久性住所,并建立了诊所。
- 1883 年 5 月:中法战争爆发。
- 1885 年 5 月:盛京医院正式开业。
- 1887 年:伊斯兰教徒造反。
- 1888 年:满洲发生特大洪水。
- 1894 年 5 月:中日战争爆发。
- 1894 年 7 月:左宝贵将军率部入朝参战。
- 1894 年 8 月 10 日:尊敬的怀利牧师在辽阳被满人士兵杀害。
- 1894 年 9 月 15 日:在朝鲜平壤战役中左宝贵将军战死。
- 1894 年 10 月 25 日:日军越过鸭绿江,侵入满洲境内。
- 1894 年 12 月 3 日:红十字医院在牛庄港建立。
- 1895 年 3 月 6 日:日军占领牛庄港。
- 1895 年 5 月 8 日:中日之间签订和平协定(《马关条约》)。
- 1895 年 7 月:传教士们返回奉天。
- 1896 年:满洲第一位中国牧师在奉天出现。

1896年9月：特许俄国铺设穿越北满洲的铁路。

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牧师在山东被杀害。

1897年11月14日：德国占领胶州湾。

1898年3月：俄国占领亚瑟港和大连湾，特许俄国铺设从哈尔滨到亚瑟港的铁路。

1898年6月：英国占领威海卫。

1898年9月1—21日：朝廷颁布变法诏令。

1898年9月21日：发生政变，老太后重新掌握政权。

1898年9月28日：六名改革者被处决。

1899年：义和团在山东兴起。

1900年4月25日：在直隶保定府附近，2000名义和团袭击天主教徒。

1900年5月26—28日：直隶火车站被焚烧，铁路被拆毁。

1900年6月1日：在直隶境内，两名英国传教士被杀。

1900年6月8日：直隶保定府和通州的传教士房产被烧毁。

1900年6月10日：西摩尔海军上将率两千士兵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

1900年6月10日：第一批义和团到达奉天。

1900年6月13日：北京有数百名基督徒惨遭杀害。

1900年6月17日：联合舰队攻取海河河口的大沽炮台。

1900年6月17—23日：中国人死守天津。

1900年6月20日：义和团在北京杀害德国公使，进攻各国公使馆。

1900年6月21日：人们私下催促传教士们离开奉天。

1900年6月25日：最后一批新教传教士离开奉天。

1900年6月30日：在直隶保定府对中国人和传教士进行大屠杀。

1900年6月30日：开始焚烧奉天传教使团的建筑。

1900年6月30日—8月11日：义和团统治奉天。

1900年7月9日：在山西太原府，毓贤大规模屠杀传教士。

- 1900年8月11日:盛京将军发布公告攻击义和团。
- 1900年8月15日:联军解除对北京公使馆的围困。
- 1900年10月1日:俄军占领奉天。
- 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
- 1904年8月24日—9月3日:辽阳战役。
- 1904年10月:沙河战役。
- 1905年1月:日军攻陷亚瑟港。
- 1905年2月19日—3月10日:奉天战役。
- 1905年5月:日俄对马海峡大战,俄军失败。
- 1905年7月:和平条约签订。
- 1905年6月:满洲禁止吸食和种植鸦片。
- 1907年3月5日:盛京新医院正式开业。
- 1907年4月:新教传入中国一百周年大会在上海召开。
- 1907年11月:奉天东郊新基督教堂投入使用。
- 1908年春天:满洲开展复兴运动。
- 1908年7月:获得盛京医学院地皮。
- 1908年11月:老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死去。
- 1909年1月:袁世凯下野。
- 1909年10月:奉天和各地召开议会。
- 1910年11月11日至次年4月:满洲流行肺鼠疫。
- 1911年1月25日:亚瑟·杰克逊死于奉天肺鼠疫。
- 1911年4月:奉天国际鼠疫会议召开。
-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革命。
- 1911年11月9日—11日:奉天革命。
- 1911年11月:袁世凯重新掌权,摄政王退位。
- 1912年1月24日—26日:盛京医学院举行入学考试。
- 1912年1月25日:奉天处决和镇压革命党人。
- 1912年2月:皇帝宣布退位,民国宣告成立。
- 1912年3月28日:盛京医学院开学。
- 1913年3月:莫特医生在各城市对青年演讲。

1913 年 4 月 27 日：确定国家祈祷日。

1913 年 10 月 10 日：袁世凯当选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奉天三十年(1883-1913)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

【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 著

【英】伊泽·英格利斯 编

张士尊 信丹娜 译

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83-1913

Being the experiences and recollections of Dugald Christie, C.M.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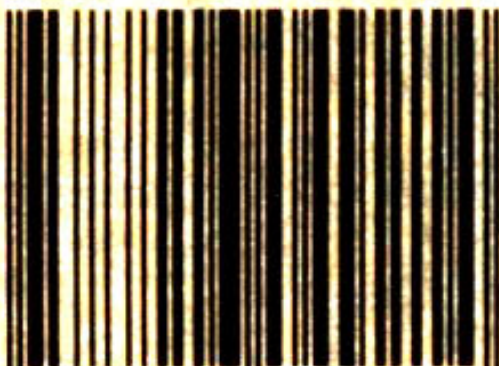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1855年出生于苏格兰。22岁时，进入爱丁堡大学医疗传教士学院。毕业以后，长期在中国东北传教。本书的合作者伊泽·英格利斯为杜格尔德的妻子。1914年，她和杜格尔德应一位伦敦出版商要求写作本书，成书后由伦敦“康斯特布尔有限公司”于1914年5月出版。

1883年至1913年这三十年，是东北历史风云变幻最为复杂的时期，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黑死病、辛亥革命，起伏跌宕。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形象地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因此，本书为晚清史、东北地方史、基督教传播史、社会史等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同时又不失为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史读物。

杜格尔德虽然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但这并不等于其所有记述都符合历史实际。为了保留历史著作的完整性，我们对书中某些观点没有改动。读者在阅读时千万不要忘记他的真实身份：一位著名的英国医疗传教士，一位基督徒。

责任编辑：祝祚钦
装帧设计：陆智昌
美术编辑：邹典佐

ISBN 7-216-04921-7



9 787216 049214 >

定价:25.00 元